PUBLIC OPINION

东方编译所译丛

BY
WALTER LIPPMANN

公众舆论

[美]沃尔特·李普曼 著

阎克文 江红 译

PUBLISHING HOUSE

东方编译所译丛

PUBLIC OPINION

ISBN 7-208-03987-9

9 787208 039872 >

定价 20.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PUBLIC OPINION

BY
WALTER LIPPMANN

公众舆论

[美]沃尔特 · 李普曼
著
阎克文
江 红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众舆论/(美)李普曼(Lippmann, W.)著;阎克文,江红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Public Opinion
原出版者:Simon -Schuster Inc, 1997
ISBN 7-208-03987-9

Ⅰ. 公… Ⅱ. ①李…②W…③阎…④江…
Ⅲ. 舆论-研究 Ⅳ. 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050 号

特约编辑　林铭纲
责任编辑　顾兆敏
封面装帧　王晓阳

·东方编译所译丛·
公众舆论
[美]沃尔特·李普曼 著
阎克文　江　红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插页 3　字数 232,000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7-208-03987-9/G·766
定价 20.00 元

Public Opinion

by Walter Lippmann

Free Press Paperbacks Edition 1997

Published by

Simon & Schuster Inc.

译者前言

乍看上去,凡是存在公共生活的地方,"舆论"这个概念可谓众所周知,关键是,它还显得不言而喻。之所以如此,最简单的原因大概只有这样猜测了:因为人人都和它有关,至少是可能和它有关。所以,自从它走出欧洲启蒙运动作家们的书斋以后,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大众化的日用概念,到如今,即使是个文盲,也无需先记住定义就能大体上知道它指的是一种什么现象,而定义恐怕反倒会把他绕得糊涂起来——且不管有没有能让人人都不糊涂的定义。

不过真要细究起来,事情就远不是那么简单了。只要从"什么是舆论"这个起点继续前进,那么立刻就会面临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比如说,舆论是固有的吗?如果不是,它又是从哪儿来的和怎么形成的呢?它能承载或者不能承载什么样的功能?它能达到或者不能达到什么样的强度?它能造成或者不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幸好,舆论不能没有主体,这使我们可以在一个比较明确的范畴内去审视舆论,虽然同样不简单,可至少不会漫无边际。毋庸赘言,"舆论"的主体就是"公众",换句话说,舆论总是公众的舆论。这样一来,我们就碰到了另外一些问题,而且同样难以回避:谁是公众?什么样的公众?至关重要的是,"公众舆论"是什

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的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公众舆论？它是不是或者什么时候才能是独立的力量？

显然，梳理这些头绪是个非常复杂但也非常引人入胜的过程。这大概就是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影响力经久不衰的奥秘所在。其实回过头来看看，无论从词源学意义上还是从它本身的性质而言，舆论都不过是一些意见。公众舆论自然就是公众的意见或者大家的意见。总的来说，意见有它的基本特征和流通表达的逻辑，首先，意见不是知识，更不是对知识的系统认知，尽管它可能会以某种程度的知识或信息为前提；其次，意见只是意见的主体对客体作出的反应，而不是对客体的本相的认知，当然更不是对客体本相的系统认知，尽管它必定会以某个客体为反应对象。这种决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特征和逻辑，既是舆论的魅力所在，也是它常常令人困惑的地方，因为任何舆论在展示着力量和宣泄激情的同时，也会包含着某些成见、偏见、定见、歧见或者门户之见，即使一个汹涌的舆论大潮也难以例外。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可以说只出现过两个源头，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尽管它们都会产生一个复杂程度不相上下的舆论过程，但是结果却大不一样。

作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公众舆论》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一个全景式的生动观照，可以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此书自 1922 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几十种文字陆陆续续地重印，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论域中的经典性地位，而作者直到 1974 年去世也没有对它作过任何修订增补，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实证资料仅仅截止到成书之前。由此也不难看出，纵使时移境迁，物是而人非，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则断不会过时。值得顺便说说的是，虽然这部上个世纪

的原作一直拖到又一个世纪才有了第一个中译本，但毕竟还是有了，总算没有留下一个彻底的遗憾。

由于国内读者对沃尔特·李普曼已经相当熟悉，对他的生平介绍就无需译者多言了，不妨摘录《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词条以作备考，尚祈读者原谅这种取巧之道："Walter Lippmann (1889—1974)，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60 年的卓越工作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他的专栏评论日益流行，最后被不止 250 家美国报纸和大约 25 家外国报纸同时刊用。……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公众舆论》。"

本书的翻译由阎克文执笔第 1—13、16—22 章，联合国驻内罗毕办事处的江红女士执笔第 23—28 章，另约请山东大学的刘林副教授译出第 14、15 两章，全书由阎克文通校。由于作者文思跌宕、文笔精到、文风独特，译者均感到移译这部名著恐有技所不逮之处，唯勉力为之，以期不负作者与读者，舛漏之处，企待方家赐正。

阎克文　谨识

2001 年 8 月

目　　录

译者前言 …………………………………………………… 阎克文

第一部分　导　　论

第 一 章　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 3

第二部分　对外部世界的研究

第 二 章　审查与保密 ……………………………………………… 29
第 三 章　交往与机会 ……………………………………………… 37
第 四 章　时间与注意力 …………………………………………… 46
第 五 章　速度、词语和清晰度……………………………………… 52

第三部分　成　　见

第 六 章　成　见 …………………………………………………… 65
第 七 章　作为屏蔽的成见 ………………………………………… 77
第 八 章　盲点及其价值 …………………………………………… 84
第 九 章　规则及其敌人 …………………………………………… 93

第 十 章　发现成见 …… 105

第四部分　兴　　趣

第十一章　兴趣的激发 …… 129
第十二章　重新思考自我利益 …… 138

第五部分　公意的形成

第十三章　兴趣的转移 …… 157
第十四章　是或不 …… 177
第十五章　领袖与平民 …… 188

第六部分　民主的形象

第十六章　自我中心的人 …… 203
第十七章　独立的共同体 …… 211
第十八章　压力、自由授权及特权的作用 …… 221
第十九章　旧物新装:基尔特社会主义 …… 233
第二十章　新形象 …… 246

第七部分　报　　纸

第二十一章　赢得公众 …… 253
第二十二章　永恒的读者 …… 261
第二十三章　新闻的性质 …… 268
第二十四章　新闻、真相与结论 …… 283

第八部分　有机化情报

第二十五章　打进楔子…………………………………… 291
第二十六章　情报工作…………………………………… 298
第二十七章　诉诸公众…………………………………… 311
第二十八章　诉诸理性…………………………………… 321

第一部分

导　　论

第一章　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

一

大洋中有一个岛屿，1914年时，那里住着几个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岛上不通电缆，英国邮轮每60天来一次。到了9月，邮轮还没来，这些岛民谈论的话题仍是最后那期报纸报道的即将对卡约夫人枪杀加斯东·卡尔梅特一案进行审判的消息。因此，9月中旬的一天，他们抱着非同寻常的急切心情全都涌向码头，想听那位船长说说做出了什么样的裁决。但他们得知，6个星期以来，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协约的尊严正在同德国人作战。在这不可思议的6个星期中这些岛民仍像朋友一样相处，而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敌人。

不过，他们的处境与绝大多数欧洲人的处境并无太大的不同。他们弄错了6个星期，大陆上的人们可能只间隔了6天或6个小时。但是确有一段间隔。在那个时刻，人们照常各行其事的欧洲景象，与即将打乱他们生活的那个欧洲无论如何也对不上号。在那个时刻，每个人仍在适应一种已经不复存在的环境。迟至7月25日，世界各地的人们仍在生产不再有可能装运的商品，仍在购买不再有可能进口的货物，仍在谋求职业，仍在

盘算生意，仍在抱有希望和期待，总而言之，世界一如既往。人们仍在著书立说描绘那个世界。他们信赖自己头脑中的那幅景象。更有甚者，4 年以后，一个星期四的早晨传来停战消息时，人们感到了难以言状的欣慰——屠杀结束了；然而，就在真正的停战到来之前的 5 天之内，尽管已经庆祝了战争的结束，却仍有数千名青年死在了战场上。

追溯既往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认识我们仍然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环境时是多么地迂回曲折。我们可以看到，它带给我们的消息时快时慢，但只要我们信以为真，我们似乎就会认为那就是环境本身。牢牢记住我们当下采取行动时所依据的信念会比较困难，但在论及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的时候，我们却会自以为很容易地就能看出，他们一本正经置身其中的那个世界的景象是多么荒诞不经。出于优越的事后聪明，我们会坚持认为，他们必需认识的那个世界和他们曾经认识的那个世界，经常是背道而驰的两回事。我们还能看到，他们在一个经过他们想象的那个世界上进行统治和战斗、从事贸易和改革，但他们却给这个现实的世界带来了后果，或者什么也没带来。他们动身去印度却发现了美洲。他们看到万恶淫为首却要绞死一个老妇。他们认为只卖不买就能发财。一个哈里发为了服从他所认为的真主的意志，竟然烧掉了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

大约在 389 年，圣·安布罗斯①撰文陈述了柏拉图山洞里那个坚决拒绝回心转意的囚徒的情况。"讨论尘世的性质与境况无助于我们对来世的期望。记住《圣经》的教喻足矣。'神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记》第二十六章第七节）。既然如此，为什么

---

① St. Ambrose(约 339—397)，古代基督教拉丁教父。以擅弄政治权术著称。——译注

还要争论神究竟是把大地吊在了空中还是放在了水面？为什么还要争论那稀薄的空气如何才能托住大地，或者飘在水面的大地何以不会沉入水底？……并不是因为大地处在中间，好象悬浮在平衡状态，而是因为全能的上帝靠他的意志的法则而强力使然，从而变动荡和虚空为持久的稳定。”①

它无助于我们对来世的期望。记住《圣经》的教喻足矣。为什么还要争论？但在圣·安布罗斯弃世一个半世纪之后，舆论仍在这样的场合为了截然相反的问题而烦恼。一位名叫科斯马斯的僧侣②，以其科学成就而闻名于世，因而受托写作一部基督教地形志，或曰“基督教对世界的看法”。③显然，他十分清楚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因为他的所有结论全都以他所研读的《圣经》为依据。因此，世界看上去成了一个单调的平行四边形，东西之宽为南北之长的两倍，平面中心是被海洋所包围的陆地，大洪水之前人类就住在那里。其余的陆地则是诺亚的避风港。北方是一座高大的锥形山，日月环绕此山运行，太阳绕到山后就是黑夜；天空粘在地缘；四面高墙汇成一个穹顶，这样，陆地就成了宇宙的地板。天空的另一面是一个大海，形成了“天外来水”。天海和宇宙极顶之间的空间就是天堂；天地之间则住着天使。最后，既然圣保罗已经说过，人们生来全都住在“大地的正面”，他们怎么可能住在所谓正相对应的反面呢？“我们被告知，由于这样一段细节赫然在目，一个基督徒就不应当‘还去谈论什么对应

---

① *Hexaemeron*, i. Cap 6，引自 *The Mediaeval Mind*, by Henry Osborn Taylor, Vol. I, p. 73。

② Cosmas（活动于公元6世纪），又名因第科普劳斯提斯，商人、旅行家、神学家和地理学家，其论文《基督世界地形》中有最早、最著名的世界地图之一，以及有关拜占庭贸易的珍贵资料。——译注

③ Lecky, *Rationalism in Europe*, Vol. I, pp. 276－278.

面'。"[1]

他根本就不应当涉足那个对应面,任何身为基督徒的君主都不应当给他一条船以便试个究竟,任何虔信基督的水手也不可能想去试个究竟。对于科斯马斯来说,他的天体图毫无荒诞之处。只要记住他的绝对信念——这是宇宙的地图,我们就会开始明白,他将多么害怕麦哲伦或是皮里[2]那样的人物,以及冒着与天使和苍穹相撞的危险升到7英里高空的飞行员。同样,只要记住几乎每一个政党都会深信不疑自己为对手所描绘的画像——它认为那就是真相,但那并不是真相,而是它想象中的真相,我们就会完全理解战争与政治的暴烈。因而,它会像哈姆雷特一样击杀瑟瑟发响的帷幕后面的波洛尼厄斯,以为他就是国王,也许还会像哈姆雷特一样接着说道:

> 别了,你这可怜、卤莽、多管闲事的傻瓜!
> 我还以为你能过得更好;这都怪你命运不济。

二

大人物——即使终其一生——照例都是通过一种虚构的个性而广为人知。因此,一个老生常谈也不无道理:仆人眼中无英雄。在仆人和私人秘书看来,他们只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常常沉溺于自我虚构。当然,王室显贵也要构铸个性。无论他们本身是否相信他们的公共形象,也无论他们是否仅仅允许宫廷内侍对这种公共形象进行幕后安排,他们至少有着两个不同的自我,一是公共的与王室的自我,一是私下的与凡人的自我。大

① Lecky, *Rationalism in Europe*, Vol. I, pp. 276-278.

② Robert Edwin Peary(1856—1920),美国北极探险家。——译注

人物的传记往往很容易就能变成这两种自我的历史。官方的传记作者是在复制公共生活，而披露内情的传记则是再现其他方面的生活。例如，查恩伍德·林肯(Charnwood Lincoln)就变成了一幅壮丽的画像，他不再是现实中人，而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史诗形象，几乎可与埃涅阿斯或圣乔治①相媲美。奥利弗(Oliver)笔下的汉密尔顿则是一次宏伟的抽象，一座理想的雕塑，正如奥利弗先生本人所说，"一篇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论文"。那是一座联邦主义治国术的正规纪念碑，很难说是一个人的传记。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泄露了内情，他们就会不时地给自己装点一下门面。雷平顿(Repington)日记和马戈特·阿斯奎斯(Margot Asquith)日记就是一种自画像，在那里，内幕材料再明显不过地成了一种标志，说明那些作者是多么喜欢自我标榜。

不过，最令人感兴趣的则是在人们头脑中自发产生的那种画像。斯特雷奇先生(Mr. Strachey)说，维多利亚登基"在公众中间掀起了巨大的热潮。多情善感成了时髦；女王看上去还是个小姑娘，一头金发，美艳绝伦，天真无邪，平易近人，驱车穿过她的首都，这样的场面使得观众的心中充满了欢天喜地、温柔亲切的忠诚感。打动了每一个人的那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首先来自维多利亚女王和她那些叔父的强烈对比。那些卑鄙龌龊的老头子，放荡自私，愚蠢可笑，由于他们的缘故，债务、骚乱和声名狼藉成了无休无止的负担——它们已经像冬雪一样消融，光辉灿烂的春天终于来到了这里。"

M. 让·德·皮埃尔弗②首先看到的却是英雄崇拜，当时他是

① St. George(约3世纪)，基督教殉教者，英格兰的主保圣人。——译注

② M. Jean de Pierrefeu, *G. Q. G. Trois ans au Grand Quartier General*, pp. 94－95.

那位已经极负盛名的军事家霞飞的参谋部的一名军官：

两年来，整个世界给予了那位马恩河的胜利者几乎是非凡的敬意。行李管理员差不多被那些沉甸甸的箱子、包裹及书信压弯了腰，那都是素昧平生的人们寄给他的，用以狂热地证明他们的钦佩之情。我想，除了霞飞将军之外，没有任何战时统帅能够了解这样的荣耀概念。人们给他寄来了成箱的糖果——它们来自世界上所有的大糖果商，还有成箱的香槟和出自所有酒厂的琼浆玉液，以及水果、野味、饰品、器皿、服装、烟具、墨台和镇纸。每个地区都寄来了当地特产。画家寄来了画，雕塑家寄来了雕塑，可爱的老太太寄来了盖被或短袜，牧羊人则在他的营房里给他雕刻烟斗。世界上所有仇恨德国人的制造商全都送来了他们的产品，包括哈瓦那的雪茄烟，葡萄牙的葡萄酒。我认识一位理发师，此人独具匠心，用仰慕将军的人们的头发为将军制作了一幅肖像；一位职业书法家也不谋而合，不过肖像是用极为细小的书写符号写出的几千个小短句组成，句句都在吟唱对将军的颂扬。至于他收到的来信，各种字迹应有尽有，它们来自所有的国家，使用着每一种方言，字里行间充满了深情厚意，人们不由自主地向他表示着感激、爱戴和崇敬。他们称他为世界的救星、法国之父、上帝的使者、人类的恩人，不一而足。……其中不仅有法国人，还有美国人、阿根廷人、澳大利亚人，等等、等等。……成千上万的少年儿童，并没有他们父母的见识，也拿起笔来给他写信，说他们爱他：绝大多数孩子都把他叫做“我们的父亲”。他们的倾诉、他们的爱戴是那么强烈，那是发自无数心灵、要战胜野蛮、得到解救的渴望。在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看来，霞飞就像征服巨龙的圣乔治。毫无疑问，对于人类的良心而言，他象

征着善对恶的胜利、光明对黑暗的胜利。

甚至狂人、傻瓜、疯子和半疯子也把他们一塌糊涂的头脑转向他，仿佛转向了理性本身。我曾读过一个悉尼人的来信，他请求将军把他从仇人手中拯救出来；还有一个新西兰人，要求将军派遣一队士兵到一位绅士家里，说那人欠了他10英镑并且拒不偿还。

最后，还有成百上千的年轻姑娘，克服了女人的羞怯，瞒着家人要求和他约会；其他姑娘则只是希望能为他服务。

这位理想化的霞飞成了一个复合体，原料来自他、他的参谋部和他的军队所赢得的胜利，以及人们对战争的绝望情绪、个人遭遇的不幸和对未来胜利的期待。但是，除了英雄崇拜之外，还有除魔做法。假如一切善都是来自霞飞、福煦、威尔逊或罗斯福，那么一切恶就是源于威廉皇帝或者苏俄领袖，他们作起恶来无所不能，犹如英雄行善无所不能一样。对于许多孤陋寡闻和担惊受怕的人们来说，无论世界的什么地方，举凡政治倒退、罢工、封锁、神秘死亡或者不可思议的战争，无不能够从这些个人的邪恶本性那里找到原因。

三

把世界上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集中展示一下，显然是极为惊人的，而且每一位作者都特别喜欢这种引人注目、无可辩驳的范例。对战争的剖析可以展示这些范例，但这并不等于无中生有。在比较正常的公共生活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同样能够一呼百应，但是每一个象征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因为还有众多的竞争对手。每一个象征都只能吸引很少的情感，因为它最多也就是代表了全体人口的一部分，而即使在这一部分的范围

内,要想禁止个人差异也是难乎其难。在和平安定的时期,这些舆论的象征易于受到牵制、比较和褒贬。他们忽来忽去,有合有分,然后就被置诸脑后,决不会完全操纵整个群体的感情。毕竟,只有一种人类的能动性能被全体人口用以完成那种神圣的联合。它出现在战争的中期阶段,那时,恐惧、好战、仇恨已经牢牢控制了社会风气,要么是压制所有其他的本能,要么是在感到厌倦之前给它以支持。

在几乎所有其他时候,甚至在战争的僵持阶段,足够广大的范围内的感情才能被激发起来,以确认冲突、选择、犹豫和妥协。舆论的象征通常都会带有——我们将会看到[1] ——这种利益平衡的标志。例如,请想想吧,停战以后,那种岌岌可危并且绝对谈不上成功建立的协约国统一体,是多么迅速地化作了泡影,几乎立刻接踵而至的则是各国的象征性图象在他国看来的土崩瓦解:“公法卫士”(the Defender of Public Law)英国,守卫着“自由边界”(the Frontier of Freedom)的法国,以及“十字军斗士”(the Crusader)美国。再请想想,在各国内部,这些象征性图象本身也是多么地破败不堪,因为党争、阶级冲突以及个人野心开始激起旷日持久的争吵。然后,领袖们——威尔逊、克雷孟梭、劳合·乔治——的象征性图像也一个接一个地黯然失色,他们不再代表人类的希望,而只是变成了一个幻灭世界的谈判者与管理人。

无论我们是否感到遗憾,和平带来的这种软灾难之一,或者欢呼向理智的回归,同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显然毫不相干。我们对虚构和象征的首要关注,是忽略它们对于现存社会秩序的价值,只把它们看作人类交流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

---

① 见本书第五部分。

今，在任何社会，只要它的利益并非完全不受外界的影响，并非狭小得使每个人都能对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那就必须依靠观念去应付那些超出视线之外并且难以把握的事件。明尼苏达草原上的舍温小姐① 听说法国的战争十分暴烈，便试图想象那是什么样的场面。她从没去过法国，肯定也不会立刻就奔赴那里的前线。她见过法国与德国军人的图片，但要让她想象出300万士兵的模样就不可能了。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想象得出来，专家们也不会去想象，他们会说，那里有200个师。但舍温小姐没有机会去摆弄作战地图，这样，如果她要想象那场战争，她很快就会想到霞飞和威廉，好像他们是在进行个人决斗。假如你能看到她用她的眼光所看到的东西，这样构成的图像大概就是一个18世纪伟大军人的雕像，他无畏而平静地屹立在那里，比真人高大，背景是一支朦朦胧胧、只有细小轮廓的军队。看来大人物们对于这种期望也不是毫不在意。德·皮埃尔弗讲述了一个摄影师访问霞飞的故事。将军就在他的“中产阶级办公室里，在一张没有文件的工作台前，他坐下来要去写下他的签名。忽然，有人注意到四周墙上没有地图。但是，在一般人看来，一位将军没有地图是不可想象的，于是为了这幅照片，几张地图被挂在了适当位置，后来很快就撤掉了。”②

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在了解别人的思想之前，不可能真正理解他们的行为。我曾看到一个在宾夕法尼亚一座煤城长大的年轻姑娘，刚刚还欢天喜地，在一阵狂风击碎了厨房的窗玻璃时，却突然变

① 见 Sinclair Lewis, *Main Street*。

② 同前引书，p.99。

得悲痛欲绝，几个小时过去了仍然伤心至极，使我感到莫名其妙。但是，当她能够讲话时，原因便清楚了：一块窗玻璃被打碎，意味着死了一位亲人，因此她是在痛悼她的父亲，并且惊恐万状地从家里跑了出来。当然，她的父亲完好无损地活着，一个电报查询便迅速证明了这一点。但在回电到来之前，被击碎的玻璃对姑娘来说仍是一个权威预言。它为什么权威，恐怕只有高明的精神病医生经过长时间调查才能作出说明。不过，即使是最漫不经心的旁观者也会发现，这位已被家庭的不幸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姑娘，由于一种源于客观事实的虚构、一种刻骨铭心的迷信、一种乱糟糟的痛悔和对父亲的眷念而产生了幻觉。

这些例子中的反常情况不过是程度的不同。如果一位司法部长受到一颗在他家门口爆炸的炸弹的惊吓，因而对革命党文件声称的 1920 年 5 月 1 日将要爆发一场革命深信不疑，我们就会认识到，这是同样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当然，战争提供了许多这种类型的范例：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情不自禁地信以为真，这三种因素便会产生一种虚假的现实，导致人们作出激烈的本能反应。显而易见，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像对待现实那样对虚构的东西作出有力的反应，而在许多场合，他们还会制造这种虚构的东西并作出反应。谁要是不相信俄国军队在 1914 年 8 月穿过了英格兰，不接受没有直接证据的暴行传言，看不到无中生有的一场阴谋、一个叛徒或者一名间谍，他就会首先遭到攻击。谁要是不对从某人那里听来的真正的内幕——而此人并不比他知道得更多——发表意见，谁就会受到责难。

对于所有这些事例，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楔入在人和环境之间的虚拟环境。他在虚拟环境中的表现就是一种反应。然而，恰恰因为那是一种表现，那么产生后果——假如它们是一些行动——的地方，就不是激发了那种表

现的虚拟环境，而是行动得以发生的真实环境。如果那种表现不是一种实际行动，而是我们简称的思想感情，那么它在虚拟环境中没有出现明显断裂之前，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一旦虚拟事实的刺激产生了针对事物或他人的行动，矛盾就会迅速发展，然后——从经验得知——便会产生用脑袋撞击石头墙的感觉，并会目睹赫伯特·斯宾塞所说的“使用一堆严峻事实谋杀美好学说”的悲剧，总而言之，会因失调而痛苦。毫无疑问，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构”这一媒介进行的。

我说的虚构并不是指制造谎言。我指的是对环境的描写，而这个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本身创造出来的。虚构的范围无所不至，从彻底的幻觉到科学家彻底自觉地使用图表模型，或者他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决心使计算结果精确到无关紧要的10位数以上。一部虚构的著作也许有着几乎无懈可击的精确度，而只要重视这种精确度，虚构就不会造成误导。事实上，人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比照和仿效赫伯特·斯宾塞所谓“我们思想的偶然启示与更新”①而进行的选择、重组和探索。对虚构的用法加以取舍，等于直接展示感觉的消长。那不是一种现实的取舍，因为，无论如何，刷新虚构有时就等于用完全天真的眼光看世界，而天真本身并不是智慧，尽管它是对智慧的补充和矫正。

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去应付如此奥妙、如此多样、有着如此频繁变化与组合的环境。虽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中活动，但又不得不在能够驾御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去对它进行重构。人们环游世界就必须要有世界地图。但他们有一个难以克服的

① James,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II, p. 638.

困难,那就是弄到一些不再标有波希米亚海岸的地图。

四

因此,对舆论进行分析的起点,应当是认识活动舞台、舞台形象和人对那个活动舞台上自行产生的形象所做的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这就像是一出戏剧,演员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各行其是,剧中的情节是在处理演员的现实生活,而不仅仅是他们的舞台生活。那些动人的形象往往要用非凡的技巧来突出内在动机和外在表现的双重戏剧效果。两个人看上去正在为了金钱而争吵,但他们的激情却令人费解。然后画面淡出,两人中的此人或彼人用他自己的眼光观看该剧重新上演。在另外的场合,他们正在为了金钱而争吵。他们想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当时有个姑娘为了另一个男人而抛弃了他。那种表面的效果有了解释:主人公并不是贪婪;主人公正在恋爱。

美国参议院也曾上演了一出大同小异的戏剧。1919 年 9 月 29 日的早餐时间,一些参议员读到了《华盛顿邮报》刊发的一条快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达尔马提亚海岸(Dalmatian coast)登陆。报道说:

> **事实现已无可争辩**
>
> 以下重要事实看来已经无可争辩。安得鲁斯海军少将指挥着驻亚得里亚的美国海军力量,而他得到的命令却来自伦敦的海军部,经手人是那里的战时委员会和海军少将纳普斯。美国海军部是否同意却被忽略不计。……
>
> **丹尼尔(Daniel)的知识没用了**
>
> 当有消息传来说,那支据认为专门由丹尼尔斯先生控

> 制的力量正在进行一场没有他的知识也能进行下去的海战时，他被无可否认地放在了一个奇特的地位上。人们十分清楚，**英国海军部希望根据大不列颠及其海军的利益命令安得鲁斯海军少将采取行动**，因为形势要求某个国家作出牺牲，尽管邓南遮的追随者被认为已经受到了遏制。
>
> 人们更加清楚的是，**按照新的国际联盟的安排，外国人将会处于在紧急状态下指挥美国海军力量的地位**，而不管美国海军部是否同意……等等。（着重号是我加的）

第一个做出评论的参议员是宾夕法尼亚的诺克斯先生。他义愤填膺，要求进行调查。康涅狄格的布兰德基先生接着发表了讲话，其中的激愤之情已经造成了轻信。半分钟以后，布兰德基先生想要了解海军陆战队是否遭到了屠杀，义愤填膺的诺克斯先生希望知道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的诺克斯先生忘了，他已经要求进行调查并得到答复。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遭到屠杀，那就是战争。辩论的基调仍然是有节制的。辩论在继续。伊利诺伊的麦考密克先生提醒参议院，威尔逊政府一向喜欢进行未经授权的小型战争。他重复了狄奥多·罗斯福"发动和平"的俏皮话。辩论进入高潮。布兰德基指出，海军陆战队是"根据一个设在别处的最高委员会的命令"行事，他想不起来有谁在那个机构中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宪法没有这样一个"最高委员会"。于是，印第安纳的牛先生便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澄清事实。

至此，这些参议员仍然模模糊糊地知道，他们正在讨论的是一个谣传。作为法学家，他们仍然记得需要某些证据。但是，作为一群火气旺盛的男人，他们已经对这一事实感到怒不可遏：美国海军陆战队是在根据一个外国政府的命令参战，而且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他们在感情上很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因为

他们是一些反对国际联盟的共和党人。这就惹恼了民主党领袖、内布拉斯加的希奇科克先生。他为那个“最高委员会”辩护说,它正在根据作战能力采取行动。和平仍无着落,那是因为共和党人的拖延。因此,参战是必要的,也是合法的。双方这时都在假定那个报道属实,而且他们得出的结论都是出自党见的结论。然而,辩论中出现的这种离奇假设却压倒了调查事实真相的决定。这足以说明,即使对训练有素的法学专家来说,把反应推迟到真相大白之后也是多么困难。反应是突如其来的。虚构被信以为真,因为人们迫切需要这种虚构。

几天以后的一份官方报告表明,海军陆战队并未按照英国政府或“最高委员会”的命令登陆。他们并没有同意大利人作战。他们是应意大利政府的请求而登陆去保护意大利人的,美军统帅已得到意大利当局的正式鸣谢。海军陆战队并未处于同意大利的交战状态。他们在按照根本不是由于国际联盟才发挥作用的通行的国际惯例进行活动。

这个活动舞台就是亚得里亚海。为华盛顿那些参议员的头脑提供舞台形象的,是一个对亚得里亚毫不在意、甚至想要废弃国际联盟的家伙,也许他是打算在这里设个骗局。对此,参议院却是按照在国际联盟问题上不断加深的党派分歧作出了反应。

五

参议院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它的正常水准,这倒无需深究。它和众议院或其他国家的议会相比是否更为可敬,也不必计较。此刻,我只想审视一下人们由于受到他们虚拟环境的刺激而在他们的舞台上东奔西忙的世界大观。即使完全容许政治科学进行蓄意的欺诈,它依然能够说明这样一

些事实的原因,比如,为什么两个交战国家都会确信自己是在采取自卫行动,为什么两个争斗不已的阶级都在一口咬定自己是共同利益的代言人。我们可能会说,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但更准确地说,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但却认为并感到不共戴天。

正是针对这些特殊的世界,正是针对这些或个人、或集团、或阶级、或职业、或宗派的产物,人类才有了"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中的政治调节。它们的多样化与复杂性实在难以言状。然而,那些虚构却能够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人们的政治表现。我们肯定会想到至少由100个立法机构组成的大约50个议会。它们属于至少50个省和直辖市议会的统治集团,这些地方拥有自己的行政、司法及立法机构,形成了完全有效的权威。但这还没有揭示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在这众多的权力中心,每一个中心都有一些政党,这些政党本身就是统治集团,它们植根于各个阶级、阶层、集团和派别,其内部是一些个体政客,以这些个人为中心形成了一张张由关系和记忆、恐惧和希望编织的网络。

无论如何,出于经常是必定说不清楚的原因,作为统治、妥协与相互捧场的结果,这些政治团体获得了支配地位,它们宣战或议和,征兵,收税,放逐,监禁,保护或没收财产,鼓励某类企业并排斥另一类企业,便利或阻挠移民,促进或审查通信,办学校,建海军,发布"政策"或"神意",设置经济壁垒,创造或毁灭财产,把一个人置于另一个人的支配之下,或者支持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每一个这样的决定,要么是从某种客观事实的角度被认为是最后的决定,要么是从某种环境的角度被认为是结论的依据。从什么事实的角度?为什么是那个事实?

即使如此,也还没有一览无遗地揭示现实的复杂性。富有条理的政治结构存在于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那里有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社团和机构,自发或半自发的联合体,以及全国性、地

方性和城区性的集团，它们往往并不产生政治团体所关心的那种决定。那么，这些决定有什么根据呢？

切斯特顿先生说："现代社会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所依据的是所有的人都将殊途同归这一观念。……就像任何罪犯的头脑中都可能隐藏着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罪行一样，在任何一个郊区小职员的家里或帽子底下，都可能保存着一种完全不为人知的人生观。第一个人可能会成为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会感到自己的躯体像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机器一样生产着他的思想。他会像旁听一只闹钟单调的滴答声一样倾听自己的思想。第二个人可能会成为一位'基督教科学家'，他会莫名其妙地认为自己的躯体还不如自己的身影来得真实，到最后，他很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四肢是一种幻觉，就像高烧不退时梦见的一些游动的毒蛇。大街上的第三个人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基督教科学家'，而是相反，成了一名基督徒。他会生活在邻居们讲述的一个虚构的传说中，那是一个神秘但又可信的传说，里面到处是超自然的朋友们的音容笑貌。第四个人可能会成为一名神智学者，也许还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应当愉快地设想第五个人是一位魔鬼崇拜者。……无论如何，这种多样性是有价值的，而那种一致性是不可靠的。由于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怀有各不相同的心思，那么让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投身相同的事情，就是一种可疑的想法。它不是把社会建立在交流——甚至也不是惯例——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全体一致的基础上。四个人在同一盏路灯下相会，一人把灯杆漆成了嫩绿色，作为一项重大市政改革的组成部分；一人在灯下诵读祈祷书；一人像酒精中毒一样痉挛起来，怀着令人意外的热情拥抱了灯杆；最后那位来到这里不过是因为嫩绿色的杆子是他和娇妻约会时的显著标志。但是，想让这种场面一晚接一晚地

再现,那就太不明智了……”①

可以用这路灯下的四个人指代世界上的各种政府、政党、社团、行会、社会机构、工会、专业团体、大学、宗派和民族。想想吧,立法者正在投票通过一项将会影响远方人们的法律时,一个政治家也在作出一项决定。想想吧,巴黎和会正在重订欧洲边界时,一个驻外大使则在用力打探该国及本国政府的意图,一个拓荒者在到一个落后国家开辟一块租借地,一个编辑在期待一场战争,一个牧师在呼吁警察管制娱乐,一个夜总会在接受一场罢工,裁缝们在准备接管学校,最高法院在讨论俄勒冈的一个立法机关是否可以确定妇女的劳动时间,一次内阁会议在讨论是否承认一个政府,一个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挑选一名候选人并起草政纲,2700 万选民在投出他们的选票,一位科克的爱尔兰人在思念一位贝尔法斯特的爱尔兰人,第三国际在计划重建整个人类社会,一个董事会面临着雇员的一大堆要求,一个男孩找到了一份差事,一个商人在琢磨下个季节的供求问题,一个投机商在预测市场行情,一个银行家在决定是否给一家新企业提供贷款,一个广告商、一个广告读者……想想吧,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大英帝国”、“法兰西”、“俄罗斯”、“墨西哥”的概念有着多么千差万别的意义,这与切斯特顿先生那四个凑到嫩绿色灯杆旁的人物的情况并无不同。

六

这样看来,为了不至于被人与人之间的固有差别这堆难以

① G. K. Chesterton, “The Mad Hatter and the Sane Householder”, *Vanity Fair*, January, 1921, p. 54.

梳理的乱麻缠住,我们最好还是集中关注一下人们在认识这个世界时产生的突出差别。[1] 我毫不怀疑,这里有着重大的生物学差别。既然人类是一种动物,如果没有这种差别,那就不可思议了。但是作为理性的存在,如果非要在没有明显相同之处的环境之间总结出浅薄的可比性表现(这种表现是对环境作出的反应),那就更糟。

这种思想的实际价值在于,它把一种必不可少的精确性引进了关于天性与教养、内在品质与环境的古老争议,因为虚拟环境是"人性"和"环境"的杂交物,在我看来,它表明了自以为是地根据人的表面作为去谈论人的来龙去脉,或者自以为是地谈论社会环境必然如何如何,都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并不知道人们在对真实的"大社会"作出反应时将会如何表现。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他们在对——可以公正地说——极为残破的"大社会"图像作出反应时的表现,指望这样的证据不可能对人或"大社会"做出可靠的结论。

这就是我们的研究思路。我们不妨假定,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如果他的图像集告诉他世界是个平面,他就会由于害怕从我们这个行星的边上掉下去而不去靠近那个边缘。如果地图册标有一个永不枯竭的喷泉,一位庞塞·德莱昂[2]就会前去探寻。如果某人掘起一抔像是黄金的泥土,一时间他会真的以为自己发现了黄金。这种对世界的想象方式,决定着人们在任何特定时刻将要做出的行为。它并不决定人们的成功与否。它决

---

① 参见 Wallas, *Our Social Heritage*, pp. 77 *et seq*。

② Ponce de Leon(1460—1521),西班牙探险家,最早在波多黎各创建殖民地。——译注

定着人们的努力、人们的情感、人们的希望，而不是它们的实现和结果。那些声嘶力竭地自称“唯物主义者”并且蔑视“空想家”的人们，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把他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什么地方呢？寄托在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集团所宣传的事物上。那么，什么是宣传呢？难道不是改造人们为之作出反应的那幅图像并用另一种社会模式取而代之的努力吗？什么是阶级意识呢？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是民族意识吗？是另一种认识方式吗？是吉丁斯教授①的那种意识，还是我们在大众中间辨认某些与我们同气相求的人的认识过程？

不妨把社会生活解释为追求快乐与逃避痛苦。你立刻就会看出，这是享乐主义者在回避实质问题，因为，就算人们在追求这样的目标，关键问题——他为什么会认为这条而非那条途径有可能带来快乐——仍然原封未动。是他的良心在指引着他吗？那么，他如何才能恰好具有他应有的那份良心呢？通过经济利己主义的学说吗？但是，人们如何才能以这种而非那种方式去构想自身的利益呢？通过向往安全、荣耀、统治或者含糊其辞的自我实现吗？人们如何理解安全、如何认识荣耀、如何谋求统治手段、什么是他们想要实现的那个自我的概念呢？快乐、痛苦、良心、获利、保护、升迁、统治，毫无疑问都在表明人们的某种行为方式。人们追求这些目标也许是受到了本能的支配。然而，阐明目标或者描述追求目标的意图，并不能够解释由此产生的行为。人们酷爱推测，这一事实便足以证明，他们的虚拟环境，世界在他们内心形成的图像，是他们思想、感情和行为中的

① Franklin Giddings(1855—1931)，美国社会学家。他是使社会学从哲学的一个分支变为以统计学为基础的独立学科的前驱，以“类群意识”说闻名。——译注

决定性因素。假如现实与人对现实的反应联系得直截了当、形影不离，而不是迂回曲折、若即若离，人们就不会知道还有什么犹豫和失败；假如我们每个人都像胎儿包在子宫中一样附着在世界上，萧伯纳先生大概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除了十月怀胎之外，没有人还会像照料一棵植物那样照料它。

对政治思想进行精神分析的主要困难就产生在这种联系中。弗洛伊德学派关心的就是不同的人对他人和具体环境的失调。他们认为，如果内心的错乱能够得到矫正，那种显然是正常的关系就很少或者根本不会出现混乱。但舆论面对的是一些迂回曲折、看不见摸不着而又令人困惑的事实，而且根本不可能一目了然。舆论所指的环境不过是一些被了解到的意见。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学家几乎始终认为，对于正常的头脑来说，环境是可知的，即使不是可知的，至少也是可以忍受的。他的这种假设就是舆论的难题。相反，社会分析学家则不大在乎一种很容易认识的环境，他最关心的是研究如何认识那种庞大的政治环境，以及如何使这样的认识更有成效。精神分析学家是在考察对某种他叫做环境的未知事物的调适，社会分析学家则是在考察他所谓的虚拟环境这一特定的未知事物。

当然，他永远都要借助于新的精神分析，不仅因为正确运用精神分析会极有助于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的独立自主，而且因为对梦境、幻觉和文饰作用的研究，能够揭示虚拟环境是如何产生的。但他不可能以现存社会秩序内部的所谓“常规生物学进程”①为标准，也不会以外部的“摆脱了宗教压抑和教条主义惯例”② 的进程为标准。对一个社会学家来说，什么是他的常规

① Edward L. Kempf, *Psychopathology*, p. 116.

② 同上，p. 151。

社会进程呢？无疑，持保守态度的评论家会认为是第一种，持浪漫态度的评论家则会认为是第二种。但是他们都会认为自己的看法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他们所谈论的社会，要么是符合他们的“常规”概念的事物，要么是符合他们的“摆脱”概念的事物。这两种概念只是舆论而已，但作为医生的精神分析学家大概就会加以采纳，而社会学家则不大可能把目前舆论的产物当作标准并据以研究舆论。

七

我们不得不从政治上去应付的这个世界，既产生于想象，也产生于见解，又产生于思想。它无可避免地要被人们探究、评说和揣测。人并不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神，匆匆一瞥就能看破一切。他是进化的产物，几乎是稍纵即逝，只有片刻时间去增长见识、获取幸福。这同一个产物还发明了一些办法，去观看不用肉眼也能观看的事物，聆听不用耳朵也能聆听的声音，能计量无穷浩大和无限细小的东西，能清点并区分比他独自记忆的内容更为庞杂的内容。他会学着用他的头脑去观察他从未见过、摸过、闻过、听过、想过的大千世界。他会逐渐在他的脑海中为自己制作一幅视线所不及的那个世界的可靠图象。

外部世界的这些特征，我们简略地称作公共事务。这些特征当然与他人的表现有关，只要他人的表现与我们的表现相抵触，就会受到我们的左右，或者引起我们的关注。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这些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写的舆论。因此，在以下各章，我们将首先探究这种内心的图像何以能够诱使人们在与外

部世界发生关系时频频误入歧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首先指出那些妨碍他们接近事实真相的主要因素。它们就是人为的审查制度,社会交往受到的限制,每天能够用以关注公共事务的时间比较匮乏,由于不得不压缩成简短的消息而对事件造成的歪曲报道,用琐细的语汇表现复杂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最后,面对那些似乎威胁人们既定生活方式的事实真相时所产生的忧虑。

这些因素差不多都是外部的限制。然后再来分析这些残缺不全的外来消息又是如何受到日积月累的想象、偏见和成见的影响的,它们如汗牛充栋,体现着并转而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注意力和想象力本身。接下来是考察一个人在接受了有限的外来消息之后又会如何形成一些门户之见,并认为这符合他所感到和构想的自身利益。随后的章节将会考察一下纷纭的众说是如何结晶为舆论的,以及一种"国民意志"、一种"团队精神"、一种"社会目的"或者随你怎么称呼的诸如此类的东西是如何形成的。

前五章构成了本书的描述性内容。接着是对传统的民主政治舆论学说的分析。这项讨论的主旨是,原初形态的民主政治从未认真正视这个难题,它之所以是个难题,是因为人们头脑中的图像并不会自动与外部世界相切合。此外,由于民主理论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批评,所以还要对那些最有代表性、最一以贯之的批评——就像英国的吉尔特社会主义者所做的那样——进行一番检验。我的目的就是想看看这些改革家是否顾及到了舆论的主要困难。我的结论是,他们像原初的民主主义者一样完全忽视了这些困难,因为他们也在假定——而且是在一种远更复杂的文明中假定——人们的内心不可思议地存在着一种超出他们视线之外的关于世界的知识。

我认为,不论是在通常所谓的政界还是在产业界,也不论有没有选举的基础,只要没有一个独立的专家组织为那些必须进行决策的人物挑明种种无形的事实,代议制政府就不可能成功运转。因此我要指出,个人代表必须辅之以无形事实的代表的支持,只有认真接受这一原则,才能做到令人满意的权力分散,才能使我们摆脱下面这种令人无法忍受、不切实际的虚构——人人都应学会在所有公共事务上胸有成竹。据认为,新闻界的问题一塌糊涂,因为批评家和辩护士都在指望新闻界能够实现这种虚构,指望它弥补民主理论未能预见到的一切,而读者也在期望毫无代价、一帆风顺地完成这个奇迹。报纸被民主主义者视为克服自身毛病的万应灵药,而新闻的性质和新闻界的经济基础的分析家则认为,报纸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反映着——因此也或多或少地调节着——舆论的强度及其不健全的组织。我的结论是,如果舆论想要发出声音,那就必须利用新闻界加以组织,而不是像今天的情况那样由新闻界加以组织。我想,进行这样的组织首先是政治科学的任务,它应当得到作为策划者的适当地位,并走在实际决策之前,而不应充当决策做出之后的辩护士、评论员和报告人。我要指出,政界和产业界的茫然无措,恰好给政治科学提供了充实自身和服务公众的巨大机会。当然,我希望本书能有助于少数人认识到,机会越是清晰可见,就越是应当自觉地把握机会。

第二部分

对外部世界的研究

第二章 审查与保密

一

在历史性重大战役之一的最可怕关头，一位将军正在主持一次编辑部会议，这种形象看上去更像一个巧克力士兵(Chocolate Soldier)而不是活生生的场面。可是我们首先从编辑法军公报的军官那里知道，这种会议是固定的军务内容；在凡尔登战役打得最糟糕的时刻，霞飞将军和他的助手们却在开会争论明早见报的名词、动词、形容词。

皮埃尔弗说："(1916 年 2 月)23 日晚间公报是在戏剧性气氛中编写的。总理办公室的 M. 贝特洛按照总理的指示刚刚打电话给佩莱(Pelle)将军，要求他立即报告并着重说明敌人的攻击进度。这肯定是为了让公众预为准备，以面对事态出现灾难性局面时产生的最坏结果。这种焦虑清楚地表明，无论是总司令部还是战时内阁都已经丧失了信心。佩莱将军做了记录。他递给我一张纸，上面有他写下的政府指令，另外还有一份据俘虏说是冯·戴姆林(von Deimling)将军当天发布的命令，内称这次进攻将是确保实现和平的决定性进攻。这一切将不难用来证明，德国人正在做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努力，并指望由此而结束战争。按照这样的逻辑，谁也不必对我们的撤退感到吃惊。半个

小时以后，我带着打字稿来到楼下，发现克洛戴尔上校——他刚刚出去——的办公室里聚集着雅南少将、杜邦上校和勒努阿尔中校。由于担心我不能给人留下应有的印象，佩莱将军亲自准备了一份公报草稿。我把刚刚拟好的稿子读了一遍。大家认为过于不痛不痒。而佩莱将军的又过于令人惊恐。我有意不提冯·戴姆林将军的进攻令。要是把它放进公报，会有可能打破公众已经习以为常的那种行文程式，有可能把它变成一种恳求。那就像是在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会抵抗？'有理由担心，公众将被这种调门的变化弄晕了头，将会认为一切都完了。我陈述了我的理由并建议把戴姆林的那份文件以特稿形式提供给报章。

"意见出现了分歧，佩莱将军请加斯泰尔诺(de Castelnau)将军来作最后决定。将军来了，面带微笑，温文尔雅，还调侃了几句，说我们是个新型的战时文人委员会，然后就看稿子。他挑了比较简明的一份来看，重点看了第一段，加上了一句'正如预期的那样'，这就增加了安慰人心的味道；他还明确反对加上冯·戴姆林的进攻令，而是要求把它作为专稿散发给新闻界……"①霞飞将军当晚仔细审看并批准了这份公报。

几个小时之内，这二三百字就传遍了全世界。它们在人们的脑海中描绘了一幅凡尔登泥浆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图像，在这幅图像面前人们可能会鼓起勇气，也可能会一蹶不振。布列斯特的店主，洛林的农夫，波旁王宫里的议员，阿姆斯特丹或明尼阿波利斯的编辑，早已被迫收敛起希望并准备接受可能的战败，但并未陷入恐慌。因此，他们被告知，法军指挥部的丧师失地并不值得惊奇。他们得到告诫说，事态虽然严重，但并非不可思议，现在的事实是，法军总参谋部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迎击

① *G. Q. G.*, pp. 126－129.

德国人的进攻。支援堑壕没挖，备用道路没建，有刺铁丝匮乏。但是承认老百姓的想象受到了刺激，以致认为一次挫折很有可能变成一场灾难。统帅部可能令人失望，但又重新振作了起来；人民无论身在国内国外，全都心神不定，没有一个专业人士还能专心致志，根据十足的传说，在关于军官们是否称职的问题上产生了一片内讧反内讧的混乱，战争却被忘记了。因此，当局并没有让公众对将军们了解的所有事实真相发挥影响，而只是向他们展示了某些事实，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最有可能稳定人心。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部署虚拟环境的人们是了解真实环境的。但是，几天以后发生了一个法军参谋部并不了解真相的事件。德国人宣布[1]，前一天下午他们靠强攻夺取了杜瓦蒙要塞。尚蒂伊的法军指挥部却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消息。25 日上午，第 20 军团参战之后，战局出现了好转。来自前线的报告并未提到杜瓦蒙。但调查表明，德国人的说法是真实的，尽管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知道该要塞是如何失守的。此时，德国人的公报已尽人皆知，法国人不得不再去说点什么。于是司令部做出了解释。"尚蒂伊方面完全不知道还曾发生过那样一场进攻，我们在 26 日晚间公报中设想了那场进攻的计划，毫无疑问它有着几乎绝对真实的可能性。"该公报是这样想象那场战斗的：

> 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杜瓦蒙要塞附近进行，它是古老的凡尔登防御系统的前哨。敌人今天上午**发动了多次不成功的突击并在遭到惨重损失之后**攻占了这个阵地，但我军已再次抵达那里并继续向前推进，敌人已无力反击。[2]

---

① *G. Q. G.*, pp. 133 *et seq*。

② 这是我自己的译文，2 月 27 日星期天的《纽约时报》发布了来自伦敦的英文译文，说敌人的伤亡"极为惨重"，而法文原文是"pertes tres elevees"（"惨重损失"），可见英译对原文作了夸张。

实际情况与法德双方的说法均有出入。前线部队在调动过程中，由于命令混乱，该阵地不知怎么就被忘在了脑后，只有一个炮兵连长和几名士兵留在要塞。一些德国士兵看到大门洞开，便悄悄摸了进去，里面的人成了俘虏。不一会儿，站在高地斜坡上的一名法国人被从要塞射出的子弹吓得毛骨悚然。杜瓦蒙并未发生战斗，也无人伤亡。法军并不像公报说的那样，似乎是穿过要塞向前挺进。诚然，他们是从要塞一侧过去的，但是要塞仍在敌人手中。

不过，每个人看了公报都会相信，要塞几乎已被包围。话没有说得这么明确，但是“像通常那样，新闻界做了加工”。军事记者们断定，德军很快就会被迫放弃要塞。几天之后他们开始自问，既然要塞里缺乏食品，为什么德军还不放弃。“这就有必要通过新闻处要求新闻界停止谈论包围的话题。”①

二

法军公报的这位编辑告诉我们，由于战役打个没完，他和他的同事开始接连不断地渲染德国人的惨重伤亡以销蚀他们的顽固劲头。必须记住，当时——事实上一直到 1917 年底——协约国人民的传统战争观仍然认为，战争决定于“消耗”。没有人信任运动战。人们坚持认为，战略或外交不值得考虑。战争不过就是杀德国人。一般公众或多或少都相信这个教条，但它却不断地使人想到德国的惊人胜利。

“几乎每天的公报……都在对德国人进行正义的审判，说他们伤亡惨重，极为惨重，说他们是血腥的牺牲品，大量军团成了

① *G. Q. G.*, pp. 138。

献祭。同样,无线电广播在不断使用着凡尔登情报处的统计数字,情报处长宽泰少校发明了一种计算德军伤亡数字的办法,产生了几乎是奇迹般的效果。每两星期把这个数字增加10万左右,于是就有了30万、40万、50万的伤亡,分别摊入每天、每周、每月的统计数字,利用一切方式对外传播,产生了惊人的影响。我们的公式几乎一成不变:'据俘虏供称,德军在进攻过程中伤亡很大',……'已经证实,伤亡已达'……'由于损失惨重,敌人已无力重新发起进攻'……某些公式每天都用,因为说得过了头,后来便放弃了:'在我们大炮和机枪的火力控制下',……'被我们大炮和机枪的火力所杀伤'……无休止的重复给中立国及德国本身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助于制造一种血腥的气氛,尽管瑙恩的德国无线电台徒劳地想要破坏这种没完没了的重复所产生的严重影响。"①

在保密检查员的指导下,法国统帅部希望通过这些报道公开证实以下这种说法:

> 这种攻势吸引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他们的人力资源正在趋于枯竭。我们得知,他们1916年入伍的兵员已经派赴前线,1917年的新兵以及第三类兵员(45岁以上的人和康复的伤病员)正在征召。几个星期之内,德国的兵源就因为这种努力而消耗殆尽,并将发现他们面对的是联盟的全部兵力(1000万对700万)。②

根据皮埃尔弗的说法,法国统帅部对此也信以为真。"由于一种非同寻常的心理畸变,人们只看到了敌人的消耗,我们的兵力似乎不会消耗。尼韦勒(Nivelle)将军也持同样的想法。我们

① *G. Q. G.*, pp. 138-139。

② 同上,p. 147。

在1917年看到了后果。”

我们已经知道，这就叫做宣传。一帮能够阻止人们独立观察事变的人，在按照自己的目的编排新闻。只要这个目的是出于爱国心，那就怎么说都行。他们利用权力，只把他们想让公众了解的事态塞给协约国公众。宽特少校那些传遍世界的伤亡数字也是一路货色。它们被用来诱发一种特定的结论，即这场消耗战对法国越来越有利。但这个结论并非得自论证，它几乎是自动地产生于凡尔登高地上正有无数德国人被屠杀这一心理图像的创作。由于图像集中展示了德国人尸横遍野，法国人的尸体被忽略不计，一幅特殊的作战景观便勾画了出来。这幅景观被用来抵消德国领土正在向前推进以及德国人有力量坚持进攻所带来的影响。这幅景观还有助于使公众默认那种强加给协约国军队且涣散士气的防御战略。一向认为战争包括重大战略机动、翼侧攻击、包围和撤退的人们，逐渐忘记了那幅图像有利于一个令人恐怖的念头：要想赢得战争就只有拿人命去较量。通过控制所有的前线消息，总参谋部便推出了一幅与这种战略相称的事实景观。

一支作战军队的总参谋部竟能如此大范围地控制将被公众看到的东西。它决定哪些记者能上前线，控制他们在前线的活动，审读他们发自前线的消息，并操纵着无线电广播。站在军队后面的政府，则利用它所掌握的电缆、护照、邮局、海关及封锁手段加强这种控制。它靠合法权力——也靠特务机关——控制出版商，控制公共集会。但是军队的控制远不是那么完备。在这个无线电时代，不可能对中立国封锁敌人的公报。尤其是还有士兵之间的传言，他们休假时就会把它们从前线带到后方并到处传播。① 一

① 就在美军进攻圣米耶尔和阿尔贡－墨兹的一周之前，这个高度的机密在法国就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支大军是个笨重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海军和外交审查更加地道的原因。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知情人越少，控制人们的行动就越容易。

三

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审查制度，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宣传。为了进行某种宣传，就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些屏障。在一个人创造出他认为明智而可取的虚拟环境之前，必须限制他接近真实环境。因为，人们在直接接近他们所看到的事物时可能会产生误解，同时，又没有一个人能够决定他们将如何误解，除非他能决定他们到哪里去看和去看什么。军事审查是最简单的屏障方式，但决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的存在已为众所周知，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人们的赞同，并且不大被当回事。

在另外的时间、为了另外的目的，某些人却在采用而其他人则在接受特定的保密标准。什么事情因为公布出来并不“符合公共利益”而需要加以隐瞒，其中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楚，这样瞒来瞒去，最后就会使人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公共事务可言。个人的保密事务的概念内容是有弹性的，因此，只有一个人的财产规模被认为是保密事务，所得税法订有严谨的条款以尽可能维护它的保密性。一块土地的规模不具有保密性，但价格却可能有。一般认为，薪金（salary）比工资（wage）更具保密性①，收入则比

① salary，通常指公职人员、白领职员、管理层人员领取的薪水、薪金，一般支付的间隔较长。wage，一般指工人或仆役等体力劳动者领取的工资，包括按小时或按件计算的。——译注

遗产更具保密性。一个人的信用等级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认可。大公司的红利比小企业的红利更为公开。某种类型的交流是特许的，比如丈夫与妻子，律师与当事人，医生与病人，神甫与教友。董事会会议通常是保密的。许多政治会议也是如此。内阁会议的绝大多数内容，或者一位大使对国务卿——或在秘谈中、或在餐桌上——所说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保密的。许多人认为雇主与雇员间的合同也是保密的。在今天，所有社团的事务有时都被认为应当像一个人的神学理论那样予以保密。而在这之前，他的神学理论却被认为应当像他眼睛的颜色一样是公开的。但在另一方面，各种传染病曾像一个人的消化过程那样成为秘密。"秘密"这一概念的历史可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对它的不同看法有时会发生激烈冲突，比如布尔什维克公布秘密条约的时候，或者休斯(Hughes)先生调查人寿保险公司的时候，或者赫斯特先生的报纸从"街谈巷议"专栏到头版头条透露某人丑闻的时候。

无论保密的理由是言之凿凿还是牵强附会，屏障都是存在的。有人坚持要在所谓公共事务领域的所有方面进行保密。因此，问问自己是如何了解到那些使你产生了自己看法的事实的，往往会令人恍然大悟。实际上是谁看到、听到、感到、想到、说到了使你有了看法的事物？是告诉你的这个人？还是告诉这个人的那个人？或者关系更远的什么人？而且他又被允许看到了多少？当他告诉你法国打算这样那样时，他对法国有多大程度的了解？他会如何了解？他到何处了解？他获准与哪些法国人谈话？他读到了什么样的报纸？他又在哪里听到他们说了些什么？你可能会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但你却很难作出回答。然而，它们将会提醒你注意隔在事件和谈论事件的舆论之间的那种距离。而提醒本身就是一种保护。

第三章 交往与机会

一

虽然审查和保密在源头上截住了大量信息，但更大量的事实本来就不会传到整个公众那里，或者传得非常缓慢。因为观念有着截然不同的传播范围。

考虑一下战争期间的政府宣传，大体上就能估计出这种努力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触及“每一个人”。请记住，开战两年半之后，美国参战之前，有千百万种出版物在流传，无数次演说被发表，让我们按照克里尔（George Creel）先生所作的报道积极行动起来，“为人们的灵魂、为坚定他们的信念”而斗争，以把“美国式的福音传播到全球的每个角落”[①]。

克里尔先生不得不调动了包括一个“新闻公报委员会”在内的宣传机器（他告诉我们，该委员会发布了 6000 多期公报）；不得不征募了 7.5 万名 Four Minute Men（类同即召民兵），他们至少出动了 75 万次，对 3000 多万人发表了 190 次演说。男童子军到处散发威尔逊总统对美国家长的演说注释本。向 60 万名教师寄去了双周刊。提供了 20 万套幻灯片用于图解演说。设

① George Creel, *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

计了1438种不同的图案用于招贴画、橱窗广告、报纸广告、卡通片、纹章和徽章。商会、教会、兄弟会、学校都被用做传播渠道。然而,对于克里尔先生的努力,我还根本没有面面俱道,这还不包括麦卡杜(McAdoo)先生巨大的"自由贷款"组织,胡佛(Hoover)先生名闻遐迩的食品宣传,也不包括红十字运动、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哥伦比亚骑士团、犹太人福利委员会,我还没有提到那些独立的爱国团体——促进和平同盟、自由国民联盟、国民保障同盟——的工作,也没有提到协约国宣传机构以及少数民族的活动。

这大概是为了把一套千篇一律的观念迅速传达给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而作出的最广泛、最集中的努力。老式的改宗运动[①]见效较慢,大概也较可靠,但决不会如此无所不包。如果在危机时刻需要这种极端措施去触及每一个人,那么如何打开通往人们灵魂的比较正常的渠道呢?我相信,政府作出了艰苦的努力、而战争帮助它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创造了一种几乎是遍及整个美国的舆论。但是请想象一下,这种坚持不懈的工作需要多么复杂的智谋,需要多么庞大的财力和人力。和平时期决不会有这种景象,其结果必然是,所有的阶层、所有那些庞大的集团、那些少数民族、那些小团体以及各个阶级,都只是模模糊糊听说有许多事情正在发生。

他们按照常规生活,只关心自己那点事情,把更大量的事务拒之门外,几乎不和圈子以外的人们来往,也极少读书看报。当然,旅游和贸易、邮政、电报、广播、铁路、公路、航运、汽车、飞机,都在极大地影响着观念的传播。它们各自都以最为复杂的方式

① proselting,原是指使邪教皈依犹太教,这里是泛指改变思想的运动。——译注

影响着信息和舆论的数量与质量，其本身则受着技术、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影响。政府每放松一次护照程序或海关检查，每开通一条新铁路或一个新港口，每建立一条新航线，价格的每一次涨落，邮件发送得更快或更慢，电报不受检查并且费用更低，公路的建成、拓宽或改善，都会使观念的传播受到影响。关税目录和补贴影响着商业企业的经营方针，因而也影响着人类契约的性质。结果可能会出人意料，就像马萨诸塞的萨勒姆那样，造船工艺的变革将使整个城市从一个汇集了国际影响的中心变成一个时髦的地方都会。更迅速的运输未必都能带来良好的直接影响。例如，法国的铁路系统高度集中在巴黎，这对法国人民而言很难说是纯粹的幸事。

毫无疑问，交通手段所提出的问题极为重要，而国际联盟纲领最具建设性的特征之一，就是把铁路运输和入海口作为研究对象。对海底电缆、港口、加油站、山口、运河、海峡、河道、港站及市场的垄断经营，决不仅仅意味着一批商人发财致富，或者让政府显得威风凛凛。它意味着对新闻和舆论的交流设置障碍。价格与有效供给甚至是更大的障碍，因为，如果旅行或贸易的价格高昂得令人无法接受，如果交通工具大大供不应求，那么无需垄断经营也会存在障碍。

二

一个人的收入情况对于他同外部世界的接触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有钱，他就能够克服几乎所有的交流障碍，他可以旅行，购买书报，把世界上几乎任何已知的事实纳入他的视线。个人的收入和共同体的收入决定着交流的状况。但是人们的观念又决定着收入将如何支出，并转而影响他们的长期收入状况。

因此有些限制也是真实的，因为它们往往是自我强加和自我放纵的结果。

有些养尊处优的人们把他们的大部分闲暇和闲钱用于开车兜风和品评汽车，用于打桥牌和品评牌技，用于喋喋不休地对同一些人唠叨几乎没有变化的同一些话题。实际上他们不可能被要求接受审查，不可能被要求保守秘密，不可能感受到交流的高昂代价和严重困难。他们对于人类舞台几乎一无所知，既不想上台表演，对台上的表演也不感兴趣。他们的问题并不是接触外部世界。众多的兴趣领域在等待他们探索，但他们却不想进入。

仿佛受到了某种束缚，他们按照自己那个社交范围的规则与准则，在固定的熟人圈子中活动。男人在商务场合、在俱乐部、在吸烟室里的谈话圈子要比他们所属的圈子大得多。而女人的社交圈子和谈话圈子往往差不多就是一回事。在社交圈子中，那些来自阅读、演讲和谈话圈子的观念将汇集在一起，被整理、接受、排斥、判断和赞同。一场讨论的每个阶段最后都要做出决定，哪些理由和哪些消息来源是可以接受、哪些是不可接受的。

组成我们社交圈子的都是些看上去就像“人们都说”这一短语所指的人们，他们就是人民，他们所认可的事情绝大多数都和我们密切相关。大都会中那些兴趣广泛并且有条件到处旅游的男男女女，其社交圈子并不那么界线分明。但是即使在大都会，也存在着乡村那种包含着自给自足式社交圈子的社区和群体。在较小的共同体中，也许会存在更宽泛的交流，早饭后到晚饭前的时间里可能会有着更真诚的友谊。但是，几乎没有人会不知道自己真正属于或者不属于哪个圈子。

通常，一个社交圈子的突出标志就是形成了可以结为儿女亲家的那种关系。如果与圈子以外的人通婚，那么在这种婚约

得到准许之前，至少一度会引起疑虑。在社交圈子的等级体系中，每个社交圈子的相对地位都有着非常明确的形象。处在同一个层次的圈子之间，交往是没有障碍的，每个个人都会迅速被接受，规矩都是现成的，谁也不会尴尬。但是“上层”和“下层”圈子之间的交往，总是抱有相互间的猜疑，多少都有一种不自在，一种疏离感。当然，在美国那样的社会里，个人跳出一个圈子挪动到另一个圈子还是有点自由度的，特别是在没有种族屏障以及经济地位变化迅速的地方。

然而，经济地位并不取决于收入的多寡。至少在第一代人当中，决定社会地位的并不是收入状况，而是一个人的工作性质，这种家庭传统的淡出可能要花去一两代人的时间。因此，金融、法律、医疗、公用事业、报纸、教会、大型零售商、经纪人、制造业，其社会价值就被认为有别于推销商、监理人、专业技术工种、护理、教学、店务管理，而后者得到的评价则会有别于一个私人汽车司机、一个女装裁缝、一个转包商或者一个速记员，这些人又不同于一个男管家、一个贴身女侍、一个电影放映员或者一个火车司机。而且，收入状况并不必然地与这些等级身分相吻合。

三

社交圈子一旦形成之后，其准入标准就不再那么讲究经济地位，在有些事情上甚至更加类似于一个生物群。成员之间由于恋爱、婚姻和儿女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共同的态度和愿望而联系得非常紧密。因此，在这种社交圈子中，外部舆论就会与家族传统、体面、礼仪、尊严、趣味和惯例发生冲突，这些东西组合成了社交圈子的自身形象，而这种形象则会绵绵不绝地嵌入子孙后代的意识。不言而喻，这个形象的很大一部分画

面就是一种对每个圈子的公认的内在要求，据此来接受其他圈子的社会地位。比较常见的是要求公开表现出应有的服从，其他圈子对这种无形中存在的服从有着自己的理解，并且得体而敏感地保持着沉默。但是，那种理解是对一大堆倾向——即特罗特①对一般情况下大众本能所作的分类——的综合，在一次婚姻、一场战争或者一场社会动乱中就会显露出来。

每个社交圈子都有"天真的时代"②的范·德尔·吕当和曼森·明戈特夫人那样的占卜官，他们被认为是社交模式的看护人与解释者。他们说，只要范·德尔·吕当理解了你，你就被接受了。他们这种职能的体现就是他们出头露面时以及他们的身分所给人的暗示。对于社交生活来说，推举这样的人物就是确定社团领袖，而社交生活是被小心地分出了等级的，并且这种等级是得到普遍承认的。这些负有基本的优生学责任的社交领袖无不特别敏感。他们不仅要清醒地意识到什么东西有利于自己这个圈子的完善，而且要养成一种特殊才具，就是理解其他社交圈子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动就像外交部长。一个圈子的绝大多数成员都会满足于生活在这个圈子中，实际上是把它看作了整个世界，社交领袖们除了要熟知自己这个圈子的情况以外，还要不断认识它在整个社交界的等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

事实上，这种等级体系是由社交领袖们共同确定下来的。每一个层次几乎都可以叫做社交领袖们的社交圈子。现实的社会还有着通过社会交往而达成的纵向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却是由那些不同凡响而且经常令人生疑的人物实现的，就像《天真的时代》中四处出没的朱丽叶丝·博福特与艾伦·奥伦斯卡一样。

---

① W. Trotter, *Instincts of the Herd in War and Peace*.

② Edith Wharton, *The Age of Innocence*.

于是，各个圈子之间就通过这种个人渠道串联了起来，由此而启动了模仿的"行规"。不过，人口中的大部分并没有这种渠道。他们能够得到的只是公开的社会新闻和反映上流社会的电影。他们可能会发展出自己的社交等级制，几乎引不起别人的注意，比如黑人和"外来移民"，而他们当中已被同化的群众则会始终认为自己属于这个"民族"，尽管与各个圈子有着很大的鸿沟，但是通过种种个人交往使不同的社交准则得到了传播。

某些社交圈子被罗斯教授称作"惯例的亮点"。正因为有了他们，上流社会才有可能被下层社会模仿，掌权者被从属者模仿，更成功者被不大成功者模仿，富人被穷人模仿，城市被乡村模仿。而模仿是没有止境的。强者的、上流社会的、成功者的、富人的、城市的社交圈子，在整个西半球基本上都是国际性的，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是以伦敦为核心的。它所网罗的成员大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包括外交使团、金融大亨、陆海军高级将领、某些教会巨头、少数报业大王，以及他们具有社交影响的妻子、母亲和女儿。它同时又是一个巨大的谈话圈子，一个实际的社交圈子。不过它的重要性乃是出于这一事实：至少在那里面，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区别实际上已经消失。这个圈子中的私事就是公事，公事也是私事。马戈特·阿斯奎斯的局限就是皇室的局限，一如哲学家们所说，他们人人谈论的都是同一份税率表或者同一场议会辩论。

有大量政治领域的问题是这个社交圈子不感兴趣的，至少在美国，它对国内政治仅仅发挥着一种时强时弱的影响。但在外交事务上它的能量却极大，到了战时它的威望更是炙手可热。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这些世界主义者同外部世界有着别人所没有的那种联系；他们在各个首都相互款待，他们的民族荣誉感决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而是可以从朋友的怠慢或赞

许中得到的具体感受。就像《天真的时代》所描绘的那样，对于明尼苏达大草原上的肯尼科特博士来说，温斯顿在想什么以及大量的是埃兹拉·斯托波迪在想什么，统统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对于有一个女儿嫁给了那位斯维廷伯爵的明戈特夫人来说，去看望女儿或者款待温斯顿本人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了。肯尼科特博士和明戈特夫人都富有社交敏感性，但是明戈特夫人所敏感的是统治世界的那个社交圈子，肯尼科特博士却只对统治明尼苏达大草原的那个社交圈子敏感。尽管在那些影响着更大的“大社会”关系的事务上，人们也常常发现肯尼科特博士持有一些他认为纯粹是自己的观点，但事实上那不过是从上流社会经由地方社交圈子曲曲折折扩散到明尼苏达草原上的东西。

四

描绘这样的社交网络并不是我们这项研究的组成部分。我们只需牢记的是社交圈子在我们与世界的精神联系中发挥着多么大的作用，它是多么倾向于把可以接受的观点弄得一成不变，然后决定如何对它进行评价。每个圈子大体都是自行决定直接权限之内的事务，至关重要的是决定判断力的详细用法。不过，这种判断力的形成可能得自过去的遗传，也可能是从其他圈子那里传递或者模仿来的。组成最高层社交圈子的人们体现着“大社会”的领导权。这个“最上流社会”几乎不理睬任何一个两眼只盯着地方事务的社交圈子，在那里，战争与和平、社会战略的重大决策以及最高政治权力的分配，都是在一个——至少是潜在的——熟人圈子里进行的。

由于地位和交往在决定什么能看、能听、能读、能体验以及

什么可以允许去看、去听、去读、去了解时发挥着非常重大的作用，那就无怪乎道德判断往往比建设性的思想更常见了。而在进行真正有效的思考时，一个非做不可的事情，就是清理各种判断，重获一种单纯的目光，摆脱各种情感，充满好奇并且心怀坦诚。人类历史就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按照“大社会”的尺度进行政治思考需要一种忘我的沉静心态，这可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的。我们全都受到了公共事务的影响，但是我们全都沉溺于私人事务之中。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有限，不愿费力注意那些还没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意见，而且我们很容易受到不断的干扰。

第四章　时间与注意力

一

无疑，我们可以做到仅仅约略地估计一下人们每天能够拿出多大的注意力来获取有关公共事务的消息。饶有趣味的是，我曾考察过的三种估计大致相同，尽管它们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采用不同方法得出来的。①

霍奇基斯和弗兰肯曾向纽约市的1761名大学生发放了一份调查表，答卷基本收回。斯科特则向芝加哥的4000位知名实业家和专业人士发放了一份调查表，收回2300份答卷。答复了这两项调查的人，总计有70—75%认为自己一天能用15分钟的时间读报。芝加哥只有4%的人认为不足这个时间，25%的

① 1900年7月，D. F. Wilcox, *The American Newspaper: A Study in Social Psycholog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Xvi, p. 56(统计表是由James Rogers, *The American Newspaper* 复制的。)

1916(?)W. D. Scott, *The Psychology of Advertising*, pp. 226－248. See also Henry Foster Adams, *Advertising and its Nental Laws*, Ch. IV.

1920 *Newspaper Reading Habits of College Students*, by Prof. George Burton Hotchkiss and Richard B. Franken, publish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Advertiser, Inc., 15 East 26th Street, New York City.

人多于这个时间。8%多一点的纽约人读报时间不足15分钟，17.5%多于15分钟。

极少有人会精确地卡着15分钟，所以对这些数字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此外，绝大多数实业家、专业人士和大学生都有一种奇怪的小偏见，认为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去读报，同时，也许应当多少怀疑一下，他们想要表现得像是些眼疾手快的读者。所有这些能被合理采用的数字都表明，3/4以上的受调查者对于书面上的外部世界的新闻所给予的注意力都相当之低。

这些时间估计恰好得到了一个不算太主观的测验的证实。斯科特问芝加哥被调查者，他们每天读多少版报纸，结果表明：

14%的人只读1版

46%…………2版

21%…………3版

10%…………4版

3%…………5版

2%…………6版

3%…………全部(8版)

读下2—3版的读者占67%，这非常接近斯科特的调查，即71%的芝加哥人认为自己一天的读报时间是15分钟。读下4—8版报纸的读者比例也大体和自认为多于15分钟的25%相符。

二

更加困难的是推测时间如何被分配。大学生们被要求答出“你最感兴趣的5个栏目”的名字。不到20%的人填了“综合性

新闻”，填社论的不到15%，“政治”不到12%，金融8%强，停战还不到2年，填外交新闻的就只有6%多一点了，当地新闻3.5%，商业接近3%，“劳工”新闻仅占0.25%。其他零零散散最感兴趣的还有体育、特写、戏剧、广告、漫画、书评、“精品”、音乐、“道德风气”、社交、短论、艺术、故事、购物、学校新闻、“时尚新闻”、插图。如果后面这些不算，那就是约67.5%的人对于涉及公共事务的栏目新闻和舆论最感兴趣。

这是一个男女混合组。女生对于综合性新闻、外交新闻、当地新闻、政治、社论、戏剧、音乐、故事、漫画、广告和“道德风气”要比男生关心得多。男生则更专注于金融、体育、商业、“精品”和“短论”。这种区别也相应地比较接近有教养的、道德的、男子汉的以及果断的理想，不至于令人怀疑这些答案的高度客观性。

而且，他们与芝加哥实业家和专业人士的答案相当一致。后者要回答的问题并不是他们对什么栏目最感兴趣，而是为什么更喜欢这份而非那份报纸。近71%的人明确回答是因为那里有他们所喜欢的当地新闻(17.8%)、政治新闻(15.8%)、金融新闻(11.3%)、外交新闻(9.5%)、综合性新闻(7.2%)或者社论(9%)。其他30%提出的理由都与公共事务无关，其中最多的是道德风气(不足7%)，最少的是幽默(一两个人)。

这样的选择与报纸给不同对象提供的空间是否一致呢？很遗憾，没有搜集到芝加哥与纽约的被调查者拿到调查表时所读过的报纸在这个问题上的资料。不过这里有一个20年前由威尔考克斯做过的有趣分析。他研究了14个大城市的110份报纸，对9000多个栏目的题材进行了分类。

全国各种报纸的素材所占版面大体上可以归纳为：

- (1) 新闻　占 55.3
  - 战争新闻　占 17.9
  - 综合性新闻　占 21.8
    - 外交　占 1.2
    - 政治　占 6.4
    - 犯罪　占 3.1
    - 漫谈　占 11.1
  - 特色新闻　占 15.5
    - 实业　占 8.2
    - 体育　占 5.1
    - 社会　占 2.3
- (2) 插图　占 3.1
- (3) 文学　占 2.4
- (4) 舆论　占 7.1
  - 社论　占 3.9
  - 来往信函　占 3.2
- (5) 广告　占 32.1

为了使这个统计表能够用于进行恰当的比较,应当把广告所占的篇幅排除在外并重新计算一下比例,因为对于芝加哥或纽约的被调查者选择报纸的自觉意识来说,广告只有极其微不足道的影响。我认为这样做对我们的意图来说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报社揽来什么广告就会刊登什么广告,而其余的版面才是根据读者口味设计的。这样,统计表就可以开列如下:

- (1) 新闻　占 81.4 强
  - 战争新闻　26.4 弱
  - 综合性新闻　32.0 强
    - 外交　1.8 弱
    - 政治　9.4 强
    - 犯罪　4.6 弱
    - 漫谈　16.3 强
  - 特色新闻　23.0 弱
    - 实业　12.1 弱
    - 体育　7.5 强
    - 社会　3.3 弱

(2) 插图　占 4.6 弱

(3) 文学　占 3.5 强

(4) 观点　占 10.5 弱 { 社论　5.8 弱 / 信函　4.7 强 }

在这个改动过的表上，如果把可以认为是关于公共事务——就是说，关于战争、外交、政治、漫谈、实业、舆论——的项目加在一起，你就能发现，1900 年被热心编辑出来的版面总共占了 76.5%；而 1916 年芝加哥实业家们之所以更喜欢一份特定报纸，有 70.6%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些版面；1920 年的纽约大学生则有 67.5%的人对那 5 个栏目最感兴趣。

这似乎表明，大城市的实业家和大学生，大体上至今仍然符合 20 年前大城市的报纸编辑们对他们所作的判断。从那时以来，特色新闻的比例无疑是大大增加了，报纸的发行量和容量也是如此。所以说，如果今天你能得到比大学生、实业家和专业人士更典型的被调查者的精确回答，你可能就会认为人们热心于公共事务的时间比例更少，报纸留出的版面比例也更少了。但同时，你可能还会发现，普通人用来读报的时间已经不止一天 15 分钟了，而报纸在总量更大的情况下给公共事务留出的版面比例也比 20 年前更少了。

从这些数字中不会得出详尽的推论。它们只是有助于让我们比较准确地了解自己每天获取舆论资料的努力是个什么状况。当然，报纸并不是唯一的手段，但肯定是主要的手段。杂志、公共论坛、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①、教堂、政治集会、工会大会、妇女俱乐部以及电影院里的连本新闻片，都是报纸的补充。

① Chautauqua，19 世纪后期以及 20 世纪初流行于美国的类似暑期学校的活动，常在野外举行，兼有教育和娱乐，包括报告会、演戏、音乐会等，因创始于纽约州 Chautauqua 地方而得名。——译注

但是,当我们直接面对看不见的环境的信息时,要想从它那里得到一切最有利的判断,每天用那点时间就太少了。

第五章　速度、词语和清晰度

一

看不见的环境主要是通过词语报告给我们的。这些词语通过电缆或无线电从记者那里传给了编辑，然后把它们送去付印。电报费用很高，而且设备常常有限。因此，新闻机构的新闻通常都被译成电码。比如这样一条电讯：

Washington, D. C. June 1.——The United States regards the question of Greman shipping seized in this country at the outbreak of hostilities as a closed incident,

(华盛顿 6 月 1 日电——美国认为在爆发冲突时德国所能利用的国内船舶问题还是个未知数，)

在电报中就可能被省略成这种样子：

Washn 1. The Uni Stas rgds tq of Ger spg seized in ts cou at t outbk ohox as a clod incident. ①

一条新闻说：

Berlin, June 1——Chancellor Wirth told the Reichstag to-day in outlining the Government's program that "restora-

① 菲利浦电码。

tion and reconciliation would be the keynote of the new Government's policy." He added that the Cabinet was determined disarmament would not be the occation of the imposition of further penalties by the Allies.

（柏林6月1日电——维尔特总理今天在向国会提出施政纲领时说，"恢复元气与实现和解是新政府的政策基调。"他还说，内阁决心裁军将不会给同盟国提供进一步施加制裁的机会。）

在电报中就会成为这样：

Berlin 1. Chancellor Wirth told t Reichstag tdy in outlining the gvts pgn Tt pn restoration & reconciliation wd b the keynote f new gvts policy. qj He added ttt cabinet ws dtmd disarmament sd b carried out loyally & tt disarmament wd n b. the ocan f imposition of further penalties bi t alis.

第二条中的要旨是从一篇用外交语言发表的长篇演讲中摘出来的，经过了翻译、编码，然后再译码。收到这些电文的译电员接着就要把它们译出来，我听说，一个出色的译电员每天8小时可译出1.5万字甚至更多，其间还包括半小时午饭及20分钟休息时间。

二

寥寥数语往往就代表了整个一系列行动、思想、感情和结果。我们来看看这段消息：

华盛顿12月23日电——朝鲜问题委员会今天在这里散发了一份声明，指控日本军队在满洲的行为比战争期间在比利时发生的情况"更可怕、更野蛮"，该委员会说，它是

根据从满洲得到的权威报告提出这项指控的。

有一些完全不为人知的目击者向这些“权威报告”的制作者提供了情况；后者把它们传给了5000英里以外的一个委员会。委员会准备了一份大概过于冗长的声明，一个记者又从中摘出了一条3英寸半长的新闻。声明的内容不得不以这种方式进行简缩，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这条新闻的分量。

就算是个文法大师，他能否把过去几个月来发生在朝鲜的事情完全公正地塞进这百十个字以说明全部事实真相，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语言决不是一个完美的达意工具。词语和货币一样是要反复流通的，它今天会激发出一种想象，明天又会激发出另一种想象。同一个词语在记者与读者的头脑中是否能唤起同一个想象，这谁都没有把握。从理论上说，如果每一个事实和每一项叙述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名称，而且人人都一致同意这种名称，那是有可能消除交流中的误解的。在精密科学中就存在着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途径，这就是在所有世界性合作事业中科学研究的合作最有成效的原因之一。

人所掌握的词语要比他们想表达的意思少得多，正如让·保罗所说，语言就是一部暗淡的隐喻组成的辞典。① 一个对50万读者说话的记者，那50万人对他来说只是一幅模模糊糊的画面，他用的那些词语传播到乡村和海外时，由它们组成的寥寥几段话不可能传达出它们所承载的全部含义。M.布里安德对国会说，“劳合·乔治的用语很费解、很难转述，它们似乎能使泛日尔曼主义者认为，时间总会带来某种开端的。”② 一位英国首相，在英国向聚精会神的全世界发表讲话，用他自己的词语表达

① 引自 White, *Mechanisms of Character Formation*。

② 1921年5月25日《纽约时报》特稿，作者 Edwin James。

着他自己的意思，而所有的人都将用这些词语来理解它们的意思。无论他说得多么含蓄、多么隐晦——或者毋宁说，越是含蓄、越是隐晦，在发布标准的演说，然后再传播到外国人头脑中的时候，他的意思就越是会受到损害。

注视着他的几百万人几乎不能理解他。更有可能的是，几百万人看懂了那些词语但却不理解它们。在那些既看懂又理解了的人们当中，我们可以假设有四分之三的人一天抽出了半小时去关注那个问题。对他们来说，这样获得的词语会成为一连串想法的提示，而这些想法最终就会决定一次结果尚未可知的选举。无疑，我们用那些看懂了的词语唤起的各种想法，构成了我们观点的绝大部分依据。世界太大，我们面对的情况太复杂，我们得到的信息又太少，因此，舆论的绝大部分就必定会产生于想象。

我们在使用“墨西哥”这个词语时，它在纽约居民的头脑中会产生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很可能是某种混合景象，里面有沙滩、仙人掌、油井、土外国佬、嗜饮朗姆酒的印第安人、暴躁的旧式骑士，或者还有即将受到浓烟滚滚的工业主义前景的侵袭并且为人权而斗争的质朴的农民。“日本”这个词语呢？不就是一群面无表情的斜角眼黄种人、如画的新娘、扇子、武士、喜欢自杀性拚命、艺伎和樱花吗？“外侨”呢？一批新英格兰大学生在1920年写下了对外侨的如下看法：①

敌视这个国家的人；

反对政府的人；

处在对立面的人；

在一个不友好国家出生的人；

① 1920年12月29日《新共和》，p 142。

战时的外国人；

企图对所在国造成危害的外国人；

来自一个外国的敌人；

反对某个国家的人，等等……

然而，外侨一词是个极为精确的法律术语，远比主权、独立、民族名誉、权利、防御、侵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词语精确得多，而对这些词语我们却会非常容易地表示“赞成”或“反对”。

三

头脑的清醒就在于有能力分辨出表面的相似、注意到差异以及鉴别出变化。这是一种相对的能力。当然，所谓清醒，其间的差异也是很大的，比如一个新生婴儿和一个植物学家对一朵花的观察。在婴儿看来，他的脚指头、他父亲的手表、桌上的台灯、天上的月亮和廉价的莫泊桑小说之间并没有什么重大区别。对于联邦派同盟①俱乐部的成员来说，一个民主党人、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个窃贼并没有什么显著不同，而在一个精深的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巴枯宁、托尔斯泰与克鲁泡特金之间却有着天差地别。这些事例表明，要想从婴儿们中间获得关于莫泊桑的合理的公众舆论、或者从联邦派俱乐部成员中间获得关于民主党的合理的公众舆论将会多么困难。

一个只是乘坐别人汽车的人不大可能在一辆福特车、一辆出租车和一辆机动车之间看出更细致的差别。但是，如果同一个人能够拥有一辆自己的车开，并且像精神分析学家说的，让他

① Union League，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一个北方团体。——译注

对汽车产生了力比多(libido),那么他只需看一眼一辆汽车的后尾,就能描绘出汽化器的差别。这就是当谈话从"泛泛而论"转向一个人的具体嗜好时就会生动起来的原因。这就像从客厅里的风景画转向户外的田野一样,是体验了画家对自身情感反应的描绘之后重返三维世界,而画家的情感反应只是来自漫不经心的记忆,里面有一些他认为自己应当看到的东西。

费伦奇[①]说,我们很容易把两个只有部分相同之处的东西看作一回事[②]:儿童比成人、天真或拘束的头脑比成熟的头脑更容易如此。婴儿最早出现的意识仿佛是一种失控的知觉大杂烩。婴儿没有时间意识,几乎没有空间意识,他在伸手去抓一盏枝形吊灯的时候同样会确信那就是母亲的乳房,而且一开始他就会抱着同样的期待。他只是在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中分清了它们的功能。对于一个完全缺乏经验的人来说,这个世界是一模一样、没有差别的,就像有人谈到某个哲学学派时说的,在那里面,所有的事实全都如出一辙。属于这个世界的事实还没有和碰巧在意识流中混在一起的事实分离开。

费伦奇说,最初,婴儿想要什么东西是通过哭叫而得到它们的。这是个"魔术般的幻觉全能时期"。在第二阶段,婴儿会指着他想要的东西,并且会得到它们。这是"借助于魔术般手势的全能"。再往后,婴儿咿呀学语了,他会索要他想得到的东西,而且多半会成功。这是"魔术般的思想和魔术般的词语时期"。每个阶段都会保持某些被遮盖起来、只是有时可见的情境,比如说

---

① Sandor Ferenczi(1873—1933),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因对基本精神分析理论的贡献及对治疗方法进行的实验而著名。——译注

② Internat. Zeitschr., f. Arztl. Psychoanalyse, 1913. Translated and republished by Dr. Ernest Jones in S. Ferenczi, *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 Ch. VIII,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nse of Reality*.

没什么害处的迷信，这是我们几乎没人能摆脱的情境。在每个阶段，部分的成功会刺激其他阶段的发展。许多个人、政党乃至民族，看来都难以超越这种魔术般的经验体系。但是，在绝大多数先进民族中，那些比较先进的人们在屡遭失败的试错过程中则必定会创立某种新的原则。他们会知道，月亮并不因为狗冲着它狂吠而不再转动。使粮食增产的并非欢度了春节或者共和党赢得了多数，而是由于阳光、浇水、播种、施肥和耕作。①

由于费伦奇对反应的分类有着完美的图解价值，这使我们能够看到，关键性的品质还是那种对原始感觉和模糊相似性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已经得到了实验室环境下的研究。② 苏黎世的联想研究清楚地表明，轻度的精神疲劳，即内心的注意力失调和外在的精神涣散，很容易"夷平"作出反应的品质。一个非常"呆板"型的例子就是铿锵的连缀音(cat－hat[猫－帽])，一种对声音而不是对刺激性词语的意义的反应。例如，一项测验表明，在第二轮的100次连续反应中，铿锵声要增加9%。这时的铿锵声几乎就是一种重复、一种非常简单的类推形式了。

四

如果连这种比较简单的实验室环境都能如此轻易地摧毁辨别力，那么城市生活的影响还用说吗？实验室里的疲劳度已经

---

① 费伦奇是个病理学家，不会去描述这种成熟期，在这个时期，经验会被组织成平衡态，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实主义阶段。

② 例见荣格博士指导下的在苏黎世大学精神病诊所进行的联合诊断研究。这些实验主要是按照所谓 Krapelin-Aschaffenburg 分类法进行的。荣格的 *Analytical Psychology*, Ch II(Constance Long 博士英译)总结出了某些实验结果。

够轻的了,精神涣散的程度也微不足道。如果连节拍器的击打声都能抑制思想,那么在工厂里度过嘈杂、恶臭、闷热的 8 个或者 12 个小时,或者日复一日地听着没完没了的打字机声、电话铃声和砰砰的摔门声,那会怎么样呢?根据在汽车里或地铁中读过的报纸去作出政治判断,又会怎么样呢?在并非尖锐的喧闹声中,我们能够听到什么?在不像电光那样闪烁的一片强光里,我们又能看到什么?住在城市里缺的就是僻静、寂寥和悠闲。夜晚同样那么嘈杂激昂。大城市的人们饱受着噪音的侵扰,剧烈、刺耳,已经成了一种不加修饰的旋律,而且没完没了,冷酷无情。在现代工业主义的环境里,思想被浸泡在噪音之中。如果它的辨别力经常变得呆板而愚蠢,从这里至少能找到一小部分原因。统治者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决定着人们的生死与幸福:在这里,无论是经验还是实验都会表明,进行思想活动是多么地困难。当环境使思想成为累赘时,"不可承受的思想重负"就真的是一种负担了。

每个需要思考个人职责的人都知道,他应当每天都给自己挤出一段安静的时间。但是在我们以文明的名义制造出来的一片手忙脚乱之中,全体公民是在一种大概无以复加的恶劣环境下履行着危险的政治职责的。对于这种真相的模糊认识激励着人们要争取更短的工作日、更长的休假期,要在工厂和办公室里得到轻松、空气、秩序、阳光和尊严。但是,要想改善我们生活的思想质量,这才仅仅是最起码的开端。漫长繁杂的劳作无休无止,而且对于工人来说,还是一种漫无目的的惯例,一种按照一成不变的方式运用全身肌肉的机械运动,他的全部生活都将成为一种机械运动,里面的一切都和外界的一切——除非它发出了霹雳般的响声,否则就——没有什么特别差异。只要他还像囚徒一样整天甚至整夜地拥挤在人群中,他的注意力就会一直

处于飘忽不定的漫游状态。他无法迅速了解并且明确界定自己在哪里成了各种骚乱的受害者，就是在家里，在摆脱了单调乏味的苦工的家里，也还有哭闹的孩子、粗声粗语、难以消化的食物、浑浊的空气和令人窒息的装饰。

偶尔我们也会进入一幢安静宽敞的大楼，走进一家用现代舞台艺术驱除了烦乱的剧院，或者驾船出海，或者寻到一个僻静的去处，这时我们就会想起，我们这个时代的日常都市生活是多么乱七八糟、多么反复无常、多么无聊和喧嚣。我们想要弄明白为什么我们一塌糊涂的头脑不能多一点精确性，为什么几个大标题和口号就能使它像跳起塔兰泰拉舞[1]一般如醉如痴、颠来簸去，为什么它会那么经常地不能对事情进行条分缕析，或者不能在表面的差异中看出共性。

五

但是，这种外在的无序由于内在的无序而更趋复杂。实验表明，我们被灌输的一些所谓情感冲突破坏了联想的速度、精确性和思想的质量。在 15 秒钟内用 100 个从中立到热烈的词语进行的刺激可以显示，其中有 5—32 个——更有甚者的是全部——都得不到响应。[2]显而易见，我们的公众舆论是间歇性地同各种情结发生着联系，同野心、经济利益、个人仇恨、种族偏见、阶级感情等等联系在一起，它们以各种方式歪曲着我们的看法、想法和言谈举止。

---

① tarantella，意大利南部的民间舞蹈，6/8 拍子，因速度极快，早先曾被用于医治毒蜘蛛舞蹈症。——译注

② Jung, *Clark Lectures*.

最后，由于舆论并不会到了正常的社会成员那里便止步不前，由于那些为一次选举、一场宣传、一批追随者和一堆待分配的权力而考虑的目的，注意力的质量还会进一步受到贬抑。由那些绝对目不识丁而又毫无主见、神经迟钝、营养不足、心灰意懒的个人组成的大众也是举足轻重的，而且有理由认为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远更举足轻重。因此，那些精神上仍处于孩提或野蛮状态的人们，那些生活陷于困境的人们，那些生命力已经枯竭的人们，那些遗世独立的人们，那些有经验却没有机会就当前问题置喙的人们，就会得到正中下怀的感召。公众舆论的潮流到他们那里才是终点，而且没有误会的旋涡，里面充满了偏见和远距离的类推。

一种“广泛的感召力”考虑的是联想的特性，它针对的是那些广泛分布的感情。“狭窄的”或“特殊的”感召力则是针对着那些不同寻常的感情。但是同一个人可能会以非常不同的特性对不同的刺激做出反应，或者在不同的时间对同样的刺激做出反应。人类的感情宛如一个高山之国。那里有相互独立的颠峰，有广阔但分隔的高原，有越来越深、几乎延伸到全人类的地层。有些个人的感情达到了崇高的颠峰境界，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犹如弗雷格与皮亚诺之间、早年和晚年的萨塞塔[①]之间那样的高雅区别，这些人在另一个感召力层面上可能都是非常坚定的共和党人，而当他们饥寒交迫、担惊受怕的时候，那种境况和其他饥寒交迫、担惊受怕的人也并无二致。无怪乎那些大量发行的杂志都喜欢用美女而不是其他什么商标作封面，一张面孔如

① Gottlo Frege(1848—1925)，德国数学家、哲学家、现代数理逻辑奠基人。Giuseppe Peano(1858—1932)，意大利数学家、符号逻辑奠基人。Sassetta(？—约1450)，意大利国际哥特式画家，15世纪早期锡耶纳最伟大的画家。——译注

果足够漂亮，那就能引人注目，如果又足够单纯，则会大受欢迎。因为，刺激因素得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在“精神层面”，而“精神层面”决定着公众在规模上的扩大或缩小。

六

因此，与我们的公众舆论有关的环境是通过许多渠道折射出来的：通过源头上的检查与保密，通过另一端的物质与社会障碍，通过飘忽的注意力，通过贫乏的语言，通过涣散的精神，通过无意识的情感丛，通过损耗、暴力和千篇一律。这是一些妨碍我们进入环境的限制因素，此外还有事实本身的朦胧与复杂，它们共同损害着感性认识的清晰度和公正性，用误人视听的虚构替代切实可行的理念，使我们无法对那些有意误人视听的人进行充分的核查。

第三部分

成　　见

第六章 成　　见

一

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工作在这个地球的一隅，在一个小圈子里活动，只有寥寥无几的知交。我们对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事件充其量只能了解某个方面或某一片断。和那些起草条约、制定法律、颁布命令的显要人物一样，被要求接受条约的约束、法律的规范和执行命令的人们，也是些实实在在的人。我们的见解不可避免地涵盖着要比我们的直接观察更为广泛的空间、更为漫长的时间和更为庞杂的事物。因此，这些见解是由别人的报道和我们自己的想象拼合在一起的。

然而，即使是目击者也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再现事件的全貌①。因为经验似乎表明，他本人会对事后减弱了的现场印象做些添枝加叶的处理，实际上，更常见的并不是他凭想象去描绘一个事件，而是对它进行改编。似乎没有什么事实仅仅是被有意传播。绝大多数事实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经过了有意加工。

---

① 例见 Edmond Locard, *L'Enquete Criminelle et les Methodes Scientifiques*。另见 Sherrington, *The Integrative Action of the Nervous System*, pp318—327。后来 Hugo Munsterberg 教授就这一问题写了一本通俗读物，名为 *On the Witness Stand*。

一篇报道乃是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共同产物，其中那个旁观者的角色总是带有选择性倾向，通常还会带有创造性。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

一个陌生的场面犹如婴儿眼中的世界，是"一种庞杂喧嚣的混乱状态"①。这种情形正如约翰·杜威先生所说②，只要事情确实新奇，任何新鲜事都会打动一个成年人。"我们所不懂的外国语，听上去似乎总是呜哩哇啦、一片嘈杂，根本听不出任何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独立语音群。诸如乡巴佬置身闹市、旱鸭子出海航行、身无长技的笨蛋参与行家里手在复杂游戏中的竞赛，都是这样的情况。一个外行进了工厂，最初的工作对他来说仿佛是一团毫无意义的乱麻。众所周知，另一个种族的所有成员在一个外国游客眼中全都是一模一样的外国人。一个局外人只能根据个头和颜色分辨一群羊的大体差别，但牧羊人却能准确地认出每一只羊。一块四处蔓延的污渍和一种游移不定的吸力，有着我们所无法理解的特性。因此，探寻事物的意义，或者（换个说法）培养简明理解的习惯，将会导致意义的(1)明确性与差别性和(2)连贯性与稳定性出现另外的模糊与暧昧。"

但是，所采用的明确性与连贯性的性质，取决于谁来采用。杜威在下文③中举例说明了一个见多识广的外行人和一个化学家对"金属"一词可能作出的定义会是多么大相径庭。在那位外行看来，金属"大概就是指的平滑、坚硬、有光泽、耀眼、体积小重量大……其特性包括砸不裂拉不断、冷了硬热了软、能保持给定的形状、抗挤压、耐腐蚀"的东西。但化学家很可能会对这些审

① James,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I. p. 488.

② John Dewey, *We how think*, p.121.

③ 同上，p. 133.

美与实用的特性忽略不计,而把金属定义为“与氧化合并生成氧化物的化学元素”。

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云集巴黎处理人类事务的大人物们,有多少人除了了解他们对欧洲作出的承诺以外,还能更多地了解一下他们身边的欧洲呢?有谁能够看透克雷孟梭的心思呢?他能看出1919年的欧洲或者在长期的好战环境里形成了积重难返的巨大成见的欧洲是个什么景象吗?他了解1919年的德国人或者1871年以来他所习见的典型的德国人吗?他曾通过来自德国的报道认识了这样的德国人,他喜欢这些报道,似乎只有这些报道才合乎他心目中的典型形象。如果是一个容克贵族在那里大发雷霆,那就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如果是一个劳工领袖在历数帝国的罪恶,他就不是真正的德国人。

在哥廷根曾召开了一次心理学会议,其间有一批据说是训练有素的观察家接受了一次饶有趣味的实验①。

> 距正在召开会议的大厅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公共庆典活动,其中还有一个化装舞会。突然,会议厅大门被人撞开,一个小丑冲了进来,一个持枪黑人在后面狂追。他们在大厅中央停下撕打;小丑倒下了,黑人扑上去开枪射击,然后两人一起冲出了大厅。整个事件持续了不到20秒钟。
>
> 会议主席要求在座各位当即写出一篇报告,因为肯定会有一次司法调查。交上来的40篇报告中,关于主要事实

① 见 von Gennep, *La formation des legendes*, pp 158—159,引自 van Langenhove, *The Growth of a Legend*, pp 120—122。

的错误低于20%的只有1篇,有14篇的错误为20-40%,有12篇达40-50%,13篇高达50%以上。而且,有24篇纯粹是杜撰了10%的细节描述,有10篇的杜撰率高于10%,低于10%的只有6篇。简言之,有十分之一的报道是虚假报道。

不用说,整个事件是预先安排好的,而且煞是生动逼真。那10篇虚假报道可以归入故事或传奇之类,24篇报道是半传奇,只有6篇具有接近确凿证据的价值。

这样,40名老练的旁观者针对刚刚发生在眼前的这一事件写出了一篇很负责任的报道,却使大多数人了解到一次并未发生的事件。那么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有人认为有什么说什么要比无中生有更容易。他们看到了自己对这场打斗的成见。他们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全都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打斗的印象,而这些印象仍在他们眼前晃动。只有一个人用这些印象取代了不到20%的实况,有13人则超过了一半。在40位观察家中,有34人用先入之见取代了至少十分之一的事实。

一位著名的艺术评论家说过①,“一个物体几乎可以表现出无数种形状。……由于我们的麻木不仁和漫不经心,使得我们很难随意想起各种事物的明晰的特征与轮廓,但是造型艺术却能够做到这一点。”实际情况要比这更为广泛,因为能给这个世界造型的并不仅仅是绘画、雕塑和文学意义上的艺术,还有我们的道德规范、社会哲学以及政治煽动。用“政治”、“商业”、“社会”等等术语替代贝伦森先生下文中的“艺术”一词,句子也照样讲得通:“……除非我们到所有的艺术学校都经过多年的学习,

① 见 Bernard Berenson, *The Central Italian Painter of the Renaissance*, pp 60 及各处。

否则我们很快就会养成一种习惯，那就是，无论我们的观察对象是什么，我们都会根据自己所熟悉的某种艺术手法为其造型。这就成了我们自己的艺术真实性的标准。如果有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形状和色彩，而我们又不可能立刻按照自己微不足道的陈腐形式和色调谱系予以接受，我们就会怀疑他未能再现我们自以为熟知的事物，或者指责他矫揉造作。”

贝伦森先生谈到，如果有一位画家“未能完全按照我们的方式描绘各种对象”，我们就会感到不快，而且中世纪的艺术也使我们感到难以理解，因为自那时以来“我们的造型方法已经发生过无数次变化”①。他接着说明了我们是如何学会就人物形象领会我们所看到的东西。“由多纳太罗和马萨乔②创造并得到人文主义者认可的人物形象的新标准、人物特征的新模式，……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典型人物。……谁有力量打破这种视觉新标准并且能够避免混乱而选择比那些天才人物所确定的更为明确的对现实的表现形式？没有人具备这样的力量。人们只能采取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方式去看待事物，只能接受现成的形式，只能喜欢现成的理想……”③

① 另见他在 *Dante's Visual Images, and his Early Illustrators in The Study and Criticism of Italian Art* (First Series)第13页的注释：“我们总是禁不住要强调维吉尔是罗马人，给他塑造一幅‘经典画像’和‘庄严姿态’，可是但丁眼里的维吉尔大概和他对整个罗马诗歌的概念一样也是一个中世纪人，根据的同样是对古代人的批判性重塑。14世纪的插图画家把维吉尔看得像个戴着礼帽、穿着黑袍的中世纪学者，无怪乎但丁眼里的维吉尔形象没有成为别的样子。”

② Donatello(1386—1466)，15世纪最伟大的雕塑家，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写实主义创始人。Masaccio(1401—1428)，意大利著名画家，从他开始，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出现了全面的繁荣。——译注

③ 见 *The Central Italian Painters*, pp 66—67。

二

如果我们不能充分理解别人的行为，那么在了解到他们的心思和见识之前，为了公正起见，我们不仅要对他们所处理的信息，而且要对他们据以传播信息的观念作出评价。因为，公认的典型、流行的样板和标准的见解，都会在人们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产生阻碍作用。例如，对于怀有先入之见的欧洲人来说，美国化至少在表面上就是美国人的化身。因此，可能会把地主视为庄园主、把雇主视为地方要人的农民，就是受到了美国化的熏陶再按照美国的标准去看待地主和雇主。这就产生了一种观念的变化，实际上，只要不断进行灌输，就会产生视觉的变化。他的眼光会出现不同的视角。一位宜人的淑女曾坦言，成见具有如此过于自负的性质，只要她的成见得不到满足，她甚至不能接受人类的兄弟情谊和上帝的权威。“我们所穿的服装也对我们有着奇特的影响。服装会产生一种精神的与社会的气氛。我们能够指望一个美国迷坚持雇用伦敦的裁缝吗？一个人的饮食也会使他成为美国迷。在咀嚼泡菜和林堡软干酪的环境里还能生出什么美国意识吗？你能想象一个美国迷的呼吸中老是弥漫着大蒜的臭味吗？”①

这位女士很可能是一次盛典的赞助人，我的一个朋友参加了一次名叫“坩埚”的活动，那是 7 月 4 日在一个汽车城举行的，调用了许多外国血统的工人。棒球场中央的第二垒位置上放着一只用木头和帆布制作的大埚，大埚两边有台阶拾级而上。观众就座后，随着乐队的演奏，一支队伍按照要求从场地一侧入

① Edward Hale Bierstadt 语，见 1921 年 1 月 1 日 *New Republic*，第 21 页。

场，队伍全部由当地工厂雇用的外籍工人组成。他们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唱着自己国家的民歌，跳着自己的民族舞蹈，打着所有欧洲国家的国旗。仪式的主持人是扮做山姆大叔的小学校长。他率领队伍向坩埚行进。他指挥他们顺着台阶从埚边进入埚里。他要求他们再从另一边出来。他们出来了——头戴圆顶礼帽，身着外套、宽松便裤、马甲，硬衬领上系着圆点花纹领带，毫无疑问——我的朋友说——他们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揣着一支"永利"牌铅笔，全都高唱着《星条旗永不落》。

对于这一活动的发起人——或许也包括大多数参与者——来说，这样做似乎是为了表现妨碍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和外来移民友好相处的最基本的困难。他们各自成见的矛盾妨碍了他们对普遍人性的完全认同。改名换姓的人们都明白这一点。他们想要改变自己，也想改变外国人对他们的态度。

外部环境和我们据以关注外部环境的观念当然有着某种联系，正如在一个激进派集会上既有长发男人、也有短发女人一样。但是，对于来去匆匆的观察者而言，有一点联系就足够了。如果观众中有两个短发脑袋和四个络腮胡子，对于事先就知道参加集会的人们喜欢用这种方式处理他们毛发的记者来说，那就是一批留着短发和络腮胡子的观众。我们的视觉和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但却是一种奇特的联系。比如说，一个人除了审视对于规划建筑群布局的用处以外难得注意风光景致，但他却见过许多挂在客厅里的风景画。从画中他学会了想象某种景致，诸如玫瑰色的落日、经过尖顶教堂的乡村小道和一轮银色月亮。一天他来到乡间，几个小时都没有看到什么风景。后来夕阳西下，满天绯红，他立刻就认出了这一景象并惊叹美不胜收。然而两天之后，在他试图回味日前的所见时，能够想起来的大概只是某间客厅里的某幅风景画。

除非他在看日落时或是喝醉了，或是做着梦，或是神经错乱，否则，他所看到的日落，重要的是他记忆中的日落，更多的便是那幅油画教给他看的日落，而不是——比方说——一个印象派画家或者一个有造诣的日本人所能够予取予求的。反过来说，那位日本人和画家所要鉴赏并牢记在心的，也是他们所熟知的日落景象，除非他们碰巧是些能够为人类开辟新视野的出类拔萃之辈。在未经专门训练的观察活动中，我们会选择那些很容易辨认的环境标志。这种标志反映的是观念，而这些观念则会由于我们丰富的想象力而膨胀。我们不是详细地观看这个男人或那种日落，而是察看该事物是个男人还是日落，接着就会首先想到充斥在我们脑海中的这类对象。

三

这里需要的是洗练。因为，要想生动详尽地察看所有事物而不加以分类概括，这会使人精疲力尽，而且，面对五花八门的事务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在朋友圈子里，在涉及到知交或对头的时候，没有捷径可走，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具体入微的认识。我们所爱慕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些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具体人物而不是各种类型的男男女女，他(她)们所认识的是我们个人，而不是可以把我们适当划进去的那个类型。因为，即使不对我们明说，我们也会本能地感到，所有的分类都与某种我们未必能够接受的目的有关。在并无交情的两个人之间有着决定性的尊严，据此，每个人都不能把对方视为目的本身。两人之间的任何契约都会存在瑕疵，但这并未确认一个公理，即双方人身不受侵犯。

然而，现代生活匆匆忙忙、五光十色，重要的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差距使人们有了隔阂，而他们——比如雇主和雇员、官员和

选民——相互间却往往有着至关重要的契约。既无时间也无机会进行密切交流。我们留心的并不是某个众所周知的类型所具有的特性，而是用我们头脑中已有的先入之见去填补剩下的画面。他是个煽动家。我们看到或听到了很多。啊，煽动家就是这种人物，所以他就是这种人物。他是个知识分子。他是个富翁。他是个外国人。他是个"南欧人"。他来自巴克湾。他是个哈佛人。这与以下说法就大不相同——他是个耶鲁人，但却是个平庸之辈。他出身于西点军校，但却是个老军士。他是个格林威治村人，但是我们对于他——然后还有她——的其他情况又有多少了解呢？他是个国际银行家，但他来自小城镇。

在所有具有支配力的因素中，最让人难以捉摸、最有普遍性的就是创造并维护成见库的那些因素。我们在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我们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物进行想象。而且，除非所受的教育能使我们具有敏锐的意识，否则这些先入之见就会强烈影响到整个感知过程。它们会把某些客体划分为亲疏两类，突出其间的差异，这样一来，似曾相识的就会使人认为格外亲切，稍感陌生的则会使人认为格外疏远。小小的迹象就会把它们激发出来，而这种迹象有着多种表现，从某个确凿的标志直到某个模糊的类比。一旦受到激发，它们就会把那些由来已久的老看法浇注到新见解之中，似乎这个世界又在记忆中得到复活。假如这种环境没有切实可行的规则，那么，人为了进行观察而接受预见的习性，就只会导致错误而不会带来简捷。不过，使规则足够准确以及节省精力的需求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为了某种彻底单纯的生活方式而抛弃一切成见，可能会导致人类生活索然无味。

问题出在成见的性质和我们运用成见时的那种轻信。而这些东西最终要取决于构成我们生活哲学的各种样板。如果我们

的哲学认为，这个世界应当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某种法则去运行，那我们就很可能会喋喋不休地根据我们的法则去描绘世界。但若我们的哲学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这个世界无关紧要的一分子，他的智力程度充其量也只能理解一张粗糙的观念网络的皮相，那么，当我们使用成见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那不过是些成见，就会迅速地控制它们，就会愉快地校正它们。而且，我们还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观念始于何时、始于何处、如何被我们继承、我们为什么接受。一切有用的历史都是以这种方式得到澄清的。它能使我们明白什么样的童话故事、学校课本、传统、小说、戏剧、绘画、言论把一种先入之见注入了此人的头脑，把另一种先入之见注入了彼人的头脑。

四

那些想要审查艺术的人士，至少不会低估这种影响。他们一般是对它进行曲解，而且几乎老是愚蠢地试图阻止别人发现未经他们认可的事物。但无论如何，就像臧否诗人的柏拉图一样，他们模模糊糊地感到，通过虚构而形成的模式往往会被强加给现实。因此，毋庸置疑，电影正在持续不断地丰富人们的意象，然后，人们在报纸上读到的语言又会再现这些意象。在人类的全部历程中，没有任何形象化手段能与电影相媲美。一个佛罗伦萨人要想把圣徒形象化，大概就得去教堂看壁画，在那里可以看到乔托①时代留下来的圣徒标准像。一个雅典人要想把众神形象化，他就会去神殿。不过，能够用图象表现的对象并不是

① Giotto(约 1266—1337)，14 世纪意大利画家，至今仍被尊崇为意大利第一位艺术大师。——译注

太多。在东方,第二戒律的精神已被广泛接受,有形事物的画像甚至更加贫乏,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作出实际决定的能力被大大削弱。然而在西方世界,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世俗的描绘在规模与范围上有了巨大的增长,先是口头描述,然后是记叙文,接着是插图记叙文,最后是电影,而且多半是有声电影。

照片对于今天的想象力有着行使管辖权的性质,这种权力昨天还属于印刷文字,再早则属于口头语言。它们似乎都是完全真实的。在我们的想象中,它们不受人为干扰地被我们直接继承了下来,是最为轻松易得的精神食粮。任何语言的描绘,甚或任何呆滞的写照,在形成图象存入脑海之前,都需要经过记忆。但在银幕上,整个观察、描绘、报道以及想象过程都已为你完成了。你需要做的只是不断感受银幕上涌现的、你的想象力始终追求的效果,此外并无别的麻烦。它使模糊的意识变得鲜明生动;可以说,多亏了格里菲思先生[①],只要你看过《一个国家的诞生》,你对三 K 党的模糊概念就会具有一清二楚的形象。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可能是错误的形象,从道德的角度说,它可能是有害的形象,但我感到疑虑的是,凡是看了这部电影的人,如果对三 K 党的了解并不比格里菲思先生多,那么,即使他并没见过那些白衣骑士,但只要他再次听到这个名称,他所想到的就是这一形象。

五

因此,每当我们谈到某一批人的思想,谈到法国人的思想、

① Hugo Emrys Griffith(1912—1980),英国著名演员,1965 年被威尔士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称号。——译注

军事家的思想、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时，往往就会陷入严重的混乱，除非我们一致同意把本能的禀赋与那些成见、样板和程式——它们在构筑迎合了自然天性并得到它响应的精神世界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分离开来。人们之所以漫无边际地谈论什么“集体思想”、“民族灵魂”、“种族心理”，就是因为不能作出这种区分。不错，一种成见可能会一以贯之、不容置疑地从父母到儿女世代相传，看上去几乎像是一个生物学现象。正如华莱斯先生所说[①]，从生物学角度看，我们在某些方面的确是寄生在我们的社会遗产上。但毫无疑问，没有丝毫科学证据能够使人认为，人们一生下来就会表现出他们出生地的政治传统。对于政治传统来说，就像一个国家一样，首先需要寻求解释的是托儿所、学校、教堂，而不是“群体心理”和“民族灵魂”的栖息地。如果你完全不能理解得自父母、教师、神甫和长辈们的传统，那么，把政治差异归因于遗传物质就是极其荒谬的。

如果抱着适当的谦逊态度尝试一下对受过同类教育、有着相同阅历的人们的相对差异进行概括，这倒还有可能。然而，即使想做到这一点也是一个棘手的事情，因为几乎没有两个人的经历会一模一样，甚至同一个家庭中的两个孩子也是如此。长子决不会有次子的经历。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忽略教养的差异，那就应当拒绝判断天性的差异。同样，要想判断拉布拉多和衣阿华的两块土地的地力，就要比较一下你以前所知道的它们的产量，不管它们是被精耕细作、竭泽而渔还是放任自流。

① 见 Graham Wallas, *Our Social Heritage*, p17。

第七章　作为屏蔽的成见

一

我们在寻求比较公正的见解时往往会坚持我们的成见,其原因除了节省精力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成见系统也许是我们个人传统的核心,是对我们社会地位的保护。

它们是一个有序的、多少和谐的世界景象,面对这一景象,我们的习惯、偏爱、能力、安逸和希望都会进行自我调节。它们可能不是世界的全部景象,但却是一个合乎我们需要的可能的世界景象。在那里,人和物都有着众所周知的位置,发挥着某种预定的作用。我们在那里会感到如在家中。我们会感到适得其所。我们都是其中的成员。我们了解周围的道路。我们会发现熟悉、平常而可靠的迷人之处,其常规形态我们了如指掌。虽然我们在曲身钻进那个模式之前要放弃许多诱惑我们的东西,但只要我们打定主意进去,它就会像一双旧鞋子那样令人舒适。

因此,毫不奇怪,任何对成见的袭扰看来都像是对世界基本原理的攻击。那是对**我们的世界**基本原理的攻击,如果那里大事不妙,我们不会迅速承认我们的世界与整个世界的区别。一个世界如果成为我们崇敬的人一钱不值、我们鄙视的人却高高在上的世界,那就是一个令人心烦的世界。如果我们先入为主

的秩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秩序，那就会出现混乱。因为，如果逆来顺受的确应在尘世代代相传，如果冠军就应当排在末座，如果人们只是由于无罪就可能遭到攻击，如果你只是不让宗教信仰影响公民责任，那么，自尊心的基础就会被那些似乎并不把这类基本原理当真而自行安排生活的人们所动摇。

成见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中立的。它不仅是用井井有条的方式替代现实的庞杂喧嚣的混乱状态。它不仅是一条捷径。它是所有这一切，甚至更多。它是对我们自尊心的保护，是投射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自身的意识、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念、我们自身的立场和我们自身的权利。因此，成见充满了被它们所吸纳的情感。它们是我们传统的堡垒，在这个堡垒的庇护下我们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坚持我们的立场。

二

例如，在公元前 4 世纪，雅典的奴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自由民难以区分，亚里士多德不顾人们日益加深的怀疑情绪，写下了他为奴隶制所作的辩护①。齐默恩先生引用《老寡头》中令人发噱的妙语说明了奴隶们受到的良好待遇。“假如奴隶被公民鞭笞是合法的，那就很可能经常发生雅典人被误认为奴隶或异邦人而遭受鞭笞的情形，因为雅典人并不比奴隶或异邦人穿得更好，外貌上也没有任何优越之处。”缺乏差别自然会消解那个制度。倘若自由人和奴隶看上去一模一样，那么区别对待他们又有什么根据呢？这正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中要着力消除的混乱。凭着可靠的本能，他明白，要想为奴隶制辩护，

① Zimmern: *Greek Commonwealth*。见第 383 页脚注。

他必须教给希腊人合乎奴隶制传统的对奴隶的识别方法。

于是，亚里士多德指出，有些人有着奴隶的天性[①]。“**就因为这个缘故**，他天生就被造就成了奴隶，适合于成为别人的财产。”这实际上是说，凡是成为奴隶的人，天生就想做奴隶。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毫无价值，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个命题，与逻辑毫不相干。它是一个成见，或者说一个成见的组成部分。下面的说法便接踵而至。在宣称奴隶也会感知理性但却不会运用理性之后，亚里士多德强调说：“自然使得奴隶和自由人的体魄也有了差异，奴隶的体魄为了必然的用途而总是强健有力，自由人的体魄比较挺拔，的确不宜于这种奴隶劳动，而适合于公民生活。……因此，很明显，有些人天生就是自由的，另一些人则天生就是奴隶。”

如果问一下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毛病何在，我们就会发现，他一开始就在自己和事实之间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当他宣称身为奴隶者天性就宜于为奴时，他一笔勾销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些碰巧成为奴隶的人们，是否就是天性宜于为奴的人。这个问题有可能使每一个奴隶的身分都受到质疑，因为，身为奴隶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一个人命里注定就是奴隶，这里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因此，亚里士多德完全排除了那个毁灭性的质疑。身为奴隶者就应当是奴隶。每一个蓄奴者都应当把他的奴隶看作是天生的奴隶。当他习惯于用这种方式看待奴隶时，他就会把以下事实认定为他们的奴隶特征：他们从事奴隶劳动，他们胜任奴隶劳动，他们的体魄宜于奴隶劳动。

这就是地道的成见，其特点是先于理性被投入应用。这是一种感知方式，它在我们所意识到的信息尚未经过我们思考之

---

① 《政治学》第一卷第五章。

前就把某种性质强加给这些信息。成见就像比肯①大街上淡紫色的窗玻璃,就像化装舞会上察看宾客的装束是否得当的看门人。面对教育和批评,没有什么能像成见那样顽固不化。在获取证据时,它会给证据打上自己的烙印。这就是打道回府的旅游者所做的报道往往都是旅游者铭记不忘的旅途趣闻的原因。如果他抱有先入之见,喜欢铺瓷砖的浴室,深信乘坐普尔曼式客车②是人的最高享受,认为可以给侍者、出租车司机和理发师而不该给车站行李员和引座员小费,那么他在漫长的旅途中将会饱尝美食与劣膳、洗澡历险、火车包厢恶作剧和被人贪索钞票的滋味。如果他是个比较较真的人,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些旅游胜地。只要他摸到了底座,再偷偷看一眼纪念碑,就会专心致志地逐字阅读旅游指南,然后赶往下一个胜地;这样,回来的时候就会对欧洲产生简洁而条理分明的印象,作出一星或二星的评价。

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外部的刺激,尤其是印刷品和口头语言发出的刺激,可以唤起一个成见系统的某个部分,就是说,真实感觉和先入之见会同时进入意识。两者交融在一起,更像我们透过蓝色玻璃看红色,看到的却是绿颜色。如果我们看到的完全合乎我们的预想,成见就会进一步加强,正如一个人早就知道日本人狡猾,偏偏又倒霉地碰上了两个不老实的日本人一样。

如果经验与成见发生矛盾,则两者之一就有了麻烦。倘若那人不再可塑,或者某种强烈的关注使他极难重新调整成见,他就会把那种矛盾嗤之为什么规律的例外,并且怀疑见证人,吹毛

---

① Beacon,美国纽约州东南部城市,比肯山为游览胜地。——译注

② 美国实业家 George Pullman 发明的铁路卧车。1867 年成立普尔曼豪华车厢公司,普尔曼任董事长,制造卧车租给铁路公司使用。——译注

求疵，接着把它置之脑后。但是，倘若他仍然好奇心盛且心胸开阔，这个新景象就会被接纳进老画面，并会获准对它加以修改。有时，如果此事非同小可，而且使他感到总体上困扰着既定的观念系统，他可能就会深感震动，以至怀疑所有已被接受下来的生活态度，期望某个事物名正言顺地不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事物。在极端情况下，尤其是假如他是个文人，他可能会生发出一种颠倒伦理标准的热情，把犹大、本尼迪克特·阿诺德①、恺撒·博吉亚②塑造成他心目中的英雄。

三

在德国人关于比利时狙击手的传说中可以看出成见所发挥的作用。那些离奇的传说，首先遭到了著名的德国天主教教士组织帕克斯的驳斥③。不断出现的暴行传闻本身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德国人也并不乐于相信这些传闻。但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极为循规蹈矩的德国爱国者团体，早在 1914 年 8 月 16 日就开始反对对敌人进行诽谤，尽管这种诽谤在抚慰同胞们惴惴不安的良心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为什么特别是由耶稣会教派动手戳穿一个对于鼓舞德国人的战斗士气至关重要的虚构呢？我想引述一下 M.范·兰根霍夫的说法：

---

① Benedict Arnold(1741—1801)，美国军官，1779 年以前一直为美国革命的事业出力。1779 年与英国人携手，此后他的名字在美国成为叛徒的代用词。——译注

② Cesare Borgia(约 1475—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获比萨大学法学学位，曾任主教、大主教、枢机主教、教皇军司令，擅弄阴谋，政治上翻云覆雨。——译注

③ 见 Fernand van Langenhove, *The Growth of a Legend*。作者为比利时社会学家。

德国军队刚刚开进比利时，各种离奇古怪的谣言就开始流传。它们四处蔓延，经过新闻界的再加工，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德国。据说，比利时人**受到了教士们的煽动**，背信弃义地参与敌对行动：他们出人意料地攻击孤立无援的小分队，给敌人指示德军的阵地，老人甚至孩子也对受伤并丧失抵抗能力的德国士兵犯下了可怕的暴行，挖眼睛、剁手指、割鼻子、砍耳朵；**教士们是在布道坛上敦促人们实施这些罪行的，并允诺人们由此可以进入天国，教士们甚至带头犯下这种暴行。**

公众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这些传闻。国家最高当局毫不犹豫地给予认可，并利用自身的权威推波助澜。

这样一来，德国舆论大哗，群情激愤，**矛头直指教士们，人们认定他们应对比利时人犯下的暴行承担责任。……普遍反天主教教士**的德国人自然把愤怒转而对准了他们，他们成了牺牲品。新教徒的心中重又点燃了古老的宗教仇恨，肆意攻击天主教会。一场新的文化斗争哄然爆发。

天主教会立即采取行动反击这种敌意。（着重号是我加的）①

也许那里有些狙击行动。如果每个愤怒的比利时人都要冲进图书馆打开一本国际法手册，看看自己是否有权任意射击沉重践踏着他的大街的恶魔，那倒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了。如果一支从未遭到攻击的军队认为，未经批准就不应射出每一颗子弹，这同样令人不可思议，因为那样做很麻烦，而且的确有点违反军事规则，如果真要照此办理，那就会成为这支军队唯一的战争经历。可以想象，比较敏感的人会一门心思地确信，那些干出了可

① 见 Fernand van Langenhove, *The Growth of a Legend*，第 5—7 页。

怕勾当的人们一定是些可怕的人。传奇也许就是这样编织出来的，直至传到审查官和宣传者那里，他们相信与否要视其价值如何，然后再把它散布到德国平民中去。即使他们看到正在大肆为虐的人民不齿于人类，也不会感到丝毫的内疚。毕竟，因为传奇来自他们的英雄，他们应当信以为真，不仅如此，如果他们不信，那就是不爱国。

然而，那里有许多事情需要去想象，因为战场被掩盖在战争的迷雾之中，无法核查，不受控制。关于残忍的比利时教士的传闻迅速激起了一种夙仇，因为在大多数爱国的德国新教徒、尤其是在上层人士的心目中，俾斯麦的胜利就包括与罗马天主教会的长期争吵。通过一个联想过程，比利时教士变成了众矢之的，对比利时人的仇恨成了他们发泄一切仇恨的出气口。这些德国新教徒的所作所为，颇像处于战争压力下的某些美国人，他们创造了一个由外敌和所有内敌组成的综合性仇恨目标，针对这个假想敌——德国的德国佬和国门之内的德国佬的混合物，他们投入了所能投入的全部仇恨。

天主教徒抵制那些暴行传闻当然是自卫性的。他们针对的是那些特定的谎言，因为那些谎言激起了对所有天主教徒而不仅是对比利时天主教徒的仇恨。M.范·兰根霍夫说，派克斯的情况仅仅和教会有关，而且“他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被认为是教士所为的恶行上”。然而，人们不禁有点奇怪，德国天主教徒这样来揭露俾斯麦帝国对他们的居心，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呢？那样的认识和以下事实之间是否有什么深奥的联系呢——乐于在停战时签署帝国死亡证书的杰出的德国政治家，乃是天主教中央党领袖埃茨贝格尔①。

---

① 本书写到这里时，埃茨贝格尔被刺杀。

第八章　盲点及其价值

一

我一直在谈论成见而不是理想(ideal),因为理想一词通常是专用于我们所认为的真善美的事物。因此它带有这样的暗示:现在应当仿效或完成些什么。但是,我们所储存的固定印象比这广泛得多,它包括理念中的傻瓜,理念中的坦曼尼政客①,理念中的好战分子,理念中的煽动家,理念中的敌人。我们这个一成不变的世界未必是我们所喜欢的世界。它不过是我们寄予了期望的世界。如果事情正好有一种熟悉感,我们就会感到自己正在随着事情的发展趋势而动。如果我们想要成为无忧无虑的雅典人,我们的奴隶就必须是天生的奴隶。如果我们告诉朋友我们击球 95 次就能把高尔夫球送进 18 个球穴,但我们却击球 110 次,于是又告诉他们,我们今天发挥不正常。这等于说,我们并不了解那个击了 15 个臭球的笨蛋。

如果不是每一代人都会出现若干人物孜孜不倦地把那些成

① 坦曼尼(Tammany)协会是美国历史上操纵纽约市政的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俗称,此名得自独立战争前以坦曼尼德(特拉华州一明智、乐善好施的印地安部落酋长)命名的协会。后因好施小惠、贿赂对立政治派别领导人,致使"坦曼尼协会"成为腐败的城市政治同义语。——译注

见整理、规范和上升为诸如《政治经济学定律》、《政治学原理》之类的逻辑体系，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就会根据各种杂乱无章、交替出现的成见而各行其是。一般来说，只要我们谈论文化、传统和群体精神，我们就会想到这些由天才人物所完成的体系。如今已没有人怀疑不断研究和评价这些理想化观念的必要性，但历史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名流却不会到此止步，因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并不是某个天才所制定的系统观念，而是每个个人头脑中那些交替出现的模仿、复制、伪造、类推和歪曲。

因此，马克思主义未必就是卡尔·马克思写在《资本论》里的东西，但所有号称忠心耿耿的好斗宗派全都认为，反正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从福音书中你不可能演绎出基督教的历史，从美国宪法中也不可能演绎出美国的政治史。你只有根据《资本论》去思维，只有根据福音书去布道并根据布道去理解，只有根据美国宪法去解释和执行。因为，尽管标准观念和流行观念总是在相互影响，但影响人们日常行为的却往往是流行观念。

一位眼帘像莉萨(Lisa)夫人那样有点儿无精打采的评论家说："相对论向人们保证要像进化论那样发展为一项普遍适用的原理。后一种学说自从作为严格的生物学假说提出来之后，实际上变成了使所有知识领域——风俗习惯、道德、宗教、哲学、艺术、蒸汽机、电车等等一切'进化'了的事物——中的人们都感到激动不已的指针。'进化'变成了一个通用词；在许多情况下还变得含混不清，以至该词原初的明确含义荡然无存，使这一被人争相描述的学说遭到了曲解。我们完全可以大胆预言，相对论也会经历同样的命运。对于目前人们残缺不全的认识水平来说，这门严格的物理学说将会变得更加模糊和暧昧。历史正在重演，和进化论一样，在被人们做出了大量明白易懂、但有点缺乏科学性的通俗阐述之后，相对论将踏上征服世界的历程。我

们认为，到那时，它很有可能被称作 *Relativismus*。许多更加浮夸的用法无疑将会登堂入室，有的将成为胡说八道，而且可以想象，相当一部分将会简化为老生常谈。然后，这门物理学说，这颗强劲生长的小种子，将会再次成为科学家们的纯专业兴趣。"①

但是，一种观念在征服世界的历程中，无论怎么含混不清，肯定都是因为与什么事物有所契合。伯里教授指出②，尽管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进步观却仍然是一种思辨的东西。他写道，"一种思辨性的新观念如果未能表现出某种外在的具体形象，或者未能得到显著的有形证据的支持，那就很难打动和渗透进一个共同体的普遍意识。就'进步'而言，这两个条件在 1820—1850 年间(的英国)得到了满足。"最显著的证据是由机器革命提供的。"出生于 19 世纪之初的人们在不满 30 岁时就已看到了汽轮航运的飞速发展，看到了城镇和家庭的汽灯照明，看到了第一条铁路的开通。"像这样的奇迹，在普通人的意识中便形成了人类可完美性的信念模式。

坦尼森是位有着高度哲学素养的人士，他告诉我们，当他第一次(1830 年)乘火车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时，认为火车轮子是在槽子里跑动，于是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 愿这个伟大的世界永远在响亮的变革槽里疾驰。③

这个多少适用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之行的观念，被概括为一种"永恒"的世界模式。这种被其他人所接受、被五花八门的发明创造所加固了的模式，开始把一种乐观主义强加给进化论。当

---

① 1921 年 1 月 2 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第 352 页。

② J. B. Bury, *The Idea of Progress*, p. 324.

③ Tennyson, *Memoir by his Son*, Vol. I, p. 195.

然，正如伯里教授所说，这种学说中立于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但它曾给人们带来不断变革的希望，而世间能够看到的变革却表现为对自然的征服，于是大众的意识中便产生了两者的混合物。由达尔文本人开其端、由赫伯特·斯宾塞述其详的进化论，说的就是一种“走向完美的进步”。

二

诸如“进步”和“完美”之类的措辞所体现的成见，基本上是由机器的发明构成的。总的来说，这种发明到今天仍在继续。美国机器进步的景象要比任何地方都更为壮观，它甚至对全部道德准则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个美国人几乎可以容忍任何侮辱，但却不能容忍被人指责为不求进取。无论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还是新来的移民，总能让他大开眼界的就是美国文明的巨大物质进步。他通过这种进步去观察世界，从而形成了一种基本的成见：乡村将会变成大都市，其貌不扬的建筑将会变成摩天大厦，小的将会变大，慢的将会变快，穷的将会变富，少的将会变多，一切都会更上一层楼。

当然，并不是任何美国人都会这样看世界，亨利·亚当斯①不会，威廉·阿伦·怀特②也不会。但是，那些热衷于在报刊杂志上把狂热追求成功描绘成美国众神的人们会。他们所宣扬的进化、进步和繁荣，不过是指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卓有成效。但事实上，令人感到好笑的是，他们却认为这是人类事业的宏伟模式。它对一种事物采取非个人的标准，对另一种事物采取世俗的标

① Henry Adams(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作家、社会活动家。——译注
② William Allen White(1868—1944)，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译注

准,对第三种事物则使人习惯于从数量角度考虑问题。毫无疑问,这种理念把卓越与规模、幸福与速度、人性与刚发明的什么新鲜玩意儿混淆在一起。而且同样的动机还可以不断驱动任何道德准则,或者不断驱动人们的意志。人们追求的是最大、最快、最高,如果你是个手表或显微镜制造商,你还会追求最小;即使是那种转瞬即逝的爱情,也要追求登峰造极、"举世无双",尽管它实质上可能是一种高尚情感。

无疑,美国人的进步观是产生于经济状况和人性方面的非凡现实。它把对权力的争夺和贪求转变成为生产劳动。大概直到不久以前,它还没有严重挫伤这个活跃的共同体成员的活跃天性。他们创造了一种文明,这使他们有了成就感,给他们提供了足够令人满意的劳动、婚姻和娱乐,他们对群山、原野和距离的大规模征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那种同宇宙意志进行交流的意识——宗教情感。这种模式按照理想—实践—成果的顺序获得了近乎完美的成功,以至对它的任何怀疑都被认为是与美国人作对。

然而,这种模式所展示的世界是片面的、不充分的。习惯于把进步视为"发展",意味着环境的许多方面被完全忽视。抱着对近在眼前的"进步"的成见,大部分美国人对于不符合这种进步观的东西几乎视而不见。他们看到了城市的扩张,却无视贫民窟的增多;他们为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感到振奋,却无视生存空间的拥挤不堪;他们自豪地强调着增长,却无视农民或未同化的移民在四处飘泊。为了使工业迅猛发展,他们不计后果地耗费自己的自然资源;他们组建巨型大公司,全然不顾产业关系的协调。他们成长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根本不打算采取什么措施、甚至根本就不想摆脱孤立。他们在毫无精神和物质准备的情况下跌进了这次世界大战,等

到踉踉跄跄地走出战场时，许多人感到了幻灭，此外便没有更多的感受了。

在这次世界大战中，这种美国成见的好处和坏处全都让人一目了然。仅仅指望全力以赴、不受限制地征募无数军队、筹集无数借款、建造无数船只、生产无数枪炮就能赢得战争，这种想法倒是合乎传统的成见，并且产生了某种实实在在的奇迹。[①]然而，在接受这种成见的大部分人中，没有谁去考虑要得到什么样的以及如何得到胜利成果。因此，目标被忽视，或者被认为不言而喻，胜利已然在握，因为成见要求这样，战场上的胜利只不过是彻底消灭敌人。在和平时期，你不会问最快的汽车是干什么用的，而在战争时期，你不会问彻底的胜利是干什么用的。然而在巴黎，这种模式与事实并不相符。在平时，你可能继续没完没了地用大的替换小的，用更大的替换大的；在战时，如果你赢得了绝对胜利，你不可能继续赢得更绝对的胜利。你必须用完全不同的模式处理某些问题。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模式，那么对于你、对于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来说，战争的结束就是一个枯燥乏味的结局。

这标志着一个点，在这个点上，成见和事实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分离，这是不能视而不见的。这个点会始终存在，因为我们对事物如何运转的概念，要比事态的进退涨落简单得多、稳定得多。因此，总有那么一刻，这个盲点会从意识的边缘进入中心。那时，除非勇敢的批评家能够发出警告，领导人能够认识到这种变化，人民有着宽容的习惯，否则，本来有助于简化努力、集中精

---

① 我想到的是给派遣到海外的200万军队提供运输能力和供给。Wesley Mitchell教授指出，我们参战后的商品总产量并没有比1916年的产量增加多少，但是战争物资的产量是不断增加的。

力的成见——比如 1917 和 1918 年人们所表现的那样，就会蒙蔽人们的双眼，从而妨碍人们的努力、浪费人们的精力，1919 年时为迦太基式的和平而哭泣、1921 年时因凡尔赛条约而悲伤的人们就是如此。

三

不加批判地固守成见，不仅会无视许多需要考虑的东西，而且一旦因此遭到报应，成见土崩瓦解，那么明智的考虑很可能就会和它一起毁灭。这就是萧伯纳先生所说的反对自由贸易、自由契约、自由竞争、天赋自由、自由放任和达尔文主义所遭到的惩罚。如果是在百年以前，他肯定会成为这些原则的最尖刻的辩护人之一，他可能不会用今天这"异教徒的半个世纪"① 的眼光去看待它们，认为"'欺骗他人'而不受惩罚，一个导航的政府干预一切，除了警察机构之外所有机构都在保护合法欺诈以反对相互斗殴，把人们的意志、意图、意向引入'违背政治经济学定律'的工业化骚乱的一切努力"都是可以理解的。那时，作为向天国②进军的队伍的先行者之一，他可能会认为，像维多利亚女王的叔父统治时期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意志、意图、意向，自然是越少越好。他可能会看到，不是强者击败弱者，而是愚者击败强者。他可能会看到，那些意志、意图、意向正在阻碍发明、阻碍企业、阻碍他会认为势所必至的创造性进化运动。

虽然现在萧伯纳先生对他所了解的任何导航的政府的指引毫无兴趣，但他在理论上已经兜了整整一个大圈子，重又反对自

① *Back to Methuselah* 序言。

②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

由放任。战前那些最超前的思想也发生了同样的转变，转而反对这一公认的观念：如果你对一切都听其自然，智慧就可能奔腾如泉涌并建立和谐的秩序。由于战争的缘故——它明确展示了那些导航的政府在审查官、宣传人员和间谍们协助下的所作所为，严肃的思想家们重又接纳了罗巴克·拉姆斯登(Roebuck Ramsden)和天赋自由。

这些循环往复有一个共同之处。每一套成见中都有一个点，在那个点上，全部努力均告停止，事情会按照你喜欢的样子自行发展。那种步步为营的成见会强有力地刺激行动，几乎能使人完全忘记考虑一下这是什么样的行动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行动。有幸摆脱了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的自由放任主义认为，人们将会受到自发骚动的驱使而达到预定和谐。在马克思的信徒看来，集体主义是冷酷无情的利己心的解毒剂，它似乎意味着一种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官员的效率和智慧的经济决定论。强大的政府，在国内外的帝国主义行径，对混乱的代价所产生的刻骨铭心的意识，全都是靠的这一观念：凡是被统治者的问题，统治者无所不知。每一种理论都有一个不由自主的盲点。

那个盲点会掩盖某种事实，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控制成见所诱发的致命运动。如果革新主义者不得不像笑话里的某些人那样问一下自己，他想如何打发打破记录节省下来的时间，如果自由放任主义的鼓吹者必须慎重考虑的不仅是人们的自由和旺盛的精力，而且还有某些人所说的他们的人性，如果集体主义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保住他的官职，如果帝国主义者敢于怀疑他自己的灵感，那么，你就会见到更多的哈姆雷特，却很少能见到亨利五世。因为这些盲点会避开杂乱无章的想象，而想象会带有如影随形的情感，可能会导致犹豫不决和意志薄弱。所以，成见不仅能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节省时间并能保护我们

的社会地位，而且当我们想要冷静全面地观察世界的时候，能使我们摆脱一切令人困惑的干扰。

第九章　规则及其敌人

一

任何一个在车站站台出口等着接朋友的人，都会碰上认错人的尴尬事。一顶帽子的式样，一种没什么特色的步态，都会在他的脑际唤起生动的影象。对于睡觉的人来说，叮当的铃声听上去像是洪钟作响，远处的锤子敲击声则像雷鸣。我们的意象丛大概也会产生与此有些类似的刺激作用。在幻觉中，它们可以充满整个意识。它们可能极少成为知觉的一部分，尽管我倾向于认为这种体验极为有趣并且非常玄妙，比如我们死盯着一个熟悉的词语或物体，就会觉得它越来越陌生。无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用一种综合方式去看待事物，既要认识事物的原貌，又想找出些别的东西。苍穹在天文学家和一对恋人看来并不是一回事儿；康德的一段话在一个康德的信徒和一个极端经验主义者头脑中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思路；一个塔希提岛[①]的美女在她的塔希提岛求婚者眼里，要比在《国家地理杂志》读者的眼里漂亮得多。

事实上，任何学科的专门知识都在成倍地增加我们打算发

① Tahiti，法属波利尼西亚的经济活动中心。——译注

现的东西，使我们养成降低期望值的习惯。在昏昏噩噩之辈看来，什么事情都是如出一辙，生活不过是一本流水帐，而在专业人员看来，事物全都各具特色。在司机、美食家、鉴赏家、内阁成员、教授夫人看来，不同的汽车、美酒、名画、共和党人、大学教员，有着不同的明显差别和特性，但在漫不经心的人们眼里却根本没有明显的不同。

然而，我们的舆论却极少具有专业见识，而生命又像萧伯纳先生表明的那样是如此短促。那些专家不过是少数领域中的行家里手。我们在战争期间已经知道，同样是身经百战的士兵，如果让骑兵去对付堑壕战和坦克，却未必能有出色的表现。实际上，在一个小问题上的一点小专长，有时就完全可以放大我们那种常见的人类习性——试图把所有能塞进去的都塞进我们的成见，塞不进去的则抛到九霄云外。

如果不是格外留神，我们就很容易借助于头脑中已经形成的概念去想象我们认为似曾相识的任何事物。因此，美国人对“进步”和“成功”的看法，就包含着一种关于人性和社会的概念，正是这种人性和这种社会，顺理成章地创造了这种被视为典范的进步。所以，每当我们试图描绘真正功成名就的人士或阐述实际发生过的事件时，总是赋予他（它）们已被成见所预设的特性。

这些特性已被老一代经济学家相当天真地标准化了。他们只要开始描述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就会发现它的复杂性难以言表。于是，他们真诚地希望设计一种简易的图解方法，其原理和精确程度无异于一个孩子在画一头复杂的母牛时用牛腿和牛头组成的平行四边形。这种设计包括一个锲而不舍地从自己的劳动中积累资金的资本家，一个盘算社会有效需求并开设工厂的企业家，一个自由签约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取舍的劳动

者群体，一个地主，一群在廉价市场上购物的消费者，那些商品因为有着他们所熟悉的体验酸甜苦辣的现成用途，从而能够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快感。这个模式开始运转。该模式所假设的那些人们生活在该模式所假设的那个世界之中，按照描绘该模式的那些著作的说法，他们会始终如一地和谐相处。

经过改装和润饰，这种被经济学家用来简化他们思想的纯粹的虚构，便得到了传播和普及，最后成为在广大民众中间流行的当代经济神话。它为一个社会的资本家、创业者、工人和消费者塑造了一种标准形象，自然是更多地专注于获得成功，而不仅是解释这种形象。拔地而起的建筑，资金充足的银行，都在证明这种如何成就事业的成见是多么准确无误。那些因成功而受益的人们也开始相信自己就是这种被人假定的人物。难怪发迹者们有些直言不讳的朋友在读过正式的传记和讣告之后，不得不忍着不去追问那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朋友。

二

对于失败者和受害者来说，这种正式的造型当然是无法接受的。那些成为进步的榜样的人们，并不会常常停下来问问他们是否已经走上了经济学家或某些其他可以信赖的人士所指引的道路，但不走运的人们会这样做。威廉·詹姆斯说[①]："除了扩充自己对细节的见识之外，没有人还会进一步了解普遍原则。"工业巨子在大型托拉斯中看到了(他们)成功的标志，被击败的竞争者却看到了(他们)失败的标志。于是，巨子们不容置疑地为大企业的组织和效能辩护，自称是繁荣的代表、贸易的先驱。

---

① *The Letters of William James*, Vol. I, p. 65.

受害者则坚持认为托拉斯是破坏、是暴行，大声疾呼司法部消除商业阴谋。对于同一种局面，一方看到的是进步、节俭和辉煌的发展，另一方看到的则是反动、奢侈和贸易钳制。为了证明各自都是言之有理，人们就真正的事实、内幕事实、更深入的事实、更详尽的事实发表了大量统计数字以及各种各样的秘闻逸事。

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大概是因为那些事实跟它一拍即合，所以，善良的人们总能为善良找出无数理由，邪恶的人们也总能为邪恶找出无数理由。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说出我们透过有色眼镜或偏见所看到的事物。如果通过一个无知的阶层去观察生活，那么，在什么是出类拔萃之辈、什么是下里巴人之流的问题上，我们的成见可能就不会遭到歪曲理解。格格不入的将被屏弃，与众不同的将被忽视。我们并不注意我们的眼睛不习惯注意的事物。时而有意识地，更常见的是无意之中，我们就对符合我们的哲学的事实产生了深刻印象。

三

这种哲学多少是由一系列描绘无形世界的意象所组成。但它不仅是被用于描绘，还被用于判断。因此，成见里满载着偏心，充盈着爱憎，吸附着恐惧、情欲、热望、骄傲和期待。无论激发起什么成见，都会受到相应情感的裁断。如果我们深思熟虑地把偏见搁置一旁，我们就不会在研究一个人的时候把他往坏里想。我们看到了一个坏蛋。我们看到了一个清爽的黎明，一个羞涩的少女，一个圣徒般的神甫，一个一本正经的英国人，一个危险的赤色分子，一个无忧无虑、放荡不羁的文化人，一个懒

惰的印度人，一个狡猾的东方人，一个满脑子梦想的斯拉夫人，一个反复无常的爱尔兰人，一个贪婪的犹太人，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在这个平凡的世界，这往往就是实际的判断，它们远远走在证据之前，本身就包含着似乎已被相当确凿的证据所证实了的结论。但这样的判断既不公正，又无善意，也不真实，因为它们缺乏证据。不过，在任何有助于思想的文明中，一个人既怀有偏见，同时又能抱有中立见解，是不可思议的，任何教育规划都不可能建立在这种理想的基础上。偏见可以被察觉、置疑和淡化，然而，只要那有数的一部分人不得不把一个庞大的文明压缩进简短的学校教程，他们就一定会打上周围环境的烙印，并且抱有偏见。他们的思维质量和行为质量取决于那些偏见是否带有善意——对其他人和其他观念有无善意，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对确实感到美好的事物产生热爱之情，而不是对他们未能看出美好之处的事物加以憎恶。

道德观念、正常的感受和恰当的形式，首先会把某些潜在的偏见进行标准化加工，然后再予以强化。正如我们按照自己的准则进行自我调整一样，我们也会按照那些准则去调整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从理性角度来看，事实对于我们的是非观而言是中立的。但实际上，我们的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应当了解什么以及如何了解。

一项道德准则是适用于许多典型情况的行为规范。受该准则指导的行为则是为了完成该准则所追求的目标。它可能是上帝的意志，国王的意志，个人在一个完美、坚实的三维天国中得救，在尘世的成功，或者为人类服务。在任何情况下，准则的制定者都会选定某些典型环境，然后通过某种形式的推理或直觉，演绎出能够实现他们所认可的目标的行为方式。这一规律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怎么才能知道他的处境是否已被立法者了然于心呢? 他被告诫不要杀人,但是如果他的孩子受到袭击,他可以杀人来制止谋杀吗? 对此基督教十诫却无可奉告。因此,每一项准则周围都会有一团解释者演绎比较特殊的情况时留下的迷雾。假设法律的修订者判决他可以因为自卫而杀人。这样一来,对下一个人的怀疑就大了:他怎么知道他所说的自卫是正当的? 他对事实的判断没有错误吗? 他是不是凭想象以为发生了袭击? 没准儿他才是真正的侵略者呢? 可能就是他挑衅发起了进攻。但是怎么才叫挑衅呢? 1914 年 8 月,纠缠着绝大多数德国人头脑的正是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

在现代世界,远比道德准则的差异严重的是对适用该准则的事实进行测度时出现的差异。宗教、道德与政治的套路,其最大的差距就是它们的信徒所测度的事实。于是,重新检验对事实的看法的,并非有益的讨论,而是互争高低的理想。因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规律,靠的就是人性一成不变这一信念。萧伯纳先生认为,不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他人的志趣可能截然不同,靠的是人性并非一成不变这一信念。竞争乃贸易之本的说法,包含着对经济动机、产业关系和特定商业体系的运转所作的庞杂假设。如果不是私有和私营,美国就永远不会拥有商船,这种主张假定了某种性质的营利和刺激之间有着某种不言而喻的联系。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人员证明了专政、情报活动等的正当性,因为"每个国家都是一部暴力机器"①是一个历史判断,一个对于非共产党人来说决不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

① 见 *Two Years of Conflict on the Internal Front*,1920 年莫斯科出版。Malcolm Davis 英译,载 1921 年 1 月 15 日《纽约晚邮报》。

在每一套道德准则的核心，都有一幅对人性的写照、一幅对世界的画像和一幅对历史的描述。对于(这样构思出来的)人性来说，在(这样想象出来的)世界中，跟在(被这样理解的)历史之后，这样的准则是适用的。至于对个性、环境和记忆方面的事实差异，这些准则显然是难以成功适用的。如今任何道德准则都不得不考虑人的心理特点、物质世界以及这样那样的传统。但是，对于深受科学影响的那些准则来说，概念被认为是一种假设，而不加检验地从过去接受下来或者产生于内心深处的那些准则，却并不把概念看作需要加以证明或反驳的假设，而是把它看作一种毋庸置疑的虚构。在头一种情况下，人会抱着谦逊的态度看待自己的信仰，因为他知道它们是不确定、不完美的；在第二种情况下，人是武断的，因为他的信仰是一个完美的神话。具有科学素养的道德家知道，虽然他不可能无所不知，但他可以有所知之；教条主义者却是利用某种神话，自信具有无所不知的洞察力，尽管他并没有辨别是非的标准。神话的显著标志就是，真理和谬误、事实和虚构、报道和想象全都有着同等的可信性。

这样一来，神话就未必是虚妄的。碰巧了它可能是完全真实的。偶然它还可能是部分真实的。如果它长期影响人的行为，那就几乎可以肯定，其中包含着许多深刻而重要的真实性。但神话决不会包含分辨自身真伪的批判能力。因为这种能力只能来自这样的认识：任何人的看法，无论它被认为有何来头，都不能被夸大成对证据的检验标准，每一种看法都不过是某个人的看法。如果你要问为什么对证据的检验比其他方法更可取，那么除非你乐于使用这种检验方法去检验它，否则便没有答案。

四

我想，以下说法可以作出有力的证明：道德准则体现了对事实的独特评价。我这里指的是一切性质的道德准则：个人的、家庭的、经济的、职业的、法律的、爱国的以及国际的。它们各自的核心都有一种与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有关的成见模式。对人性、惯例或传统的共同看法，很少是通过所有准则而得以延续。例如，可以比较一下经济准则与爱国准则。假设发生了一场同样波及到所有人的战争。有两个人是生意伙伴。一个人参军入伍，另一个却接了一笔军火合同。那位士兵牺牲了一切，甚至可能包括生命。他每天只有一美元的报酬，没有人会说，也没有人相信，你用经济刺激的方法能使他成为一个更优秀的战士。那种动机在他的人性中消失了。那位承包人却几乎没什么牺牲，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几乎不会有人认为或者相信，即使没有经济刺激他也会生产军火。这样说也许对他并不公正。关键在于，公认的爱国准则体现了一种人性，而公认的商业准则体现了另一种人性。这些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基于这种真实的期望：一个人一旦接受了某项准则，他就会逐渐具备该准则所要求的那种人性。

这就是笼统地谈论人性之所以危险的一个原因。一位慈爱的父亲可能又是一个刻薄的老板、一个满腔热忱的国内改革家和一个掠夺成性的对外侵略者。他的家庭生活、经营事业、政治谋略和对外政策，依靠的是完全不同的版本：别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就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同一个人会按照不同的准则演出这些版本，而这些准则体现在同一个社交圈的人们当中也会稍有不同，体现在社交圈之间、两个国家之间或者两个种族之间

则会大为不同，这种不同达到顶点可能就会毫不相通。这就是号称忠于同一信仰体系的人们竟会刀兵相向的原因。决定他们行为的信仰要素是他们对事实的看法。

准则就是这样微妙而广泛地发挥着形成舆论的作用。正统理论认为，一种舆论会针对一组事实构成某种道德判断。我所说的这种理论认为，就目前的教育状况而言，舆论主要是对事实加以道德化和条理化。而我的看法是，处于我们那些准则的核心地位的成见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应当关注哪些事实，以及从哪个角度去关注。这就是不管做出多大努力，报刊的新闻方针总是支持其编辑方针的原因；就是一个资本家如实地看待某些事实和人性的某些方面，而他的社会主义对头看到的却是另一些事实和人性的其他方面的原因，也是每当他们的实际分歧在于观念的分歧时彼此都会视对方为无理和错误的原因。一位美国的社论撰稿人写道："美国无阶级。"而《共产党宣言》的说法是："迄今为止所有现存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你抱有那位社论撰稿人的模式，你就会清晰地看到能够证实该模式的那些事实，与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变得模糊不清、毫无价值。如果你抱有这种共产主义的模式，你就不仅会期待另外一些事情，而且会从完全不同的着眼点去看待你和那位社论撰稿人碰巧一同看到的事情。

五

由于我的道德体系有赖于我所认可的那种版本的事实，那么只要是否定我的道德判断或者我那个版本的事实，无论是谁，我都会认为他是错误的、异己的、危险的。我该如何对他作出说明呢？反对者总要得到解释，而我们所能找到的最终解释就是

他看到了一些不同的事实。我们一直在回避这样的解释,因为它会侵蚀我们自认为是冷静而全面地看待生活的信心的基础。只有当我们习惯于把我们的观点看作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成见得到的局部经验时,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对反对者的宽容。如果没有这种习惯,我们就会把自己的观点绝对化,而且势必会认为所有的反对意见都居心叵测。虽然人们乐于承认一个"问题"会有两个方面,但却不会相信他们所认为的一个"事实"也会有两个方面。如果没受过长期的严格教育,没有充分意识到他们对社会状况的了解是多么间接和主观,他们就决不会相信这一点。

所以,如果有两个派别,他们各自清晰地看到了有利于自己的一个方面,并且对自己的见闻做出了各自的解释,那么要让他们富有诚意地相互信任几乎就是不可能的。如果那个样本在某个关键点上符合他们的经验,他们就不会再把它视为一种解释。他们会把它看作"现实"。它不可能类似于现实,除非它最终得出了一个合乎实际经验的结论。我可以根据地图上的一条直线来描述我从纽约到波士顿的旅程,就像一个人把他的成功看作是一条笔直而狭窄的小路的终点。我去波士顿实际要走的这条道路,可能会有许多迂回、转向和拐弯,就像他的道路上除了纯粹的事业、努力和成功以外可能还有许多其他东西一样。但是,假如我到达了波士顿,假如他也获得了胜利,那么我的那条直线和他的那条笔直的道路就会成为现成的图示。只有当某人想要按图索骥而不得时,我们才有必要回答质疑。如果我们坚称我们的路线无误,而该人却坚决否认,我们很快就会认为他是一个危险的傻瓜,而他会认为我们是些撒谎的人和伪君子。这样,我们相互间都会逐步地描绘出对方的形象。那个对手出场时会念叨着,罪过全在你们,我是正确的。他是个令人讨厌的人,他找不到事情的条理。然而他却无事生非。由于我们认为那种条理

乃是基于无可争辩的、有着不可抗拒的逻辑支持的事实，因而必须在其中为他找到某个位置。但是，在政治与经济的论战中，只是简单地允许他参与进来，却很难给他找到一个位置让他看到同一个现实并且了解现实的另一个方面。这就很可能动摇整个条理。

因此，对于巴黎的意大利人来说，阜姆[①]就是意大利的。它不仅仅是个值得并入意大利王国的城市。它就是意大利的。他们一门心思想到的只是这个城市本身法定边界之内占人口多数的都是意大利人。而美国的议员代表团尽管在纽约看到了比阜姆还多的意大利人，但是他们不会认为纽约属于意大利，因为他们仅仅把阜姆看作欧洲中心的一个港口。他们只在郊区和非意大利人居住的偏僻地方看到了南斯拉夫人。因此，巴黎的某些意大利人就需要对美国人的这种固执己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在一个流言中找到了这种解释，没有人知道流言出自何方，它说的是，一位很有影响的美国外交官中了一个南斯拉夫女人的圈套。人们看到她……人们看到他……在凡尔塞的林荫大道上……在丛林环抱的别墅里。

这就是用来对付反对派的相当常见的方法。这种指控如果采取了更多诽谤的方式，那就很少会见诸出版物，而一个罗斯福则需要等待几年，一个哈定需要等待几个月才有可能在所有的谈话圈子里制止一场争议，或者结束一次造谣运动。公众不得不忍受无数产生于俱乐部聚会室里、餐桌上及闺房中的恶毒的流言蜚语，它们被翻来覆去地精心传述着，人们兴致勃勃，乐此

① Fiume，亚得里亚海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为这个海港的控制权而发生了纷争。二战后根据《巴黎条约》全部归还南斯拉夫，改名里耶卡。——译注

不疲。我相信,虽然这种事情在美国不像在欧洲那么盛行,但是美国的公职人员也难得碰上一个不去反复传播他的丑闻的人。

我们会到反对派当中寻找恶棍和阴谋。如果价格上涨得太快,那就是投机商在推波助澜;如果报纸发布了歪曲报道,那就是一个资本家的诡计;如果富人太富,那是因为他们在偷盗;如果一次势均力敌的竞选最终失败,那是因为选民被人贿买;如果一个政治家做了你不赞同的什么事,那是因为他受到了某个可疑人物的影响。如果工人群众骚动不安,那是因为他们成了煽动家的牺牲品;如果他们的骚动在到处蔓延,那是因为有一个阴谋正在实施。如果你没有生产出足够的飞机,那是因为出了间谍;如果爱尔兰有了麻烦,那是因为德国人或者布尔什维克的"金币"。如果你鬼迷心窍、死活要去找出什么阴谋诡计,那么你就会把所有的罢工、the Plumbe 计划、爱尔兰暴动、穆斯林叛乱、君士坦丁国王复辟、国际联盟、墨西哥骚乱、裁军运动、周日电影、女短裙、逃避禁酒令、黑人的自行其事,全都看作是某个庞大阴谋的子阴谋,而策划这个庞大阴谋的不是莫斯科、罗马、共济会、日本人就是那些犹太长老。

第十章 发现成见

一

那些不得不对各交战民族高声倾谈的老练的外交官们，都知道如何利用大量积存在那里的成见。他们要去应付一个不稳定的大国联盟，而每一个这样的联盟只有依靠极端谨慎的领导才能维持它的战时团结。普通士兵和他的妻子，即使有着举世无双的英雄气概和无私精神，也不会为了外国列强的外交官们所说的任何理念而欣然赴死，尽管外交官们声称这些理念对于文明的未来至关重要。几乎没有多少士兵愿意为了同盟国而越过无人地带去夺取那些港口、矿山、怪石嶙峋的山隘和村庄。

现在碰巧有个国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里的主战派控制了外交部、统帅部和绝大多数新闻机构，他们对几个邻国提出了领土要求。这些要求被各个有教养的阶层叫做“大鲁里坦尼亚王国”①，而这些阶层则把吉卜林、特赖奇克、莫里斯·巴雷斯②看

① Greater Ruritania，浪漫国，源出 Anthony Hope 的小说 *Prisoner of Zenda* 中虚构的中欧王国名。——译注

②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Treitschke(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Maurice Barres(1862—1923)，法国作家、政治家。这里是以他们三人作为扩张主义精神和强权政治学说的代表——译注

作百分之百的鲁里坦尼亚人。但是,这种宏大的理念并没有唤起广泛的激情。于是,鲁里坦尼亚王国的政治家们擎着最华丽的鲁里坦尼亚天才之花——一如他们的桂冠诗人所说——动情地前去分而治之了。他们把那种要求划分为若干部分。每提出一个部分,他们都会求助于那种使某个或多个盟国感到难以抗拒的成见,因为盟国也希望利用这同一种成见使自己所提出的要求得到赞同。

第一部分碰巧是个住着外国农民的山区。鲁里坦尼亚王国要求它成全自己的天然地理边界。如果你久久地专注于"天然"之物那不可言喻的价值,这些外国农民就会化作枯草,收入眼底的只有那山坡。第二部分居住的是些鲁里坦尼亚人,照理不应当有人生活在外国人统治之下,于是他们被重新兼并。然后是一个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城市,那里并没有鲁里坦尼亚人居住。但是直到18世纪它一直都是鲁里坦尼亚王国的一部分,按照"历史上正确"的原则,它也被重新兼并了。再往前有一处被外国人拥有并由外国人开采的大矿藏,根据损害赔偿原则,它被重新兼并。此外还有一个97%的居民都是外国人的地区,构成了另一个国家的天然地理边界,它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鲁里坦尼亚王国的一部分。但是,与鲁里坦尼亚王国结盟的诸省份之一,以前曾在那些市场上进行贸易,而且其上流社会的文化属于鲁里坦尼亚王国文化。根据文化优势原则以及捍卫文明的需要,王国应当领有这些地区。最后,有一个港口,无论从地理上、人种上、经济上、历史上还是贸易上都与鲁里坦尼亚王国毫无干系。但是它也为王国所需,理由是有利于国防。

在结束了世界大战的那些条约中,你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范例。现在我并不打算暗示,我认为始终如一地运用这些原则的任何一项都可能使欧洲重新安定下来。我可以肯定地说,那不可

能。正是由于狂妄而专横地使用这些原则，和解的精神才没有占据上风，这意味着和平的要义并没有包含在其中。从你开始讨论工厂、矿藏、山脉甚或政治权威，把它们作为这个或那个永恒原则的完美范例之时起，你就不再辩称你在战斗。那个永恒原则会删除一切异议，使问题变得没有背景、没有来龙去脉，使你抱着某种强烈感情去滥用根本不适用于船坞、货栈和不动产的原则。只要你在这样的状态下开始行动，你就停不下来了。真正的危险就会接踵而至。你不得不求助于更加专横的原则去应付险局以备受到攻击。然后，你将不得不四处设防，建立缓冲区，为缓冲而缓冲，直到事态陷入一团乱麻，以致看上去开战还不如继续谈判来得危险。

有一些线索往往很有助于让人看出一种成见的荒谬的专横性质。就鲁里坦尼亚王国的宣传而言，那些原则非常迅速地开始了互相干扰，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出争端是如何产生的。那一系列矛盾表明，为了每一部分而运用成见，可能会抹杀与那种要求相抵触的全部事实。这种矛盾就是一个很好的线索。

二

无力考虑空间因素是另一个线索。例如在1918年春天，许许多多的人们被俄国退出战争吓得魂飞魄散，要求“重建东部战线”。在他们的想象中，战争本来就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的，既然其中一条消失了，那么重开这条战线就是当务之急。应当把闲置的日本军队派往前线接替俄国人。但是，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与东部战线之间有5000英里的距离，其间只有一条已被破坏了的铁路。不过那些热心人并没有把这5000英里放在心上。他们压倒一切的信念是东部战线乃势所必需，他们对于日军的勇武气概极

有把握,就是说,他们在心里盘算着那支军队可以登上一张魔毯从弗拉迪沃斯托克飞往波兰。我们的军事当局徒劳地争辩说,把军队送到西伯利亚边缘根本就够不着德国人,就像从伍尔沃思(Wool-worth)大厦的地下室爬到顶层也够不着月球一样。

这个例子中的成见就是在两条战线作战。自从人们开始设想世界大战以来,他们就认为德国人夹在法国与俄国之间。一代——或许是两代——战略家都把这种生动的想象作为他们一切分析的起点。将近4年的时间里,他们看到的每一张作战地图都在深化他们的印象:这就是那场战争。一旦事态发生了新的转折,就很难理解它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通过成见去看事实,而事实一旦与成见发生冲突,比如从日本到波兰的距离,就不可能活生生地进入他们的意识。

令人感兴趣的是,美国当局在应付新局面时要比法国更为现实。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1914年之前)他们并没有预见到欧陆的这场战争,部分则是因为美国人在部署自己的力量时一股脑儿地把目光盯在了西线,这本身就是一种成见,它使他们的意识丧失了对其他战场的敏感。在1918年春天,这种美国观念就不是传统的法国观念的对手了,因为,尽管美国人对自身的力量极为自信,但同时法国人(在Cantigny和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之前)却抱着极大的疑虑。美国人的自信浸透了美国人的成见,给了它固执己见的力量、强烈而敏感的锐气、激励意志的作用、作为期望目标的情绪化兴趣以及当前行动的和谐性,这就是詹姆斯所说的被我们认作"现实"①的特征。绝望中的法国人仍然固守着他们既定的观念。当事实——严重的地理事实——与他们的预见不相吻合时,他们要么置之不理,要么把事实本身曲解得走了样。因此,

①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II, P. 300.

日本人与德国人照面的困难,就被德国人在半路上和他们遭遇的说法克服掉了。1918年5、6月间,人们普遍相信一支德国军队正在调往东西伯利亚。这支幻影军队的成分是一些确实被人看到的德国俘虏,更多的则是被想象出来的德国俘虏,而关键还是这一幻觉:那隔在中间的5000英里实际上并不存在。[①]

三

一个合乎实际的空间概念并不是个微不足道的事情。如果我在地图上的孟买和香港之间画一条直线并测量一下距离,这根本无法使我了解到我的实际行程究竟有多远。即使我估量了我必定要经过的实际距离,我也仍然没有了解到什么,因为我还不知道乘坐什么样的船,它们开起来有多快,我能不能订上铺位,以及是否付得起这笔费用。在实际生活中,空间是个有效运输的问题,那可不是平面几何,老铁路大王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才会威胁要让那个惹恼了他的城市街道上长满荒草。如果我开着汽车,问人家到我的目的地还有多远,如果有人告诉我还有3英里、但却没有说明另有6英里弯路,我就会把这家伙骂作十足的混蛋。不过要是告诉我步行得走3英里,这对我毫无用处。也许人家会告诉我,像乌鸦那样飞过去只有1英里。我既不能像乌鸦那样飞,也不是在步行。这下我应当知道,开车要走9英里,而且,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还有6英里是些坑坑洼洼的车辙路。我会把那个告诉我3英里的行人叫做讨厌鬼,会认为那个告诉我1英里的飞行员是恶作剧。他们说的都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我的行程所覆盖的空间。

---

① 见Charles Grasty对福煦将军的访谈,1918年2月26日《纽约时报》。

在划定边界线时，由于无法设想一个地区的实际地形地貌，荒谬的复杂性就会接踵而至。根据某种普遍规则，那些拥有了自决权的政治家们不时地要在地图上划些界线，而一旦实地看到某个地方时，那界线可能会穿过一家工厂，会落在一条乡村马路的中央，会斜跨一座教堂的中殿，或者夹在一个农舍的厨房和卧室中间。在一个牧区划出的边界隔开了草场与水面、隔开了草场与市场，在一个工业区又使铁路的尽头站和铁路处于隔离状态。在有色人种地图上，那界线从种族角度来看是公正的，就是说，仅仅在那个人种地图上展示的世界里是公正的。

四

不过，时间概念的情况与空间概念同样糟糕。一个常见的例子是人们试图通过订立详尽的遗嘱以便身后也能长期支配自己的财产。"威廉·詹姆斯的目的，"他的曾孙亨利·詹姆斯写道，"就是规定他的孩子们(其中几个在他去世时尚未成年)应当凭着勤奋和阅历证明自己有资格享有他预定要留给他们的大笔遗产，并且接着就看到了他立下的一份遗嘱，其中包含着许多限制和训诫。由此他也表明了他对自己的判断有着多么大的把握，对子孙后代的道德幸福是多么牵挂。"①法庭最后宣布这份遗嘱无效。因为法律在反对永久所有权时承认，尽管允许任何人都能把他的道德标准强加于尚未可知的未来，但是要有一些明确的限制。既然强加于人的欲望乃是人的特性，因此，对于这样的人，法律允许他的欲望在他死后的有限时间内仍然奏效。

任何宪法的修正条款都是一种显著的标志，说明了修正案

---

① *The Letters of William James*, Vol. I, p.6.

的作者们对于他们的主张可以连续影响若干代人是多么充满自信。我相信，美国的有些州宪法几乎是不能修正的。制定这些宪法的人们大概没有什么时间流动感，对于他们来说，“此时”和“此地”总是那么明明白白、确定无疑，而“来世”又总是那么模糊不清、令人恐惧，他们有勇气说，他们身后的生活将会一如既往。正是因为宪法难以修正，热情的人们才会抱着对传统的爱好，乐于在这种不朽的铜表上写上各种各样的规则与限制，而即使它们对未来表示了得体的谦恭，大概也不会比一部普通法更具永久性。

一种关于时间的假设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一个为了整个被意识到的生活而存在的制度，对于某人来说乃是永恒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另一个人看来则是转瞬即逝的东西。地质学的时间完全不同于生物学的时间。最复杂的则是社会时间。政治家们必须决定是为当务之急还是为长久之计做打算。某些决策不得不以两个钟头之内将会发生的事情为依据，另一些决策则要考虑一周、一个月、一个季度、10 年之内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时孩子们或者孩子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了。智慧的一个重要成分就是能够看出完全属于正在讨论的问题范围内的时间概念。使用了错误的时间概念的人比比皆是，包括无视现实的空谈家和什么都看不出来的庸人。一种严格的价值尺度则有着非常敏锐的相对时间感。

人们总会用某种方式去设想遥远的时间，设想过去和未来。但是正如詹姆斯所说，“我们对于更长的持续期并没有切近的‘清晰’感”。①我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最长持续期，就是所谓的“虚拟

①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I, p. 638.

现实”，按照蒂奇纳[1]的说法，这种感受只能历时6秒钟[2]。“在这段时间内，所有的印象都会同时出现在我们脑际。这使我们有可能去设想各种变化、事件以及静止的对象。感性的现实会得到想象的现实的补充。感性认识会结合着过去完整的某几天、某几个月乃至某几年的记忆印象一股脑儿地进入现实。”

在这种想象的现实中，一如詹姆斯所说，想象的活跃程度与我们从中看到的区别是成正比的。因此，一个无所事事的假期慢慢腾腾地过去之后，虽然我们曾经置身其中，但在记忆中却好象非常短暂。重大活动可以迅速地消磨时间，可是在记忆中它的持续期却很长。关于我们的辨识力和我们的时间的关系，詹姆斯有一段饶有趣味的文字：[3]

> 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人在他们直观感觉到的整个持续期和在完全占据了那个持续期的完整事件中，或许是极为不同的。冯·贝尔[4]曾对这种改变了自然面貌的差异所产生的结果专心致志地做过一些有趣的计算。先来假定一下，我们能在1秒钟之内分别记录下10000个事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能记录10个；[5] 假如到那时我们的生命所保存的印记和现在一个样，那可能就是只活了千分之一的时间。我们将活不到1个月，根本无法亲身体验四季的变化。如果是生在冬天，我们就会像现在这样相信夏天的炎热一如石炭纪时期。有机物的运动在我们的感觉中可能会十分缓慢，我们看

---

① Edward Titchener(1867—1927)，美国心理学家，建立美国实验心理学的重要人物。——译注

② 引自 Warren, *Human Psychology*, p 255。

③ 同上，第639页。

④ von Baer(1792—1876)，爱沙尼亚胚胎学家、地理学、人种学及自然人类学先驱。——译注

⑤ 使用超速摄影机可以在电影上产生这种效果。

不出来，只能去推断。太阳一动不动地高悬空中，月亮也几乎没什么变化，如此等等。不过要是把这个假定反过来说，一个人在既定的时间内得到的感觉仅仅是我们所得到的千分之一，因而等于多活了1000倍。这样一来，冬天或者夏天对他来说就像过了一刻钟。蘑菇以及生长得更快的植物像在飞速成熟，似乎转眼就冒了出来；季生灌木的荣枯则像沸腾的泉水一般此起彼伏；动物的奔跑犹如子弹或炮弹一样来去无踪；太阳也将快如流星似地掠过天际，在他身后留下一道火光，等等。

五

韦尔斯先生在他的《史学概论》中作出了非凡的努力，直观地展示了“历史时间和地质时间的真实比例”。① 在一个刻度尺上，表示从哥伦布到我们的时间用了3英寸距离，这样，读者走上55英尺可以来到阿尔塔马拉洞窟②绘画的时代，走上550英尺可以看到早期尼安德特人，走上1英里左右就可以见到最后的恐龙。比较确切的编年史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才开始的，那时的“阿卡德－苏美尔帝国的萨尔贡一世是个遥远的记忆，……比君士坦丁大帝离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遥远得多。……汉谟拉比已经死去了千年以上。……英格兰的巨石阵③也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

① 见 Wells, *Outline of History*, Vol. II, P. 605。另见 James Harvey Robinson, *The New History*, p. 239。

② 位于西班牙北部桑坦德市西，因有优美的史前绘画和雕刻而闻名。——译注

③ 一译“圆形石林”，圆形巨石柱群，建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座落在英格兰索尔兹伯里以北约15公里处，四周为土堤。——译注

韦尔斯先生是抱着一个目的写作的。“在一万年的短时期内，这些单位从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家族小部落成长为统一的大王国，但是和现在相比仍然很小很偏。”韦尔斯先生希望通过改变看待我们现实问题的时间眼光来改变道德眼光，因为天文学的时间尺度以及地质学、生物学等等望远镜的尺度，都把现实缩小到了最低限度，它们和一个显微镜相比并不“更真实”。西米恩·斯特伦斯基先生坚持认为，“如果韦尔斯先生考虑的是他的副标题‘人类可能的未来’，那么他就有理由以多少个世纪为单位寻求答案。如果他考虑的是拯救在世界大战的冲击下摇摇欲坠的西方文明，他就必须以 10 年或 20 年为单位。”① 斯特伦斯基先生是对的。你采用什么尺度，一切都取决于实际目的。时间眼光需要拉长的时候情况会是一个样子，需要缩短的时候情况则是另外的样子。

如果有人说，1500 万中国人饥饿而死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两代人的出生率就足以补上这个损失，那么他用的就是一种为自己的迟钝进行辩解的时间眼光。一个民族如果为了眼前的和平而乐于收买一个侵略成性的贪婪帝国，这等于是用一种虚拟现实糟蹋他们后代的和平。对一个讨厌的邻邦缺乏耐心的民族，如果不顾一切地要去“摊牌”，同样会成为虚拟现实的牺牲品。

六

恰当的时间考虑几乎是一切社会问题的组成部分。比如说，这里有一个木材问题。有的树比别的树长得快。那么一项合理的林业政策就应当考虑在哪个季节砍伐哪个品种、哪个年轮的多

① 见 1921 年 6 月 18 日《纽约晚邮报》“文学评论”版的“拯救文明”。

少树木，以利于再植补充。就此而论，如果计算准确，就可以达到最佳经济状态。伐少了是荒废，伐多了则是滥采。但是如果出现紧急情况，说战争需要飞机材料，那么当年度的采伐势必会超额。一个警觉的政府将会认识到这一点，并把恢复平衡视为今后应当承担的责任。

煤的问题则要进行不同的时间分析，因为煤不同于树，它是按照地质时间生成的。煤的供给是有限的。因此，一项正确的社会政策要涉及到对于世界上的可用储量、开采的可能性、目前的使用率、目前的用法是否节约以及能否找到替代燃料进行复杂的计算。不过，即使做出了那样的计算，最后也肯定要被一种与时间有关的理想标准所修改。比如说，假定工程师们断言，现有的燃料正在以某种速度被消耗着；除非有了新的发现，否则工业将在未来的某个明确时间进入萎缩阶段。那时我们将不得不决定如何节约和克制我们的用量，毕竟，合理的节约措施还是要有的，这是为了不至于掠夺子孙后代。但是，我们应当考虑多少代后人呢？我们的孙辈？曾孙辈？也许我们会决定按照 100 年的时间进行计算，认为即使煤炭的短缺已成定局，但同时这段时间也足够用来发现替代燃料了。当然，这些数字是假设的。不过在进行这样的计算时我们应当使用我们所拥有的理性。我们应当在公众舆论中给社会时间留出它的位置。

我们来想象一下一个稍有不同的情况：一座城市和一家电车公司的契约。该公司说，如果它不能获得主要道路 90 年的垄断经营权，它就不打算投资。在提出这种要求的人们看来，90 年几乎意味着“永远”。但是，假定有理由认为，从一个中心电站驶上轨道的路面车辆在 20 年内就会过时。那么签订这样的契约就是很不明智的做法，因为你实际上是在宣告未来的一代人将要使用劣等的交通工具。在签订这样的契约时，城市官员并没有清楚地

意识到90年是个什么概念。更好的办法是给那个公司一笔补贴以吸引资金,而不是抱着一种虚幻的永恒感去刺激投资。在谈论90年的问题时,城市官员和公司官员全都丧失了现实的时间意识。

大众史学则是时间错乱的快乐狩猎场。比如说,对于普通的英国人来说,克伦威尔的行为,关于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合并的议会制定法,1847年的大饥馑,都是早已死去的角色犯下的错误和早已死去的人们蒙受的苦难,他们和活着的人们——无论是爱尔兰人还是英国人——没有任何实际的联系。但是在一个满腔爱国激情的爱尔兰人看来,这同一些事件却仍然历历在目。他的记忆就像这些历史画卷之一,在那里面,维吉尔和但丁正在促膝攀谈。这些透视法一样的缩小和放大造成了民族之间的巨大鸿沟。要让秉持这一传统的人们记住另一传统下的人们对现实的理解,确实是难乎其难。

如果以"历史上正确"或"历史上错误"的名义看问题,那就不可能对"过去"产生客观的认识。例如德法关于阿尔萨斯-洛林的争端。它完全取决于你所选择的起点资料。如果你从劳拉奇人和塞卡尼人①开始看起,那么这块版图可以说从历史上就是古代高卢的一部分。如果你更喜欢从亨利一世开始,那么它们从历史上就是德国领土。如果你从1273年算起,它们就属于奥地利王朝。如果你从1648年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算起,它们的绝大部分就属于法国。如果你从路易十四和1688年算起,它们几乎就全部属于法国。如果你使用了历史上的论据,你肯定就会选择那些能够支持你对现实的看法的历史资料。

关于"种族"和民族的争论往往也会表现出同样具有随意性

① Rauraci and Sequani,古代高卢凯尔特民族。——译注

的时间观。在这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强烈感情的影响下，人们普遍相信了“条顿人”同“盎格鲁撒克逊人”及法国人和其他人的差异乃是一种永久性的差异。他们一直就是一些相互对立的种族。然而，就在一代人以前，像弗里曼(Freeman)那样的历史学家还曾强调了西欧各民族有着共同的条顿血统，人种学家们更是坚持认为，德国人、英国人以及绝大部分法国人都是同一个种族的分支。这里有一个普遍规律：假如你喜欢当今的某个民族，你就会把那些分支都安排到这个主干上去；如果你厌恶他们，你就会认为这些不同的分支分属不同的主干。在某种情况下你会专注于他们还不是清晰可辨的那个时期，在另一种情况下你又会专注于他们已经各立门户之后的那个时期。而合乎这种心态的观点就被叫做“真理”。

在家谱中则会出现一种令人愉快的变化。通常，家谱会给一对夫妇提供一些最早的祖先，如果有可能，还会把这对夫妇同某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事件——比如诺曼征服——联系起来。这对夫妇没有祖先。他们也不是子嗣。但他们又是某些祖先的子嗣，而“某某人是家族的奠基者”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该人就是家族的亚当，然而他却是一个开拓了值得夸耀的起点的特定祖先，或者是有记录的最早的祖先。不过家谱却暴露了更深刻的偏见。除非女方碰巧有着特别显要的身世，否则这个家谱就只能按照男方的血脉往下续。树是男人。女人只是在不同的时候聚集到男人那里，就像飞来飞去的蜜蜂落在了一棵古老的苹果树上。

七

然而，“未来”是最容易令人产生错觉的时间。在这方面我们受到的诱惑就是总想跳过一些顺序排列的必不可少的台阶；而

且,由于满怀希望或者满腹疑虑,我们对于完成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所需要的时间,往往会估计得过长或者过短。人们讨论工人在工厂的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就陷入了这种困境。管理是个涵盖了诸多职责的术语。有些职责无须培训,有些则需稍加培训,另有一些恐怕要学一辈子。真正与众不同的工厂民主化方案大概要按照适当的时间顺序进行,就是说,职责的承担要同时辅之以补充性的职业培训方案。要求实行一种突如其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企图排除隔在中间的准备时间;反对一切职责的分工,就是企图否认人的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变化。那些粗劣的民主观,诸如轮流任职、蔑视专家等等,其实无非是照搬了那个古老的神话:智慧女神从朱庇特的脑门子里一跳出来就有了大智大勇。按照这样的民主观,那些需要进行多年学习的东西根本就不必去学。

每当“落后民族”这一短语被用作某项政策的依据时,时间概念就成了一个决定性因素。例如,国际联盟的盟约中说[①],“托管地之性质得视民族之发展阶段而不同”,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依据。它宣称,某些共同体“业已达到的发展阶段”使他们的独立只能得到暂时的承认,他们应当接受指导和帮助,“直到他们能够真正独立时为止”。受托管理国与托管国都认为,时间将会深刻影响他们的关系。因此,像古巴那样的情况,美国政府的判断实际上和古巴爱国者的判断是一致的,虽然出现了一些麻烦,但在强国与弱国的关系史上还没有过比这更优美的篇章。历史上更常见的是无法达成一致认识的情况。宗主国民族——不管它公开怎么说——往往会坚信,落后民族的落后性是令人绝望的,根本不值得去救助,或者说,不想去救助它反而是非常有利的,因为那样的

① 第十九条。

关系会腐蚀和毒化世界和平。也有少数这样的情况,非常少:落后民族有意需要统治的强国提出一个急切的改进计划,一个有着明确标准和明确时间表的计划。事实上,更常见——极为常见——的似乎是这样的规律:落后性被认为是劣等民族与生俱来的永久标志。因此,那里每一次改变落后性的尝试都会被视为骚乱而引起强国的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肯定就是骚乱了。在我们自己的种族战争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某些不能理解时间会逐渐消除黑人的奴隶道德,因而基于这种道德所作的社会调整开始失败造成的后果。

描绘未来的时候宛如它会服从我们眼前的意图,这一点不难做到——凡是拖我们后腿的因素就想象可以把它一笔勾销,凡是能让我们免于恐惧的因素就想象可以让它永存不朽,如此即可。

八

在汇集公众舆论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想象比我们肉眼能看到的更大的空间、比我们能感觉到的更长的时间,而且还要描绘和判断比我们所能计数或者所能生动想象出来的更多的人、更多的行动、更多的事物。我们必须进行总结与概括。我们必须挑选样板,把它们看作典型。

恰当地找出一个庞大阶层的恰当样板,这并非易事。这个问题属于统计科学,对于只有初级数学水平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为困难的事情;尽管我曾虔诚地以为自己弄懂了半打的指南,可是我的统计学知识仍然一塌糊涂。它们对我的作用就是让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分类取样是多么地困难,而我们又是多么地喜欢用一小块黄油去涂抹整个宇宙。

不久以前,英格兰谢菲尔德的一组社会工作者打算着手对该

市工人的精神素质进行一番精确的描绘，用以替代自己过去的印象主义感觉。[1] 他们希望——而且确实有些很不错的根据——能够得出结论说，谢非尔德的工人是多么称职。但是他们发现，他们困在了混乱之中，而只要不抱先人之见，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发现。不用说，他们使用的测验方法就是一份涉及到广泛领域的调查表。为了进行说明，不妨假定那些问题可以公正地测出英格兰城市生活的精神素质。那么，从理论上说，那些问题就应当提交给工人阶级的每一个成员。然而，要想知道谁是工人阶级可不是个容易事。不过可以再次假定，通过人口普查能够知道如何把他们区分出来。于是，大约10.4万男人和10.7万女人被认为应当接受询问。他们会得到用来赞成或驳斥关于"愚昧的工人"或"有知识的工人"的因果句的答案。但是，没有人想到要对这20多万人进行询问。

于是，这些社会工作者请教了著名统计学家鲍利教授[2]。他建议他们找出408名男子和408名女子，这可以证明是一个公正的取样。根据数学计算，这个数目不会比1/22的平均数出现更大的偏差。[3] 因此，他们在能够侈谈普通工人之前至少应当向816个人提出问题。但是，他们应当接触哪816个人呢？

"我们可以搜集一些关于工人的特点，使我们在调查前就能对他们有所了解；我们可以通过那些男女慈善家做工作，因为他们分别在俱乐部、慈善机构、医院、礼拜堂或居民区同某一部分工人保持着联系。但是，这样一种选择方式可能会产生毫无价值的结果。这样选出来的工人可能丝毫也不代表通常所说的'普通工

① 见 *The Equipment of the Workers*。

② Arthur Bowley（1869—1957），英国统计学家，以发展了抽样技术而著名。——译注

③ *The Equipment of the worker*，第65页脚注。

人'；他们可能仅仅代表自己所属的狭隘的小圈子。

"把'牺牲品'弄到手的正确途径，就是通过某些'中立'、'偶然'或'随机'的方法得到你需要的工人。我们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劳动代价严格遵循这一途径。"

他们做到了。在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之后，他们得出了比他们的分类调查表所预期的更加明确的结论，在20万谢菲尔德工人中，"约1/4""完全称职"，"近3/4""不大称职"，"约1/15""根本不称职"。

可以把这种认真而近乎学究式的方法同我们对一些庞大群体的笼统判断做一下比较，比如我们常说的反复无常的爱尔兰人、讲究逻辑的法国人、遵守纪律的德国人、愚昧无知的斯拉夫人、忠心耿耿的中国人、不可信赖的日本人，等等。所有这些概括都是来自样板，但是选取样板所使用的方法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却是极不可靠的。因此，雇主就会根据他所知道的最不易调教或者最驯服的雇员来评判工人，并且根据某个激进团体认为的工人阶级的典型样板去评判许多人。这种因果思维的倾向喜欢寻找或发现能够支持或否定其偏见的样板，然后把它当作某个阶级整体的样板。

当人们按照我们对他们的分类而对自己进行归类的时候，大量的混乱就出现了。如果他们一直停留在我们所给出的位置上，据此作出预言就非常容易。但是，像"工人阶级"这样的短语，事实上仅仅说的是某一段时间内的某种实际情况。当你谈论的是收入水平低于某个标准的所有人并且把他们叫做工人阶级时，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凡是属于这个类别的人都会表现出合乎你的成见的行为方式。问题在于，谁是这样的人呢？你对此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工厂的雇员和矿工大体还算得上，但是农业工人、小农、小贩、小店员、小职员、佣人、士兵、警察、消防员就会被排除

在外。如果你说的是“工人阶级”，你就会紧盯着二三百万比较固定的工会会员，把他们叫做“工人”(Labor)；另外的一千七八百万——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他们也许是够格的工人——则会默认这个被有组织的核心所提出的观点。英国职工大会的一系列决议案以及知识分子们写的许多小册子就是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果认为1918—1921年间的英国工人阶级也持有同样的观点，那可真是大错特错了。

把“工人”看作“解放者”，这样的成见会挑选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排斥其他证据。于是，在现实的劳工运动(the real movements of working men)之外，又并存着一个虚构的“工人运动”(“Labor Movement”)，在那里，一个理想化的大众正在向着一个理想的目标挺进。这个虚构着眼的是未来。至于未来，那里的可能性与或然性以及或然性与确定性的区别几乎是无法辨认的。如果这个未来过于遥远，人就会把仅仅是可以想象到的事情转而想象成完全可能的事情，进而把这种可能的事情想象成确实会发生的事情。詹姆斯把这叫做信仰阶梯，他说，“这是一个由善良愿望组成的斜坡，在那上面排列着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中的大量问题。”①

1. 在某种世界观里并不存在荒谬成分，这是真实的，并不存在自相矛盾；
2. 它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是**真实的；
3. 它现在**也许**是真实的；
4. 它是**合乎**真实的；
5. 它**理应**是真实的；
6. 它**肯定**是真实的；

① 见 William James, *Som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p 224。

7. 它**就会**成为真实的，无论如何对我来说是真实的。

而且，正如他在另一处所说，[①]“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你的表演可能就会成为一种手段，用来确保它最终成为真实的。”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坚定地认为，我们必须尽力搞清楚如何避免起点的目标被替换掉，如何避免把有可能在未来产生的勇气、努力和技能硬放到现在。不过，这种不言自明的道理极难给人什么指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选择样板的问题上都不会得到多少训练。

如果我们相信某个事情理应是真实的，我们就总是能够发现一个用来说明事情的确如此的例子，或者找到一个相信事情的确如此的人。要想让一个具体的事实来说明某个希望与该事实丝毫不爽，这可真是难乎其难。假如我们最初碰上的 6 个人和我们有着一致的看法，我们也不会轻易地想到他们早餐的时候全都读过同一份报纸。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每次想要估计一个或然性的时候都能给 816 个随机抽样者发放一份调查表。在面对大量的事实时，如果我们根据一种因果印象采取行动的话，猜测就会同我们发掘出来的真实样板作对。

九

如果我们试图更进一步，以便找出无形的复杂事态的前因后果，那种随意的舆论就更加靠不住了。公共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极少能同时显露出前因和后果。在那些潜心多年——比如说——研究商业周期、物价与工资波动、移民与归化、列强的外交意图的学者们看来，它们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我们总要设法猜测有关这些问题的舆论，这就难怪会出现一种最常见的直观推理方

① *A Pluralistic Universe*, p.329.

式：*post hoc rego propter hoc*（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

越是没有受过训练的头脑，就越是喜欢作出一种揣测：如果两件事情同时引起了注意，那就说明它们有着因果联系。我们已经比较详细地说明了事情是怎样引起我们注意的。我们知道，我们接触信息的途径是布满了障碍的，是不确定的，而且我们对信息的理解受到了我们的成见的深刻影响，我们进行推理时所能够得到的证据往往会屈从于辩解、威望、道德、空间和抽样调查给我们造成的错觉。我们现在应当注意到，由于一开始就受到这种污染，公众舆论会更加令人困扰，因为在多半是通过成见观察一系列事件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接受了相当于因和果那样的顺序感或者对应性。

这种情况在同时出现了两种观念并且激起了同一种感情的时候最有可能发生。如果它们同时出现，那就有可能激起同一种感情；即使它们没有同时进入一种强烈的感情，也会从记忆的各个角落里找出那些能使人感到一模一样的观念。于是，一切令人讨厌的事情都会集中到同一个因果系统，一切令人愉快的事情也同样如此。

> (1675 年)11 月 11 日这天，我听说上帝向这个小镇射了一支箭。一个普通的天鹅足迹上便出现了天花，天鹅的看护人名叫温莎。他的女儿病了。人们看到，这种病开始于一个酒馆，证明上帝对于酗酒的罪孽以及酒馆越来越感到不满！①

因此，英克里斯·马瑟，一位杰出的天体力学教授，在 1919 年便讨论了爱因斯坦的理论：

> 很有可能，……布尔什维克暴乱其实就是某些根本的、

① *The Heart of the Puritan*, p. 177.

深刻的世界性精神失调的外在表现。……这同样的精神骚动已经侵入了科学领域。①

如果对一件事情产生了强烈憎恨，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它同我们所强烈憎恨或恐惧的绝大多数其他事情联系起来，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因果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也许并不比天花与酒馆或者相对论与布尔什维克的联系更多，但是它们被融入了同一种感情。在那位天体力学教授那样的迷信头脑中，感情就是一道熔岩流，它会抓住并吞没它所碰到的一切。当你挖开它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就像一座被埋葬的城市，所有物体全都荒谬地互相纠缠在一起，一切都可能和其他的一切有关，假如它感到像是有关的话。处在这种状态下的头脑决不会明白这种状态是多么地荒唐。古时的恐惧被比较晚近的恐惧所增强，汇集成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恐惧感，在那里面，一切可怕的事物都是其他一切可怕事物的原因。

十

一般来说，这一点会在虚构一个万恶交汇的体系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在虚构另一个体系——诸善云集的体系——时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显得那么爱好绝对。因为我们不喜欢修饰性的副词，② 嫌它们会把句子堆砌得乱七八糟，干扰不可抗拒的情感。我们更喜欢的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我们厌恶有点、大概、如果、或许、接近、差不多、几乎、一时、部分等等词语。在我们无拘无束的时候，我们会把一切前景都说得那么绝对——百分之

① 引自 1919 年 12 月 24 日《新共和》，第 120 页。

② 参见弗洛伊德《梦的释义》第六章。

百、到处、永远。

很难说我们的傲慢比敌人的傲慢更有道理，也很难说我们的胜利比敌人的胜利更有助于实现民主。有人肯定会坚称，我们的胜利将会永远结束战争，使这个世界安享民主。而战争一旦结束，尽管我们挫败了比仍然困扰着我们的邪恶更大的邪恶，但是这种结局的相对性却在逐渐消失，眼前的邪恶的绝对性又让我们惊悸不已，我们感到自己很无助，因为我们并非不可抗拒。钟摆仍在全能和无能之间摇来荡去。

实际的空间，实际的时间，实际的数量，实际的关联，实际的压力，统统无人理睬。前景与背景以及行动的尺度，统统被成见所省略和冻结。

第四部分

兴　　趣

第十一章　兴趣的激发

一

不过，人的头脑可不是一卷胶片，通过快门和镜头能够立刻记录下所有的印象。人的头脑有着没完没了且持续不断的想象力。图象的淡化或融合，不是突出了这个地方就是浓缩了那个地方，好象我们要更完整地把它们归为己有。它们并不是了无生气地附着在头脑的表层，而是通过想象力的再加工又进入我们的个人印象。我们对重点进行了部署并参与了行动。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很容易把大量的关系加以人格化和戏剧化。正如某些寓言，如果不是头脑非常老练，就会把它们看成世态百相的反映。社会运动、经济力量、民族利益、公众舆论，都会被当作人物来看待，或者教皇、总统、列宁、摩根、国王之类的人物又被看作是一些观念和制度。所有成见当中最根深蒂固的成见就是人的这一成见——把人性归结为一些了无生气的或者集合性的事物。

我们的印象有着令人迷惑的变化，甚至在它们经过了种种审查之后，也很容易迫使我们采用更经济的寓言形式。事物的多样性不可胜数，我们不可能老是对它们记忆犹新。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给它们起个名称，让这个名称代表整个印象。但是，

一个名称总是漏洞多多。旧的含义会悄悄溜走，新的含义也会不期而至，要想保留住名称的全部含义，需要原原本本地召回全部印象，两者都会使人精疲力尽。而且，对于思想来说，名称是一种劣币。它们太空洞、太抽象、太没人性。于是，我们便开始通过某些个人成见去认识名称、解读名称，最后则是把它看成人的某种特性的象征。

然而，人的特性本身却是模糊不清、摇摆不定的。要想牢牢记住它们，就得借助一种有形的象征。因此，我们往往会把人的特性归并到我们的印象名称里去，这往往就要使用有形的隐喻加以形象化。英国的人民，英国的历史，就这样压缩成了英国，英国又变成了约翰牛，快活而肥硕，不太灵巧，但足以照顾好自己。在有些人看来，外来移民就像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而另一些人则会把它看作泛滥成灾的洪水。勇敢者的表现可能会被形象地说成是一块岩石；他们的目的像是一条道路，他们的疑虑像是路上的岔口，他们的困难就是前车之辙和暗礁，他们的进展就是一片沃野。如果他们调动了战舰，那就是拔刀出鞘。如果他们的军队投降了，那就是一败涂地。如果他们遭到了压制，那就是受苦受难。

通过演讲、口号、戏剧、电影、漫画、小说、雕塑或者绘画把公共事务广而告之的时候，要想让它们引起一个人的兴趣，首先就需要对原型进行抽象，然后使这些被抽象出来的东西产生刺激作用。对于那些不是亲眼所见的事情，我们不可能有太多的兴趣，也不可能受到太大的触动。我们每个人看到的公共事务都是那么不足挂齿，因而在某人经过艺术加工把它们变成电影之前，它们总是那么单调乏味。所以，抽象乃是一种补充，它迫使我们完全在自己的视角和偏见范围内去认识现实。我们既非无所不知，也非无所不能，我们不得不想、不得不说的东西大都是

我们不得而见的。我们都是血肉之躯，并非以词语、名称和灰色的理论为生。我们都是那种根据抽象观念去作画、演剧、拍卡通片的艺术家。

或者，如有可能，我们会寻找一些能让我们进行形象化想象的才子。因为人们并不全都具有同样程度的绘画才能。而且我想，人们可能会像柏格森那样断言，重实用的头脑最易于接受具有空间特性的事物。①一个“清醒的”思想者几乎总是一个能够出色地把事物加以形象化的人。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由于他像个“电影摄影机”那样看待事物，因此他往往又非常皮相和迟钝。那些长于直觉的人往往能比形象加工者更好地领悟事件的特性和行为的深意。如果关键因素是一种欲望，而这种欲望从来没有赤裸裸地公开表达出来，表面上看只是一个模糊的手势或者一种演说的节奏，他们会理解得更加准确。形象化可以抓住刺激点和结果。但是那些中间因素和内在因素却往往会遭到形象加工者的拙劣歪曲，就像作曲者要在甜美的少女声部掺入一个发出巨响的女高音一样。

然而，尽管直觉经常有着特殊的准确性，但它们始终是高度隐秘的，而且几乎是无法言传的。可是社会交往所依靠的就是相互交流，一个人可以凭着直觉极为优雅地驾驭自己的生活，但是要让别人对这些直觉也能感同身受，一般情况下都会极其困难。如果让他说出这些直觉，它们就会变成一堆迷雾。虽然直觉能够使人更准确地感知人类情感，但是由于空间与触觉的隔阂，理性极少需要进行那种感知。因此，不管是不是有许多人抱着同样的想法采取了行动，大概确凿无疑的是，一开始做出实际决定时没有任何观念是清晰的，除非它具有了视觉和触觉的价

① *Creative Evolution*, Chs. III, IV.

值。不过同样确凿无疑的是，除非包含了我们自己的个性所重视的某些因素，否则，形象化观念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在没有释放或排斥、压抑或增强我们自己的某些渴求之前，它将始终是无关紧要的对象之一。

二

图像始终是最可靠的观念传达方式，其次则是能够唤起记忆图象的词语。但是，被传达的观念在没有使我们认同于图象的某个方面之前，它不会完全成为我们自己的观念。这种认同，或者弗农·李所说的共鸣，[①]几乎是无比地微妙，有着几乎无比的象征性。我们在进行模仿时可能会全然不觉，而有时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支撑着我们自尊心的那些个性产生反感。在老于世故的人们中间，这种参与不可能表现为英雄的命运，而是表现为整个观念的命运，其中英雄与恶棍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这些都是精制品了。

有着大众化表现的认同途径几乎总是一望而知。你立刻就能知道谁是英雄。如果标志不明确，选择又不清晰，要想指望轻易地大众化就行不通。[②] 但是这还不够。受众肯定会有所动作，而对真、善、美的思索却并不是非做不可。为了不至于面对图象时无动于衷，受众必须接受形象的训练，这既适用于小说和电影，也适用于新闻报道。这里有两种训练方式，它们远远胜过所有其他的方式，由于两者都很容易做到，因而才被调动起来；由于两者都使人渴望，因而才能为它们找到刺激。这就是性激

---

① *Beauty and Ugliness*.

② 一个对于新闻的特点有着重大影响的事实，见本书第七部分。

情和斗争，两者有许多相互的关联，有着非常密切的相互交融，一场与性有关的斗争，其魅力远远高于任何其他主题。这里对文化与边界的所有差别既不是聚精会神，也不是漫不经心。

这种性主题几乎不可能刻画出美国的政治形象。除了某些无关紧要的战争狂热、一个偶然的丑闻或者一场同黑人或亚洲人的种族冲突以外，谈论这个主题似乎根本就是牵强附会。只有在电影里、小说中以及某些杂志上，才会虚构出一些同某个姑娘或其他女人纠缠在一起的劳资关系、商业竞争以及政治和外交事件。不过斗争主题似乎就无处不在了。如果出现了一场斗争，或者如我们所说，出现了一个争端，政治就会引人注目。为了让政治变得大众化，就必须寻找争端，即使真理和正义在手，即使天下一片太平，就是说，即使在判断、原则或事实方面的分歧还不到需要挑起争端的程度时，也是如此。[①]但是，在争端尚未挑起时，我们当中那些没有直接卷入其中的人会发现很难保持对它的高度兴趣。对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来说，即使没有争端发生，那种专注劲头也足以实实在在地吸引住他们。他们可以靠着妙不可言的行动的乐趣、靠着微妙的竞争或虚构来做到这一点。不过，对于那些只是从表面上模模糊糊看待整个问题的人来说，就不大容易发挥这些另类的才能。为了让那些事务的模糊形象对他们有所触动，就必须让他们学着去喜爱斗争、虚构和胜利。

帕特森小姐[②] 强调说："虚构……构成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艺术杰作和里韦利与里亚托剧院中的绘画之间的区别。"如果她明确指出杰作既缺乏获得认同感的捷径，又缺乏深受这

---

① 参阅 Frances Taylor Patterson, *Cinema Craftsmanship*，第 33—34 页。"三。如果情节缺乏悬念：1，增加一个反面角色，2，添加一个障碍，3，加上一个难题，4，强调观众心中的某一问题……"

② 见前引书，第 6—7 页。

一代人欢迎的主题，她的以下说法就完全正确了：上述区别“解释了为什么到大都会博物馆去的人那么稀稀拉拉，而涌向里亚托或里韦利剧院的却是熙熙攘攘。那些稀稀拉拉来到艺术博物馆的人们欣赏一幅绘画不会超过10分钟——除非他们碰巧是学艺术的学生，批评家或鉴赏家。而里韦利或里亚托剧院里熙熙攘攘的观众却能够花上一个多小时观看一部电影。就审美价值而言，这两个地方的画面可能无法相提并论。然而，电影比艺术杰作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吸引他们的时间更长，这并不是因为它自身有什么内在的价值，而是因为它在叙述不断发展的事件，观众则是屏息闭气地等待着事件的结果。它包含着斗争的要素，这在激发虚构方面决不会徒劳的”。

因此，为了使远处的情形不至于成为在注意力边缘上摇曳的模糊事物，就应该把它转换成图像，使人能够看到产生认同感的机会，否则就只能使很少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感兴趣。它是那种看得见却摸不着的景观，是能够冲击我们的感官却并非公认的那种知觉。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我们必须能够作出选择。我们必须从内心深处离开观众席，走上舞台，像英雄一样为了以善胜恶而搏斗。我们必须给自己的生命注入寓言。

三

所以，尽管批评家们持有不同意见，但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古老争论还是得出了一个定论。我们通常的趣味是让戏剧发端于现实的环境之中，以使它显得真实可信，并使其结束于一个浪漫的环境中，让人羡慕，但不是浪漫得令人难以置信。在开端和结尾之间，艺术规范是自由的，但真实的开头和大团圆式的结局是明显的标志。电影观众会拒绝按照逻辑方法展开幻想，

因为纯粹的幻想在机器时代没有了立足之地。观众也会拒绝无情无义地追求现实主义,因为它在已经成为自己所进行的斗争中不会欣赏失败。

那些被公认为是真实的、现实的、善的、恶的、值得向往的事物,并不会永恒不变。它们得自以往的经验,由成见加以固定,并被用于对后来的事物进行判断。因此,虽然每一部电影和那些通俗杂志并没有投入巨资以求迅速广泛地流行,但是精力旺盛、想象力丰富的人士却能够利用银幕和期刊——因为人们想的就是要利用它们——来扩大和提炼、验证和批评那些使我们的想象力据以发挥作用的形象库。不过,要想得到这笔费用,拍电影的人就要像其他时代的教堂画家和宫廷画家一样,必须依附于他们所发现的那些成见,否则就要付出期望落空的代价。成见是可以改变的,但要等到影片发行半年之后才保证见到成效,那就为时晚点了。

那些改变了成见的人们,那些先锋派艺术家和批评家,自然对那些保护自己投资的经理和编辑们感到沮丧和恼火。他们可以拿任何事情冒险,为什么别人就不行?但这个问法并不十分公道,虽然他们的愤怒有几分道理,但他们却忘了,他们得到的回报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雇主有可能感觉到的东西。他们不可能替对方设身处地,即使能设身也不会去处地。在这场与庸人的无休止的战争中,他们还忘记了另一件事,即他们正在用过去的艺术家与哲人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他们所追求的发行量和观众在最近几代人以前从来就没有被艺术家们考虑过。当他们无法得到这些时就会深感失望。

像《大街》的辛克莱·刘易斯那样的人们会大受欢迎的,他们明明白白说出了许多人胸中有而口中无的模糊想法。“你替我说出来了。”他们确立的新形式会不断地被人模仿,直到它成为

一种感性认识的成见。接踵而来的先锋派艺术家则发现，很难让公众换一种眼光来看待《大街》，于是他就像刘易斯的先驱者一样，与公众发生了争吵。

这种争吵不仅是由于成见之间的冲突，而且由于先锋派艺术家对他的素材的尊重。只要是他选定了的平面，他就会一直停留在那个平面上。如果他探讨的是某个事件的内在因素，他就会打破沙锅问到底，毫不顾及由此引起的苦恼。他们不会拿自己的幻想去帮助别人，或者在和平并不存在的地方大叫和平。他有他的美国。但大多数观众并不喜欢如此严谨的态度。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自己，而不是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事情。他们所关心的自我乃是学校和传统向其展示的自我。他们坚持认为一件艺术作品就是能载着他们一步跨到海外的交通工具，他们坐在上面并不是浏览那个国家的轮廓，而是在奔向一片乐土，在那里他们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既不用在计时机上打孔，也不用刷盘子。为满足这些要求，就会有一个处于中间位置的艺术家阶层，他们能够并且乐于把各种平面混合起来，借助于那些大人物的发明创造来拼凑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混合物，正如帕特森小姐所说，给予"现实生活几乎从不给予的东西——种种困境的彻底消解；行善的痛苦与作恶的成功……变成了对美德的颂扬和对美德之敌的永恒惩处"。①

四

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也在遵循着这些规则。那里始终有着现

---

① 见前引书，第 46 页。"男女主人公一般必须具有年轻美貌、心地善良、高度的自我牺牲和永不动摇的坚定性等特征。"

实主义的根据。一些现实的邪恶图象，比如德国的威胁或阶级的冲突，在争论中都是清晰可见的。对世界的某个方面所作的描绘之所以令人信服，是因为它合乎人们熟悉的一些观念。但当这种意识形态论及不可见的未来和一团乱麻的现在时，很快就会不知不觉地变得难以证实。在描述当前的情形时，人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日常经验的约束。在描述无人体验过的事情时，人们就毫无顾忌了。你或多或少地投入了善恶大决战，但是你在为上帝而战，或许……。先是一个根据流行的标准可谓真实的开端，然后是皆大欢喜的结局。每个极权主义的信徒都会冷酷无情地参与眼前的野蛮暴行，主要是为了享受独裁之后的明媚阳光。战争煽动者也是这样：如果他们是德国人，那么无论在莱茵河东岸还是西岸，他们都不会看到什么地方的人性中还有兽性。这种兽性确实存在。但是胜利之后则是永恒的和平。令人十分悲观的是，大量这种行径都是蓄意的。那些老到的煽动家们深知，虽然必须从一种似是而非的分析入手，但千万不能追根寻底，因为现实政治成就的单调乏味很快就会令人兴致荡然。所以，煽动家们在一个勉强说得过去的开端中就耗尽了人们对现实的兴趣，然后挥舞着天堂通行证煽动人们踏上了漫漫征程。

当流行的虚构把自己和一种迫切需求搅和在一起时，这套规则就会起作用。不过一旦搅和在一起，到了激战时刻，形成了联合体的本来的自我和本来的成见，可能就彻底消失了。

第十二章　重新思考自我利益

一

因此,同一个故事在所有的听众那里都会变得各不相同。由于没有两个人的经历会一模一样,每个人都会从稍有差异的角度接受那个故事,会用自己的方式把故事再现一番,并在其中注入他的情感。有时,一个艺术家令人折服的技巧会迫使我们领略一种与我们自己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是那位艺术家的生活乍看上去却是那么阴郁、可憎或者怪诞。不过这种情形很少见。几乎在每一个引起我们关注的故事中,我们都会成为故事中的一员并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充当其中的角色。这些方式或是细致入微,或是粗糙笨拙,或对故事满怀同情,或是仅仅粗略相似,但却包含了那些由于接受角色而引发的情感。于是,最初的主题在传播中被人们强调、改变或润饰。这就像莎士比亚的一部戏剧,每次演出都由演员和观众改变原作的重点和意义,变成对莎剧的重写。

那些中世纪的英雄传奇在变成白纸黑字的书面故事之前,就曾出现过非常相似的情形。在我们的时代,印刷品上的记录限制了每个个人的想象力的扩张,尽管作用不大。但是对传言的限制却很少,或根本没有限制,而那种原汁原味的故事——无

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就会长出翅膀、犄角、蹄子和嘴巴，仿佛艺术家在利用每一次闲谈进行创作。第一个叙述者的讲述就会让它变形走样。所有听到故事的人都会对它进行编辑修订，把它用作白日梦去四处传播。[1]

其结果是，观众的成分越复杂，对故事的反应差异就越大。这是由于当观众的数量增加时，他们共同使用的词汇数量就会减少。于是故事中的相同成分便愈益抽象。这样的故事没有了自身的精确特性，因为听故事的人们各具特性。他们把自己的特性给了故事。

二

他们不仅由于性别、年龄、种族、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各不相同，而且还会在更粗略的范围内按照个人先天的或习得的个人素质、他的才能、他的职业、他的职业成就、他的职业的侧重面、他的语气时态，或者他在他出场的某个人生游戏舞台上所处的位置，而赋予故事不同的特性。他通过自己的固定模式来接受被几行印刷文字、某些照片、闲闻轶事以及个人生活的偶然经历传达给他的公共事务，并根据自己的情感加以再创造。他不会把他的个人问题当作更大环境中的局部标本，而是把更大环境的故事看作他私生活的模拟放大。

但是，那种私生活未必就是他给自己描绘的那个样子。因为他的私生活中的选择范围很狭窄，自我受到了很多压抑，不为他所知觉，无法直接指导他的外在行为。因此，除了有较多的普

① 这方面有趣的例证，见 C. J. Jung, *Zentralblatt fur Psychoanlyse*, 1911, Vol. I, p. 81。Constance Long 英译 *Analytical Psychology*, Ch. IV。

通人把自己的生活幸福归因于普遍的善意，或者把他们的不幸转化为猜疑和憎恶之外，有些貌似幸福的人在他们的圈子以外却处处残忍，还有些人则越是憎恶家庭、朋友和工作，越是洋溢着对人类的爱。

如果你从一般结论转向具体细节时，这一点就会看得更加清楚：人们处理各自事务的那些特性并非固定不变。或许，各不相同的自我共生在同一树干，有着共同的品质，但是一枝一蔓却都各有千秋。谁也不会用同一种特性去对付所有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特性会由于受到时间和日积月累的记忆的影响而有所变化，因为他不是个机器。他的特性不仅会因时而异，也会因地而异。据说，南洋住着一个孤独的英国人，他每次都要刮了胡子、系上黑领带才吃晚饭。这一传说证明，由于他的直觉和文明熏陶，他害怕失去他已经获得的特性。那些日记、像册、回忆录、旧书信、旧衣物也起着同样作用。这种对一成不变的生活惯例的热爱向我们证明，想两次迈进同一条赫拉克里特河是多么困难。

没有任何一个自我会一直不停地起作用。因此，在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什么样的自我会卷入其中。日本人要求在加利福尼亚定居的权利。很显然，你认为这种要求是为了种植水果还是为了娶个白人的女儿，其结果会大不一样。如果两国为一块领土发生争端，人们是把谈判看作一笔不动产交易，一种使自己丢脸的企图，还是使用往往会给这种争端蒙上阴影的挑衅性激烈语言，把此事当作一场洗劫，这中间都大有差异。因为，我们凭着本能去考虑柠檬或遥远地方时的那个自我，和我们作为暴躁的一家之长——即使是潜在的——考虑问题时所表现出的自我是大不一样的。在一种情形下，进入舆论的个人情感是不冷不热的，在另一种情形下却会热得发红。“自我利

益"决定舆论的说法千真万确，但那只是同义反复，没有什么启发意义，除非我们知道是什么样的自我构成了众多的选择并指引着人们所设想的利益。

宗教学说和大众智慧总是在每个人身上划分出若干种人格。它们被称作高尚的和低下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神性的和世俗的。尽管我们不会完全接受这种分类，但却无法否认，区别是存在的。一个现代人或许能注意到，大量存在的是无法条分缕析的自我，而不是两相独立的自我。也许他会说，神学家们作出的划分是任意的和表面的，因为许多不同的自我只要适合神学家的分类就会被放到一起，称为高尚的自我；但尽管如此，他仍会承认这是观察人性之多样化的一条可靠线索。

我们已学会观察各种各样的自我，但对如何判断它们还有点准备不足。我们知道，我们看到的同一个人会由于不同的境遇而变成另外一个人：他是在同一个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同的人打交道，还是同社会地位比自己高或低的人打交道；他是在同一个可以合法娶进家门的女人做爱，还是同一个根本无法与她结婚的女人做爱；他是在向一个女人求婚，还是把自己当作这个女人的主子；他是在同自己的子女、同伴、最可信任的下属打交道，还是在同决定他成败命运的上司打交道；他是在为生活必需品而挣扎，还是已经取得了成功；他是在同一个友好的陌生人打交道，还是在同一个受他鄙视的陌生人打交道；他是深处险境之中，还是绝对安全；他是独自一人漂泊巴黎，还是住在皮奥里亚市（美国伊利诺斯州中部的城市），与家人团聚。

当然，在性格的前后一致方面，人们的差异很大，大到可以

囊括从吉基尔医生[1]的分裂灵魂到单纯直率的布兰德、帕西发尔[2]或堂吉诃德的程度。如果一个人的各种自我互不相干，我们就不会信任他；如果它们一条道走到黑，过于僵硬，我们就会认为他枯燥、顽固或者怪异。在性格的仓库中，单调贫乏是由于孤独而自足，变化多端则是由于适应性强，这包括了从最高处到最低层的一系列自我，我们希望前者能得到上帝的关注，对后者我们却看都不敢看。一个人在家庭中可以扮演各种角色：父亲，耶和华，暴君；丈夫，主子，大男人；情人，私通者。在职业上也是如此：雇主，老板，剥削者；竞争者，阴谋家，敌手；下属，谄媚者，势利小人。有些人从来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之内。还有些人只在很特殊的环境中才出现过。不过，一个人会由于对他置身其中的环境的感知而形成各种特性。如果他为之敏感的环境碰巧是一群机敏伶俐的人，他就会模仿那些他认为合适的特性。那种特性就会作为他的举止、言谈、气质和偏好的调节器而发挥作用。当人们设想如何适应陌生环境的时候，许多人生喜剧就会发生了：夹在提携人中间的教授，玩扑克牌的教堂执事，乡下的伦敦佬，混在真钻石中的人造宝石。

三

一个人的特性在形成过程中会受到各种不易条分缕析的事物的影响。[3] 对其基本规律进行分析，现在同公元前 5 世纪希

---

① 19 世纪英国小说家 L. 斯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人物，原本善良温厚，因服用自己发明的一种药物而变成凶残狠毒的海德先生。——译注

② 亚瑟王传奇中寻找圣杯的英雄人物。——译注

③ 约瑟夫·贾斯特罗的 *The Psychology of Conviction* 在“性格和气质研究的先驱”一章中对解释性格方面较有价值的早期研究作了一番有趣的概述。

波克拉底时代显得同样可疑，希波克拉底曾归纳出多血质、忧郁质、胆汁质、黏液质等体液说，并把它们归因于血液、黑胆汁、黄胆汁和粘液。最近的理论，比如我们在卡农[1]、阿德勒[2]、肯普夫[3] 等人那里找到的理论，看上去遵循着大体同样的路径，从外在行为和内在意识推演出人体的生理机能。尽管研究技术有了极大的提高，但谁也不大可能声称能够拿出确凿的结论，说可以把我们的天性与教化加以区别，并且从习惯中抽象出天性来。只有约瑟夫·贾斯特罗所说的心理学贫民窟才会把对性格的阐释看作一套固定不变的体系，以供颅相学家、看手相的、算命的、窥探他人心思的人和少数政治学教授运用。你会发现，它断定"中国人喜好色彩，有穹形的眉毛"，而"卡尔美克人的头颅顶端凹陷，侧面看上去这个表达倾向的器官非常庞大；而且，这个民族偷窃成性也是公认的"。[4]

现代心理学家倾向于把成年人的外在行为当作众多变量间的一个方程式，这些变量包括对环境的反抗——而环境压抑着人们在各个成熟期的欲望——和鲜明的人格。[5] 它们促使我们认为，对欲望的压抑和控制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一定会涉及一个人的全部，而是或多或少与他的不同自我有关，尽管我还没有见到对这种看法的系统表述。某人作为一个爱国者，有些事他就不会去做，如果他不认为自己是爱国者，这些事他就会去做。

---

① *Bodily Changes in Pleasure, Pain and Anger*.

② *The Neurotic Constitution*.

③ *The Autonomic Functions and the Personality*; *Psychopathology*。另参阅 Louis Berman, *The Glands Regulating Personality*。

④ 见贾斯特罗的前引书，第 156 页。

⑤ Kempf 的 *Psychopathology*(第 74 页)有如下概述：

> 前青春期受压抑的欲望、青春期受压抑的欲望、此后受压抑的欲望、主要欲望等受到环境的抵制，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构成行为。

毫无疑问，有些欲望或多或少地在一个人的孩提时代就出现了，但在他整个一生中，它们除了隐秘而间接地与其他冲动混合在一起出现以外，就再也没有起过作用。不过这也并非一成不变，因为压抑并非不可解除。社会环境正如心理学家一样，能够使深埋内心的冲动浮上表面。[①] 只有当我们的周围环境保持正常与平和时，只有当我们遇见的人期望我们的行为前后一致时，我们才不会知觉自己的许多天性。当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就会认识到许多过去不认识的自我。

我们的自我是在所有影响着我们的人们的帮助下形成的，它们决定着何种冲动应该如何突出出来，应该指向何处，并与某些典型境遇相适应，因而，我们早就学会了为这些境遇准备合适的态度。面对一种可辨认的经验类型，某种特性就会控制我们全身心的外在表现。比如在公民生活中，残忍的仇恨心态便会受到抑制。即使你气得说不出话来，但作为父母、孩子、雇主、政治家，你也决不会表现出来。你不愿意自己表现出来的人格透着杀气腾腾的仇恨。你会皱皱眉毛了事，而周围的人也会如此。但如果一场战争爆发了，你所喜欢的每个人大多就会开始感到屠杀和仇恨的正当性。起初，这些感情的发泄通道还很狭窄。最显而易见的自我是那种与对故乡的真正热爱相吻合的自我，你可以在鲁珀特·布鲁克那里、在爱德华·格雷爵士 1914 年 8 月 3 日的演讲中、在威尔逊总统 1917 年 4 月 2 日对国会发表的讲话中发现这种情感。战争的现实仍然令人憎恶，而认识战争的

---

① 参阅 Everett Dean Martin 饶有趣味的著作 *The Behavior of Crowds*。另参看霍布斯的《利维坦》第二部分，第 25 章。“说到人们的感情，它们分开来时是温和的，就像一块点燃了的木块的热度；汇集一处就像很多木块，互相燃烧，特别是他们用言辞互相攻击的时候。”

LeBon, *The Crowd* 一书进一步阐述了霍布斯的上述观察。

实际含义却是个逐步的过程。以往的那些战争已成为变形失真的记忆。在那个蜜月阶段，战争的现实主义者们满有理由地相信国人还尚未觉醒，并且相互之间一再认定，说："等着瞧伤亡名单吧。"逐渐地，屠杀的冲动成了主流，所有那些可能调节这一冲动的品格均告瓦解。这一冲动成了核心，被神圣化，并逐渐变得不可控制。它不仅按照对敌人——在战争期间被绝大多数人实际认定的所有敌人——的想象，而且还到一向可憎的所有的人或事或观念那里寻求发泄。仇恨敌人是合法的。其他仇恨心理则通过最粗糙的类比，通过一旦冷静下来我们就会看出最不着边际的类比，来把它们自己合法化。如此强烈的冲动万一放任自流，就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平息。于是，当战争事实上结束了之后，还要花费时间、作出努力去重获自我控制，去处理民间性质的和平问题。

正如赫伯特·克罗利先生所说，现代战争是现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固有产物，但是按照现代社会的理想来说，战争又是不义的。对于平民百姓而言，在战争中是不存在战士们至今仍然具备而骑士们曾经遵循的理想行为模式的。平民眼中无标准，只有他们当中的出类拔萃者才会设法临时抱佛脚。他们所具备的唯一标准就是把战争看成一件可憎的事情。然而，尽管战争可能不可避免，但他们从没接受过为战争做准备的道德训练。唯有他们较高尚的自我才具备某种准则和行为模式，如果他们不得不按照被高尚的自我看作是低下的品质采取行动时，就会产生深刻的精神失调。

为应付所有环境——人们可能不知不觉就发现自己已经置身其中——而进行的品质培养，都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显然，要想获得成效，就要依靠真诚和知识去考察环境。因为，在一个被虚构出来的世界中，我们自己的品质也是虚构的，我们就会举

止失措。因此,道德主义者必须作出选择:要么他必须为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提供一种行为模式,不管有的阶段多么令人反感;要么他必须保证信徒们将来不会遇到他所不赞成的处境。要么必须消灭战争,要么必须教会人们用最节省的心理方法来进行战争;要么必须废除人的经济生活而飨之以幻觉和露水,要么必须研究经济生活的窘况并提供在一个无人可以自给自足的世界中切实可行的行为模式。然而,这些正是流行的道德文化通常拒绝作出的选择。在面对现代社会的极端复杂性时,它的最佳表现是缺乏自信,最糟糕的表现则是提心吊胆。现在,不管道德主义者如何研究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或者社会科学家如何给道德主义者进行培训,都已经无关紧要了。除非每一代人都能学会构造那种用来应付最可能遇上而又必须面对的各种难题的人格,否则就只有毫无准备地步入现代社会。

四

这种天真的自我利益观大都拒不考虑这些问题。它忘记了,自我和利益都是以某种方式产生出来的,而且在极大程度上都是依据惯例产生出来的。自我利益的老生常谈通常完全忽略了认知功能。显然,它强调的是人们最终都会把一切归因于人本身这一事实,它也不是没有注意到,人们对万物、对自我的观念并非与生俱来。它们是后天习得的。

因此,像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10 篇中的说法可能就非常正确:“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业集团以及许多较小的集团,在文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从而使他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驱动。”但是,如果你仔细研读麦迪逊文章的上下文,就会发现某些在我看

来显然是本能决定论的观点,它有时也被称为对历史的经济解释。麦迪逊为联邦宪法进行了辩护,"在联邦的众多利益中",他提出了"联邦的趋势就是削弱和控制分裂狂热"。分裂正是他所忧虑的问题。他把分裂的原因归结为"人性",那里所潜伏的倾向会"根据平民社会的不同环境而造成不同程度的行动。热中于有关宗教和有关政体的不同意见以及其他许多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见解,依附于各种野心勃勃、争权夺利的领袖或者其他各种其财产令人向往的人物,相继把人们分成各种党派,激励着他们相互仇恨,使他们变得更愿意相互折磨和压迫,而不是为了共同利益相互合作。人类相互敌视的倾向如此强烈,在没有充分机会表现出来时,最琐碎、最怪诞的差别都足以煽动起他们不友善的情感和最激烈的冲突。但是造成分裂的最常见而最持久的根源,一向就是对财产的不同与不公平的分配"。

因此,麦迪逊的理论认为,分裂的倾向会被宗教或政治见解、被领袖们、最常见的则是被财产的分配煽动起来。然而,请注意,麦迪逊仅仅指出,人以群分乃是由于他们与财产的关系。他并没有说人的财产和见解有着因果关系,而是说财产的差别是见解差别的原因。麦迪逊观点中的核心字眼是"差别"。从不同的经济存在状况出发,你可以尝试着推断见解上可能会有的差别,但却无法推断这些见解必定会有差别。

这种保留态度从根本上打破了上述理论通常持有的主张。这样的保留态度是必需的,正统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矛盾即为明证。他们辩称,社会进化的下一阶段是现阶段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为了制造出那不可避免的下一阶段,他们需要人们产生"阶级意识"。人们要问了,为什么经济状况没有使每个人都产生出阶级意识呢?答案是,那根本就不可能,仅此而已。因此,社会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对

命运的预见之上这一骄傲的说法也就站不住脚了。它靠的是对人性的假设。[1]

社会主义实践乃是基于这一信念:如果人们在经济上各行其道,那么他们最终就会因此而持有某些观念。毫无疑问,人们往往会相信,或者能被引导着相信,不同的事情本来就不同,比如地主和佃户,雇主和雇工,熟练工和非熟练工,计件或计时工和年薪或月薪收入者,买方和卖方,农场主和中间商,出口商和进口商,债权人和债务人。收入的差别造成了交往和机会方面的深刻差别。正如索尔斯坦·维布伦先生出色展示的那样,[2]在机器旁劳动的人对生活经验的解释不同于手工业者或商人。假如这些就是唯物主义政治观所说的一切,那么这一理论就是舆论的每一位阐释者都必须加以利用的价值巨大的前提。但是他可能会不得不抛弃这种理论,而且不得不始终保持警惕。因为,在试图解释某种公众舆论时,很难看清楚一个人的众多社会关系中的哪一种在影响着一种特定的看法。史密斯的看法来自他作为一位地主、一位进口商、一位铁路股份持有者、一位雇主所面对的问题吗?如果琼斯是个纺织工厂的织工,那么他的见解是来自他老板的态度、来自和新移民的竞争、来自他妻子的杂货铺账单,还是来自刚与某公司签订的合同,而该公司打算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他一辆福特牌轿车和一套住房?不经过专门调查你就无法断定。经济决定论者也无法断定。

一个人的不同经济交往会限制或扩大其见解的范围。但是,哪种交往、以什么形式、根据何种理论,唯物主义政治观却无

---

① 参阅 Thorstein Veblen,“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见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特别是第 413 至 418 页。

② *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力预言。它可以很有把握地预言，如果某人拥有一家工厂，他的那些看上去和该工厂有关的见解就会体现出他的所有权来。但是他作为所有者会如何体现他的所有权，任何经济决定论者本身都不可能给你说清楚。在任何与他作为工厂主有关的问题上，他都不会抱着一套固定不变的见解，在劳工、财产、经营问题上都是如此，更不用说在并不那么直接的问题上了。决定论者能够预言，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场合，这位工厂主都会抵制剥夺他所有权的企图，或者赞成那些在他看来会增加他利润的立法。但是，由于所有权并没有任何魔力能使一位商人知道何种法律可以带来生意兴隆，所以，也就并不存在经济唯物主义描述的那种可以使人人都能预见到该工厂主将会采取长期还是短期、竞争性还是合作性观点的因果链。

如果这一理论真的具备它经常宣称的那种效力，它就真的能使我们未卜先知了，我们可以分析一个民族的经济利益，从而推导出他们必定会做些什么。马克思做过这样的尝试，在对托拉斯进行了出色的猜测之后，却误入了歧途。最初的社会主义试验，并不像他预言的那样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顶点，而是产生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垮台。为什么他错了呢？为什么他最伟大的学生列宁错了呢？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的经济地位会使他不可抗拒地产生一种明确的经济利益观。他们认为，他们自身已经具有了这种明确观念，而他们所熟悉的东西，其余的人类也会学得到。事实证明，一种明确的利益观不仅不可能在每个人那里自动产生，甚至在马克思和列宁本人那里也没有产生。在马克思和列宁写下他们的著作之后，人类的社会行为依然晦暗不明。如果仅靠经济地位就能决定公众舆论的话，事情就不会如此。如果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经济地位不仅应该把人类划分成各个阶级，而且还应为每个阶级提供关于经

济利益的观点和获得这一利益的一贯政策。然而，最确凿无疑的却是，人类的所有阶级在自己的经济利益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全都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困惑之中。[①]

这一点消解了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利益乃是产生于我们对那些利益的变动不居的看法，那么，经济决定论作为解释社会发展进程的万能钥匙也就失效了。该理论假设，人们是能够确定自身的独特利益的，而一旦确定了它，就必定会采取行动去实现它。它还假设，存在着一种特定的阶级利益。这一假设是错误的。人们既可以宽泛也可以狭隘地、既可以自私也可以无私地、既可以不根据任何事实也可以根据某些事实或者很多事实、既可以根据真理也可以根据谬误去设想一种阶级利益。这样一来，马克思解决阶级冲突的方法也就坍塌了。该方法假设，如果全部财产能被共同占有，阶级差异就会消失。这一假设是错误的。财产完全可以被共同占有，然而却不能被设想成一个整体。任何一个人群，一旦不用共产主义方式看待共产主义，就会根据他们的经历划分成阶级。

谈到现存的社会制度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强调财产冲突

---

① 事实上，一旦实验开始，列宁就完全放弃了对政治的唯物主义解释。他在1917年夺取政权时，如果他坚持马克思的理论，就会对自己说：根据马克思的教导，社会主义从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现在我统治的国家只是刚刚发展资本主义……我是个社会主义者，这千真万确，但我是个科学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推进资本主义以便马克思预言的进化可以发生。但列宁没有做任何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不是等待进化发生，而是用意志、暴力和教育来对他的哲学所设想的历史进程表示满不在乎。

我刚刚写完这些内容，列宁便以俄国不具备一种成熟的资本主义所蕴含的必然性为理由而放弃了共产主义。他现在说俄国必须创造资本主义，这就是要创造无产阶级，将来有一天要创造共产主义。这至少和马克思主义教条相一致。但它表明了，在一位决定论者的观念中，决定论是多么地微不足道。

制造了舆论；谈到定义并不明确的工人阶级时，它又忽视了财产冲突是煽动的基础；谈到未来，它想象了一个没有财产冲突、因而也没有舆论冲突的社会。现存社会制度可能比社会主义有更多的实例表明，一个人必须有所失，另一人才能有所得，不过，由于每一种情况下都是此人必有所失而别人才有所得，那么在无数情况下人们就会想象这种冲突乃是由于无知。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你可以消除任何绝对冲突的情况，但每个人对整个事实的认识仍然是片面的，因而仍会产生冲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废除教育、道德或自由的科学，尽管根据严格的唯物主义立场，财产共有应使它们成为多余。如果只靠经济决定论就能决定俄国人民的见解，那么俄国的共产主义者就不会抱着如此百折不挠的热情来宣传他们的信念了。

五

与享乐主义的精打细算一样，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也是错误的决定论的例证。二者都认为，人的天性注定会明智地产生某种行为类型。社会主义者相信，这种天性就是追求一个阶级的经济利益；享乐主义者则相信，它们追求快乐、逃避痛苦。这两种学说都是基于一种朴素的本能观，一种由詹姆斯界定的观点，虽然他进行了彻底修订，[1]认为“这种方式的行动官能会产生某些目标，而这些目标不可预见，在完成过程中也没有事先的教育”。

这种本能活动是否能够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完全体现出

①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II, p.383.

来，乃是大可怀疑的。正如詹姆斯指出的：[①]“在有记忆力的每一种动物身上，每一种本能活动在被重复一次以后，就不再是‘盲目’的了。”不管出生时的资质如何，那些固有的天性从最初的婴儿时期就沉浸在经验之中，这些经验决定着哪些天性会作为行为的动机被唤醒。一如麦克杜格尔先生所说，[②]“把它们发动起来的不仅是对直接刺激其固有天性、使其自然或天生的本能兴奋的那种对象的感知，而且还有这些对象的观念、以及对其他种类对象的感知和这些对象的观念。”[③]

麦克杜格尔先生进一步指出，“唯有天性的核心部分，才能保留自己的独特性质，对所有的个人、对所有能够刺激本能的环境都会作出同样的反应。这种认知过程，以及本能达到目标所引发的实际的身体运动是极为复杂的。”[④] 换言之，人有恐惧的本能，但是，人恐惧的对象和消除恐惧的途径，不是在出生时决定的，而是由经验决定的。

如果没有了这种多变性，那些种类繁多的人类天性就难以想象。但你若想到，人所具有的全部重要倾向，他的欲望，他的爱，他的恨，他的好奇心，他的性欲，他的恐惧，他的好斗性，可以无限制地同各种对象联系起来，把它们当作刺激的来源，也可以用它们来满足自己，这时，人之天性的复杂状态就不是那么难以想象了。而且当你想到，每一代新人是前一代人调控好了的生活方式的偶然的牺牲品，也是前人造就的环境的继承者，那么，

---

①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II，第 390 页。

② *Social Psychology* 导论，第四版，第 31 至 32 页。

③ “关于本能和本能行为的大多数定义都只考虑它们的意动(conative)方面……而忽略了本能的心理过程中的认知和感情方面，这是个常见的错误。”见前引书第 29 页脚注。

④ 见前引书，第 34 页。

可能出现的组合与变化的数量就是非常庞大的。

因为人们渴望特定的事物，为人处世采取某些特定的方式，就断定人类天性压根儿就会有那样的渴望和那样的行为方式，这种猜测决非证据确凿。欲望和行动都是学来的，而另一代人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学法。分析心理学与社会史共同支持了这一结论。心理学证明，特定刺激和特定反应之间的联系，就其本质而言是偶然的。最宽泛意义上的人类学强化了这一观点，它证明了激发人们情感的对象和人们据以认识对象的手段，依时代、地点的变化而永不休止地变化着。

人们始终在追求他们的利益。但他们如何追求却并非命中注定。因此，只要这个星球还能继续维持人类的生命，人就会无休止地研究自身的创造性活力。他不会发布机械行为论的判决。他可能会说——也许他应当说——凡是他认为有益的，他这一生都不会变。但在这样说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生活限定在自己亲眼所见的范围之内，而拒绝那些他能用心灵看见的事物；他会把自己偶然拥有的一种尺度用来衡量什么是有益的。他找不到理由放弃自己最高的期望和松懈自觉的努力，除非他喜欢把未知的事物当作不可知的事物，除非他愿意相信，现在无人知道的事物，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现在还无人学会的事物，将来也不会有人教他学会。

第五部分

公意的形成

第十三章 兴趣的转移

一

下面将要说明的是，每个人对于无形世界的印象都是那么变动不居。触点会变，已经定型的期望值也会变，而变化最微妙的则是被激发起来的兴趣。一个庞大的人群给人留下的生动印象，总的来说就是一堆不可胜数的个人，而且有着难以把握的复杂性。那么，人们的头脑是如何与超出他们视野之外的环境建立起实际联系的呢？对于如此抽象的图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感受，那么民主理论的语言是如何发展出普遍意志的呢？从这种变动不居的混合体中是如何产生出简明而稳定的观念的呢？众所周知的“人民意志”、“国家目标”或“公众舆论”等等事物又是怎样在如此稍纵即逝的偶然意象中形成的呢？

这确实是个大难题，美国驻英大使和其他为数众多的美国人之间在1921年的一场怒气冲冲的争论就证明了这一点。哈威先生在一次英国晚宴的餐桌旁发表讲话，毫不犹豫地向全世界说明了美国人在1917年参战的动机。[1] 按照他的说法，这些动机和威尔逊总统在阐释美国精神时所强调的动机是不一样

---

[1] 《纽约时报》，1921年5月20日。

的。当然,哈威先生或威尔逊先生,或他们两人的批评者或朋友们,或其他什么人,都无法从数量上和质量上了解美国三四千万成年人的内心想法。但是,每个人现在都知道,战争打过了,而且依靠大量的努力打赢了。至于战争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威尔逊、哈威那样的动机以及这两种动机的各种混合物打赢的,就无人知道了。人们应征入伍,奋战厮杀,努力工作,纳税缴款,为一个共同目的作出牺牲,然而却无人能够精确说明是什么动机驱使着每个人做他做的每件事情。一位士兵认为这是一场结束战争的战争,哈威先生告诉他,士兵不要去考虑这种问题。这话毫无用处。抱着这种想法的士兵**想的就是要结束战争**。而另有想法的哈威先生却是**另有**想法。

在同一次讲话中,哈威先生用同样明晰的态度概括了1920年时选民的心思。此举有些鲁莽,而且如果你简单地假设所有投你票的人与你想法一致,那么,这就有欠诚实。计票显示1600万人投票支持共和党,900万人支持民主党。哈威先生说,选民是为支持或反对国联而投票。为了支持这种说法,他可以强调说威尔逊先生要求举行公民投票,可以强调一项不可否认的事实,即民主党和考克斯先生坚持说国联是争论焦点。但是,口头上说国联是争论的焦点并不会把国联真的变成焦点,靠清点投票日的选票,你不能了解人们关于国联问题的真正分歧。比方说,民主党的支持者有900万。你有权利相信所有这些人都是国联的坚定支持者吗?当然没有。因为你对美国政治的了解会告诉你,数以百万计的选民投票是为维护美国南方的现存社会制度,他们一向都这么做,无论他们如何看待国联,都没有用选票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那些想要国联的选民很高兴民主党也支持国联。那些讨厌国联的选民很可能在投票时捂住鼻子。但是南方选民中的这两部分人都投了同样的选票。

共和党人的意见就更加一致些吗？任何人从自己的朋友圈子里挑选出足够的共和党支持者，就能发现他们的见解覆盖的范围很广：从毫不妥协的约翰逊和诺克斯参议员到为国联辩护的胡佛国务卿和首席法官塔弗特。无人能确切地说出有多少人用某种特定的方式对国联感到过同情，也无法说出有多少人在这个问题上让他们的情感左右了自己的投票。如果情感的变化形式数以百计，却只有两种方式来表达，这时便没有什么确定的方式来了解什么才是决定性的组合。参议员博拉在共和党的政纲中发现了一条支持共和党的理由，但是洛威尔校长也会如此。组成共和党的大多数男男女女想法不一，对于共和党获胜，有的认为这能扼杀国联，有的认为这是挽救国联的最切实际的办法，还有人认为这是获得一个经过改良的国联的最稳妥的方式。所有这些选民都和他们自己的愿望、也和其他选民的愿望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这些愿望包括扩大生意，或使工人安分守己，或为了惩罚民主党人而继续进行战争，或为了没有更早一点参战而惩罚他们，或为了摆脱波利森先生，或为了提高小麦的价格，或为了减税，或为了阻止丹尼尔先生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或为了帮助哈定先生做同样的事情。

然而，人们还是作出了某种决定；于是哈定先生住进了白宫。全部选票的最小公分母是民主党下台、共和党上台。在各方矛盾互相抵消之后，这就是能够留下来的唯一因素。但这一因素就足以改变4年的政策了。人们在1920年11月的那天为什么渴望变革，其准确原因没有被记录下来，甚至在个别选民的回忆录中也没有记录。这些原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发展变化并消融在其他原因之中，所以，哈定先生上台后所面对的公众舆论和选他当总统的公众舆论是不一样的。1916年人人都看见的一种舆论和一条特定的行动路线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

联系。威尔逊先生曾高呼他会让我们远离战争，并显然以此当选，但在5个月内就把国家拖入了战争。

因此，普遍意志的作用始终需要加以说明。那些对其飘忽不定的作用有着深刻印象的人们把M.勒庞先生视为预言家，并且喜欢用罗伯特·皮尔爵士所说的“愚蠢、虚弱、偏见、错误的感情、正确的感情、顽固不化和被称为公众舆论的报章宣传的大杂烩”进行概括。还有些人则断定，由于从飘忽不定和杂乱无章的状态中出现了确定不移的目标，那么在国民头顶上的某个地方肯定是有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在起作用。他们乞灵于一种集体之魂，一种民族精神，一种时代精神，它能把秩序加诸于无序的舆论。因为一个群体的成员的感情和想法不会透漏出任何能被简单清晰地加以概括、可以被其中的每个个人作为他们的“公众舆论”的真实表述接受下来的东西，于是，一种超灵似乎就成为必需。

二

但我认为，上述事实可以不必求助于任何超灵的托词就可以解释得更有说服力。毕竟，每一次政治竞选都用上了让想法不一的各色人等一样投票的技巧。例如在1916年，共和党候选人不得不从形形色色的共和党人那里争取共和党的选票。我们来看看休斯先生在获得提名后发表的首次演说。[①] 演说的背景在我们看来仍然非常清楚，足以避免许多解释；问题也不会再引起争议了。候选人说起话来清楚异常，他远离政治多年，没有卷入最近的热点问题。罗斯福、威尔逊或劳合·乔治一类公众领导

① 演说地点为纽约市，卡内基会堂，时为1916年7月31日。

人的那种魔力，那种为追随者的感情越俎代庖的表演天才，他一点也不具备。他的天性和素养使他对政治的这个方面很冷淡。不过他的深思熟虑也让他了解了政治家的技巧。他属于那种只知道如何做某事，却不会完全事必躬亲的人。这种人做教师往往要比做艺术大师更出色，艺术对他们来说主要是第二天性，他们不了解如何应付。常言说，能干的动手，不能干的动口。这话并不像它听起来那样完全是对教师说的。

休斯先生明白眼下的机会至关重要，他细心准备了讲稿。刚从密苏里赶回来的西奥多·罗斯福坐在一间包厢里。剧场里挤满了经历过世界大决战的复员军人，他们怀有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幻灭感。在讲台上和其他包厢里，可以看见1912年的前伪君子和前盗贼们，一望而知，他们健康状况极佳而又满怀伤感。大厅外面则有强势的亲德派和强势的亲协约国派，有来自东部地区及大城市的主战派和中部及偏远西部地区的主和派。会场上弥漫着对墨西哥的强烈同情。人们各执己见，分成了塔夫脱与罗斯福派、亲德与亲协约国派、主战与中立派、赞成干涉与反对干涉墨西哥派，休斯先生则必须从中形成反对民主党的多数。

当然，关于多数人如何看待局势或者有什么样的真知灼见，不是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只是一个领导人使用什么方法把异质的舆论汇集起来以确保进行一次同质的投票。

> 这次**代表**集会是个吉兆。它意味着**重新联合**的力量。
> 它意味着**林肯**的政党的复兴……

着重体是些黏合剂：在这样的演讲中，**林肯**当然与亚伯拉罕·林肯没有任何关系。这只不过是一个成见，通过这个成见就会把环绕着这个名字的虔诚感转移到眼下站在林肯位置上的这位共和党候选人身上。林肯使共和党人、罗斯福领导下的进步党人以及党内当权的保守派想起了分裂之前他们曾有过的共同历

史。至于分裂,就没有人愿意再提了。但它已经发生了,至今仍未弥合。

演讲者必须弥合分裂。1912 年的分裂如今又出现在内政问题上了;1916 年的重新联合,正如罗斯福先生宣称的,是以威尔逊先生在国际事务中的作为所引起的公愤为基础的。但国际事务也是导致冲突的危险根源。这就有必要在讲话的开篇就找到合适的话题,既要忽略 1912 年的老帐,又要避开 1916 年那些充满火药味的冲突。演讲者巧妙地挑出了外交人员任命中的政党分肥制这个话题。"值得称道的民主党人"是个声名狼藉的短语,休斯先生立刻用上了。记录是不可原谅的,休斯先生的抨击毫不迟疑。从逻辑上讲,这是创造一种共同气氛的理想开端。

然后休斯先生转而谈到墨西哥,开头先讲历史回顾。他必须考虑到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情绪,即认为墨西哥的事态正在每况愈下;还有一种同样普遍的情绪,认为战争应该避免;还要考虑到两种主流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威尔逊总统不承认韦尔塔是正确的,另一种则宁要卡兰萨也不要韦尔塔,并主张对二者都进行干涉。韦尔塔是第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

> 毫无疑问,他是事实上的墨西哥政府首脑。

但那些认为韦尔塔是个酒鬼杀人犯的人也必须得到安抚。

> 他是否应该得到承认,是个运用健全的判断力并要按照正确的原则作出决定的问题。

这样,候选人没有说韦尔塔早就应当得到承认,而只说应该运用正确的原则。每个人都信奉正确的原则,当然,每个人也都相信他掌握了这些原则。为了把这个问题弄得更加模糊不清,威尔逊总统的政策被说成是"干涉"。从法律上说也许就是如此,但从该词通常所指的意义上说就不是如此。延伸该词的词义既能涵盖威尔逊总统的所作所为,也能包含那些真正的干涉主义者

的期望，这样一来，两派之间的争议被抹平了。

由于让所有的人都体会到了“韦尔塔”与“干涉”这两个词的所有含义，这位演讲人绕过了两个爆炸性的焦点，一时间被认为胜券更加在握。这位候选人讲述了坦皮科、维拉·克鲁斯、比利亚、圣·伊萨贝尔、哥伦布和卡里札尔的故事。休斯先生真是与众不同，这或者是因为报纸上那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令人不快，或者是因为准确的解释——比如关于坦皮科——过于复杂。这样的履历不会引发任何对立的情感。但候选人最后必须表明一种立场。他的听众在期待着。控告是罗斯福先生提起的。休斯先生愿意接受罗斯福的药方，进行干涉吗？

> 我国没有针对墨西哥的侵略政策。我们没有对她的任何领土要求。我们希望她保持和平、稳定与繁荣。我们应当做好准备，帮助她包扎伤口，免除饥馑和动乱，用一切可行的方式让她得享我们的无私友谊。现任行政当局的作为制造了一些我们必须加以克服的困难。……我们**将必须采取一种新的政策**，一种**坚定不移**和一以贯之的政策，只有通过这种政策我们才能促进持久的**友谊**。

友谊的主题是说给不主张干涉的人听的，“新的政策”与“坚定不移的政策”是说给干涉主义者听的。在这一不大会引起争论的政策清单中，细节被淹没了；在这个问题上，一切都变得朦胧不清。

关于欧洲战争，休斯先生使用了一个机智的准则：

> 我主张毫不退缩地维护美国在陆地和海上的一切权利。

为了理解这种表态在当时的力量，我们必须记住，在中立时期，每一派别是多么相信惟有自己所反对的那些欧洲国家正在侵犯美国的权利。休斯先生似乎在对那些亲协约国的人说：我将会

制服德国。但那些亲德派却坚持认为英国的海军力量正在侵犯我们的大多数权利。这一准则使用了富有象征性的短语"美国的权利"来容纳两种恰恰相反的目标。

但是还有卢西塔尼亚问题[1]。像1912年的分裂一样,这一问题是达成一致意见的难以克服的障碍。

> ……我深信,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没有造成任何美国人的生命损失。

因此,不能达成妥协的问题就应予以抹煞,如果出现了一个并非所有人都希望达成一致的问题,就要假装它并不存在。至于将来美国与欧洲的相互关系,休斯先生闭口不谈。他提不出任何能够让毫不妥协的两派皆大欢喜的说法,而这两派的支持都是他正在争取的。

不用说,发明这一技巧的并非休斯先生,他对它的运用也并非炉火纯青。但他验证了由不同见解组成的公众舆论是如何变得模糊不清的,其含义是如何从五光十色的混合体接近了中间色调的。在以达成表面一致为目的而冲突依旧的场合,向公众发出呼吁时运用愚民政策是屡见不鲜的。在公开辩论中的关键问题上几乎总会出现模糊性,这表明了有人要达到相反的目的。

三

但是,一个模糊的意思怎么会常常有力量把人们深藏于心底的见解统一起来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些见解无论被人们多么深刻地感受着,与他们声称关心的事实都没有持久而强

---

① 卢西塔尼亚,英国的一艘豪华客轮,1915年5月7日被德国潜水艇用鱼雷击沉。——译注

烈的联系。对于不可见的环境，对于墨西哥，对于欧洲战争，尽管我们的感情可能很强烈，但是了解得却很肤浅。唤起感情的最初图景和话语同感情本身的力量根本不是一回事。在我们从未去过的某地，发生的事情处于我们的视觉和听觉以外，对它们的描述——除了在短暂的想象或者幻觉中——就不会也决不可能囊括整个现实。但是，这种描述却能够唤起全部情感，有时比现实所能唤起的情感还多。因为，可以扣动扳机的不止一个刺激因素。

最初扣动扳机的刺激因素或许是心中被书面或口头语言唤起的一系列画面。这些画面很暗淡，难以保持稳定，轮廓和节奏不断波动。这就逐渐开始了一个过程：你知道你对什么产生了感情，却完全不了解对它产生感情的原因。愈益暗淡的画面被其他画面代替，然后又被它们的名称和象征符号所代替。但感情却在继续发展，仍然能被作为替代品的名称和意象唤起。这些替换过程即使在严肃的思考中也会发生，因为，如果有人想比较两种复杂局势的话，他不久就会发现，在心中事无巨细地把握这两种局势会令人疲惫不堪。他会使用名称、符号和样板作为一种速记法。如果他想有所进展的话，他就必须这样做，因为他不可能携带着全部思想负担走过思考过程的每一阶段、每一步骤。但如果他忘记了这些替换和简化过程，他很快就会陷入偏爱词语的状态，开始不顾对象，只谈论名称。到了那时，他就没有办法知道，名称什么时候脱离了最初的对象，变成了与其他对象纠缠在一起的混合物。在充满了偶然性的政治中，防止这样的偷梁换柱更为困难。

因为，从心理学家们所熟知的条件反射角度来看，一种感情并不只和一种想法有关。唤起这种感情的事物无穷无尽，满足这种感情的事物同样无穷无尽。如果感情仅仅受到了模糊而间

接的刺激,并且目标也同样间接,上述说法就尤其真切。你可以把一种感情,比如恐惧,首先与迫在眉睫的危险事物联系起来,然后与该事物的观念联系起来,然后与其他类似于该观念的事物联系起来,如此等等。在某一方面,人类文化的整个结构是刺激和反应的精细产物,其原初的感情接受力始终是个相当固定的核心。毫无疑问,在历史过程中,感情的质量已发生了变化,但是表明了感情的条件作用之特征的速度或精细程度,却没有变化。

人们对于观念的敏感性差异极大。有些人一想到俄国的一个孩子在挨饿,就像亲眼见到一个孩子挨饿一样生动。有些人则几乎不会因为一个疏远的观念而兴奋。在这两者之间还有许多层次。有些人对事实反应迟钝,只有观念能把他唤醒。然而,尽管感情是被观念唤起的,但我们却不会亲自参与到那个场景本身中去以满足我们的感情。某人一想到那位正在挨饿的俄国孩子,就会产生喂他吃饭的愿望。但是被这样唤起的人不可能给那孩子喂饭。他只能把钱交给一个非个人的机构,或者交给一个他称之为胡佛先生的化身。他的钱不会送到那孩子手中,而是去了一般的联合基金,那里可以让大群的孩子有饭吃。正如观念是间接的一样,行动的效果也是间接的。认识是间接的,只有认识的效果是直接的。在上述过程的三个部分中,刺激来自视觉之外的某处,对刺激的反应也是到达视觉之外的某处,只有感情完全存留在人的心中。他对那孩子挨饿只有一个观念,对孩子的救助也只有一个观念,但是他要帮助那孩子这一愿望却是一种真实的体验。感情是直接的,就蕴涵于自身,这就是事情的核心真相。

在这个变化范围内,感情既可以转化为刺激,也可以转化为反应。因此,在具有不同反应倾向的人群中,如果你能找出一个

刺激因素来唤起他们同样的感情，你就可以用它来代替那个最初的刺激因素。比如，一个人厌恶国联，另一个人痛恨威尔逊先生，第三个人惧怕工会，如果你能找到某个象征成为他们共同憎恶的对象，你或许就能把他们团结起来。假设那个象征就是崇美主义。第一个人会把它理解成保持美国的孤立，或者像他可能称呼的，美国的独立；第二个人会把它理解成对一位政治家的排斥，这位政治家与他心目中的美国总统形象相冲突；第三个人会把它理解成号召抵制革命。从字面意义上说，这一象征本身不指任何特定之物，但它几乎可以和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个缘故，它可以成为共同感情的共同纽带，即使那些感情最初是与互不相干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当政党或报纸宣称支持崇美主义、进步主义、法律和秩序、正义、人道时，它们希望的是调和互相冲突的各派的感情，如果没有这些象征，而是邀请各个派别讨论某一具体问题，它们肯定会分道扬镳。如果在这个象征的周围形成了一种联合体，人们的感情就会倾向于在象征下达成一致，而不再挑剔达成一致的条件。我想，使用这些象征性的短语很是便利，在技术上也很恰当。它们不代表具体的观念，而是意味着观念之间的休战或者融合。它们像个战略铁路枢纽，汇聚着许多线路，而不管它们最初始于何处，最终目的地又是哪里。谁抓住了这些能够将目前的公共感情包容起来的象征，谁就控制了制定公共政策的大多数机会。只要某一特定的象征具有联合的力量，那些踌躇满志的派别就会为占有这个象征而争斗。比如，想想林肯的名字，或罗斯福的名字。一个领导人或者一个利益集团，如果能够使自己主宰当前的象征，那就能够主宰当前的局势。当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各个派别都认为该象征代表着现实，但如果这个被代表的现实遭到了过于激烈的滥用，或者以该象征的名义对新

目标进行的抵制过于强烈,可以说,该象征就会破碎。1917年间,“神圣俄国”和“小圣父”的庄严象征就是这样在苦难与战败的冲击下破碎的。

四

俄国崩溃的严重后果在整个战线和所有民族那里都能感受得到。它们直接导向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实验,因为从被战争剧烈搅动起来的各种见解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舆论。“十四点和平纲领”是对所有盟国、敌国、中立国的政府以及所有民族说的。它们试图把一场世界大战中无法估量的主要因素编织在一起。这肯定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这次大战第一次把人类的所有决定性元素全都用来同时思考同样的观念、至少思考同样的观念名称。如果没有电缆、收音机、电报和日报,“十四点和平纲领”的实验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项利用现代通讯手段开始在全世界恢复“共同意识”的尝试。

但我们首先必须考察一下1917年末出现的某些形势。在这个文件最后采取的形式中,所有这些考虑都以某种方式得到了体现。在这一年的夏季和秋季,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人民情绪和战争进程的事件。在7月,俄国人展开了最后一次攻势,结果遭到了惨败,士气低落的过程开始了,这导致了11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此前不久,法国人在香槟省经历了一场几乎是灾难性的惨败,引起了军中的哗变和市民中的失败主义骚动。英国正深受潜艇游击战之苦,在佛兰德战役中也是损失惨重,11月英军在康布雷的败退吓坏了前线的部队和国内的领导人。对战争的极度忧虑在整个西欧蔓延开来。

实际上,极度的痛苦和失望使得松松垮垮的人们不再集中

精力关注公开的战况报道。他们不再关心日常的政府公报，他们的注意力开始迷乱，眼下则是紧盯着他们自己的苦难、他们的政党和阶级的目标，对政府产生了普遍的怨恨。由官方宣传以及由希望、恐惧、仇恨刺激起来的关切和注意力形成的还算完善的感知系统——即所谓士气——正在土崩瓦解。各处的人们都在开始寻找许诺解救他们的新靠山。

他们忽然间看到了一场惊人的大戏。东部战线出现了圣诞节休战，停止了杀戮，停止了喧哗，提出了和平的允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所有心地单纯的人们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媾和是可能的，除了与敌人拚命以外，还有别的方式也能结束这场磨难。人们战战兢兢而又全神贯注地把目光转向了东方。他们问道，为什么不呢？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政治家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我们真的在为他们所说的一切而战吗？也许，不打仗也能达到目的？在审查制度的约束下，这些问题极少能印成铅字，但是，当兰斯多恩爵士说话时，人们从内心作出了反应。早期的战争象征已变成了陈词滥调，丧失了团结人民的力量。在一层面纱掩盖下的巨大分裂正在每个协约国家公开出现。

类似的事态也在中欧发生了。最初的战争冲动已经衰竭；神圣同盟瓦解了。战场上的纵向裂缝还不如正在以种种无法预见的方式到处延伸的横向裂缝来得快。在军事成败尚未可知的时候，战争的道德危机已经降临。这一切，威尔逊总统及其顾问们已经意识到了。当然，他们对于这种形势并非了如指掌，但是我所概述的这些情况他们还是了解的。

他们还知道，各协约国政府被一系列规约束缚住了，这些规约在字面上和精神上都与流行的战争概念背道而驰。当然，巴黎经济会议的各项决议是公共财产，秘密条约的框架内容在

1917年11月被布尔什维克公布。[1] 各国人民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了它们的条款，但却毫不含糊地相信，这些条款与民族自决、不吞并领土、不要赔款等等理想化口号是不一致的。公众以这样的质询表达了他们的疑惑：阿尔萨斯—洛林或达尔马提亚值不值得用成千上万英国人的性命去换，波兰或美索不达米亚又能值多少法国人的性命。这些疑惑在美国完全不为人知。由于拒绝参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协约国的全部目标统统陷入了被动。

这里有一种极其敏感的心态，任何称职的领导人都不会失而不察。理想的反应理应是协约国联合行动。但10月份召开的协约国会议证明，要想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12月，压力已经变得非常巨大，乔治先生和威尔逊先生独自行动起来作出了某些反应。总统采取的方式是发表了一个十四点和平纲领。其中不少内容都体现了一种确保无懈可击的技巧，立刻就使人觉得这是一个讲求实效的文件。使用"和平方案"而不是"战争目标"的说法，是因为必须要确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替代物。它们的意图就是用世界范围的公开辩论这样一种更加壮观的场面取代俄—德谈判的场面，以此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一旦激发起世界的关注，就必须把这种关注统一起来，让它能够灵活应对目前局势中所包含的任何不同的可能性。方案必须使协约国的大多数觉得它理应如此。必须满足每个民族的民

---

① 威尔逊总统在与参议员的会谈中说，他在到达巴黎以前从未听说过秘密协定的事。这一说法令人迷惑不解。正像文本显示的那样，不了解秘密协定，"十四点和平纲领"就无法制定出来。当总统和豪斯上校准备供最后发表使用的"十四点和平纲领"文本时，秘密协定的主要内容就放在他的面前。

族抱负，但又必须限制这些抱负，以使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觉得自己成了别人的工具。还必须满足官方的利益以免造成官方的分裂，同时又必须合乎一般人的想法以防士气继续跌落。简言之，必须保持和加强协约国的团结，假如战争还要打下去的话。

但它们也必须是一些能够争取到和平的条款，这样，万一德国的中间派和左派由于时机成熟而采取行动，就可以有根有据地对统治阶级施以沉重打击。因此，这些条款必须推动协约国的统治者更接近他们的人民，把德国的统治者从他们的人民那里赶得远远的，在协约国、非政府的德国人、附属的奥匈诸民族之间开辟一条达成共识的路线。十四点和平纲领是个大胆的尝试，它提出了一项几乎人人都可以进行修补的标准。如果敌对民族中有足够数量的人民做好了接受的准备，和平就指日可待；如果不是这样，协约国也能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以承受战争的冲击。

所有这些考虑都纳入了十四点和平纲领。没有一个人能把它们全都铭记在心，但是所有的人都记住了其中的某些内容。让我们根据这个背景来审视一下文件的某些方面。前五点和第十四点谈的是"开放外交"、"航海自由"、"贸易机会平等"、"裁减军备"，不进行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兼并，成立国际联盟。这些内容可以说就是当时人人都会表示信奉的一般原则。但第三点比较特殊一些，有意识地直接针对着巴黎经济会议的决议，意在免除德国人民对经济停滞的恐惧。

第六点是涉及一个特定国家的第一点，意在回答俄国人对协约国的猜疑，其雄辩的承诺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戏剧效果交相辉映。第七点谈比利时问题，形式和目的实际上都能获得全世界——包括中欧大部分国家——的无条件信服。我们必须在第八点上稍做停留。它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要求撤出并

恢复法国的领土，继而谈到阿尔萨斯—洛林问题。这一条的措辞最完备地展示了一项必须把极为复杂的各方利益压缩到有限词语之中的公开声明的特点。“普鲁士1871年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对法国的错误做法，使得近50年来的世界和平始终悬而未决，这个错误应该得到纠正……”这里的每个字眼都是细致入微地斟酌出来的。错误行为应该得到纠正；为什么不说阿尔萨斯—洛林应被归还呢？之所以没有这么说，是因为拿不准假如提交公民表决的话，全体法国人**当时**还愿不愿意为了重新夺回领土而坚定不移地打下去；还因为对英国人和意大利人是否愿意打下去更没有把握。所以，这个说法乃是考虑到了两种可能性。“纠正”一词准能使法国人满意，但读起来并不像一种简单的吞并行为。但为什么提到**普鲁士**在1871年的错误做法呢？无疑，普鲁士一词意在提醒南部德国人，阿尔萨斯—洛林并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普鲁士。为什么提到和平在“50年”中悬而未决、并使用了“1871年”呢？首先，让法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忘不了的就是1871年。那是它们怨忿情绪的结点。但十四点纲领的阐释者们知道，法国当局打算得到比1871年的阿尔萨斯—洛林更多的地方。在1916年沙皇大臣和法国官员交换的秘密备忘录中囊括了吞并萨尔谷地和某种程度上肢解莱茵河地区的要求。计划要把萨尔谷地包括在“阿尔萨斯—洛林”的名下，因为萨尔谷地在1814年曾是阿尔萨斯—洛林的一部分，尽管它在1815年被分离出去，在普法战争结束时，就不属于这一地区了。法国为了吞并萨尔而把它纳入“阿尔萨斯—洛林”名下，这个正式的说法指的就是1814—1815年间的阿尔萨斯—洛林。总统强调“1871年”，实际上是在划定德法两国的最后边界，这是暗指秘密条约，同时又把它抛在一边。

第九点则没有多少玄机，它为意大利做了同样的事情。“明

确公认的国界"恰恰是《伦敦条约》划定的边界所没有的。那些边界部分是战略边界，部分是经济边界，部分是帝国主义边界，部分是种族边界。唯一可能获得协约国同情的是它收回那些真正属于意大利而被别国占领的土地。其余的部分，正如每个见多识广的人士都明白的，只是延缓了迫在眉睫的南斯拉夫人的起义。

五

从表面上看，十四点纲领受到了一致热烈的欢迎，但要认为这说明人们对一个方案达成了共识，那就错了。每个人似乎都找到了他喜欢的东西，并强调了这个方面或那个细节。但是，没有人敢冒险展开讨论。这些蕴含着文明世界潜在冲突的措辞被接受了下来。它们代表着互相对立的观念，却唤起了一种共同的感情。可以说，它们在西方各民族不得不忍受战争中令人绝望的最后10个月的日子里，在一定程度上振奋了他们的精神。

只要十四点纲领谈论的是苦难即将过去之后的那个朦朦胧胧的幸福未来，在对它们进行解释时就不会出现真正的冲突。它们打算设计一个完全不可见的环境，因为这些计划鼓舞了所有各怀隐衷的群体，于是所有的希望便汇成了一种共同的希望。正如我们在休斯先生的演讲中看到的那样，和谐一致就是一个由各种象征组成的等级体系。当你为了包容越来越多的派别而拾级上升时，有一段时间你可能会失去思想能力而保留了感情上的联系。但即使感情也会变得愈益稀薄。当远离了经验时，你就会上升到更加概括和朦胧的境界。当你乘坐气球升到空中时，你会把越来越多的具体对象弃之不顾，而当你怀着"人类的权利"(Rights of Humanity)或"稳步走向民主的世界"等等短语

到达顶点时，你会看得既远且广，但看见的东西却少而又少。不过，那些感情被激发起来的人们并不总是被动的。当公开的呼吁变得越来越能让所有的人各取所需，当感情被搅动起来而含义却五花八门时，它们那些非常个人化的含义就被赋予了普遍的适用性。凡是你严重匮乏的，都是缺乏人类的权利造成的。因为，这个词组越空洞，就越能指称几乎任何事情，很快就会变得能够指称差不多万事万物。威尔逊先生的短语被地球每个角落的人们用数不清的不同方式理解着。没有任何经过协商、由公认的档案产生的文件来澄清这些混乱。① 于是，到了否极泰来之时，几乎有多少人就会怀有多少种期望。条约的欧洲作者们有了巨大的选择机会，他们选择的是要去兑现那些在国内行使着极大权力的同胞们所怀抱的期望。

他们顺着这个等级体系往下走，从人类的权利下降到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权利。他们没有放弃使用象征。他们只放弃了那些战争结束后便在选民的想象中失去了永久根基的象征。他们利用象征体系维护了法国的统一，但不会为了欧洲的统一去冒任何风险。法国的象征深入人心，而欧洲的象征只有短暂历史。然而，在欧洲这样的载体和法国这样的象征之间的区别并不那么截然分明。各个国家与帝国的历史显示，既有统一观念越来越膨胀的时代，也有它不断萎缩的时代。我们不能说，人们在持续不断地从小型的忠诚转向大型的忠诚，因为事实将不会证明这一说法。罗马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比 19 世纪的民族统一体膨胀得有过之无不及，"世界政府"的信奉者们便据此进行类比。不过，正确的说法或许是，不管各个帝国一时间如

① 只是到了停战前夕，美国才向协约国政治家们作出了对十四点纲领的解释。

何热胀冷缩,真正的融合已经得到了增强。

六

毫无疑问,这种真正的融合已经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了。1789年以前的10年间,绝大多数人似乎都觉得他们的州和他们的共同体才是真实的,而州的联盟是不真实的。他们州的观念,州的旗帜,州的著名领袖,或无论什么能代表马萨诸塞或者弗吉尼亚的事物,便是名副其实的象征。也就是说,来自儿童时代、职业、居住地等等的实际经历哺育了他们。人们的经验范畴极少越过他们想象中的州界。弗吉尼亚一词几乎能和绝大多数弗吉尼亚人所熟悉或感受到的一切联系在一起。这是和他们的经验真正联系着的最宽泛的政治观念了。

他们的经验并不等于他们的需求。因为,他们的需求产生于他们的现实环境,而那个年代的环境至少有13个殖民地那么大。他们需要一种共同防御。他们需要一个像邦联那样宽泛的财政与经济体制。但是,只要州的拟环境(pseudo-environment)还在包围着他们,州的象征就会耗尽他们的全部政治关切。像邦联那样的州际关系的观念只是一种无力的抽象。那是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象征,由这个载体产生出来的各行其是的群体之间的和谐将会稍纵即逝。

我已指出,邦联的观念是一种无力的抽象,然而,在美国宪法被正式通过前的10年间,统一的需要就存在了。说存在着这种需要,意思是如果不把统一的需要考虑在内,事情就会出麻烦。各殖民地的某些阶层开始逐渐突破这种州界的经验。他们的自身利益使他们跨越州界进入了州际经验,他们心中逐渐构想出一幅真正全国规模的美国环境画面。对他们来说,联邦的

观念成为一个真实的象征，而不再是一个载体。这些人中，最具想象力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碰巧的是，他和任何一个州都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的感情，因为他生于西印度群岛，而且他的活跃的一生从一开始就和所有各州的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在弗吉尼亚还是在费拉德尔菲亚建都就成了极为重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头脑仍是地区性头脑。对汉密尔顿来说，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感情上的重要性；他希望的是有人来承担那个州的债务，因为这些债务会使拟议中的联盟进一步全国化。所以他很高兴用首都的选址从波托马克河地区的代表手上换回了两张必需的选票。对汉密尔顿来说，这个联盟是代表他的全部关切和经验的象征；对来自波托马克河地区的怀特和李来说，他们州的这个象征就是他们为之服务的最高政治实体，尽管他们憎恨付出这种代价，但仍为之效力。杰弗逊说，他们同意改变选票，“怀特满怀厌恶，胃部几乎痉挛。”①

在一种共同意志的形成过程中，总会有一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发挥作用。

① *Works*, Vol. IX, p. 87. Cited by Beard, *Economic Origins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 p. 172.

第十四章　是　或　不

一

象征常常具有很大的用处和神奇的力量，词语本身就能释放出不可思议的魔力。一想到象征，人们总会兴致勃勃地谈论它们，宛如它们有着独立的力量。而且，那些曾经令人神魂颠倒的象征，从没有完全失去对人们的影响。博物馆里和民俗书籍中充满了各种已经死亡的标志和符咒，因为象征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除非通过人的头脑去联想一番。那些失去力量的象征，以及不断证明没有深入人心的象征，都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去详细研究一个象征的流行过程，就会看到一部纯世俗的历史。

在休斯的竞选演说中，在十四点和平纲领中，在汉密尔顿的蓝图中，全都运用了象征。但是，它们都是由某个人在某个特定时刻运用的。词语本身并不会把散乱的情感凝聚起来。词语必须由居于战略地位的人士说出来，而且必须在恰到好处的那一刻说出来，否则就不过是一阵风而已。象征必须被打上标记。因为象征本身不特指任何事物，可供选择的象征总是数量众多，如果我们面对竞相吸引我们注意力的象征时完全犹豫不决，就会像那头等距离站在两捆干草之间的驴子一样，最后饥饿而死。

比如，下面列出的是1920年大选前夕某些平民写给一家报纸的投票理由。

支持哈定的理由：

今天投票支持哈定和库里奇的爱国男女，将被后人看作签署了我们的“第二份独立宣言”。

——投资商威尔蒙特先生

他会保证使美国不参加“麻烦的联盟”。把政府的控制权从民主党手中转向共和党，华盛顿作为一个城市将从中获益。

——商人克莱伦斯先生

支持考克斯的理由：

美国人民认识到，加入国联是我们在法国战场上保证履行的义务。我们必须肩负起我们在全世界实现和平的那份责任。

——速记员玛丽小姐

如果我们在获得国际和平时拒绝进入国联，我们就将丧失我们的自尊和其他国家的尊敬。

——统计学家斯宾塞先生

两套说辞同样崇高，同样真实，几乎是可逆的。克莱伦斯和威尔蒙特能够在哪怕一瞬间承认他们想背弃我们在法国战场上保证承担的义务、或者承认他们不向往世界和平吗？当然不会。玛丽和斯宾塞能够承认他们赞成加入一个麻烦的联盟或者放弃美国的独立吗？他们会和你争辩说，正如威尔逊总统认为的那样，国联既是个消除麻烦的联盟，又是个全世界的独立宣言，另外还是本星球的门罗主义。

二

既然象征的供应非常丰富，可以加诸其上的意义又非常灵活，那么，一种特定的象征如何能在特定的人们心中扎下根来呢？它是由我们公认的权威人物播种在我们心中的。如果它种得很深，以后我们就会把对着我们挥动该象征的人叫做权威人士。但首先，象征之所以合我们的意，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把象征传达给我们的人是合我们意的重要人物。

我们不是在 18 岁时抱着现实主义的想象从一个鸡蛋中破壳而出的；正如萧伯纳先生所说，我们还处在波格和鲁宾的时代，未成年时候的交往还要依靠年长者。所以，我们要通过某些敬爱的权威人物与外部世界进行联系。他们是通向无形世界的第一座桥梁。尽管我们能够逐步地自主把握大环境的许多片段，但总是有一个更为深远的环境不为我们所知。对此，我们仍然需要通过权威来与之发生关系。凡是我们不能亲眼目睹全部真相的地方，不管是对它的真实报道还是貌似有理的谬误，读着、听着、觉着都一样。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少数问题以外，我们无法确定哪些陈述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于是我们就在值得信任和不值得信任的报道者之间进行选择。[①]

从理论上说，我们在每个问题上都应选择最好的专家。不过，虽然选择专家比选择事实真相容易些，但也仍然极为困难，经常行不通。专家本身也根本拿不准他们当中谁是最专的专家。而且，即使我们能够确认了那样的专家，他也很可能会过于

① 见 George Cornewall Lewis 那本饶有趣味而又怪异的旧著：*An Essay on the Influence of Authority in Matters of Opinion*。

忙碌而无暇释疑解惑，或者根本就够不着他。但有些人，我们非常轻而易举地就能产生认同，因为他们是些一有事就会一马当先的人。父母、教师、刚愎自用的朋友，是我们最早遇到的这类人物。至于为什么孩子信任父母中的这一位而不是另一位，信任历史教师而不是主日学校的教师，我们没有必要去探讨这个难题。我们也无需探讨我们是如何通过一份报纸或者一个关心公共事务的熟人而逐渐对那些社会名流产生了信任的。精神分析学的文献提出了大量具有启发性的假设。

无论如何，我们发现我们对某些人产生了信任，他们充当了我们与几乎全部未知事物相联结的手段。非常奇怪的是，这个面子有时被认为天生就应当丢，是我们天生就像绵羊加类人猿的证据。但是，彻底独立于天地之间是绝对不可想象的。我们几乎对于任何事情都会产生看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把任何看法视为理所当然，那就会在极为平庸的状态中了此一生。一个成年人最接近于彻底独立的做法就是当个隐士，而隐士的活动范围是非常狭窄的。他的活动完全是自顾自，只能在微不足道的半径内从事目的非常简单的活动。如果他还有时间思考重大问题，我们就可以断定，他在当隐士之前无疑已经接受了煞费苦心得来的大量信息，比如怎样保暖、怎样免于挨饿，以及那些重大问题是什么。

除了我们生活中极少数转瞬即逝的问题以外，我们在所有问题上能够做到的最大独立就是大力增加能让我们恭恭敬敬聆听其高见的权威的数量。作为天生的外行，我们对真理的追求就在于刺激专家并迫使他们对任何信誓旦旦的异端邪说作出反应。在这样的争论中，我们通常都要去判断谁赢得了雄辩的胜利，但是，如果争论者都没有对某个错误假设提出置疑，或者他们都没有把某个被忽略的方面纳入自己的论点，我们事实上也毫无对策。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民主理论是如何从相反的假设

出发继续前进，并且假设有着无数自给自足的个人可供满足这种政体的目的。

我们赖以接触外部世界的那些人都是一些管理这个世界的人。也许他们管理的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① 护士喂小孩吃饭，给他洗澡，把他放到床上睡觉。这些不能使护士成为一位物理学、动物学和圣经考据学的权威。史密斯先生掌管着或至少雇佣着工厂经营者。这不会使他成为一位美国宪法权威或者福德尼关税(Fordney tariff)的权威。斯穆特先生负责犹他州的共和党。这本身不能证明他就是解答税制问题的最佳人选。但是，那位护士可以暂时决定小孩该学什么样的动物学，史密斯先生在美国宪法对他的妻子、秘书、甚至他的牧师具有什么意义这一问题上有很多话可说，而且，谁来规定参议员斯穆特的权限范围呢？

神甫、庄园主、首领与国王、党魁、商人、老板，不管这些人是如何挑选出来的，不管是通过出身、继承、征服还是竞选，他们和他们的手下人掌管着人类事务。他们是些官员，尽管同一个人可能是家里的元帅、办公室里的少尉、政治上低贱的列兵，尽管在许多机构中，身分等级很模糊或者很隐蔽，但在每一个要求众人相互合作的机构中，有些这类的等级制仍然存在。② 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我们把它称为机器，或者"组织"。

三

在这部机器的成员和平民百姓之间存在许多重要的区别。

① 参阅 Bryce, *Modern Democracies*, Vol. II, pp. 544—545。

② 参阅 M. Ostrogorski, *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R.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以及 Bryce, *Modern Democracies*, 特别是第 75 章；另见 Ross,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第 22—24 章。

领袖、程序委员会以及核心集团，与他们的外部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当然，他们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应该如何定义那个外部环境，但他们并非完全在和抽象事物打交道。他们希望看到某些特定的人物当选，希望看到某些特定的资产负债表得到改善，希望某些具体目标如愿以偿。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摆脱了对成见的嗜好。他们的成见往往会把他们变成愚蠢的墨守陈规者。但不管他们有什么局限，那些首脑人物与更大环境的关键要素始终保持着实际的接触。他们作出决定。他们发布命令。他们讨价还价。某些事情也许根本不是按照他们想象的那样实际发生了。

他们的下属们并不是怀着共同信念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一部机器的次要成员并不是根据对领袖智慧的独立判断来决定他们的忠诚。在这个等级体系中，每个人都仰赖于一个上司，同时又是某个仰赖于他的等级的上司。把机器联成整体的是一套特权制度。这些制度可能会随着追求特权者的机会和口味而变化，从裙带关系和全面庇护到小集团的英雄崇拜或者某个固定观念。它们从军队中的军阶经由封建制度下的土地和效忠变成了现代民主制度下的职业和名声。这就是你能通过废除特权来打碎一部机器的原因。但我相信，在每个紧凑的集团中，这样的机器必定会重新出现。因为特权是完全相对的，一体均沾是不可能的。你可以竭尽全力想象一下最绝对的共产主义，那里没有一个人占有的对象不被他人所占有。如果共产主义团体不得不采取任何一种行动，如果某人将发表演说以保证获得大多数选票，我相信，纯粹以成为此人的朋友为乐就足以在他周围形成一个内部人组织。

假托一种集体智慧去解释为什么一个团体形成的判断往往比一个路人的评论更连贯、更真实，这毫无必要。一个人或少数

几个人的头脑是可以进行思想训练的，但是当一个团体要想一起思考时，它所能做的不过是表示同意还是不同意。一种等级体系的成员会形成一种合作的传统。他们做徒弟时从师傅那里学手艺，师傅们做学徒时也同样如此，在任何持久存在的社会中，进行统治的等级体系内部，其人员变更非常缓慢，足以让某些重大成见和行为模式代代相传。某些观察与行为方式就是由父亲教给儿子、教士教给信徒、老兵教给新兵的。这些方式会变得人所共知，并被广大局外人所公认。

四

只是远远地看一下这样的场面就足以令人着迷了：无需一个由少数人操纵的核心机构，也会有那么多人在任何复杂事务中相互合作。布赖斯说："在立法和行政机构有了几年的处事经验后，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到，统治这个世界的人是多么屈指可数。"① 当然，他是指国家事务。如果你考虑到全部的人类事务，那么统治者的数量肯定会相当可观。但如果你只是考虑一个特定的机构，比如一个立法机构、一个政党、一个工会、一个全国性运动、一个工厂或者一个俱乐部，那么实际的统治者就远远少于理论上假设的统治者数量。

一边倒的胜利会关掉一部机器而开动起另一部；革命有时则是彻底捣毁一部机器。民主革命装配了两部轮流运转的机器，每一部都会有几年的时间从另一部犯下的错误中收获着利益。但机器从不会消失。没有哪个地方能够实现牧歌式的民主理论。毫无疑问，工会、社会党或共产党政府也不可能实现。总

① 见前引书，第 2 卷，第 542 页。

是有一个内部人的圈子，周围环绕着一些向心圈，它们渐行渐弱，直到消融在对它们漠不关心或者无动于衷的平民百姓之中。

民主主义者从没有向团体生活的这种陈规陋习让过步。他们一律将其视为反常。因为存在着两种民主观：一种以自给自足的个人为前提，另一种则以统领万物的超灵为前提。其中的超灵还是有些益处的，因为它至少承认，大众作出的决定并非自发地产生于每个成员心中。但如果我们聚精会神地观察一下这部机器的话，把超灵当作统摄共同行为的力量就是一种多余的故弄玄虚。这部机器是个非常平凡的现实。它由穿着衣服、住在房子里的人们组成，这些人有名有姓、活灵活现。他们履行着通常被指定给超灵的所有职责。

五

需要这部机器并不是由于人性的邪恶。从任何团体的门户之见中都不可能单独产生出共同观念。对于那种遥不可及的局势，大众能够采取直接行动的方式是有限的。他们中的有些人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移民出境，他们会罢工或抵制外货，他们会鼓掌喝彩或发出嘘声。通过这些方式，他们有时能抵制他们不喜欢的事情，或胁迫那些阻碍了他们愿望的人。但是，依靠群众行动却不可能构思、筹划、协商或实施任何事情。这样一个公众，如果没有有组织的等级体系，它可以聚集起来，可以因为价格太高而拒绝购买商品，可以因为工资太低而拒绝做工。一个工会可以通过罢工中的群众行动打击对立面以便工会官员进行谈判。比如它可以争得联合管理的权利。但除非通过一个组织，它不可能行使这种权利。一个国家可以万众喧嚣、吵吵闹闹地要求战争，但如果投入了战争，就必须听从总参谋部的命

令了。

直接行动的极限就是人人都在某个呈现在大众面前的争端中出于各自的实际目的而说"是"或者说"不"的权力。① 因为，只有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一个争端才能以同样的方式自发地、几乎同时呈现在公众的全体成员面前。有些未经组织的罢工和抵制外货，不仅在产业界，在其他各界也有，其愤懑之情非常强烈，即使没有领导也会在很多人身上产生同样的反应。但即使在这些简单的情况下，也会有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比其他人行动得更迅速，他们会成为临时领袖。当领袖没有出现时，群众就会漫无目的地到处乱转，各怀心思茫然无措，或者听天由命袖手旁观，就像有一天50个人凑在一起观看一个人自杀。

视线之外的世界能够给我们留下的绝大多数印象，乃是一出在幻想中上演的哑剧。我们很少有意识地对超出我们目力的事件作出什么决定，而且每个人能够去落实的决定都是不足挂齿的，假如他还打算去落实的话。我们难得碰上实际的争端，因此没有养成作出重大决定的习惯。如果我们所接受的绝大多数信息没有暗示我们应当如何感受新闻，这一点恐怕会更明显。我们需要那种暗示，如果没有在新闻中找到它，我们就会转向社论和值得信赖的顾问。如果我们感到自己卷入了其中，那种幻想就会不舒服，直到我们确定了自己的立场，也就是说，直到事实被加以概括，我们认为能够对它们说"是"或者说"不"的时候，这种感觉才会消除。

当许多人全都说"是"的时候，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

① 参阅 James, *Some Problems of Philosophy*，第227页。"但对我们大多数紧急情况而言，分成一部分一部分的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我们很少能在分裂的状态下采取行动。"

参阅 Lowell, *Public Opinion and Popular Government*，第91，92页。

他们一般都会有这些理由。我们已经谈到，他们心中的画面以各种微妙而隐秘的方式变化着。但这种微妙性存在于他们心中；它由很多象征性词语公开表现出来，这些词语携带着抽空了绝大多数词义后的个人感情。然后，那个等级体系，或者假如有一场竞争，这两个等级体系就会把这些象征和一种明确的行动、一次"是"或"否"的投票、一种赞成或反对的态度联系起来。史密斯反对国联，琼斯反对第十款，布朗反对威尔逊先生及其全部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他们全都以差不多同样的象征性短语的名义，通过投票支持共和党来表示反对民主党。一种共同意志就这样表达了出来。

必须提出一项具体的选择，必须通过象征来转移人们的兴趣，使这项选择与个人见解联系起来。职业政治家早就比民主哲学家懂得了这一点。于是他们组织了秘密会议(caucus)、候选人提名大会、程序委员会，作为提出一项明确选择的手段。任何人想要通过许许多多的人们合作而成事，都会步其后尘。有时这事做得相当冷酷，比如和会缩减成十人委员会，十人委员会又缩减成三四个巨头，他们起草条约，让弱小盟国、选民和敌人接受或拒绝。通常也有可能做到更多的相互协商。但基本事实始终是，少数领导人把一项选择出示给一大帮人。

六

滥用程序委员会导致了诸如公民创制权、公民复决、直接预选等等各种各样的建议。但这些仅仅是把选举——或如 H. G. 威尔斯谨慎而准确的说法：选拔——弄得复杂化而延缓或者模糊了一部机器的需要。不管能够拉来多大规模的选票，都不会消除制造争端让选民去说"是"或者说"不"这种需要，无论这个

争端是一项议案还是一位候选人。事实上，不存在诸如“直接立法”之类的事情。在那些据说存在这种事情的地方，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公民到投票站去，接过一张选票，上面印着一连串几乎总是以缩略形式出现的议案。若他有话可说，那就说“是”或者“不”。他可能会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英明的修正案。他会投票赞成这项议案而反对另一项。如果你把这叫做立法，那就是在对英语施暴。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样做毫无益处，不管你怎么称呼这一过程。我想，就某些问题而言，这种做法有些非同寻常的好处。但是，考虑到世界的复杂性无法避免，公众的决定要在这样的世界中付诸实施，他们作出的任何决定就有必要简单明了。这是极其重要的事实。我认为，人们所能设想出的最复杂的投票形式就是选择投票制。在这种制度下，选民从列出的诸多候选人中间排定自己的选择次序，而不是赞成一位反对其他。但即使这里有了极大的灵活性，公众的行动仍然取决于别人提供的选项的质量。[1] 而全部选项都由那些乐此不疲的小圈子提供，他们四处奔忙，摇唇鼓舌，想方设法笼络代表。**少数人**提名之后，**多数人**才能投票选举。

① 参阅 H. J. Laski, *Foundations of Sovereignty*, p. 224:“比例代表制”。

第十五章　领袖与平民

一

由于象征具有非凡的现实重要性，没有任何一位成功的领袖会忙得顾不上培育那些能把他的追随者组织起来的象征。特权在等级体系内部发挥的作用，就是象征在平民当中发挥的作用。它们维持着统一。从图腾柱到国旗，从木制偶像到上帝这位不可见的国王，从魔幻词语到某些经过稀释的亚当·斯密或边沁言论，象征一直受到领袖们的呵护，但他们许多人自己是不轻信的，因为那是些淹没分歧的焦点。超然的旁观者或许会嘲笑卫护着星条旗这一象征的“星条旗”仪式，大概就像那位自言自语地说巴黎只有寥寥民众的国王差不多。但是领袖从经验中得知，只有当象征发挥了作用时，他才有了推动群众前进的可乘之机。象征所包含的感情会向着共同的目标倾泻，而真实观念的特性则被抹煞了。无怪乎他会憎恶他所谓的破坏性批评，而落拓不羁的人士有时把这种批评叫做清理废话。巴格霍特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王权应该受到崇敬，一旦你开始对它追根究底，就不会再崇敬它了。”[1]用明确的定义和直来直去的说法追

---

①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p. 127. D. Appleton & Company, 1914.

根究底，有利于人所共知的一切高尚目的，但却无助于轻而易举地保护一种共同意志。正如每个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认为的那样，追根究底很容易打断个人意志向公共象征的情感转移。他会言之凿凿地指出，这样做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出现个人主义的混乱状态和争斗不已的小宗派。一种象征——比如“神圣俄罗斯”或者“铁汉迪亚斯”①——的解体，永远都是长期动荡的开端。

通过移情作用，这些伟大的象征拥有了一个古老而稳定的社会中所有细致入微的忠诚感。它们激发起每个个人对风光、家具、面容、记忆的感情，这些是他最重要的现实，在一个停滞的社会中，还是他唯一的现实。他的意象和忠诚的核心是其民族性，如果没有这些意象和忠诚，他就会感到自己不可思议。伟大的象征囊括了这些忠诚，而且不用召唤那些原始意象就能唤起忠诚。公开论战中的较小象征，比较随意的政治饶舌，总是要回过头去求助于那些原始象征，如果可能的话，就和它们联系起来。城市地铁的适当收费问题被用来象征“人民”与“利益集团”之间的争端，然后人民被嵌入“美国”这一象征，终于，在竞选运动的高潮，8 美分的票价变成了反美行径。那些革命前辈们从未打算阻止它。

因为有力量从截然不同的观念中抽取情感，象征既是一种团结的技巧，又是一种宣传的手段。它能够使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但是，正因为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的少数人必须选择具体的对象，所以，象征也是一种能被少数人用来扩张势力

---

① Diaz(1830—1915)，墨西哥将军，独裁者。1876 年发动叛乱，自任临时总统。1877 年至 1911 年，6 次连任总统。1911 年在群众反对下辞职，1915 年死于巴黎。——译注

的工具，借以操纵多数，转移批评矛头，诱使人们为了他们并不理解的目标而堕入痛苦。

如果我们喜欢自认为有着现实、自立、自治的人格，那么，我们臣服于象征时的许多表现就不是令人愉快的。然而，也不可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象征完全是魔鬼的工具。在科学与思辨的领域，它们无疑就是魔鬼本身。但在实际行动领域，它们可以是有益的，有时则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必要性往往是想象出来的，危险也往往是虚构出来的。但是，如果迫切需要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通过象征来控制民众可能就是完成一项急务的唯一捷径。行动经常比理解重要得多。有时的确就是如此：等到人人都理解了，行动可能就会失败。有许多事情不可能等待全民公决或者长时间的宣传，比如在战时，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乃至它的统帅们，时常只能把战略部署透露给极少数人；两种对立的意见——尽管其中之一可能是正确的——往往比只有一种错误的意见更危险。错误的意见会导致不良后果，但两种意见则要承受瓦解整体的灾难。①

福煦和亨利·威尔逊先生预见到了正在向高夫②军队逼近的灾难，这是意见分歧和扩散消息的后果，不过他们把自己的看法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他们知道，即使一次灾难性的失利也确实比在报纸上激烈争论造成的危害要小。在 1918 年 3 月到处弥漫的紧张空气中，至关重要的不是一次特定行动的正确性，而是对命令来源的不懈期望。假如福煦"诉诸人民"，他或

① 最高战时委员会助理秘书 Peter Wright，*At the Supreme War Council* 一书描述了统治部的保密能力和团结一致，很值得细读，尽管他对协约国领导人作了意气用事的攻击。

② Hubert de la Poer Gough（1870—196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第五军军长。——译注

许能赢得争论，但在他赢得争论之前，他指挥的军队可能早就瓦解了。奥林匹斯诸神争吵的景象是有趣的，但也是破坏性的。

不过，不约而同地保持沉默也是如此。赖特上校说："不遗余力使用伪装技巧的是最高统帅部，而不是前线，并且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所有地方的所有长官都在忙于无数时事评论员的工作，以此保持一副假面，好让自己被误认为拿破仑式的人物——远处看才像的拿破仑。……不管这些拿破仑多么无能，替换他们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公众给予了他们巨大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是由那些被隐瞒或被掩饰的失败、被夸张或被虚构的胜利制造出来的。……但这种精心组织的欺诈对将军们本身产生着最险恶的影响：他们通常都是谦逊、爱国的，正如绝大多数从事军旅生涯这种高贵职业的人一定会表现的那样，但是他们最终会受到这些普遍幻象的影响，每天早上阅读的报纸让他们变得越来越认为自己就是战争霹雳，从不出错，不管遭到过多少失败，他们维护自己统帅权的目的都是神圣的，为此使用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能够使总参谋部最后摆脱全部制约的条件中，这种大型欺诈乃是最大的条件。他们不再是为国家而活着：是国家为他们而活着，或者为他们而死。胜败已经不再是主要关切。对这些准统治集团来说，事关重大的是亲爱的老威利还是可怜的老哈瑞将统帅他们，或者尚蒂伊派能否压倒荣军大街派。"①

赖特上校非常雄辩，对保持沉默的危险明察秋毫。然而，他却被迫赞成福煦保持沉默，没有公开毁掉那些幻象。这里有一个复杂的悖谬，后面我们将会看得更清楚，因为传统的民主生活观不是为了紧急和危险的情况，而是为了安宁与和谐才被构想

① 参阅前引 Wright 书，第 98 页，第 101 页至第 105 页。

出来的。凡是人们必须在一种不确定的突发环境中进行合作的地方，一般都必需确保一致和灵活而无需他们的实际同意。象征可以做到这一点。它会淡化个人意向，抵消分歧，模糊个人目的。它使个性呆滞，同时却让团体的意向锐不可当，把该团体和有目的的行动连成一体——这是其他任何因素在危机中都做不到的。它通过凝滞个性来动员民众。象征是一种工具，能够使民众借以在短时间内摆脱自身的惰性，摆脱犹豫或盲动，在复杂局势的曲折道路上被引导着前行。

二

但是，如果时间长一些，那么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互动就会不断增强。描述平民对待领袖的心态时，最常用的词就是士气。当人们竭尽全力去完成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或每个人的全部力量都被来自上面的命令激发起来的时候，据说就是士气良好。很自然，每一位领导人在筹划方略时都会把这一点考虑在内。他不仅必须从“是非曲直”的角度，而且必须从对所有下属的影响上来考虑他的决定，他需要他们持续不断的支持。如果他是一位计划发动进攻的将军，他会明白，如果伤亡的百分比上升得过高，他那些组织起来的军事单位就会作鸟兽散。

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先前的计算结果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因为“在每 9 个赴法人员当中就有 5 人伤亡”。[①] 人们承受痛苦的限度比任何人想像的都大得多。但是总有达到极限的时候。于是，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对敌人的影响，在更大程度上则是考虑

① 见前引书，第 37 页。赖特少校所采用的数字来自国防部档案中的战时统计数字。这些数字显然只指英国的伤亡，或许是英国和法国的伤亡。

到对军队及其家庭的影响，这场战争中没有任何指挥官敢于直言损失。法国从未公布过伤亡人员名单。在英国、美国和德国，一场重大战役的损失都是拖拖拉拉地分散公布，以便破坏对伤亡总量的整体印象。只有局内人随后不久就知道了索姆战役或佛兰德战役夺去多少人的生命；[①] 毫无疑问，鲁登道夫比伦敦、巴黎或芝加哥的任何平民都远更精确地了解这些伤亡数字。每个阵营的所有领导人都在竭尽全力限制任何一个士兵或平民都有可能生动想象出来的实战规模。但是，像1917年的法军老兵，对战况的了解当然就比公众多得多。这样一支部队便开始根据它所遭受的苦难来评价自己的指挥官。当又一次过分许诺的胜利结果还是变成了习惯性的流血失败时，你会发现，一次相比而言较小的大错就能导致一场兵变，[②] 比如1917年的尼韦尔攻势，因为这是一个积微成著的大错。在一连串大灾大难之后，即使碰上一次小小的灾难，革命和兵变通常也会接踵而至。[③]

政策的影响范围决定着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如果领导者的计划中所需要的人们远离采取行动的场合，如果成效隐而不显或者显露得很迟，如果个人的义务是间接的而且并非应尽的，最重要的是，如果人们的同意是出于某种快乐的感情，那么，领导人可能就会放手大干。那些计划立刻就会成为最得人心的计划，如同在绝对戒酒者中间实行禁酒令一样，但却并不立刻侵犯追随者的个人习惯。这是为什么政府在外交事务中能够挥洒

---

① 见前引书，第34页。索姆战役的伤亡将近50万人；1917年的阿拉斯和佛兰德进攻战造成65万英国士兵伤亡。

② 协约国蒙受了许多比 Chemin des Dames 更加惨重的失败。

③ 见前引书中皮埃尔弗描述的苏瓦松兵变和贝当采取的应对方法。第1卷，第3部分。

自如的一个重要原因。两国之间的许多冲突包含了一系列隐蔽而曲折的争斗，有时在边界，但更多的是在学校地理课没有提供准确概念的地方。在捷克斯洛伐克，美国被视为解放者；但总的来说，在美国的报纸文章和音乐喜剧中，在美国人的闲谈中，我们解放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南斯拉夫，却从来没有最后确定下来。

在外交事务中，政策的影响范围会在长时间里仅仅限于针对看不见的环境。那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被人感到是完全真实的。因为在战前，没有人非得去打仗不可，也没有人非得付出代价不可，所以，政府无需对它们的人民多说什么，只管自行其事即可。在地方事务中，政策的代价比较容易看到。因此，除了最卓越的领导人之外，一般都宁可实施那些代价尽可能间接的政策。他们不喜欢直接税制。他们不喜欢领到工资即付所得税。他们喜欢长期借贷。他们喜欢让选民们相信外国人将会付出代价。他们总是不得不从生产商而不是消费者的角度来计算繁荣程度，因为政策对消费者的影响范围分布得非常琐碎。工会领袖从来就更喜欢增加工资而不是降低物价。公众对百万富翁的收益比对工业系统中的各种浪费一向更感兴趣，前者是可见的，但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后者数额巨大，但却难以捉摸。对付住房短缺的法案一写到字面上就证明了这个规律，首先是不做任何事情去增加住房数量，其次是猛烈抨击贪婪的房主，第三是调查获利的建筑商和建筑工人。因为，一项建设性的政策处理的是间接、乏味的因素，而一个贪婪的房主或营利的管子工却是直接可见的。

但是，在人们乐于相信某项政策在无法想象的将来，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将使他们获益时，随着政策的付诸实施，一种和他们想法不同的逻辑就会接踵而至。一个国家可以听信提高运费

将使铁路建设蓬勃发展。但是,如果费率对农场主和托运人的影响导致了消费者难以承受的商品价格的话,这种信条就不会带来铁路的繁荣。消费者是否会照价付费,并不取决于他9个月前是否赞成这项提高费率、顾全大局的议案,而是取决于他眼下是否真想为了要一部新汽车而支付那些运费。

三

领导人经常使用的借口是,他们不过是揭示了一个早已存在于公众头脑中的规划。如果他们相信这一点,一般来说那就是自欺。规划不会在大众头脑中同步产生。这不是因为大众的头脑就一定赶不上领导者,而是因为思想是有机体的一种功能,而大众不是一种有机体。

这个事实并非一望而知,因为大众在不断接受各种暗示。大众不是在阅读新闻,而是带有对他们进行暗示味道的新闻,这些暗示在告诉他们采取行动的路线。他们倾听各种报道,但不像事实那么客观,而是根据对某个行为模式已经形成的成见。因此,那些表面上的领导人会经常发现,一份权威报纸的业主才是真正的领导人。不过,假如有人可以像在实验室里那样从民众的经验中清除一切暗示和引导,我想他就能发现如下情况:面对同样刺激的大众所作出的反应,从理论上说可以绘成一个谬误多边形。可能会有某一群人感到相似得足以类聚。可能会出现感情的两极分化。这样的类聚很容易使得每一类中的每个个人都变得坚定起来,能够使他们用语言表达方式作出反应,也就是说,当人们把自己模糊感觉到的感情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他们才会比较明确地知道自己感觉到了什么,然后才能更确切地去感觉它。

与大众感情保持着接触的领导人很快就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些反应。他们知道高昂的代价正在向公众迫近，或者某种类型的人物正在变得不得人心，或者针对另一国家的感情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然而，如果始终把暗示——这不过是报道者僭用领导权——的效果排除在外的话，那么大众的感情中就会空无一物，而这种感情最后决定着对一切具体政策的选择。大众感情所要求的一切，就是政策的产生与实施假如不能在逻辑上，那也应当能够通过类比和联想与最初的感情联系在一起。

所以，当一项新政策付诸实施时，最初都会需要一种感情共同体，就像马克·安东尼对布鲁图的追随者发表演讲时表现的那样。[①] 一开始，这位领导者说出了公众的流行看法。他有时讲一个动人的故事，有时炫耀一番自己的爱国心，时常刺激一下听众的不满情绪，从而与听众的类似态度打成了一片。如果认为他值得信赖，踌躇不决的群众就可能把目光转向他。然后人们会期待他提出一套行动计划。但是他在表达了大众感情的口号中将找不到那种计划，甚至连个兆头也看不见。如果政策将要产生的影响很模糊，那么至关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必须从词语和感情上把纲领与大众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联系起来。如果受到信任的人们按照熟悉的角色赞同那些公认的象征，那么无需解释他们纲领的实质就能够主动走出很远。

但是明智的领导人不会满足于做到这一步。假如他们认为公开性不会使反对势力过于强大，争论不会把行动拖延得太久，他们就会寻求某种程度上的同意。如果不能获得全体公众的同意，他们就会把等级体系的下属视为知己，让他们为将要发生的

---

① Martin, *The Behavior of Crowds* 一书对此有着精彩的分析，见第 130 至 132 页。

事情做好准备，并让他们感到事情的结局乃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但是，无论一个领导人多么表里如一，如果事态过于复杂，那么这样的协商就总是会存在某些假象。因为，全体公众不可能像那些富有经验且富于想象力的人士那样对任何可能性都有生动感受。相当多的人必定会不经从容考虑、不了解背景情况就同意领导人提交给他们的选择。然而，没有人会有更多的要求。只有理论家们会那样做。如果我们在法庭上大获成功，如果我们说的话有人听，如果我们做的事效果很好，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就不会停下来考虑一下我们的意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手头的事情。

因此，如果确立了地位的当权者机敏而见识广博，如果他们显然想满足公众感情，并切实消除某些导致不满的原因，那么，不管他们进展得多么缓慢，只要他们被认为正在取得进展，他们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如果不断出现大错，再加上几乎无比的笨拙，那就会开始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宫廷革命、部门之间的革命则是另一回事。煽动民众也是如此。一旦感情得到表达、紧张状况得以缓解，它就无计可施了。但政治家知道，这种缓解是暂时的，如果过分经常地沉湎其中，那会有碍健康。因此，他一定要注意不去召唤那种不可能注入到纲领中去的感情，因为纲领要面对的事实乃是特定感情所系。

但是，并非所有的领导人都是政治家。所有的领导人都憎恶下台，而且大多数领导人很难相信，当局势变糟的时候，别人能防止它变得更糟。他们不是被动等待着公众去感受政策的影响，因为这一发现的后果通常会落在他们自己头上。因此，他们会断断续续地设法修补篱笆，巩固自己的地位。

修补篱笆的行动包括推出一个临时替罪羊，或平息一种无关大局、但却影响到某个权势人物或权势集团的不满，或重新调

整某些职责，或安抚一群想在家乡建一座兵工厂的人，或想通过一条法律来制止大人物的恶行。如果你研究一下当选公职人员的日常活动，这个清单还会加长。有些国会议员年复一年地当选，却从未想到过在公众事务上耗费精力。他们喜欢在许多微不足道的问题上为许多人帮点小忙，而不愿尽力做一件不至于落空的大事。不过，能够使一个组织成为卓有成效的仆人的人总是有限的，机敏的政治家关注的是有影响的或者再怎么大喊大叫也没有影响的人物，对这种人略加注意是一种极为宽宏大量的标志。更多的人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垂青，这就是无名的大众，只有接受宣传的份儿。

在任何组织中，确立了地位的领导人都有着极大的天然优势。他们被认为享有更好的信息资源。他们的办公室里有图书和文件。他们参加重要会议。他们会见重要人物。他们担负着责任。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注意，说话的声调更容易令人信服。但是，他们也拥有极大的力量限制人们接近事实真相。在某种程度上说，每个官员都是一位审查官。而且，由于没有人能够依靠遮遮掩掩或者忽略不计来隐瞒信息，由于不知道想让公众了解什么，每个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个宣传员。处在全局性地位，甚至经常被迫在两种都是为了保证制度安全、同样无可反驳却互相冲突的理想之间作出选择，还要坦率面对公众，这样的官员会发现自己在越来越有意识地决定在什么环境下、以什么为幌子让公众了解什么样的事实真相。

四

我想，通过精心安排能够制造出同意，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毫无疑问，公众舆论的产生过程和它在本书中表现出来的

情况同样复杂,任何通晓这一过程的人都有机会去摆布它,这是非常显见的。

制造同意并非一种新技巧。它已经十分古老了。据说它已经随着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消亡了。事实上,它是在技术上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因为它现在以分析为基础,而不是以粗糙的经验为基础。于是,作为一种心理研究的结果,在现代交流手段的配合下,民主政治的实践度过了难关。目前正在发生一场革命,其意义比经济权力的任何变动都要重大得多。

在目前控制局势的这一代人中间,说服已经变成一种自觉的艺术和世俗政府的一个常规功能。我们当中还没有人开始理解这一变化的后果,但是,如果熟知如何制造同意,那就可以改变每一项政治算计,修正每一个政治前提,这话并不是轻率的预言。在宣传的影响下——未必只是该词的险恶含义——我们思维中的既有常数已经成了变量。比如,我们不再可能信奉原始的民主信条了;也不再可能相信处理人类事务所需要的知识是从人的内心自发产生出来的。如果我们根据这样的理论去行动,我们就会堕入自我欺骗,就会面对一些我们无法检验的观念形态。如果我们要和我们视线之外的世界打交道,我们就不能依靠直觉、良心或者临时出现的偶然看法,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

第六部分

民主的形象

第十六章　自我中心的人

一

既然"公众舆论"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的原动力,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指望能够找到大量文献。可是找不到。有大量的著述是在谈论政府和政党,就是说,谈论可能体现了业已形成的公众舆论的机器。但是,关于公众舆论所由产生的根源,关于它的发展过程,人们谈论得却比较少。一般都认为,存在着一种叫做"公众舆论"的力量乃是理所当然,而美国的政治作家们最关心的是搞清楚如何使政府表达出共同意志,或者如何防止共同意志颠覆他们认为能使政府得以存在的目标。按照他们的传统,他们希望的是要么驯服舆论,要么就服从舆论。因此,一套著名系列教科书的编者说道:"进行统治最困难也是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个人见解的力量传导给公众行动。"①

不过,无疑还有更为重大的问题,即如何使我们对政治景象的个人看法发挥效力的问题。下面我要进一步说明,存在着根本改善的前景,因为原则的发展已经在起作用了。不过这种发

---

① 见 Albert Bushnell Hart 为 A. Lawrence Lowell 的 *Public Opinion and Popular Government* 写的导论。

展将要取决于我们能否很好地学会利用这方面的知识——整理各种见解以照管我们自己的见解，如果它们应当加以整理的话。因为，那些偶然的见解都是局部交往、职业或者个人利益的产物，不可能理所当然地乐意接受政治思考的方法，而这种方法依靠的是精确的记录、权衡、分析和比较。头脑决定着什么是有趣的、重要的、亲近的、个人的以及激动人心的事情，正是头脑的这些特性，从一开始就会让那些现实主义的见解垂头丧气。因此，除非在共同体中有着普遍增强的信心，没有那么多偏见和直觉，否则，耗费时间、金钱、劳务、自觉努力、耐心和镇静而形成的现实主义见解就不会得到足够的支持。那种信心会由于自我批评的加强而不断增长，使我们意识到什么是夸夸其谈，当我们想要夸夸其谈的时候就会鄙视自己，并且会警觉地发现它。在阅读、谈论或者判断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人并没有那种根深蒂固的分析见解的习惯，因而几乎不会觉得还需要更好的主意，即使它们出现在眼前也不会关心，更没有能力去妨碍政治才俊们玩弄新技巧。

然而，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最古老、最强有力的民主政治就会发现，它们早已把公众舆论搞成了一个谜。那些老到的舆论组织者几乎可以说参透了这个谜，因而能够在选举日制造出多数来。但是这些组织者却被政治科学视为一帮下九流或者“问题人”，而不是关于制造和操纵公众舆论的最有效的知识的拥有者。人民有着表达民主理念的倾向，即使他们没有付诸行动，学者、演说家、编辑们也会像其他社会的人们一样看待公众舆论，把它视为最终决定事态发展方向的神秘力量。

几乎在所有的政治理论中都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因素，它在该理论的鼎盛时期会变得无法检验。在这些表象背后有一种“命运”，有一些“守护神”或者“上帝对特选子民的授权”、“神授

君权"、"天国副摄政"、"天生的高贵等级"。那些比较明显的天使、恶魔以及国王们被逐出了民主思想,但是这样的需求仍在继续,即相信存在着一些相反的领导力量。这种需求要的是那些设计了民主子宫的18世纪思想家。他们有一个苍白的上帝,但却满怀热情,他们在人民主权的信条中发现了为新社会制度提供一个神秘起源所需要的答案。于是就有了那个谜,只有人民的敌人才会用亵渎与孟浪的手去戳破它。

二

他们并未除去面纱,因为他们是投身于激烈而不确定的斗争的实干政治家。他们亲身感受到了民主的鼓舞,它比以往的任何统治学说都深刻,而且更加亲切、更加重要。他们与时代偏见格格不入,全力以赴地坚持人的尊严。使他们着迷的并非亚当·斯密对什么公共事务问题表达了什么观点,而是亚当·斯密这位始终被看作一个下层社会家族的后裔如今不再向其他人表示屈服了。这就是令人欣喜若狂的"在黎明时生来"的景象。但是所有的分析家似乎都在贬低那种尊严,否认人人都有理由受教育、长知识,指出人们受到了愚弄,并不总是了解自身的利益所在,而且并非人人都适于进行统治。

这些批评家们差不多就像 a small boy with a drum 一样大受欢迎。关于人容易犯错误这个问题的一切评论都被令人作呕地利用了起来。如果民主主义者承认贵族政治观里面存在真理,他们就有可能在围困中打开一个缺口。正如亚里士多德必须强调奴隶天生就是奴隶一样,民主主义者必须强调自由人天生就是立法者与行政官。他们不可能停下来解释说,一个人的灵魂即使没有——或者确实不可能有——这种专业资质,他也

有着不被不自愿地用作他人的工具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上等人仍然过于强大、过于恣肆,就是不愿对这个如此公正的说法进行重新评价。

所以,早期的民主主义者坚持认为,在庞大的人群中会自发地产生出一种理性的正义感。他们全都希望——许多人则坚信——这是实际情况,尽管像托马斯·杰斐逊这样最明智的人士私下里有着各种各样的保留意见。不过有一个问题是确凿无疑的:如果公众舆论并非自发产生,在那种时代就根本不会有人相信它还能产生出来。因为,在一个基本方面,民主主义所依据的政治科学就是亚里士多德阐述的同一门科学。它对民主派和贵族党、保皇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而言都是同一门科学,它的主要前提就是假定统治术乃是一种天生的才能。人们在试图认定这种天才人物时的标准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他们全都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如何发现那些天生就富有政治智慧的人物。保皇主义者断定,国王们生来就是为了进行统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认为,虽然"每个阶层都有一些强有力的头脑,……但是代议机关仍将由土地所有者、商人以及有见识的专业人士组成,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它对政府的精神并无任何影响"。[①] 杰斐逊认为,上帝在农夫和耕种者中间积存了各种政治才具,有时看上去就像在所有的人那里都能发现它们一样。[②] 主要前提是同样的:统治乃是表现在某个人或者少数特定人物,全体男人,或者仅仅是21岁的白种男人,甚或全体男女身上的本能,就看你的社会偏好如何了。

---

① *The Federalist*, Nos. 35,36. 参见 Henry Jones Ford 在 *Rise and Growth of American Politics* 第五章所作的评论。

② 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70页。

在确定谁最适于进行统治时，见识广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标准。贵族政治论者相信，只有那些能够应付大局的人们才会具备这种本能，而民主政治论者宣称人人都具备这种本能，因此人人都可以应付大局。两者都在苦思冥想统治者是如何做到见识广博的，这并不是政治科学的内容。如果你是为了人民，你就不会费力琢磨如何随时向选民报告情况的问题。到了21岁他自会有他的政治官能。算来会有一副好心肠、一副理性的头脑、一种均衡的判断力。这些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熟，但是未必就会考虑如何充实心胸、培育理性。人们就像吸收空气一样吸收着事实。

三

但是，以这种毫不费力的方式掌握的事实是有限的：他们可以熟悉曾经生活劳动过的地方的风俗习惯和一些比较显著的特点，可是关于外部世界的情况就只能靠想象了，而且既不能凭着本能去想象，也无法指望仅仅活着就能吸收有价值的知识。因此，唯一有可能产生自发性政治的环境，就是统治者的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范畴所限定的那种环境。凡是在你能够看到按照天然的人类官能进行统治的地方，这个结论都是无可回避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如果一个城邦的公民需要按照他们的功德去断案和分配职司，那就必须相互熟悉彼此的品行；倘若他们不具备这种知识，选任职司和裁判法律诉讼就会出错。”①

显而易见，这一箴言对于所有政治思想流派都具有约束力。但是它对民主政治论者展示了一些特殊的困难。信奉阶级统治

① 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七卷第四章。

的人们完全可以断言，在宫廷里或者在贵族的乡间宅第中，人们对于彼此的品行是互相熟悉的，只要其他人类都是驯服的，那么唯一需要熟悉的品行就是统治阶级中人的品行。但是，希望高扬所有人的尊严的民主政治论者，立刻就会被他们的统治阶级——全体男性选民——的巨大规模和鱼龙混杂所困扰。他们的科学告诉他们，政治乃是一种本能，而这种本能只在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他们所抱的希望则命令他们坚持认为，人人都可以在一个非常庞大的环境中进行统治。在他们的理想和他们的科学之间这种致命的矛盾中，唯一的出路就是不假更多讨论地断定，人民的声音即上帝的声音。

这种悖谬过于巨大，这种赌注过于巨大，他们的理想供批判检验时也过于巨大。他们无法说明一个住在波士顿的波士顿公民如何构想对弗吉尼亚的看法，一个住在弗吉尼亚的弗吉尼亚人如何产生对华盛顿政府的实际评价，华盛顿的国会议员们又是如何有了对中国或者墨西哥的认识。因为，在那个时代，许多人根本不可能把一个看不到的环境纳入自己的评价范畴。当然，自亚里士多德以降，事情有了某些进步。有了一些报纸，有了一些书籍，大概有了更好的道路，也有了更好的船。但是并没有巨大的进步，而且 18 世纪的政治假说实质上仍是以往 2000 年间政治科学中流行的那些内容。关于如何解决人的现有注意力和他们对个人尊严的无限信仰之间的冲突，前辈民主政治论者并没有掌握什么诀窍。

他们的假说不仅早于现代报纸、世界性通讯机构、照片和电影，而且真正更为重要的是，还早于测量法和档案、早于量化的比较分析、早于证据原则以及对目击者的偏见进行校正和折扣的心理分析能力。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的档案就无懈可击，我们的分析就没有偏见，我们的测量就丝毫不爽。我也不是说已

经做出了关键性的发明创造，可以把看不到的世界拿来进行判断。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还没有这样的发明创造，即使在卢梭、孟德斯鸠或者托马斯·杰斐逊的时代，这样的发明创造在政治学说中也仍没有重要到清晰可见的程度。下面一章我们将会看到，即使在最晚近的人类重构理论——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中，所有那些深刻的假设也都是来自这一古老的政治思想体系。

这个体系只要还胜任和诚实，它就必须假定，一个人对于公共事务仅仅有着非常狭隘的经验。这个假设至今仍是真实的，而且极其重要，因为一个人用于公共事务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古代的理论不得不去假设，人们不仅极少注意公共事务问题，而且现有的注意力也只是局限于近在眼前的事情上。它可能幻想过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即远距离的复杂事件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可信的报道、分析和展示——使一个外行也能作出真正有价值的选择。这个时代已经出现了。毫无疑问，对于一个看不到的环境进行连续报道已是可行的了。它经常做得很糟糕，但是它毕竟已经做到了，这一事实表明，它能够做到；而且，我们已经开始知道它经常做得很糟糕，这一事实则表明，它可以做得更好。实业家的工程师和会计、官员的秘书和随从、总参谋部的情报官以及投读者所好的记者，每天都在以不同程度的技巧和诚实报道着远距离的复杂事态。这是一些粗糙但却根本性的开端，这个词的实际意义远比反复唠叨战争、革命、退位与复辟根本得多；人类生活的规模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使劳合·乔治先生有可能在伦敦用过早餐之后与威尔逊讨论煤矿问题，或者在巴黎共进正餐之前讨论阿拉伯人的命运。

把人类事务的任何方面统统纳入判断力范畴，这样的可能性打破了唯政治理念是瞻的魅力。当然，存在着并不了解注意

力限度的芸芸众生，乃是政治科学的主要前提。他们的立足之地是沙滩。他们早已亲身证明了一种非常狭隘地以自我为中心去认识世界所产生的结果。但是政治思想家们——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到民主政治理论家，始终就是围绕着自我中心的人进行思索的，后者不得不始终凭着头脑中寥寥几幅画面来看待整个世界。

第十七章　独立的共同体

一

如果自我中心的人群始终有着明显的相互摩擦，他们就会投身于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这一点至少在《利维坦》的一个著名段落中可以看得更加真实。霍布斯说，“就具体的个人来说，虽然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存在过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然而在所有的时代，国王们和**最高主权者**却因为他们的**独立地位**而不断地相互猜忌，不断地保持着斗剑的态势，他们兵戎相向，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①

二

围绕这一结论，人类思想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已经形成并且至今仍然有着许多学派——以如下方式出发了：它设想了一种理想公正的人际关系模式，其中的每个人都被恰如其分地赋予了自己的职责与权利。如果他凭着良心履行了指定给他的任务，那么无论他的见解是对是错也就无关紧要了。他尽到了

---

① *Leviatan*, Ch, XIII.

自己的本分，别的人就会仿而效之，所有尽职尽责的人们就会组成一个和谐的世界。每个等级制度都表明了这一原则；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在封建理想中，在但丁的天国中，在官僚型的社会主义中，在放任主义中，你都可以发现这一原则，在辛迪加、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被罗伯特·兰辛先生理想化了的国际法体系中，则发展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它们全都设想了一种预定的和谐，不是受到了神启，就是因为外部影响，或者就是与生俱来，那些固执己见的人、阶级或者共同体由此与其他人类达成了高度和谐。更有权力主义者则想象了一个务使每个人都各司其职的交响乐队指挥；无政府主义者的想象则倾向于认为，如果每个乐手都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去演奏，那就会听到更加非凡的和谐音。

但是也有些哲学家厌恶这些权利义务方案，视冲突为理所当然，并且着力想要弄清楚他们这一方如何才能独占鳌头。他们似乎总是更现实，即使他们看上去令人惊恐，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总结出无人能够逃脱的经验。马基雅维里就是这一学派的典范，一个受到最无情中伤的人，因为他碰巧是第一个在一直被超自然主义者捷足先登的领域中使用朴素语言的自然主义者。[①]他比以往任何政治思想家的名声都糟糕，但是他的门徒比他们任何人都多。他忠实地记述了保持独立状态所需要的生存技巧。这就是他拥有门徒的原因。他的恶名主要来自他投向梅第奇家族怀抱，夜里做梦都想着穿上他的“贵族法袍”，一如他马基雅维里本人就是君主，而且把对成事之途的洞察变成了对

---

① F.S. Oliver 在他的 *Alexander Hamilton* 一书中谈到马基雅维里（第 174 页）时说：“假设现存的条件——人性与物性——是不可改变的，他就会以冷静、非道德的方式继续前进，像一位讲师论述青蛙那样展示一个勇敢精明的统治者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因势利导，确保他的王朝不坠。”

谋事之方的颂歌。

他在最为著名的一章[①]中写道："明君应当十分小心，千万不要让那些无视上述五种品质的言论——哪怕是只言片语——脱口而出，要在人们目睹其面、耳闻其言的时候，表现得那么仁慈、那么诚挚、那么正直、那么人道、那么虔诚。相比而言，君主更有必要显得具备了最后这项品质，因为一般人等更多地是用眼睛而不是用双手进行判断，每个人都能看到你，却只有少数人能够摸透你。人人都能看到你表面上如何，但只有少数人能够摸透你实际上如何，而少数人是不敢反对多数人的看法的，因为后者会得到最高权威的支持。至于人们的行为，尤其是君主们的行为，只要没有受到深思熟虑的挑战，人们就只能通过结果去判断。……当代的某个君主——姑且隐其名号——只顾喋喋不休地大谈和平与信义，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是十足的倒行逆施。然而，要是他真的在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身体力行，他的声望和权力可能就会屡屡遭殃。"

这是玩世不恭的态度。然而，这是一个确实完全看不懂自己所见所闻之原因的人的玩世不恭。马基雅维里考虑的是"更多地用眼睛而不是用双手进行判断"的人与君主的动向，这是他的言说方式，意思是说，他们的判断是主观的。他对俗世太了解了，因而无法谎称他那个时代的意大利人对世界有着稳定和完整的看法。他不会耽于幻想，而且他没有素材能够用来想象一个懂得如何纠正自己眼光的人种。

他发现，这个世界是由很难纠正自己眼光的人们组成的，马基雅维里知道，这样的人们由于按照一种个人方式看待整个公共事务，因而陷入了永恒的冲突之中。对于实际上远远超出他

① 《君主论》第十八章，"君主应当如何守信"。

们视野的事态，他们所了解的是他们自己本身的、阶级王朝的或者地方性的看法。他们了解的是它们的外表。他们了解得很准。但是他们把其他同样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们一笔勾销了。于是他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或者至少他们由于不为外人所知的原因而认为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威胁。那种基于现实的——尽管是一己的——经验而形成的坚不可摧的目标证明了手段的合理性。他们会牺牲这些理想中的任何一个去拯救全部理想……"通过结果去判断……"

三

这些基本的事实就摆在民主政治哲学家们的面前。不论是否自觉，他们都很清楚，政治见识的范畴是受到了限制的，自治的空间也必定是有限的，独立的国家在相互摩擦时就会剑拔弩张。但是他们无疑也知道，人们都在决心把握自己的命运，都在寻求并非由暴力强加于人的和平。他们如何协调希望与事实呢？

他们进行了全面的思考。他们在希腊和意大利城邦中发现了一部腐败、阴谋和战争的历史。[①] 他们在自己的城邦里看到了内讧、造作和狂热。这不是民主理想能够成功的环境，也不是独立而同样有能力的人们自发管理自身事务的地方。大概是受到了让·雅克·卢梭的影响，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未受玷污的偏远乡村。他们产生了足够的自信，认为民主理想就在故乡。杰斐逊尤其感受到了这一点，杰斐逊比任何人都系统地阐述了美国的民主形象。从乡镇得到的权力带领美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从

① "民主政体总是呈现着骚动与争斗的景象，……一般来说往往是短命的，因为它们总是暴亡。"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

乡镇得到的选票使杰斐逊的党执掌了政权。置身于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的农业共同体之外，如果你把奴隶问题忽略不计，你就会亲眼看到什么是民主的形象。

托克维尔说："美国革命爆发了，在乡镇培育出来的人民主权原则占领了这个国家。"[①] 毫无疑问，它也占领了阐述和普及民主成见的那些人的头脑。杰斐逊写道，"热爱人民就是我们的原则。"[②] 不过，他所热爱的人民几乎只是那些小土地所有者："这些在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就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如果上帝有了特选子民，他就会把他们的胸膛作为他的特殊仓库，用来寄存那些真正名副其实的美德。这就是上帝让圣火长明不熄的聚焦点，否则这圣火就会从地球表面消失。没有哪个时代、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提供一个实例，说明那里出现过大多数耕作者道德败坏的现象。"

无论这种向自然的浪漫回归多么令人惊叹，也还是有一种坚实感的成分。杰斐逊认为，一个独立的耕作者群体要比任何其他人类社会都更能接近于满足民主政体的要求。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想保持理想不坠，那就必须把这些理想的共同体与可憎的世界隔离开来。如果农夫们要想自行其事，那就必须限定在他们习以为常的事务上。杰斐逊得出了所有这些逻辑上的结论。他不喜欢制造业、对外贸易、海军、无形的财产形式，从理论上说也不喜欢任何不以一个小型自治团体为中心的统治方式。他在生前就招来了批评家们的批评，其中有人评论说，"包裹在彻底的妄自尊大之中，强大到实际上足以保护我们对付任何入侵者，我们就可以享受一种永恒的田园生活，永远在一种

① 《论美国的民主》，第一部分，第 51 页。

② 引自 Charles Beard, *Economic Origins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 Ch. XIV。

自私自满的冷漠态度掩蔽下无动于衷而又俗不可耐地打发日子。”①

四

像杰斐逊提出的这种由一个理想环境和一个精选的阶级构成的民主理想，与那个时代的政治科学并不冲突。与它冲突的是现实。当理想用不留余地的语言——部分是由于激情澎湃、部分则是出于竞选目的——表达出来之后，它很快就会忘记这理论最初是针对特定条件而构想出来的。它会变成政治福音书，并且提供了一些成见，所有派别的美国人都会通过这些成见去看待政治。

这福音书是由于这样的必然性而定稿的：在杰斐逊那个时代，没人还会想到公众舆论竟然不是自发和主观的。因此，这个民主传统始终在努力认识这样一个世界：那里的人民唯一关心的事务就是因果关系都在他们习惯的范围中起作用的事务。从来没有任何民主理论能够在一个广阔得不可预见的环境背景下进行自我设计。这个镜子是凹面的。虽然民主主义者承认他们和外部事务有联系，但他们毫不犹豫地认为，与外界独立团体的任何联系都是对最初构想的民主政体的一种威胁。这是明智的忧虑。如果民主政体是自发的，那么民主政体的利益就应当始终是简单、易懂、便于管理的。条件应当是接近于农村乡镇——如果信息的供应仅仅适用于偶然经验的话。环境应当仅限于每个人直接、确定的知识范畴。

① 引自 Charles Beard, *Economic Origins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 Ch. XIV, 第 426 页。

民主主义者知道对公众舆论的分析似乎也证明了什么：在涉及一个看不见的环境时，决定"明摆着都是随意做出的，显然，它们不该如此"。[①] 于是，他们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竭力缩小那个看不见的环境的重要性。他害怕对外贸易，因为贸易会卷入对外关系；他怀疑制造业，因为它们会产生大城市和大量聚居的人口；不过要是真有了制造业，他也宁肯只限于自给自足。如果他在现实世界找不到这些条件，他会满怀激情地奔向荒野去建立与世隔绝的乌托邦共同体。他的口号显示了他的成见。他喜欢"自治"、"自决"、"独立"。这些理念没有一个涉及超出自治团体畛域之外的同意或者共同体的概念。民主行动的范围则是一个限定的空间。在警戒线以内，目标就是做到自给自足、避免纠纷。这个原则并不是不要对外政策，而是明明白白显示在那里，因为国界以外的生活比界内的任何生活都更明显地是一种异己因素。历史表明，在对外政策方面，民主政体通常都是在光荣孤立和违背理想的外交之间进行选择。事实上，那些最成功的民主政体——瑞士、丹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直到最近都没有过欧洲人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外交政策。即使像门罗主义这样的原则，其初衷也是想用一个缓冲区来填充两个大洋，而组成这个缓冲区的则是一些足够共和，以至没有对外政策的国家。

由于形势危险乃是实行独裁的一个巨大的或许是必不可少的条件，[②] 如果民主政体还想运转，安全感就被认为是必需的。

---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七卷，第四章。

② 被1800年的民主革命吓坏了的 Fisher Ames 在1802年给 Rufus King 写信说："与所有国家的做法一样，我们也需要一个可怕的邻居从外部对我们施加压力，和煽动家们相比，它的出现在任何时候都会激起更强烈的恐惧，从而促使人民投向政府。"引自 Ford, *Rise and Growth of American Politics*, 第69页。

应当尽可能像一个独立共同体那样以没有动乱为前提。不安全感包含着意外变局。这意味着有人正在改变你的生活,你控制不了他,也不可能和他协商。这意味着暴力将要普遍打乱人们熟悉的常规,将要提出新的问题需要采取迅速、反常的解决办法。每个民主主义者都会彻骨地感到,民主政体容不得险恶的危机,因为他了解大众的惰性,就是说,迅速行动起来的极少数人必须作出决定,其余的人只是盲目跟从罢了。这并不会把民主主义者变成不抵抗主义者,而是会导致所有民主主义者统统投身于为和平主义目标而战的战争。即使当战争事实上成为征服的战争时,他们也会真诚地相信那是捍卫文明的战争。

在地球表面圈一块地盘的各种意图,并不是出于懦弱、冷漠或如杰斐逊的批评家之一所说的乐于过那种驯猴子的生活。民主主义者看到的是一种辉煌的可能性,即人人都应得到充分发展、摆脱人为的束缚。按照他们对统治艺术的了解,他们会和以前的亚里士多德一样设计一个由自主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只不过那是个封闭的简单社会。他们找不出别的前提,假如他们想要得出的结论是人人都会自发地处理公共事务的话。

五

这个前提对于他们最热切的希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即使采用了这个前提,他们也会得出别的结论。因为,为了得到一种自发的自治,你就必须有一个简单的独立共同体,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是,一个人几乎天生就有能力处理那些简单而独立的事务。在那种希望乃思想之父的地方,这个逻辑还是令人信服的。此外,在农村乡镇,全能公民的信条也确实有着最实用的意义。在乡村,每个人或迟或早都会试图插手乡村的一切事务。事事

外行的人也有机会轮流任职。在民主政体的模式得到普遍应用之前，这种全能公民的信条不会带来多么严重的麻烦，就是说，人们会像看待一个封闭的村庄那样看待一个复杂的文明。

每个公民不仅适合于处理一切公共事务，而且会始终如一地热心公益，并且有着孜孜不倦的关切。他对乡镇的公益怀着足够的热忱，他认识每个人，关心着每个人的事情。想象着足够应付乡镇的事务，很容易就会转成想象着足够应付任何问题，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质量的思考并不适于套进某个成见。但是可以另外转个圈子。由于假设每个人都对重大事务抱着足够的关切，那么只有那些每个人都关切的事务似乎才能算是重大事务。

这就意味着人们是根据自己头脑中未受到挑战的画面来构想外部世界画面的。他们头脑中的这些画面是由父母、老师精心铭刻进去的，而且极少被他们自己的经验所校正。只有少数人能碰上带着它们跨出国界的机会。能找到出国理由的人就更少。绝大多数选民都是在一个环境里终其一生，只是靠着几份单薄的报纸、某些小册子、政治演讲、宗教熏陶和街谈巷议来想象商业与金融、战争与和平那样更大的环境。公众舆论中的客观成分极少，更多的是根据临时的想象。

这样，由于众多不同的原因，自给自足就成了成长时期的精神理想。乡镇的自然孤立，拓荒者的孤独，民主理论，新教传统，政治科学的局限性，全都集中在一起使人们相信，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良心来释放政治智慧。毫不奇怪，从绝对原则中演绎出来的法律夺走了他们大量自由的活力。美国的政治思想不得不靠它的首都过活。它在条文主义中创立了一个久经考验的条文机关，新的条文在那里不必经过从经验中得出新的真理的劳动就可以编造出来。各种陈规陋俗全都那么郑重其事，令人难以

理解,每个头脑正常的外国旁观者都会惊讶于美国人民蓬勃的实干活力同公共生活呆滞的陈词滥调之间那种鲜明的对照。酷爱定则简直就是已知达到自给自足的唯一途径。不过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共同体在看待外部世界时形成的公众舆论,主要是由若干固定的想象组成的,人们按照从共同体的法律和道德准则中演绎出来的模式对这些想象进行整理,而赋予它们生命的则是由地方经验唤起的情感。

因此,民主理论从对终极的人类尊严的美好设想出发,由于缺乏报告环境的知识手段,不得不求助于在选民中碰巧积累起来的智慧与经验。用杰斐逊的话说,上帝把人们的胸膛"作为他的特殊仓库,用来寄存那些真正名副其实的美德"。这些特选子民在他们的独立环境中能够获得全部事实真相。这环境是那么熟悉,一个人会认为大家都在大量谈论同一些事情乃是理所当然。因此,唯一的分歧大概只是发生在对同一些事实进行的评价上。无需对信息源进行保护。它们全都明摆在那里,人人都同样唾手可得。也无需为终极标准操心,在一个独立的共同体中,人们可以采用——或至少已经采用了——同样的道德标准。因此,唯一发生歧见的地方就是如何把公认的标准合乎逻辑地用于公认的事实。由于推理的官能也被充分地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一个推理错误也会迅速面临对它的自由讨论。于是,在这些限度内就可以自由地获得真理。共同体认为提供信息乃是理所当然;它的规则是通过学校、教会、家庭和政权告诉人们如何从一个前提得出一些结论,而不是具备发现前提的能力,这被认为是思想训练的主要目的。

第十八章　压力、自由授权及特权的作用

一

汉密尔顿写道：[①]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联邦的措施并未得到执行；各州的懈怠情形逐渐达到极端，终于阻止了全国政府的所有车轮，使它们可怕地停顿了下来。”……因为“就我们的情况而言，在邦联的条件下，必须经十三个独立主权的意志达成一致意见，才能完全执行出自联邦的每个重要措施”。否则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说：“各成员州的统治者……将会着手自己去判断这些措施是否恰当。他们将会考虑已经提议或要求的事情是否符合他们的直接利益或目的；会考虑一旦正式通过将要带来什么暂时的便利或不便。他们会以偏私和怀疑的精神仔细斟酌这一切，既不了解对于作出正确判断必不可少的全国形势和国家的理由，又对地方目标怀着强烈的偏爱，因而很难不导致错误的决定。在组成邦联的每个成员州里，同样的过程肯定会反复出现，于是整个议事机构所拟订的计划，往往就会因为各成员出于错误认识和偏私之见的判断而被执行得变幻无常。凡是熟悉

① 见《联邦党人文集》第十五篇。

人民立法机关程序的人都知道，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要使他们在重要问题上作出一致的决定往往是多么困难，而且很容易想象，要想引导这样一些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抱着不同印象考虑问题的州议会去热切希望为了同一观点和目的进行合作，一定是多么地不可能。”

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①] 国会经历了10年的风暴和重压之后“只是成了一个外交集会”，它给革命领袖们提供了“一个有益但却令人苦恼的教训”[②]，使他们知道了若干自我中心的共同体纠缠在同一个环境里会发生些什么事情。1787年5月他们会集费城时，表面上看是为了修改《十三州邦联宪法》，但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反击18世纪民主学说的基本前提。这些领导人不仅有意识地反对那个时代的民主精神，一如麦迪逊所说，感到“民主政体始终是骚乱与争斗之大观”，而且他们决意在国界之内竭其所能地抵消那种独立环境中的自治共同体理想。他们亲眼目睹了人们自发管理自己的事务时这种凹面民主政体所带来的冲突与失败。他们认为，问题在于恢复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统治。他们理解的统治就是有权力进行全国性决策并在全国实施；他们相信，民主政体就是各地方各阶级按照自己的直接利益和目标坚持自决。

他们进行算计时并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知识结构的可能性，即分立的共同体是能够根据对事实的共同看法而共同采取行动的。我们也是刚刚开始为世界的某些地方设想这种可能性，那里有着自由传播的新闻和一种仅仅适用于生活的某些方面的共同语言。在工业与世界政治中形成一个自愿联邦的整个

---

① 前引 Ford 书，第36页。

② 见《联邦党人文集》第十五篇。

想法还不过是个萌芽，我们已经从自身的经验中得知，它仅仅是微不足道而又羞答答地进入了现实政治。宪法的作者们根本没有理由作这样的设想，一个多世纪以后，我们所能设想的也仅仅是把它看作一个促使几代人进行思想努力的刺激因素。为了创立全国性政府，汉密尔顿和他的同事们就必须制订计划，但理论依据并不是人们会由于对共同利益的认识而进行合作，而是人们能够被统治——假如通过权力平衡来保证特殊利益得到平衡的话。麦迪逊说："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①]

正如某些作家料想的那样，他们并不打算去平衡所有的利益而致统治陷入永久的僵局。他们的打算是羁縻地方和阶级利益，以防它们阻碍统治。麦迪逊写道，"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极为重要的是，制约与平衡的理论乃是联邦主义领袖们对公众舆论问题的补救办法。除了设计一个使地方观点保持中立的精巧机器以外，他们找不到其他用"行政官的温和影响"取代"血腥暴力"[②] 的途径。他们并不懂得如何操纵大规模的选举，那绝不止于他们所理解的在信息共享基础上形成普遍同意的可能性。事实上，亚伦·伯尔已经给了汉密尔顿一个教训，他在1800年借助于坦慕尼协会夺得纽约市控制权，给汉密尔顿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汉密尔顿在能够重视这个新发现之前却死于决斗，一如福特先生所说，伯尔的手枪击中了联邦党的智囊。[③]

---

① 见《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篇。

② 同上，第十五篇。

③ 前引 Ford 书第 119 页。

二

在宪法脱稿的时候,"政治上的安排仍然需要绅士们的协商同意"①,汉密尔顿需要说服贵族支持政府。这里面的意图是,如果地方偏见影响到宪法制衡所需要的均势,贵族就应当控制国家事务。当然,自身就属于这个阶层的汉密尔顿也有着他们所喜欢的偏见。但是这并不足以解释他的治国方略。毫无疑问,他在为了联邦而殚精竭虑,我想,如果硬说他要让联邦去保护阶级特权,这就是颠倒黑白了,毋宁说,他在利用阶级特权为联邦谋利益。汉密尔顿说:"我们应当用人不疑,如果我们期望他为公众服务,那就必须爱护他这样做的热情。"② 他需要有人进行统治,他们的热情可以最迅速地吸引全国的注意。这是些贵族、公共债权人、制造商、托运商和贸易商,③ 而且,为了达到明确目的所使用的精明手段,在历史上没有比汉密尔顿的一系列财政措施更出色的先例了,由此而使各地的贵族归附了新政府。

虽然制宪会议是关起门来工作,虽然批准宪法需要"最多六分之一的成年男子投票"④,但是丝毫也不做作。联邦党人是为联邦而不是为民主声辩,尽管乔治·华盛顿担任了两年多共和党总统之后共和一词让他听着不快。这部宪法是一次公正的尝试,以限制多数统治的范围;唯一打算让政府控制在手中的民主机构就是严格限定财产资格、经普选产生的众议院。即使如此,

---

① 前引 Ford 书第 144 页。
② 同上,第 47 页。
③ 参阅 Bear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④ 同上,第 325 页。

众议院也被认为有可能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政府机构，因而煞费苦心地用参议院、总统选举团、总统否决权以及司法解释来加以制衡。

因此，在法国大革命激发了世界各地的大众感情之时，1776年的美国革命家们却在受制于一部作为应对之策的、追溯既往以英国君主政体为楷模的宪法。这种保守的反应不可能持久。宪法制定者是少数，他们的动机受到了怀疑，而且当华盛顿引退时，贵族的地位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不可避免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的程度。先驱们的初衷和时代的道德情感之间这种反差太大了，以致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无法加以利用。

三

杰斐逊把他的当选叫做"1800年大革命"，不过另有深意的是这是一场思想大革命。没有重大的政策变化，但是一个新的传统得到了确立。因为是杰斐逊第一个教会了美国人民把宪法视为民主的手段，他塑造了一些形象、观念甚至许多短语，从那以后美国人就用它们相互谈论政治了。尤其彻底的是精神的胜利，25年后，托克维尔来到了联邦党人的故乡，他注意到，即使那些"被它[共和政府]的持续性惹恼了"的人们，也不难听到"他们公开颂扬一个共和政府的乐趣和民主制度的长处"。①

富有一切远见卓识的宪法之父们却未能看出，一部坦诚的非民主宪法是不可能被长期容忍的。对多数统治的大胆否定必定会使某个人成为先遭枪打的出头鸟，比如杰斐逊就是这样，他

① 《论美国的民主》(1838年第三版)第一卷，第十章(原文如此——译注)，第216页。

的宪法观走得太远了，而且并没有比汉密尔顿做出更多的准备要把政府移交给人民的“粗糙”意志。[①] 联邦党人领袖们是些有着明确信念而且直言不讳的人。他们的公开与私下观点没有真正的差异。但是杰斐逊的思想却不乏模棱两可之处，这不独因为它们有缺陷——汉密尔顿及其传记作者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而且还因为他既信奉联邦又信奉自发的民主政体，但是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科学并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方法能把两者协调起来。杰斐逊把思想和行动搅在了一起，因为他产生了一个绝对没有人产生过的惊人的新观念。不过，尽管不是人人都清楚地理解了人民主权——它看上去极大地升华了人的生命，但却没有任何宪法能够明确否定它而又站得住脚。因此，这种明确的否定被有意识地勾销了，这个一望而知就是有限宪政民主的真正范例的文献，被说成和想成了一个直接民治的工具。杰斐逊实际上已经绝对认为，联邦党人歪曲了宪法，他们在他的想象中已经不再是它的作者了。也就是说，宪法在精神上被改写了。部分是实际的修正，部分则是被实践所修正，例如总统选举团的情况，但主要还是因为通过另一套成见看待它而被修正，即表面上不再让人想起寡头政治。

美国人民终于相信，他们的宪法是个民主的工具，而且确实就是这样对待它的。他们把这个虚构归功于托马斯·杰斐逊的胜利，而且一直是个极为稳定的虚构。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人人始终都像宪法的作者们那样看待宪法，这部宪法大概早就被强行推翻了，因为忠于宪法和忠于民主似乎难以相容。杰斐

① 参见他的弗吉尼亚制宪计划、由财产所有者组成参议院的想法、以及他对司法否决权的看法。Beard, *Economic Origins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第450页及以下。

逊教给美国人民把宪法理解为对民主的表达,从而解决了这个悖论。他本人也是到此止步。但是,在25年或者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的过程中,安德鲁·杰克逊实现了一场由杰斐逊为他准备好了传统的政治革命。

四

这场革命的政治核心乃是自由授权的问题。按照创立了政府的那些人的看法,公职应当被视为一笔财产,不容稍有侵扰,而且他们无疑还希望能够始终把公职掌握在他们那个社会阶层的手中。不过,民主理论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全权公民的信条。因此,当人们开始把宪法看作民主的工具时,永久任职当然就显得不民主了。人们的天然野心恰好与那个时代的巨大道德动力重合了起来。杰弗逊普及了这个观念,但却没有无情地贯彻到实践中去,而且,比较来说,历届州长治下的弗吉尼亚极少出现由于政党轮流坐庄而把什么人免职的情况。是杰克逊开创了自由授予公职的实践。

在短期内轮流任职的原则被视为一项重大改革,这在我们听来不大好理解。它不仅承认普通人享有了新的尊严,即人人都可能适于担任公职,也不仅摧毁了一个小型社会阶层的垄断地位,看上去是把职业对才能开放,而且"是人们鼓吹了若干世纪、对政治腐败最有效的救治措施",是一条防止产生官僚政治的途径。[①] 对公职问题进行急速变革的实践,乃是把产生于独立乡村的民主形象用之于一个巨大版图的做法。

如果是在一个给民主理论提供了依据的理想共同体中,它

① 前引 Ford 书,第169页。

也许能行得通,但在全国范围自然就不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它产生的是完全出人意料的结果,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取代了被吞没的联邦党人。无意当中,自由授权惠及了大批选民,而汉密尔顿的财政措施则是惠及上层社会。我们往往认识不到,我们政府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这种自由授权。因为它切断了那些天生的领袖与自我中心的共同体那种过于密切的联系,削弱了地方精神并且促成了某种和平的合作,正是那些作为地方名流而又缺乏共同利益意识的人们,曾经分头撕裂了联邦。

不过当然了,这种民主理论并没有想到要制造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它决不会迁就这一事实的。民主主义者在要求废除对公职的垄断、实行短期轮换时,他想到的是乡镇的情况,那里的任何人都可以担任一个公职,然后谦恭地回到自己的农庄。民主主义者根本不会喜欢职业政治家阶层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也不会拥有他所喜欢的情况,因为他的理论产生于一个理想环境,而他生活在其中的却是现实环境。他越是深刻感受到民主的道德动力,他就越是不愿体会汉密尔顿如下说法中的深刻真理:相距遥远而又各怀心思的共同体是不可能抱着同样的观点和目的进行长期合作的。因为,这个真理将会延缓任何要在公共事务中完全实现民主的打算,直到它能彻底改善获取普遍同意的技巧。所以,杰斐逊和杰克逊的革命才产生了自由授权的权力,它形成了两党制,创造了贵族统治的替代物,为调节制衡僵局留下了借鉴,而这一切事实上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因此,轮流任职可以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官职是在心腹之间转来转去。任期不可能永久垄断,但职业政治家却是永久的。正如哈定总统曾经说过的,进行统治可能很简单,赢得选举才是深湛的业绩呢。职务薪金可能像杰斐逊的朴实那样示人以俭,

而政党组织的开支和胜利果实却是大手笔。民主的模式支配着可见的政府;但是美国人民不得不难以觉察地修改、迁就和适应着他们所处环境的实际状况,即使人人都能看出这一切。只有法律语言、政治家的演讲、政纲和正规的行政机器不得不与原始的民主形象保持着一致。

五

如果要问一位民主哲学家,那些独立的共同体各自有着高度自我中心的公众舆论,它们如何才能进行合作呢?他的回答可能是,由国会来体现的代议制政府。但是最能让他吃惊的却是,他会发现代议制政府的声望在那么迅速地衰落,而总统的权力却在那么迅速地增长。

某些评论家把这一点追溯到华盛顿喜欢任用地方名流的惯例。他们认为,假如国会由全国性知名人士组成,首都的生活就会更卓越。当然,如果退职的总统和内阁成员都能效法约翰·昆西·亚当斯①,那么事情或许能美妙得多。但是缺少这样的人物并不能解释国会的困境,因为当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最著名的政府分支时,这种衰落就已经开始了。实际上,反过来说大概会更接近实际情况:由于国会不再直接影响全国性政策的形成,所以对那样的名流也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这种现象是世界性的,我想,在以下事实中可以找到其中的主要原因:众议院实际上是一群置身于一个广阔的未知世界中

① 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美国第六任总统,卸任后于1830年当选美国众议院议员,当时有人劝告他,作为前总统接受这样一个位置有失身分。亚当斯回答说,无论什么人都不会因为做国会议员为人民服务而丧失身分。——译注

的盲人。对于某些异议，宪法和代议制政府理论所承认的唯一方法，就是各地区之间交换看法，国会就是干这个的。国会并没有适当的制度化权威途径去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理论说的是，每个地区的出类拔萃之辈都会把他的选民的最高智慧带到这个中枢来，所有这些智慧合在一起，就是国会所需要的全部智慧。这样一来，便无需对表达和交换地方意见的价值表示怀疑了。国会作为一个大陆国家的市场有着巨大的价值。在美国国会的衣帽间、旅馆走廊、供膳食的寄宿处，在国会女主人的茶话会，从临时通道进入世界主义者华盛顿的会客室，都会打开新的前景，视野也会更加宽阔。然而，即使把这种理论付诸应用，即使各地区派来的始终是出类拔萃之辈，那么把地方印象汇集或者结合起来也并不足以成为全国性政策的依据，而且根本不能成为控制外交政策的依据。因为，绝大多数法律的影响都是微妙而隐秘的，那些渗透了地方经验的地方性头脑不可能领悟到。对它们的了解仅仅是通过有节制的报告与客观的分析。这就像一家大工厂的老板不可能通过谈话了解到一个工头的能力，他必须去核查成本报表和各种数据，这只有会计才能给他弄清楚，同样，立法者只是把地方画面拼接在一起并不能得到全美国的真相。他需要地方画面，但是，除非他有办法对它们进行校准，否则此画面几乎就会等于彼画面，且一个会比一个好看得多。

总统是通过报告美国的信息来取得国会支持的。他有条件这样做，因为他统辖着一个庞大的官僚及其代理人的合成体，他们除了行动之外还要提交报告。但是总统告诉国会的都是经过他选择的。他不会受到诘难，而且他会亲自审查什么内容符合公共利益。这是一种完全单向的微妙关系，有时它会达到如此荒谬的程度：国会为了设法得到一份重要文件，竟要求助于芝加

哥的一个报纸记者，或者一个精于拐弯抹角的下级官员。非常糟糕的是，立法者们要想接触必需的事实，不得不依靠私下透露的消息或者使丑行合法化，议员们渴望得到合法的思想养料，但是为此进行的国会调查却像粗暴狂热的大搜捕，有时甚至不惜采取野蛮手段。

如果没有国会调查产生的这点成果，如果没有和行政部门的偶然沟通，没有那些私人搜集的——诸如议员们读到的报纸、期刊和图书等等——有趣或无聊的资料，没有一种极好的新做法——求助于州际商业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关税委员会等等专业机构，国会产生的意见就是一锅大杂烩。由此出现的后果则是，全国性立法要么是由少数知情的内行来制订并要承受党派压力，要么就是成为地方条款的大拼盘，全都按照地方理由去制订。海关税目表、舰船厂、军邮、河道与港口、邮政信箱与联邦建筑、年金与自由授权，统统会作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确凿证据提供给那些凹面共同体。作为凹面，它们能够看出某个白色大理石建筑在联邦资金中拔地而起，从而抬升了地方不动产的价值并雇用了地方承包商，却不容易看出政治分肥累积起来的代价。公道地说，在一个大型集会中，每个与会者的实际知识都不过是他那个地区的知识，对于那些涉及到跨地区事务的法令，议员们不经任何创造性参与就会表示反对或同意。他们仅仅参与制订那些可能被认为是地方热点的法令。如果没有有效的信息和分析手段，一个立法机关必定会在盲目的一致性之间摇来摆去，受到临时的内部分歧和相互捧场的左右。而相互捧场使得那种一致性很令人惬意，因为通过相互捧场，一个议员可以向他那些比较活跃的选民证明，他正在像他们期望的那样照料着他们的利益。

这并非议员个人的错误，除非他以此为得意。即使最精明、

最勤奋的代表，也无法指望他细致入微地了解他参与表决的每一个法案。他能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聚精会神于少数法案，对于其他则是人云亦云。我认识一些国会议员，他们在专心致志于某个主题时，就像未曾研究过那样进行研究，因为那要通过他们的终审，因此要用掉大量的浓咖啡、湿毛巾连同其他一切。他们必须挖掘信息，竭尽全力整理归纳和勘验事实，而这些事实在任何一个自觉组织起来的管理机构中都应当是唾手可得的、从形式上看适于决策的。而且，在他们真正弄清楚了一个主题之后，他们的焦虑才刚刚开始，因为背后还有那些编辑、贸易委员会、中央联合同盟、妇女俱乐部，他(她)们无需进行这样的劳动，却要通过地方的情形来审视议员的业绩。

六

自由授权之所以能把那些政治扛鼎人物吸引到全国性政府中来，就是因为各自我中心的共同体提供了无限多样化的地方津贴和特权。自由授权与政治分肥混合并安抚了无数的特殊观点、地方的不满以及个人野心。也存在着另外两种选择。一是通过制造恐怖和服从进行统治；一是在高度发达的信息、分析和自我意识系统——使“国情知识与国家的理由”家喻户晓——的基础上进行统治。独裁制度已是穷途末路，自由制度则方兴未艾；看一下人们大规模结合在一起的前景吧，国际联盟，工业统治，国家同盟，共同意识的素材已经积累到了这样的程度，它决定着是依靠强力还是依靠比较温和的选择——自由授权和政治分肥——才能带来长远的合作。那些伟大的建国者——比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诀窍就是，他们知道如何运用这些原则。

第十九章　旧物新装：基尔特社会主义

一

无论自我中心的团体之间的争斗多么令人难以忍受，以往的改革者们总是发现不得不在两大选择之间进行取舍。他们可能会取法罗马，把罗马式和平强加给交战的部族。他们也可能走向孤立，以求自主和自足。他们几乎总是选择走起来最近的那条路。如果他们想要尝尝沉闷单调的帝国味道，他们就会把自己那个共同体的简单自由看得至高无上。但是如果他们看到这种简单自由被浪费在狭隘的嫉妒中时，他们就会渴望一个伟大强国的博大秩序。

无论他们作出何种选择，根本的困难都是相同的。如果决策被分散，他们很快就会挣扎在地方观点的喧嚣之中。如果集中决策，国策就会以首都的一个小圈子的意见为依据。总之，要想维护一个地方的权利而反对另一地方的权利，或者把法律和秩序强加给各个地方，或者抵制中央实行阶级统治，或者为了保卫整个社会、集中或分散反对外来的蛮族人，使用强力就是必不可少。

现代民主政体和工业制度都是产生于反抗国王、王国政府

及苛细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时代。在工业领域，这种反抗采取的是彻底放权的形式，比如众所周知的放任主义个人主义。所有的经济决定都应由享有财产权的人自行做出。既然一切差不多都可以为某人所有，那么某人就有可能支配一切。这是一种极端的复数主权。

这是任人发挥经济哲学的经济统治，尽管据认为它受到了政治经济学不变法则的支配、最终必定带来和谐。它产生了许多美好事物，但也制造了一些足够可恶而可怕的事情，从而启动了逆流。其中之一就是托拉斯，它在工业内部确立了一种罗马式和平，对外则表现为罗马式的掠夺性帝国主义。人们转向立法机关寻求救助。他们企盼着建立在乡镇农场形象基础上的代议制政府去规制这些半主权的法人团体。工人阶级转向了劳工组织。接下来就是一个日益集权的时期，并且出现了军备竞赛。托拉斯连锁、行业联盟携起手来合成了一种劳工运动，政治体系在华盛顿越来越强大，在各州却不断削弱，因为改革者们要和大企业进行较量。

在这个时期，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从左派马克思主义到新民族主义——实际上全都环绕在西奥多·罗斯福周围，把集权看作是一种进化的初级阶段，这个进化将会使政治国家吸收掉企业的一切半主权力量。可是除了战时的几个月之外，这种进化并未发生。不过这就足够了，并且车轮转而反对无所不包的国家、支持各种形式的多元化。然而，这时的社会并没有返回亚当·斯密经济人和托马斯·杰斐逊农场的原子论个人主义，而是返回了一种自愿结合的分子论个人主义。

关于所有这些理论上的摇摆不定，其中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是，每一种理论都在依次承诺会出现这样一个世界——那里将没有任何人为求生存而被迫效法马基雅维里。它们全都需要以某

种强制方式来建立，它们全都需要实行强制以保持不坠，它们最后全都会被强制抛弃。然而它们并不承认强制——无论是物质力量还是特殊身分，也无论是自由授权还是特权——乃是它们的理想的组成部分，个人主义者说，富有自知之明的自我利益将会带来内部和外部的和平。社会主义者则断定，侵略的动机将会不复存在。新多元论者希望他们能随心所欲。[①] 强制几乎是所有社会理论的不尽根(surd)，但是马基雅维里主义除外。拒绝马基雅维里主义的诱惑在所有试图把人类生活理性化的人们当中成了大势所趋，因为它被认为荒诞不经、难以启齿、不可捉摸。

二

一个聪明人有时会尽力避免完全承认 G. D. H. 科尔先生论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著作中所展示的那种强力的作用。科尔说，现存的国家"主要就是一种强制工具"[②]；在一个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不存在主权权力，尽管还会有一个协调机构。他把这个机构叫做"公社"。

然后他开始列举公社的权力，我们知道，公社主要的并不是一种强制工具。[③] 它调解价格争端。有时它会确定价格、分配盈余或者弥补亏空。它分配自然资源，控制信贷。它还"调配公社劳力"。它批准各基尔特与行政机构的预算。它征管税收。它对"全部收入问题"都拥有管辖权。它向共同体的非生产人员"分配"收入。它对各基尔特之间的所有政策与权限问题拥有最

① 见 G. D. H. Cole, *Social Theory*, p. 142。

② *Guild Socialism*, p. 107.

③ 同上，第三章。

终裁判权。它批准宪法法律以确定职能机构的职责。它任命法官。它向各基尔特授予强制权、批准它们的实施细则而无论是否含有强制性。它宣战与媾和。它控制武装力量。它是国家对外的最高代表。它确定民族国家内部的边界问题。它视需要而设立新的职能机构,或者给原有的机构赋予新的职能。它管理警察。它制定任何必需的法律以规制个人行为与个人财产。

这些权力并非由一个公社,而是由一个联合组织行使,地方与省级公社连同一个最高的全国性公社一起构成了这个组织。当然了,科尔先生喜欢强调说,这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但是,如果存在着任何一个现代政府——科尔没有给它留出余地——都会拥有的那种强制性权力,我对他的说法就不能苟同了。

然而,他告诉我们,基尔特社会是非强制性的:“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新社会,我们心中想的不是强制,而是自愿奉献。”[①] 因此,每个抱有同样希望的男男女女,都是这样细心理解这种许诺要把强制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基尔特社会规划的,尽管当今的基尔特主义者已经为他们的公社保留了最为广泛的强制权力。我们立刻就能看出,这个新社会的存在不可能以普遍同意为基础。科尔先生过于真诚了,以致无法回避进行过渡所需要的暴力因素。[②] 显然,他不可能预见到如何才能避免内战,但是他很清楚,肯定会有一个时期是工会在采取直接行动。

三

但是,撇开过渡问题不谈,也不去考虑他们未来行动的结

① *Guild Socialism*,第145页。

② 同上,第十章。

果，我们来看一下当人们打开通道奔向这个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以后，基尔特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怎么才能使一个非强制的社会保持运转呢？

科尔先生对这一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答案，即废除资本主义财产权，从而消除侵略动机。然而，他并非真的相信这一点，因为，如果他真的相信，他就会像一般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不怎么关心工人阶级一旦实现了统治将如何管理政府的问题。如果他的诊断言之有理，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完全正确的了：假如弊病就在于资本家阶级而且仅仅在于资本家阶级，那么消灭了这个阶级，人们就会自动得到拯救。但是，科尔先生却有着巨大的关切：革命后的社会应当由国家集体主义，由基尔特或者合作社，还是由一个民主议会或者职业代表来进行管理呢？事实上，基尔特社会主义正是作为一种新的代议制政府理论而引起人们注意的。

基尔特主义者并不指望由于资本主义财产权的消失而出现一个奇迹。他们期望的是——这当然完全正确——如果收入的平等成为一项法则，那么社会关系就会发生深远的变化。但是，就我所能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他们在这方面与正统的俄国共产主义者截然不同：俄国共产主义者是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手段确立平等，认为只要人们在收入和贡献上实现了平等，就会失去侵略的动力。基尔特主义者也打算用暴力确立平等，但他们足够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想要维持一种均衡状态，就必须提供一种维持均衡的制度。因此，基尔特主义者的信念是一种新的民主论。

科尔先生说，他们的目标是“恢复机器的正常运转，尽可能把它调整得能够表达人们的社会意志”。[1] 这些意志需要得到

① *Guild Socialism*，第 16 页。

机会去自我表达“任何社会行为方式”的自治。这些说法的背后有着真正的民主动力，有着提高人的尊严的愿望，以及这样的传统假设：如果每个人的意志不能介入对一切影响着他的事务所进行的管理，那么所谓人的尊严就是可疑的。因此，和早期的民主主义者一样，基尔特主义者寻求的也是一种能够实现这种自治理想的环境。自卢梭与杰斐逊以来，100多年过去了，利益中心从乡村移到了城市。新民主主义者不再可能到那种理想化的农村乡镇去寻找民主形象了。他现在转向了工场。“联合的精神必定只在能够得到最充分表达的范围里才会自由展示出来。显然，这只能是工厂，那里的人们有着共同劳动的习惯与传统。工厂是工业民主天然的基本单位。这就意味着，工厂不仅应当尽可能自由地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且工厂这一民主单位应当成为更大规模的基尔特民主的基础，更大规模的基尔特行政管理机构主要就是基于工厂代表的原则。”①

当然，这里说的工厂是个非常宽泛的用语，科尔先生要求我们把它理解为矿山、造船厂、船坞、车站以及所有成为“天然的生产中心”的地方。② 不过，这种意义上的工厂(factory)，与一个企业(industry)完全不是一回事。按照科尔先生的设想，工厂是这样一种劳动场所：那里的人们有着实际的个人交往，其环境小得足以使所有工人都直接相识。“这种民主假如是现实的，那就应当使基尔特的每个成员都能彻底理解并且直接可行。”③ 这很重要，因为，和杰斐逊一样，科尔先生寻求的是一种天然的统治单位。而唯一天然的单位就是人们相知有素的那种环境。现在

---

① *Guild Socialism*，第40页。

② 同上，第41页。

③ 同上，第40页。

那些大工厂(large plant)、铁路系统、大煤矿,都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天然单位,除非那是非常小的工厂,实际上,科尔先生真正想到的是工场(shop),那里的人们被认为有着"共同劳动的习惯与传统"。其余的工厂(plant)、其余的企业,都是一种进行推论的环境。

四

人人都能看到,而且几乎人人都会承认,在工场的纯内部事务上的自治,就是"能够众口一词地实行"[①] 对事务的管理。但是,对于什么才叫一个工场的内部事务,可能会有些争议。显然,最为重大的那些问题,比如工资水平、生产标准、原料采购、产品销售等等就根本不是纯内部事务。工场民主有自由,但要服从外部环境的极大限制。它可能要在某种程度上为工场安排劳动分工,它可能要去应付个人的性格脾气,它可能要对不大勤奋的工人实行制裁,而且像个初审法庭一样处理较大的个人争端。至关重要的是,它可能要作为一个单位同其他工场、或许还要同整个工厂(plant)打交道。但是,与世隔绝是不可能的。这种工业民主的单位绝对是要同外部事务纠缠在一起的。正是在管理对外关系的问题上,构成了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的考验。

它们不得不由代议制政府按照从工场到工厂、从工厂到行业、从行业到全国的联邦制顺序来管理,也要在地区性代表团体之间进行调停。但整个这个结构却是源于工场,其特有的全部功效也被归因于这一源泉。科尔先生宣称,一个真正的民主政体会产生出一些代表,他们再选出一些代表,这些代表则选出最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七卷,第四章(原文如此——译注)。

终“协调”和“管理”工场的代表。因为他们都是出自一个个自治单位，所以整个联邦制有机体都会受到自治精神与现实的激励。代表们将会自觉贯彻工人“自身所理解的真实意志”①，即工场中的个人所理解的真实意志。

历史将会表明，一个严格按照这种原则运转的政府，不是忙于没完没了的相互捧场，就是陷入各工场间的混战。因为，尽管工场的工人对于工场内部的全部事务可能会抱有某种真实的见解，但是对于工场与工厂、行业、国家的关系问题，他的“意志”往往就会受制于眼界、成见和自我利益的局限，而这些东西也会包围着其他任何自我中心的见解。他在工场的经验充其量也只能让他的注意力顾及到整体的某些方面。什么是工场内部的公正，他可以凭着对基本事实的直接了解而形成他的见解。至于什么是他视野以外极复杂环境中的公正，如果他想根据个别工场的经验进行概括，那么他的见解就很可能错误多多。作为一个经验问题，基尔特社会的代表可能会发现，在他们必须为之作出决定的大量问题上，并不存在工场“所理解的真实意志”。今天的高层工会官员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五

然而，基尔特主义者坚持认为，这种批评是盲目的，因为它忽视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发现。他们会说，你认为工场的代表不得不在许多问题上拿主意，而工场对这些问题并没有什么见解，你的判断可能完全正确。但是你完全陷入了一个古老的谬误：你正在寻找某个人去代表一群人。你找不到这样的人。唯一能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七卷，第四章，第42页。

找到的代表就是能够担负“某些特定功能”的人，因此，每个人都应当帮助进行选择，有多少“不同而又必需的功能团体”就应选出多少代表。[①]

这就意味着，代表们不是为工场中的人说话，而是为这些人所关心的某些功能说话。请注意，如果代表们在履行各该功能时没有按照各该团体的理解去贯彻团体的意志，那就是不忠诚。[②] 这些功能性代表会聚一堂了。他们的事务就是协调与管理。我们理应假定，工场之间的见解存在冲突，否则就没有必要进行协调与管理了，那么，每个代表都是按照什么标准对其他代表的建议作出判断呢？

据认为，这种功能民主的特殊功效就在于，人们会按照他们自身的利益来公正地进行表决，据说，他们的日常经验使得他们非常了解这些利益。他们在独立的团体中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过在对外关系问题上，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团体还是它的代表，所面对的事务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直接经验范畴。工场不会自发地对于整个形势形成一致看法。因此，一个工场如何理解它在行业中、在社会上的权利义务，这是个教育和宣传的问题，而不是工场意识的自动产物。无论基尔特成员选出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代理人，他们都无法回避这个正统民主主义者的问题。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团体还是一个选举出来的代言人，都必须让思想超越直接经验的局限。他必须要对其他工场提出的问题、对超出整个行业界限的事务进行表决。工场的基本利益甚至不能覆盖一个完整的产业职业的功能。一个职业、一个大行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功能乃是一种概念，而不是一种

---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七卷，第四章，第23－24页。

② 参见本书第五部分。

经验，必须进行想象、虚拟、教育和信仰。虽然你可以尽量细致地界定功能，但是，只要你承认每个工场对功能的看法都不一定和其他工场的看法相吻合，那么你就会说，一个工场的利益的代表也应当关心其他工场利益的代表所提出的建议。你会说，他必须考虑一种共同利益。在选举这个代表时，你就会挑选这样一个人，他不仅代表你对你的功能的看法——这一点只有你知道得最清楚，而且还能代表你对其他人关于这种功能的看法的看法。于是，你的选择就会像正统的民主主义者那样模糊起来了。

六

基尔特主义者一心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发挥词语的功能去设计一种共同利益。在他们想象的社会中，世间的一切主要劳动都被按照功能进行了分解，而这些功能又将融洽地合成一体。[①] 他们假定，人们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目的有着根本一致的看法，对于有组织的团体在实现这些目的时的作用有着根本的一致看法。因此，这是一种美好的情感，它引导他们用天主教封建社会中出现的一种制度来命名他们的理论。但是他们应当记得，那个时代的哲人所想像的功能系统，凡人是设计不出来的。我们并不清楚的是，基尔特主义者打算如何继续设计这种系统并使它在现代世界变得可以接受。有时他们似乎在说，这种系统将在工会组织中得到发展，有时又说公社将会确定这种团体的结构功能。但是，他们相信还是不相信这些团体能够确定自己的功能，将会造成重大的实践差别。

---

① 参见本书第十九章。

科尔先生认为，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都将通过在公认的“不同而又必需的功能团体”概念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交往而继续运转。那么如何组织这些不同而必需的团体呢？就我所知，科尔先生认为，一种功能就是与一个团体的人都有关的东西。“功能性民主的实质就在于，一个人要许多次地计算有多少与他有关的功能。”①现在，“有关”一词至少就有了两层意思。你可以用它来指一个人被牵扯进去了，也可以指他的思想被吸引住了。例如，约翰·斯密可能会极为关心斯蒂尔曼离婚案。他可能会逐字逐句地阅读每一条夜班新闻。但是同时，年轻的盖伊·斯蒂尔曼——他离婚的正当性还悬而未决——却根本不去自寻烦恼。约翰·斯密关心的这一套并不会影响他的“利益”，而盖伊无动于衷的这一套却有可能决定他整个一生的成败。我想，科尔先生恐怕会倾向于约翰·斯密。他反击了一个“愚不可及的异议”——按照功能去投票那才叫投票：“如果一个人——比如说对于一打问题——没有足够的兴趣参加投票，而且不可能激发起足够的兴趣参加投票，那么让他无动于衷地盲目投票，其结果并不比他放弃投票权更民主。”

科尔先生认为，无知的选民会“放弃投票权”。由此可以推断，有知的选民通过投票能够表明他们的关切，而他们的关切就会确定功能。②“因此，布朗、琼斯、罗宾逊肯定不是每人只有一票，而是有许多不同的功能票，因为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问题需要采取他们都关心的联合行动。”③我感到非常疑惑的是，科尔先生是认为布朗、琼斯、罗宾逊有资格参加他们自称关心的任何选

① *Social Theory*, p. 102 *et seq*.

② 参见本书第十七章：“由于假设每个人都对重大事务抱着足够的关切，那么只有那些每个人都关切的事务似乎才能算是重大事务。”

③ *Guild Socialism*, p. 24.

举呢，还是认为某个无名氏挑选了一些功能让他们去关心呢？如果非要我回答科尔先生会怎么想，答案可能就是他掩盖了这个难题，因为他有一个极为奇特的假设，即无知的选民才会放弃投票权；那么结论则是，无论功能投票是由高层权力安排的，还是根据一个人只要有兴趣投票就可以投票这一“自下而上”的原则进行的，有知者无论如何都会去投票的，于是该制度就会运转起来。

但是这里有两种无知的选民。有一种人并不知情，而且知道自己不知情。一般来说这是一种开明人士。他是个放弃了投票权的人。但是还有一种人，他无知却又不知道自己无知，也不知道小心谨慎。他可能总是被拉去投票，假如政党机器正在运转的话。他的选票就是那部机器的基础。而且，由于基尔特社会的公社在税收、工资、物价、信贷和自然资源问题上大权在握，如果认为那里的竞选至少不会像我们的竞选一样闹得热火朝天，那就太愚蠢了。

既然如此，那么人们表明关切的方式就不会给一个功能社会的各种功能划定界线。有两种其他的方式也可以界定功能。一种可以通过为实现基尔特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会。这种斗争可能会把按照某种功能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人们锤炼成一些强固的团体，而这些团体将会成为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其中的某些团体，比如矿工和铁路工人，可能会变得非常强大，他们从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获得了关于自身功能的看法，对此他们大概会坚信不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某些处于有利地位的工会将会成为协调与统治的中心，这并不是全无可能。但是一个基尔特社会则必定会发现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它们去应付，因为直接行动将会显示出他们的战略力量，而他们的某些领袖至少不会轻易地把这种力量奉献给自由的祭坛。为了“协

调”这些力量，基尔特社会将不得不聚集它的实力，而且我想，人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激进派将要求公社能够强大得足以界定基尔特的功能。

不过，假如你接着让政府（公社）去界定功能，那么这个理论的前提便消失了。它不得不假设，一个功能系统显然是为了让那些凹面的工场能够自愿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如果在每个选民头脑中没有这样一个稳定的功能系统，那么他在基尔特社会中并不比在正统民主制度下能够更好地把一种自我中心的见解转变为一种社会判断。当然，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功能系统，因为，即使科尔先生及其同道能够设计出一个良好的系统，作为一切权力之源的工场，也会在操作这个系统时去琢磨一番能够从它那里得到什么、指望它能够预见到什么。各个基尔特也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一个系统。这样一来，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要政治事务就不再是如何让这个系统成为保持基尔特社会凝聚力的大框架，而是不断吃力地确定这应当是个什么系统。如果我们同意了科尔先生的功能系统，我们就会同意他的几乎一切。不幸的是，他在前提中嵌入了他希望一个基尔特社会去推论的东西。[①]

---

① 我之所以论及科尔先生的理论而不是苏俄的经验，是因为尽管苏俄这个实验还不完整，但是所有称职的观察家似乎都会同意，1921 年的俄国并不能说明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常态。俄国正处于革命之中，你能够从俄国人那里得知革命是怎么回事，但是你根本不会了解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是怎么回事。然而，首先是作为实践的革命家和公职人员，俄国共产党人并不依靠俄国人民的自发民主，而是依靠一个特殊阶层——经过思想灌输的忠诚的共产党员——的纪律、特殊利益和那种居高临下的历史使命。我相信，在目前这个尚未确定时间限度的“过渡阶段”，矫正阶级统治和强制国家弊病的办法，严格说来就是 homeopathic（顺势疗法）。

第二十章　新　形　象

一

我认为教训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与教育——它们能够成功报道环境、从而使公共生活的现实能够坚决抵消自我中心的舆论，那么共同利益在公众舆论中就根本得不到反映，只能通过一个其自身利益超越了地方局限的专业阶层加以管理。这个阶层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们的行为所依据的信息并非共享的信息，他们所处的地位一般公众无法设想，而且只有在木已成舟之后才能究其责任。

自我中心的舆论不足以成就良好统治——民主理论无法接受这一说法，因而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无穷矛盾。根据它的理论，一如科尔先生所说，人的全部尊严应该表现在“任何一种社会行为方式中”。它认为，表达自我意志是人的无法抑制的欲望，因为人被假设为是生而具有统治才能的。然而经验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自决不过是人性中的诸多方面之一。主宰自身命运的愿望是一种强烈的愿望，但它必须要适应其他同等强烈的愿望，如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对和平的渴望，对免于压迫的渴望。在对民主政体的最初设计中，每个人的表达被认为不仅能够自发地满足自我表达的愿望，而且能够自发地满足对美好

生活的渴望,因为自我表达的本能本来就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表达意志的机制向来都是被强调的重点。民主的黄金国始终是一种完美的环境,有一个完美的选举和代表制度,每个人固有的良好意愿和天赋政治才能都可以付诸行动。在有限的空间和短暂的时期,这种环境曾经非常盛行,换言之,它非常隔绝,充满了各种机会,使得这一理论功效显著,以致人们坚信它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行得通。然而,后来隔绝被打破,社会变得复杂了,人际之间必须周密地进行关系调整。此时民主主义者便忙着设计更加完美的选举单位,以期达到如科尔所说的"恢复机器的正常运转,尽可能把它调整得能够表达人们的社会意志"。但是忙于此道的民主理论家,却远离了人性的实际利益所在。他只关心一件事:自治。人类关心的远不止于此,他关心秩序,关心权利,关心繁荣,关心视听之愉悦,希望摆脱烦恼。自发的民主如果不能满足人们的其他利益,那么它在大部分时候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空中楼阁。因为成功自治的艺术并非本能,所以人们并不是为了自治而渴望自治。他们渴望自治,是为了得到自治带来的结果。这就是自治的冲动常常在反抗恶劣处境时表现得最为强烈的原因。

民主的谬误在于它只关心统治的起源,却忽视了过程和结果。民主主义者一贯认为,政治权力如果源自正道,则必然会带来仁政。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权力的来源上,他迷恋的信条是,表达人民的意志才是大事,原因一,表达乃人的最高利益,二,人民的意志天生即善。然而,对大河的源头无论如何治理,都无法完全控制其后来的表现。民主主义者醉心于寻求一种形成社会权力的良好机制,即选举和代表的良好机制,却几乎完全忽视了人的其他利益。无论权力如何形成,最关键的在于权力如何行使。文明质量的决定因素是权力的使用方式,而使用方

式是无法从源头进行控制的。

如果你想完全从源头控制政府，那么所有重大决策就必定会变成隐形决策。因为，既然没有什么本能可以自动作出带来美好生活的政治决策，那么实际行使权力的人就不仅不能表达人民的意志——因为在绝大部分问题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意志，而且他们还会依据完全不为选民所知的见解去行使权力。

如果在所有细节上根除民主哲学的这一整个假设——统治乃出于本能因而可以由自我中心的舆论来驾御，那么对人类尊严的民主信仰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它将由于同完整的人格而不只是单纯同其中一个方面联系在一起而获得充满希望的新生。因为，传统的民主主义者冒险把人的尊严放在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假设之上，因此他才会认为人的尊严本能地体现在明智的法律和良好的统治之中。选民们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在讲究实际的人们眼里，民主主义者总是显得有点儿傻气。但是，如果不把人的尊严挂靠在一个自治的假设上，而是强调人的尊严需要一个使人能够适当发挥其才能的生活水准，那么整个问题就发生了变化。此时用以衡量统治的标准就成了这种统治能否提供一定的基本医疗、体面的住房、日用品、教育、自由、娱乐以及美的东西，而不是牺牲这一切，只看它是否响应了人们头脑中浮动的自我中心的见解。如果要使这些标准达到确切而客观的程度，那么必定只是少数人才关心的政治决策实际上就与人们的利益产生了关系。

任何时候我们都无法想象会有这样的前景：所有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明白整个无形的环境，从而在全部政府事务上自发形成明确的公众舆论。即使有这种可能性，我们中间很多人是否愿意惹这个麻烦或者花费时间去形成对影响我们的“任何社会行为方式”的看法，也是大可怀疑的。唯一并非幻觉的前景，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各自的空间尽量描绘出无形世界的真实画面，以及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成为保持这种画面的现实性的行家里手。在我们自身可能具有的相当狭窄的注意力范畴之外，社会控制取决于设计出生活标准与核查方法，据此来衡量政府官员和产业领袖的行为。我们不可能像那些玄妙的民主主义者一贯想象的那样亲自激发或指导所有这些行为，但是我们可以坚持将所有这些行为记录在案并客观衡量其结果，从而稳步加强我们的实际控制。或许我应该说，我们会逐渐有望去坚持这样做，因为这样的标准与这样的核查才刚刚开始出现。

第七部分

报　　纸

第二十一章　赢得公众

一

人们必须不断研究这个世界以便去统治它，这种想法在政治思维中只起了很少的作用。其作用甚微，是因为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民主政体的前提得到确立的时代，从有利于进行统治的角度对世界进行报道的方法，比较起来几乎没有什么进步。

因此，如果你问一个早先的民主主义者，作为人民意志之基础的信息从何而来，他会感到大惑不解，就好象你在问他的生命或灵魂从何而来一般。他几乎从来都认为，人民的意志永在，而政治学的责任就是要设法创造出选票和代议制政府。如果有了这种机制并在适当条件下实施，例如独立的乡村或者独立的工场，那就可以克服亚里士多德曾指出过的注意力的转瞬即逝和狭隘，独立共同体理论对此也是默认的。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到了现在，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仍然抱着这一观念不放：只要有了适当的投票和代表单位做基础，就可能建立一个进行复杂合作的共同体。

民主主义者深信，只要你去找，就会找到这样的智慧，因此他们把制造公众舆论的问题当作一个公民自由的问题来看待。[①]

---

① 最出色的研究是 Zechariah Chafee 教授的 *Freedom of Speech*。

"谁能在自由开放的交流中竟会越来越不了解真相呢?"[1] 就算没有人会越来越不了解真相,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真相是在交流中产生的,如同钻木可以取火一般吗? 这一经典的自由信条被美国的民主主义者放到了《人权法案》中。事实上,在这一信条背后有着关于真理起源的若干不同理论。其中一种认为,在各种舆论的竞争中,最具真理性的将占上风,因为真理有着特殊的力量,如果竞争持续的时间足够长,情况就更是如此。当人们坚持此论时,心中想到的是历史的裁判,尤其会想到那些生前被迫害、身后成典范的异端。弥尔顿的问题也是基于人人生而具有认识真理的能力,只要真理自由传播即可得到公认这一信念。由经验也同样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因为经验表明,只要不是在懵然无知的警察眼皮底下,如果人们不能谈论真理,那就不可能发现真理。

人们再怎么高估这些公民自由的实际价值以及维护这些自由的重要性都不算过分。一旦这些自由受到危害,人的精神也就受到了危害。如果在某些时候不得不对这些自由加以限制,例如在战时,那么对思想的压制就构成了对文明的威胁,而如果极端势力利用这种必要性把战时的禁忌大量延伸到和平时期,那就可能阻碍文明从战争的后果中恢复元气。所幸的是,长期以来忍气吞声的人们已经不再喜欢那些职业检查官了,不再愿意遭受恐吓的人们发出了抨击,那些职业检查官逐渐暴露出了卑鄙的面目,原来他们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2]

---

① Milton, *Areopagitica*,引自 Chafee 先生著作的篇首。关于对弥尔顿、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及伯特兰·罗素表述的这一经典自由信条的评论,见我的 *Liberty and the News*,第二章。

② 例见纽约卢斯克委员会的出版物,以及米切尔·帕尔默先生的公开声明,帕尔默先生是威尔逊总统患病期间的美国司法部长。

但是，尽管公民自由至关重要，却不能保证现代世界的公众舆论，因为人们总是认为真相要么是自发性的，要么只有在排除了外部干扰的情况下才能找到获取真相的方式。然而，当面对一个无形世界时，这种假设是错误的。关于遥远或复杂事态的真相并非不言而喻，收集信息的方法是一种专业，而且代价高昂。然而，政治科学，特别是民主政治科学，从未摆脱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基本假设，仍不足以重新确立其前提，使政治学思想解决如何将无形世界展现给现代国家里的公民的问题。

这一传统根深蒂固，以至于直到最近，例如我们大学里讲授的政治科学，仿佛完全忘记了报纸的存在。我指的并不是新闻院校，因为那是些专业院校，目的就是培养专业男女。我指的是对未来的商人、律师、政府官员和一般公民所讲解的政治科学。在这门科学中，对新闻和大众信息源的研究却找不到一席之地，这是个很怪诞的现象。任何对于政治科学并不抱有日常关切的人大概都会莫名其妙，美国的政治学者或社会学家竟然从没有人写过一本关于采集新闻的著作。偶尔也有人提及新闻报道，提到新闻不“自由”，不“真实”，或是应该“自由”和“真实”。但除此之外，我再也找不到其他。而专家们的不屑也反映在公众舆论中。人们一般都承认，新闻报道是接触看不见的环境的主要手段，而实际上几乎所有地方的人们都认为，新闻报道应当自动地为我们做到原始的民主政体想象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为自己做到的事情，即每两三天就为我们描绘一幅我们所感兴趣的整个外部世界的真实画面。

二

这种认为真相不是谋得，而是感悟、揭示和免费提供出来的

老信条，非常明白地反映在我们作为报纸读者的经济偏见上。我们期待报纸给我们奉献真相，无论这真相可能会多么无利可图。为获得这种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服务，我们直到最近仍在期待造币厂能够铸出面值最低的硬币，来报偿这一艰难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工作。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于平时每天付上两三分钱，在周日有插图百科与综艺副刊时挤出个五分或一角。没有人认为自己应该为报纸付钱。人们指望真相之泉汩汩不停，但并不订立法律或道义上的契约以承担任何风险、成本或困难。他觉着合适，他会付点钱表示一下意思；他觉着合适，他也会不付钱；他觉着合适，他还会另选一家报纸。有人曾恰如其分地指出，报纸编辑不得不每日改选。

读者和新闻机构之间这种一边倒的随意关系，是我们文明的一个畸形产物。没有什么现象可以与此类比，因而也就难以将新闻机构与其他行业或机构进行比较。它不是纯生意，部分原因在于这种产品的售价大都低于成本，但主要原因是共同体在用一种道德标准评价新闻机构而用其他标准评价工商业。人们像评判教会或学校一样从道德角度评判报纸，但如果真的将它们相提并论，却是行不通的。纳税人养着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则有捐赠或学费的支持，教会亦有补贴和善款。你也不可能把新闻工作与法律、医疗或工程相类比，因为后者对消费者的服务都是有偿的。如果你从读者的态度去看，自由的新闻就意味着报纸应当免费发放。

然而，人们对新闻机构的批评仅仅表达了共同体的道德标准，他们期望这种机构应该象学校、教会或其他非赢利的行业一样在同一个被假定的水平上维持生计。这再次反映了民主的凹面性。没有必要人为地获取已被感到存在的信息。信息应当自然而然来到我们面前，就是说，应当是无偿的，或者出自公民内

心，或者免费来自报纸。公民付钱打电话、乘火车、开汽车、消闲娱乐，却不舍得付钱得到新闻。

但是，为了使有的人有幸读到他，他也会出手大方。他会直截了当地付钱作广告，也会拐弯抹角地付钱为他人作广告，因为这笔费用是隐藏在商品价格中的，是他不能有效理解的无形世界的一部分。尽管公众会为广告上的商品付出更多的钱，但要让他们花上一瓶冰激凌汽水的价钱获得世界上的所有新闻，就会被看作一件缺德事。公众会为新闻报道付钱，但支出必须是隐性的。

三

因此，发行量就成了达到目的的手段。只有通过广告商打开销路之后，发行量才能变成一种财产，广告商则是从读者支付的间接税中获得收益来购买发行量的。[①] 广告商购买何种发行量要取决于他销售的商品。可能是"以质取胜"，也可能是"薄利多销"。但总的来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线，因为通过广告销售的商品，其顾客既非少数巨富，也非少数赤贫，而是在基本必需品之外仍有余力随意购物的人。因此，能够进入殷实人家的报纸大概就是对广告商最有价值的报纸。这种报纸也可能进入穷人家，但除了某些特定商品外，有头脑的广告代理不会把这部分发

① 《纽约时报》出版商 Adolph S. Ochs 在世界联合广告俱乐部费城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一份权威报纸有权自定广告费率，这样可以把发行量带来的纯收入归到损益表的贷方。要获得净利润，我会从毛利中扣除与发行量有关的促销、发行费用以及其他杂费。"引自 Elmer Davis,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Times, 1851—1921*，第 397—398 页。

行量视为一种巨大财产，除非发行量非常可观，比如像赫斯特[①]先生那样的情况。

一份报纸要是得罪了那些本可以给它带来最佳广告收益的人，它在广告商看来就不是一个好媒介。由于无人会宣称广告是个慈善事业，所以广告商就要购买那些极有把握到达未来顾客手中的报刊版面。人们不必花费太多时间去操心那些未经报道的干货商人的丑闻。它们实在没什么意思，而且这类事件比新闻自由的批评者所想象的要少得多。真正的问题在于报纸的读者不习惯于为采集新闻而付钱，只有把读者变成了发行量，继而将发行量卖给制造商和商人后，才能从读者身上赚钱。而那些最可以利用来赚钱的，正是那些最有钱可花的读者。这样一个新闻机构必定会尊重购物大众的观点。编辑出版报纸就是为了这种购物大众，没有他们的支持，报纸便无以为生。报纸可以藐视一个广告商，可以攻击一家大银行或者公交业，但是如果疏远了购物大众，它就会丧失生存所必需的财产。

曾供职纽约《太阳晚报》的约翰·吉文先生在 1914 年说，[②]美国出版的 2300 多种日报中，约有 175 种是在人口超过 10 万的城市印行的。它们构成了报道“综合新闻”的媒体。它们是采集重大事件消息的主要报纸，即使那些从来不读这 175 种报纸中任何一种的人，最终也得依靠它们了解外部世界。它们组成了许多在新闻交流中进行合作的新闻协会，因此，它们中的每一

①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1863—1951)，美国报纸发行人，后发展为大托拉斯系统。——译注

② John L. Given，*Making a Newspaper* p. 13。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专业书，凡是讨论新闻问题的人都应阅读。霍姆大学图书馆的 G. B. Diblee 先生在 *The Newspaper* 一书中说(第 253 页)：“为新闻人写的论新闻的书，我知道只有一本好书，即吉文先生的书。”

家不仅是其读者的报信人,同时也是给其他城市报道本地新闻的机构。农村报刊或专业报刊一般都从这些主要报纸获取综合新闻。它们当中有些要比其他报纸更加丰富多彩,这主要是在国际新闻方面,而国内的整个新闻界大概都要依赖各新闻协会的报道和几家大都会日报的特稿。

笼统地说,采集综合新闻所需的经济支持,就在那些人口10万以上城市中相当富裕的居民购买广告商品所支付的代价中。这些购物大众的收入主要依靠贸易、经商、制造业和金融业。他们是能让报纸获得最佳广告收益的人。他们的购买力集中,虽然人数上可能不及农民和工人,但在日报覆盖的半径之内,他们能最快地给报纸带来财产。

四

此外,他们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双重权利。他们不仅是广告商的最佳客户,而且他们当中就包括了广告商。因此,报纸给这些公众留下的印象非同小可。幸而这些公众并非众口一词。他们可能都是"资本主义"的,但对何谓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如何运行,则莫衷一是。除非赶上危难时期,否则其舆论分歧之大,足以允许重大的政策分歧。出版商本身通常也是这些共同体的成员,需要老老实实反映其亲朋好友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否则分歧还会更大。

他们从事的是冒险生意,[1] 靠的是综合贸易环境,更具体

① 有时风险性如此之大,为了保证声誉,出版商不得不大举借债。就这一点来说,获得信息是非常困难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信息的普遍重要性往往被严重夸大了。

地说，靠的是发行量，它的基础不是与读者结为婚姻，而是与读者的自由恋爱。因此，每个出版商的目标，都是要把发行量从那些在报摊上抓着什么看什么的乌合之众手里转到一个忠心耿耿的永远的读者群中去。一份真正以读者的忠诚为靠山的报纸，才能成为真正独立的报纸，才能给现代新闻业提供经济支持。[①]一个与报纸患难与共的读者群，其力量超过任何一家广告商，也足以打破广告商的合纵连横。因此，一旦报纸为迎合某个广告商的利益而背叛读者，我们就可以基本肯定地判断出，要么那是出版商的确与广告商同声相应，要么就是他——恐怕是错误地——认为，读者不大可能支持他公开抵制广告商的指手画脚。问题是，不为新闻支付现金的读者，会不会为报纸奉献忠诚。

---

① "这是报业的一个定律：'读者越多，就越能摆脱广告商的影响；读者越少，就越是要依赖广告商。'应当说，广告商越多，他们各自对出版商发挥的影响就越小。这看上去似乎是个矛盾，但事实的确如此。"见前引 Adolph Ochs 的演讲。

第二十二章　永恒的读者

一

购物大众对一份报纸的忠诚不是由任何契约来规定的。在几乎任何其他行业，期待得到服务的人总是要服从个什么协议来控制自己的突发奇想，至少他要为自己的所获而付钱。对于期刊的出版发行来说，最接近协议的做法便是在一定时间内的预订，但我相信，这对一家大都市的日报来说并非重要的经济因素。唯一能够每天判断读者是否忠诚的就是读者自己，没有任何办法能够用来对付他的背信弃义。

尽管一切都有赖读者的忠诚，却并不存在一个哪怕是模糊的传统可以让读者牢记这个事实。他的忠诚取决于他碰巧感觉如何，或者他有什么偏好，而这些又不仅仅取决于新闻的质量，还常常取决于一些模糊不清的因素，但在我们与报纸的松散关系中，我们对这些因素根本懒得去想。至关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根据报纸如何看待我们认为与我们有关的那部分新闻来对它作出评判——假如我们想要评判的话。报纸报道着许多超出我们自身经验的事情，但也报道我们有所经验的事情，而我们经常是根据报纸对待后者的态度来决定对报纸的好恶，以及是信任它还是拒绝它。如果报纸对我们自以为熟悉的事情，如

我们的职业、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政党，有令人满意的报道，它就可以高枕无忧，基本不用担心会受到我们的猛烈批评。一个人吃着早餐浏览报纸，还有什么更好的评判标准能够说明那份报纸正合他意呢？因此，绝大部分人都会倾向于认为，严格说来，报纸最有能力尽到的责任不是面对一般的读者，而是面对特别关注与自身经历有关的问题的那些读者。

除了有关的当事人以外，很少有人能够检验一篇报道的准确性。如果是本地新闻并且存在竞争，编辑知道他可能会听到当事人指责报道失真或失实。但如果不是本地新闻，那么主题的产地越远，批评者就会越少。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的形象在另一个城市受到了歪曲报道，如果他们是有着良好组织且能雇得起知名人士的团体成员，那么他们就是唯一能够纠正这种报道的人。

这里应当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报纸的一般读者如果认为自己被新闻误导，这在法律上是找不到对策的。只有受害的一方可以因诽谤或造谣中伤而提起诉讼，并且必须证明对自己的实际伤害。法律包含着这样的传统认识，即一般新闻并不是个能够引起普遍忧虑的问题，[①] 除非与所谓的伤风败俗或者恶意煽动有关。

但是，新闻本身虽然总体上没有受到漠不关心的读者的审查，其中却包含着某些读者早有先入之见的内容。这些内容便成了读者进行评判的基础，如果读者对某些新闻没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他们就会根据其他标准进行评判。这时他们处理的就

---

① 读者不要误认为这是呼吁新闻审查。但是，如果有能胜任的、最好是非官方的仲裁机构对一般新闻中的失实和不公进行甄别，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参阅 *Liberty and the News*, pp. 73—76。

是一个令他们难辨真伪的主题了,真实性标准也无从应用。如果这类新闻符合他们心中的成见,他们也就不犯猜疑了;如果对它们有了兴趣,他们就会继续读下去。

二

即使在大城市,有些报纸也是按照这样的原则进行编辑的:读者希望读到与自己有关的东西。这种理论认为,如果有足够的人可以经常在报纸上见到自己的名字,看到对其婚礼、葬礼、社交、出游、会议、学校颁奖、五十大寿、六十大寿、银婚、郊游和海滨聚会的报道,他们就能构成可靠的发行量。

这类报纸的经典公式,可见于 1860 年 4 月 3 日霍拉斯·格里利给准备创办一份乡村报纸的"朋友弗莱彻"写的信中。[①]

> 1. 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对一个平常人来说,最让他感兴趣的主题就是他自己;其次他最关注的便是他的邻居,而亚洲和 Tongo 群岛要远远排在后面。……新的教会建立了起来,或者新的成员加入了已有的教会,一个农场卖掉了,一幢新屋盖成了,一座磨坊开工了,一家商店开张了,或者能让十来户人家关心和感兴趣的任何事情,千万不可在其发生后却没有简要而及时地出现在你的栏目中。如果一个农民砍了棵大树,或是种出了巨型的甜菜头,或是小麦或玉米的大丰收,你都要尽量无一例外地如实进行简要报道。

正如李先生指出的,无论何地出版的每一种报纸,都要在一定程度上履行成为"家乡的印刷日志"这一功能。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综合性报纸的传播无法担负这一功能,于是就有了格里利式

① 引自 James Melvin Lee,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p. 405。

的小报在各个城区印行。在曼哈顿和布朗克斯区，区域性日报的数量可能是综合性报纸的两倍，[①] 而且另有各种与贸易、宗教以及民族问题有关的专业出版物作为补充。

这些日报是为那些认为自己的生活饶有趣味的人出版的。但也有许多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枯燥乏味，梦想过一种更为刺激的生活。为满足这些人的需要，有一些整张的报纸或报纸的部分栏目专门报道一套想象出的人物，读者可在自己的幻想中心安理得地欣赏那些滔天罪恶。赫斯特先生对上流社会的不懈关注，正迎合了那些根本无望跻身上流社会，但却能够在阅读报道时仿佛自己也成为上流社会一部分的那些人。在大城市中，"家乡的印刷日志"常常成为最时髦人士的日志。前面已经提到，各城市的日报承担着将远地新闻传达给普通公民的重任。但是，支撑其发行量的却根本不是政治和社会新闻。人们对这类新闻的兴趣时高时低，几乎没有任何出版商会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因此，报纸都喜欢突出其他各种各样的特色，主要目的在于抓住一个读者群，他们也会关心重大新闻，但是并不挑三拣四。此外，在重大新闻上，任何一个共同体内部的竞争都不是非常激烈。新闻机构会把最重要的事件进行标准化处理；只是偶尔才会出现独家头条。显然，像近些年使《纽约时报》成了持各种观点的人们必读物的那类大规模报道，并没有很大的读者群。为独树一帜、抓住稳定的读者群，大部分报纸不得不跳出一般新闻的框子，涉足于五花八门的各个社会层面，丑闻和犯罪、体育、图片、女演员、失恋咨询、高中笔记、妇女专页、购物专页、烹饪食谱、棋局、牌技、园艺、连环漫画、不同凡响的党派偏见等等，这并非因为出版商和编辑们除新闻之外对什么都兴趣十足，而是因

---

① 引自 John L. Given, *Making a Newspaper*, p. 13。

为他们必须找到某个途径，牢牢抓住据说是满怀热诚的读者，某些新闻评论家认为他们总是吵着闹着要知道真相、而且只要真相。

报纸编辑处在一个很奇特的位置上。他的事业要仰仗广告商从读者那里获取的间接税，而广告商的赞助又要依靠编辑为其汇集有效顾客群的技能。这些顾客是凭个人经验和固定的期望来进行评价的，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对于所读到的绝大多数新闻并不具备独立的知识。如果他们的评价并非不利，编辑至少还能换来一定的发行量。但为了保住这一发行量，他不能仅仅依靠宏观环境的新闻。当然，他会尽量把这类新闻处理得趣味盎然，但一般新闻特别是公共事务新闻的质量，不足以使大部分读者分辨各家报纸的优劣。

报纸和公共信息之间这种拐弯抹角的关系也反映在报人的薪酬上。报道从理论上讲是整个行业的基石，但也是报业圈里收入最低、最不受重视的行当。总的来说，能干的人进入此行不是迫不得已，就是为积累阅历，而且一心希望早日脱身。老老实实干报道并不是个能够带来丰厚回报的职业。新闻业的回报是留给专业工作的，是留给具有社论质量的通讯员来稿、行政长官以及有着自己独特技巧和风格的人的。无疑，这应当归因于经济学家所说的特殊才能经济租金。然而，这一经济原则在新闻业中却表现得尤其无情，使采集新闻的工作无法吸引到与其重要性相称的训练有素且精明强干的人员。能干的人从一开始就是抱着尽快脱身的想法而“老老实实干报道”的，我认为，这是从未形成足够的标准以便那些法人传统能够给人一种职业荣耀和一种小心自尊的主要原因。只有这种法人传统才能培育职业自豪感、提高从业水准、惩戒违规行为，给人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实力。

三

但是,这一切还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尽管新闻业的经济规律压抑了新闻报道的价值,但我相信,如果就此而放弃我们的分析,那就是错误的宿命论了。记者固有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经历过报道生涯的人数量如此之众,因而必定有着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相对来说人们没有下那么大功夫把这种职业提升到医疗、工程或法律等行业所享有的地位。

厄普顿·辛克莱先生认为用他所说的"Brass check"[①]可以解释其中的深层原因,[②] 他的话代表了美国的大部分舆论:

> 是你们这些人在编写、印刷和发行我们的报刊杂志,在你们的钱袋里,每个星期都能发现一份 Brass Check。Brass Check 是你们羞耻心的标价——你们把那么多真相拿到市场上去拍卖,你们背叛了人类贞洁的希望,把它抛进了财团的黑窟。[③]

由此说来,的确存在着一些已知的真相和一系列理由充分的希望,被富有的报业老板们有意无意地偷偷出卖了。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自然就会得出某种结论,即如果新闻机构与财团毫无瓜葛,许多真相就会原原本本公诸于众。然而,倘使碰巧有的新闻机构并不受财团控制,甚至连充满善意的控制也没有,却仍然说不出多少真相,这恐怕就是辛克莱先生的理论出了什么差错。

---

① 大财团给报业的贿赂。——译注

② Hilaire Belloc 先生对英国报业作出了实际上相同的分析。

③ Upton Sinclair, *The Brass Check. A Stud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P. 436.

的确有这样的新闻机构。奇怪的是，辛克莱先生对症下药时，并没有要求读者去订阅最激进的报纸。为什么不呢？如果美国新闻业的麻烦归根结底在于财团的 Brass check，为什么对症之药不是去阅读那些根本不接受 Brass check 的报纸呢？为什么要由“各种信念与动机一应俱全”的庞大董事会来资助“国内新闻”，以便印出满是事实的报纸，“而全然不顾伤及的是钢铁托拉斯还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是标准石油公司还是社会党呢？”如果麻烦在于财团，即钢铁托拉斯和标准石油之流，为什么不号召人人都去阅读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或社会党的报纸呢？辛克莱先生没有解释为什么不。但是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无法让任何人，甚至也无法让自己相信，反资本主义的新闻机构是匡正资本主义新闻机构的良方。无论是他的 Brass check 理论还是他的建设性建议，都忽视了反资本主义的新闻机构。但是你要诊断美国的新闻业，你就不能忽视它。如果你关心的是“那么多真相”，你就不会犯下如此低劣的逻辑错误——搜集了一批报纸中你所能找到的不公与谎言，却忽视了另一批报纸中极易找到的同类现象，然后就根据你的有限调查去认定谎言的起因，把它说成是新闻机构的所谓共同特征。如果你继续前进，指责“资本主义”要为新闻机构的错误负责，你就必须证明在不受资本主义控制的地方这些错误就不存在。辛克莱先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尽管他的诊断把一切毛病都归咎于资本主义，他的处方却既忽视了资本主义，也忽视了反资本主义。

人们可能会想，既然辛克莱先生及其同道无法找到任何一家非资本主义的报纸堪称真实性和负责任的典范，他们或许能对自己的假设做一点批判反省。比如，他们或许会自问，那么多被财团滥用、而反财团者又似乎无法获得的真相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这个问题直捣事情的核心，即何谓新闻。

第二十三章　新闻的性质

一

即使全世界的所有记者昼夜不停地工作，也不可能亲历世界上的每一个事件。记者的数量本来就不多，而且谁也没有分身术。记者并没有超人的视力，也不会盯准了一个预言就随意看世界，更没有心灵感应术相佐。然而，这些相对来说数量极少的人却要设法采访报道范围极广的问题，如果不把这些问题弄成一些标准化的模式，那的确算得上奇迹。

报纸并不想照看全体人类。① 它们把人派驻到某些地方，比如警察局、验尸官办公室、县政府、市政厅、白宫、参议院、众议院等等。它们紧紧盯着——或者毋宁说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属于什么协会，而这些协会雇人去——紧紧盯着"不多的几个地方，一旦某人的生活……超出常轨或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发生，便立刻公之于众。比如，假设约翰·史密斯成了一个经纪人。他十年如一日循规蹈矩，除了他的客户和朋友，谁也不会注意到他。对于报纸来说，他仿佛不存在。但是，在第十一年，他蒙受

① 见前引 John L. Given 先生的著作中论"Uncovering the News"的一章，即第五章。

了重大损失，最后一文不名，于是叫来律师，准备做一次陈述。律师匆匆赶往县政府找到办事员。办事员进行了必需的官方记录。这时报纸介入了。就在办事员记录史密斯的生意寿终正寝时，记者探头看了看，不消几分钟便了解了史密斯的麻烦，也搞清楚了他的业务状况，比他们在史密斯家门口安个记者盯梢十年毫不逊色。"①

当吉文先生说报纸了解了“史密斯的麻烦”及“他的业务状况”时，并不是说他们了解的与史密斯本人所知的一样，或者像阿诺德·本内特先生假如要把史密斯写成一部三卷本小说主人公时的那种了解。报纸知道的只是“几分钟”内在办公室所记录下的事实梗概。这一公开的行为“揭开”了关于史密斯的新闻。新闻还会不会继续报道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关键在于，当一系列事件成为新闻之前，它们常常会通过某种多多少少是公开的行为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一般都是不加修饰的公开行为。史密斯的朋友可能多年以来早就知道他在冒险，如果这些朋友喜欢饶舌，某些传言可能也早就传到了金融版编辑的耳朵里，但也仅此而已。这一切不可能公开报道，因为那可能是诽谤，传言中没有什么确凿的依据可以形成报道。必须有确凿的事件以无可置疑的形式发生，比如可能是宣布破产，也可能是一场火灾、一起撞车、一顿殴打、一通骚乱、一次拘留、一个恐吓、一项法案的通过、一席讲话、一次投票、一个会议、一位知名人士的公开表态、一篇报纸社论、一次拍卖、一张工资表、一次价格的变化、一个建桥的动议……。必须有一个表现形式。事件的发展必须形成某种确定的形态，而且，在达到一个形成了某种既成事实的阶段之

① 见前引 John L. Given 先生的著作中论“Uncovering the News”的一章，即第五章，第 57 页。

前，新闻所面对的就只能是大量可能的真相。

二

很自然，在事件有了某种形态、能够加以报道时，也就有了产生广泛的舆论分歧的空间。一个优秀记者能够比一个混子更多地发现新闻。如果他看到一个建筑物问题百出，不会等到楼塌下来才明白这里面有新闻。如果听到某某爵士在打听印度的风土人情便猜到了下一位印度总督的名字，那就是一位了不起的记者。的确存在幸运的机会，但能碰上运气的人却为数不多。一个事件往往会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场合——即能够表明新闻动向的场合——表现出一种固定的形态。最引人注目的场合则是人民的事务触动公共权力时的场合。*De minimis non curat lex*。这样的场合就是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聚散离合、法律诉讼、骚乱、瘟疫、灾祸等等为众所周知的场合。

因此，首先，新闻不是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而是对已经显露出头角的那方面的报告。新闻不会告诉你种子如何在土壤中生长，但可以向你报告第一棵秧苗的破土而出，甚至告诉你某人对种子在地下的情况都说了些什么。它还可能告诉你新芽并不是在预期的时间冒出地面的。任何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可以确定、证实、衡量和命名的特点越多，新闻的发生点就越多。

因此，假使有一天某个立法机关绞尽脑汁寻求人类进步的途径，居然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应当禁止棒球比赛时记录分数，人们也还是有办法继续打球的，只要裁判根据自己对公平竞争的理解确定每场球应打多长时间、哪一队攻垒、谁是赢家就行了。如果报纸对球赛进行报道，可能会提到裁判的决定，还有记者对观众喝彩或起哄的印象，还会隐约提到某些没有规定位置的人

在没有标界的草皮上瞎忙了几个钟头等等。越是想象这种荒唐局面的逻辑，事情就越是明显：如果没有一套记名、记分和记录的人马与规则，要想达到采集新闻的目的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达到比赛的目的了）。由于方法远不完备，裁判的日子常常就很难过。许多关键的打法他不得不用眼睛来判断。如果有人认为值得把每个动作都拍摄下来，比赛可能就不会出现纠纷，正如人们按照规则下象棋时不会出现纠纷一样。正是电影最终解决了许多记者心中的疑问，因为人眼毕竟慢几拍，分不清究竟是登普西的哪一拳击倒了卡庞捷。①

只要有了良好的记录手段，现代新闻报道就可以极为准确。股票交易所就有这样的手段，股价变化的新闻便随着行情自动收录器而不断闪现出来，十分准确。报告选举结果也有了这样的办法，如果计票与列表有条不紊，全国大选结果在选举日当晚就可以家喻户晓。在那些文明的共同体中，死亡、出生、结婚、离异均有记录，而且是准确的记录，除非故意隐瞒或出现疏忽。产业界和政府在某些而且只在某些方面有这种机制，以不同的精确程度记录着证券、货币和大宗商品、银行清算、房地产交易、工资规模等等情况。进出口贸易也是这样，因为它们必须通过海关并且直接被记录在案。国内贸易特别是通过经纪人事务所而不是通过交易所的贸易活动就根本到不了同样精确的程度。

我认为，在新闻的确切性和记录系统之间可以发现非常直接的关系。回想一下改革者们对新闻界发出严重指控时涉及到的那些问题就会发现，这是一些常常使报纸处在无记分规则的棒球赛裁判那种困境的问题。所有与精神状态有关的新闻都有

---

① Jack Dempsey（1895—1983），美国拳击手；Georges Carpentier（1894—1975），法国拳击手。——译注

这种特点，它们触及的是性格、心意、欲望、动机、意图、大众情绪、民族情感、公众舆论、外国政府的政策等等。更多的新闻是在谈论即将发生的什么事情。这类新闻常常涉及私人收益、个人收入、工资、劳动条件、劳动效率、受教育机会、失业率[①]、单调乏味、医疗、歧视、不公、贸易限制、浪费、"落后民族"、保守主义、帝国主义、激进主义、自由、荣誉、正直等等。所有有关的资料充其量都是零零碎碎的记录。资料可能会因为检查制度或者隐私传统而被隐藏起来，也可能因为无人意识到其重要性，或者因为不愿费事，或者因为尚未发明出客观的评价系统而根本不存在。这类新闻只要没有被彻底忽略，就必定会引起争议。报道这种找不到什么痕迹的事件，不是出于私人或传统的观点，就是根本不能叫做新闻。在有人提出异议，或者有人进行调查，或者有人借题发挥之前，用个词源学的词义来说，在引起了对它们的**争论**之前，它们就算不上新闻。

这就是新闻广告人(press agent)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应当使每一个有组织的群体——无论它们希望获得还是回避知名度——都能真正认识到，什么样的事实或者什么样的印象应予报道，都需要极为谨慎，而践行这样的谨慎却不光是记者的责任。雇用一个介于这些群体和报纸之间的新闻广告人就比较保险。一旦雇用了他，利用他的战略地位就有了极大的诱惑力。弗兰克·科布先生说："大战前不久，纽约报界对经常受雇和经常受到赞誉的新闻广告人进行了统计，结果是有 1200 个之多。现在(1919 年)有多少，我不敢断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许多直接的新闻渠道被堵住了，为公众提供的信息首先要经过知名的新闻广告人过滤。大公司用他们，银行用他们，铁路用他们，所

① 请想一想在 1921 年的失业率报道中掺进了多少猜测的成分。

有的商业、政治及社会活动机构都用他们,他们成了新闻来源的媒介。甚至政治家也用他们。"①

如果新闻报道只是去发现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么新闻广告人就不过是个办事员。但是,在绝大部分的重大新闻中,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也根本谈不上显而易见,而是需要选择和判断,因此,很自然,每个人都希望见诸报端的是他自己喜欢看到的事实。新闻广告人就是干这个的。他的活动肯定会给记者省去许多麻烦,会给记者提供一幅清晰的画面,否则记者就可能摸不着头脑。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新闻广告人为记者制作的画面乃是他希望让公众看到的画面。他既是检查官,又是宣传员,他只对雇主负责,只有在符合雇主的利益时,他才会对整个真相负责。

新闻广告人的产生,清楚地表明了现代生活的重大真相不会自发地形成众所周知的形态。必须有人赋予它们形态,由于记者不可能按照常规给事实一种形态,而不抱偏见的信息机构又几乎不存在,于是抱有偏见的各方当事人就会去满足阐述某些事实的需要。

三

那些出色的新闻广告人都明白,他们这个行当的业绩并不是新闻,除非这种业绩怪诞得完全越出了生活的常规。这不是因为报纸不喜欢业绩,而是因为在没有人盼着发生什么事情时,你却在那里劝告大家别盼了、别盼了,这毫无价值。因此,如果

① 1919年12月11日在纽约妇女城市俱乐部发表的演讲。发表于1919年12月31日《新共和》,第44页。

新闻广告人想要免费出名，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他就必须动手做点什么。他会导演一场戏：妨碍交通，戏弄警察，想办法让他的当事人或目标卷入一个已经成为新闻的事件。主张扩大参政权的人很明白这一点，虽不特别乐于承认，但却一直照此行事，而且一直把普选权问题当作新闻由头，尽管关于普选权的论点早已味同嚼蜡，人们已经渐渐安定下来，认为普选运动是美国生活的既定制度之一。①

幸亏，这些不同于男女平等主义者的人有着非常具体、非常简单的目标。投票的象征意义并不简单，无论是最能干的鼓吹者还是最有力的反对者对此都很清楚。但是投票权却是一项简单而为人熟知的权利。劳资纠纷大概是人们指责报纸时的主要话题，而在今天的劳资纠纷中，罢工权就像投票权一样简单。然而，一场特定罢工的起因及其目标，却如同妇女运动的起因和目标一样极难捉摸。

我们可以假设导致罢工的原因是劳动条件恶劣。那么如何判断它是否恶劣？是某种关于生活、卫生、经济保障和人的尊严的适当标准的概念。行业条件可能会远远低于共同体的理论标准，工人们可能会过于悲惨，但却懒得提出抗议。有的条件可能会高于这个标准，工人却仍然会强烈不满。标准充其量也是个模糊的尺度。但是，我们假设条件低于编辑心目中的平均水平。有时无需工人发出威胁，只要社会工作者稍加提醒，编辑就会派记者去调查，提醒人们注意恶劣条件的存在。当然，他不可能常有此举，因为这类调查耗时、耗资，需要专业人才，还会占去大块

① 参阅 Inez Haynes Irwin, *The Story of the Woman Party*。书中不仅出色地描述了一场大煽情的精彩片段，而且充分展示了公众注意力、公众利益和政治惯例在现代条件下产生的非革命、非阴谋而又卓有成效的煽情运动。

版面。要想使对恶劣条件的报道切实可信，非得花去几个专栏不可。为了如实报道匹兹堡地区钢铁工人的情况，就必须有一批调查人员，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必须占用若干个大版面。很难设想任何一家日报会把进行匹兹堡调查甚或各教派联合的钢铁报道作为自己的职责之一。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获得的新闻往往为日报的财力所不支。[①]

恶劣条件本身并非新闻，因为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新闻报道不是对原材料的第一手报道。它报道的是格式化之后的材料。因此，如果健康委员会报告一个工业区死亡率奇高，恶劣条件才有可能成为新闻。没有前者，事实本身并不形成新闻，除非工人们组织起来向雇主提出要求。即便工人们提出了要求，如果争议很快解决，无论恶劣条件是否因争议的解决而改善，其新闻价值都会降低。但假如劳资关系恶化为罢工或僵局，事件的新闻价值就会提高。如果罢工涉及到与报纸读者直接相关的某种公用事业，或者会打破某种秩序，它的新闻价值就更大。

通过某些易于捕捉的征兆，比如一项要求、一场罢工或一次骚乱，可以在新闻中反映出潜在的问题。从工人的角度或从主持正义的旁观者角度来看，那项要求、那场罢工或那次骚乱本身，只是对他们而言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中的偶然事件。但是由于眼前的全部现实超出了两者的直接经验，或者超出了报纸所依托的绝大多数特定公众的直接经验，报纸一般都会等待以

① 不久前，巴伯·鲁思(Babe Ruth，1895—1948，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为首批入美国棒球荣誉厅的5人之一。——译注)因驾车超速而被监禁，在下午球赛开始前他被放出。为补回因监禁而耽误的时间，他再次违规超速，驾车直奔球场。警察没有阻拦他，但一个记者却为他记了时，并在第二天早上公布了他的驾车速度。巴伯·鲁思是个特殊人物。报纸不可能为所有人记录车速，他们只能从警察局得到超速驾车的新闻。

公开行动为表现方式的信号。当信号出现时，就是说，工人罢工了，或者警察被召来了，人们对于罢工或骚乱的成见便开始起作用了。那种看不见的斗争完全失去了本相，人们只是抽象地注意到它，然后这种抽象又被读者和记者的直接经验所激活。显然，这与罢工者的经验大相径庭。可以说，罢工者所感受的是工头的坏脾气、机器的单调、空气的污浊、老婆的无聊、孩子的胡闹、居所的昏暗。罢工的口号与这一切息息相关。但是记者和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一场罢工和几句口号，然后他们会掺进自己的感受。他们的感受可能是，他们的工作会变得没有保障，因为罢工工人可能会妨碍他们所需的物资供应；罢工可能导致商品短缺、价格上涨；罢工使得一切都极为不便。这些也是现实。当他们把发生了罢工这一抽象新闻弄得有声有色时，当然就把工人放在了一个不利的地位上。可以说，现存劳资关系体制的性质决定了，由工人的痛苦或希望所引发的新闻，几乎一概都是透过一次对生产的公开打击而披露出来的。

因此，你看到了极为错综复杂的环境，看到了凸显这种环境的公开行动，看到了以固定成见发布信号的公告，看到了读者从对他有着直接影响的经验中得出意义之后所注入的那种意义。这样一来，读者对罢工的体验确实非常重要，但从导致了罢工的核心矛盾的角度来看，这种体验却是偏颇的。但是这种偏颇的意义却能自动成为最令人感兴趣的意义。[①] 对读者来说，他必须走出自我，进入完全不同的世界，才能富有想象力地触及核心问题。

所以，对罢工进行报道的捷径，就是借助公开行动揭示新闻，把事件描述成与读者的生活相冲突的故事。这是最能引起

---

① 见本书第十一章。

他的注意、也最容易调动起他的兴趣之所在。工人和改革者们所看到的报纸的故意歪曲报道，其实大部分——我个人认为是关键部分——都是揭示新闻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造成的直接后果，以及在把远距离的事实变得饶有趣味时所存在的感情困难，除非如爱默生所说，我们能够“完全将(这些事实)看作是我们熟知的经验的一种新表现”，并且能够“立即着手(把它们)移译成我们的经验所熟悉的事实”。[①]

研究一下新闻机构对一次罢工进行报道的许多路数，你往往就会发现，争端很少出现在大标题中，导语中也几乎见不着，有时甚至通篇只字不提。另一个城市的一场劳资纠纷必须意义极为重大，新闻报道中才会包含明确的信息告知人们纠纷的症结所在。新闻的常规就是按照这种路数运作的，对政治争端和国际新闻的报道差不多也是这套路数。新闻所描述的是那些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公开化阶段，而且诸多方面的压力也迫使报纸固守这一常规。压力来自删繁就简的需要——因为它只能去关注一种局势的定型阶段。压力来自找到这种记者的困难——他们能够洞察到他们尚未学会去洞察的东西。压力来自这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困难——即使最出类拔萃的记者也难以找到足够的版面去发表言之有理、打破常规的看法。压力来自经济上的需要——必须迅速抓住读者的兴趣，如果根本不能打动读者，或者由于对意外消息报道得不充分或是叙述得很拙劣而开罪了读者，报纸就会陷入经济危机。所有这些困难共同导致了编辑在遇到迫在眉睫的危险问题时感到难以把握，并且自然而然地去选择那种不争的事实，以更容易引起读者关注的方式加以处理。

---

① 语出他的随笔《艺术与批评》。引语见 R. W. Brown 教授的 *The Writes' s Art* 一书第 87 页。

不争的事实就是罢工，而读者很自然就会关注的是罢工引起的不便。

最微妙、最深奥的真相就是目前产业组织中那些极不可靠的真相。它们涉及到对生活水准、生产率和人权状况的判断。由于缺少精确的记录和量化分析，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可以无休无止。只要产业中不存在这种记录和分析，那么新闻的运作便如爱默生引用伊索克拉底的话所说，很容易成为“小题大做和大题小作”。[①] 凡是产业中不存在宪法程序、没有对证据和权利要求进行专业审核的地方，那么能让读者感到耸人听闻的那种事实，就会成为几乎每个记者都要去追逐的事实。既然大行其道的是这样的劳资关系，即使什么地方存在着协商或仲裁，但却没有对事实的独立的过滤以得出结论，那么读报大众所认为的争端往往就不是产业所认为的争端。而且，试图通过报纸呼吁进行争论，也会给报纸和读者带来他们不可能也不应当承担的重负。只要不存在现实的法律和秩序，大部分新闻都将不利于那些没有合法而有序的手段坚持自身权利的人们，除非新闻能够自觉勇敢地改弦易辙。出自行动舞台上的公告可能会指出权利要求所导致的麻烦，却不会提到产生权利要求的原因。这原因是无形的。

四

编辑要处理这些公告。他坐在办公室审读，基本上看不到事件本身的原貌。我们已经看到，他每天都必须讨好至少一部

① 语出他的随笔《艺术与批评》。引语见 R. W. Brown 教授的 *The Writes' s Art* 一书第 87 页。

分读者，否则如果其他竞争对手的报道正对读者的味口，他就会被无情地抛弃。他的工作压力极大，因为报纸的竞争往往就发生在弹指之间。对每份公告都要作出迅速而复杂的判断。编辑必须理解每一份公告，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根据自己对读者兴趣的判断，对其内容加以渲染或进行低调处理。如果没有标准化作业，没有成见，没有常规性的判断，不去无情忽略那些微妙之处，编辑恐怕很快就会死于兴奋过度。当天报纸最后版面的大小是固定的，而且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准备就绪；只能给新闻加上有数的标题，每个标题都必须限定字数。总也拿不准购物大众有什么样的迫切需求，总是有被指责为诽谤的危险，总是存在招来无数麻烦的可能性。如果没有系统化作业，这一切根本就无法应付，而标准化生产则能节省时间和精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败局。

在这点上，报纸间的相互影响最为深刻。因此，战争爆发时，美国报界就面临着一个它们从未经历过的问题。某些财力雄厚租得起电缆的报纸，在抢新闻上便占了先机，其新闻报道方式就成了整个报界的模式。但这种模式从何而来呢？来自英国报界。这不是因为诺思克利夫[①]子爵拥有了美国报纸，而是因为最初比较容易买到的是英国的新闻稿，还因为美国记者读英国报纸的新闻比读其他来源的新闻更方便。伦敦是电报和新闻中心，正是在那里逐渐发展出了某些战争报道技能。对俄国革命的报道也是类似的情况。当时，获得俄国消息的途径不仅被俄国与协约国的军事审查所封闭，更因为俄语造成的困难而极

① Alfred Charles Northcliffe(1865—1922)，英国报纸发行人，创办或收购经营过多家报刊，1906 年取得对《泰晤士报》的控制权。1905 年封为子爵。——译注

为不畅。但是,闭塞了有效新闻报道的首先是这一事实:无法形容的混乱,尽管这混乱是逐渐形成的。这使得对俄国发生的新闻所做的阐释,从一开始就处于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日内瓦、巴黎、伦敦的检查官和宣传者控制之中。他们长时间不受任何制约。终于,他们陷入了一种荒唐的境地,制造了一套能够引起仇恨与恐慌的成见——应当承认,里面也有俄国大动乱的某些真相——如果谁还想去了解并道出实情,即使最出类拔萃的新闻直觉也早被碾碎了。

五

到达读者手中时,每份报纸都已经是一系列选择的产物,这些选择包括印什么新闻、印在什么位置、每条应占多大版面、各自的重点是什么等等。这里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也没有什么成例可循。以在同一城市同一天早上出版的两家报纸为例,其中的一家头条大标题为《英国发誓帮助柏林抵抗法国入侵;法国公开支持波兰》。而另一家的则为《斯蒂尔曼太太[1]另有所爱》。你喜欢哪一条是个口味问题,但对编辑来说就不完全是个口味问题。他要解决的问题是判断如何才能让某一批读者拿出半小时的注意力放到他的报纸上。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决不等于严格按照宗教教义或者某种道德文化形态规定的方式去陈列新闻,而是如何激发读者情感,使他与所读内容产生共鸣。如果不能给读者提供机会使他对新闻所描述的斗争如临其境,新闻就

---

① 美国金融家与银行家詹姆斯·斯蒂尔曼(1850—1918)之妻。詹姆斯·斯蒂尔曼任总经理时,纽约国民城市银行(现为花旗银行)成为美国最强大的金融机构。——译注

不可能吸引大量读者。读者必须通过个人的认同，像参与演剧一样参与新闻。就像每个观众在看到女主角身处险境时都会屏住呼吸，或者想要帮着巴伯·鲁斯打上一棒一样，读者就是以这种微妙的方式进入新闻的。为了进入新闻，他必须先在故事中找到一个熟悉的门槛，这就是成见所要起的作用。这些成见告诉他，如果木材商协会被称为“康拜因”，他就理所当然可以表现出敌意；如果它被称为“知名实业家团体”，那么成见就会引导他做出善意的反应。

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便形成了制造舆论所需要的能量。编辑们则进行强化。有时报纸上的新闻过于混乱，令读者难以认同，那就要给读者提供一个线索。如果他要在忙忙碌碌中了解新闻——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这条线索就是必不可少的。他需要某种提示，告诉他像他这样的人在什么地方可以和他读到的新闻产生共鸣。

沃尔特·巴格霍特写道：“据说，只要你有办法让一个中产阶级英国人琢磨一下‘天狼星是否有蜗牛’，他很快就会拿出自己的看法。能让他琢磨这个问题不容易；不过一旦开始思考，他不会消极等待，他要得出自己的结论。当然，对于任何日常的问题，情况都是如此。一个杂货商也会有一套外交政策，一位少妇则会有一套完整的圣事理论，而且两者对此都会毫不怀疑。”①

然而，同一个杂货商却会对自己的商品满怀疑虑，而那位对圣事确信不疑的少妇也会根本拿不准是否应该嫁给那杂货商，或者如果不，又是否应当接受他的殷勤。能够作出消极反应，意味着要么是对结果兴趣不大，要么是强烈意识到了还有其他竞争因素。就这两位的外交政策或者圣事而言，对结果的兴趣是

① Walter Bagehot, *Literary Studies*, Vol. III, p. 172.

浓厚的，而检验其见解的手段却很贫乏。这正是综合新闻的读者所面临的困境。如果他读了新闻，就说明他肯定有兴趣，也就是说，他肯定会进入情况并关心结果。一旦这样做了，他就不可能持消极态度，除非拥有独立的手段去核查报纸给予他的提示，否则他感兴趣这一事实本身就可能使他难以对各种见解进行权衡，即使这些见解可能最接近事实真相。他的兴趣越深，就越会对不同意见，甚或稍微令人不安的新闻产生不满。这就是一旦报纸挑起了读者的党派情绪便很难再改变立场的原因。如果必须改变，就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谨慎。一般报纸都不会轻举妄动。比较轻松也比较安全的做法是等待这类新闻渐渐销声匿迹，如同断了氧的火自然会熄灭一般。

第二十四章　新闻、真相与结论

一旦我们开始更为精确地研究新闻机构，很多问题就要取决于我们的假设是什么。如果我们和辛克莱先生及其大部分反对者那样，假设新闻和真相其实说的是一回事，那么我认为我们就不能取得任何结果。我们可以证明在这一点上报纸说了谎，也可以证明在那一点上辛克莱说的是谎言；我们可以证明辛克莱先生撒谎说有人在撒谎，也可以证明有人说辛克莱撒谎其实也是谎言。我们可以发泄我们的情感，但到头来都是枉费气力。

我认为最有生命力的假设是新闻和真相并非同一回事，而且必须加以清楚地区分。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则是揭示隐藏的事实，确立其相互关系，描绘出人们可以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现实画面。只有当社会状况达到了可以辨认、可以检测的程度时，真相和新闻才会重叠。这只是人的全部兴趣领域的一小部分。在这一领域中，也只有在这一领域中，对新闻的检验才能达到足够精确的程度，使对歪曲或隐瞒报道的指控超越党派偏见。一家报纸曾经 6 次报道说列宁死了，它得到的唯一消息就是一则列宁死了的报道，而消息来源又屡被证明不可靠，这无论如何都是没有道理、无可辩解、不可原谅的。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不是“列宁死了”，而是“赫尔辛基说列宁死了”。报纸应当负责任地寻找可靠的新闻来源，这样才不至于让

列宁多死好几次;如果说有个问题对编辑们而言责任最为重大,那就是对消息来源之可靠性的判断。但是,如果要去报道——比方说——俄国人民的愿望,这样的考验就不存在了。

我认为,缺乏精确的检验,说明了这一职业所具有的特性,因为再无其他的解释了。精确的知识数量有限,无需有了特殊的才能或训练再去从业。剩下的就要靠记者自己去把握了。等他离开约翰·史密斯走向破产的地方——这在县政府那个办事员那里已被明确记录在案——所有固定的标准便统统消失了。约翰·史密斯为什么失败,他的人性弱点,对造成他破产的经济环境的分析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有无数种不同的解释。与医学、工程学甚至与法律不同的是,应用心理学没有什么权威的清规戒律能够在记者的头脑从新闻进入朦胧的真相领域时给他以指导。没有什么准则去指导他自己的头脑,也没有准则来制约读者或编辑的判断。他对真相的说法只是他自己的说法。他如何证明他所见的就是真相呢?他无法证明,甚至无法像辛克莱·刘易斯那样证明他已说出了关于"大街"的全部真相。他对自身的弱点越了解,就越愿意承认如果没有客观的检验标准,他自己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据自己的成见、按照自己的准则、出于自己的迫切兴趣而形成的。他知道他是戴着主观眼镜看世界的。正如雪莱所说,他无法否认自己也是一个沾染了永恒白光的彩色玻璃球。

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他的自信便会受到锤炼。他或许能满怀道德勇气,他有时会有,但他缺乏的就是对某种技能——使自然科学最终摆脱了神学控制的技能——的持久信念。正是一种无可质疑的方法的逐渐发展,才使自然科学家获得了抗衡整个世俗权力的精神自由。但是,记者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实际上都没有这样的支持。上司和读者的见解控制着他,但这种

控制并不是出于偏见而对真相实行的控制，而是出于彼见解而对此见解实行的控制，尽管那个彼见解说起来并非更不真实。格雷法官认定工会将毁掉美国的制度，而冈珀斯先生则断言工会是人权组织，两者孰是孰非，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你愿意信谁。

简缩这些矛盾，把它们弱化到能够作为新闻加以报道的程度，这不是记者可以成就的任务。记者可能也必须对人们说清楚他们据以形成见解的真相有着不确定性，并通过批评与鼓动去激励社会科学对社会现实作出更切实的解释，促使政治家建立更透明的制度。换言之，新闻界能够为报道更大范围的真相而斗争。但在当今社会真相被有机化的状况下，新闻机构的力量尚不足以逐版逐篇地提供公众舆论的民主理论所需要的知识规模。这并不能归因于 Brass Check，激进报纸的新闻质量可以证明这一点；而是因为新闻机构所面对的社会是一个对各种支配力量没有完备记录的社会。认为新闻机构可以孤军奋战记录这一切的说法是错误的。它能够记录的通常只是由于制度的运转而被它记录下的东西。其余的便都是些观点和见解，而且随着世事变迁、自我意识和意气用事而起伏不定。

虽然新闻界并不像辛克莱先生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劣迹累累和诡计多端，但它实际上比民主理论业已承认的要脆弱得多。它过于脆弱了，无法承担人民主权的全部分量，无法自动提供民主主义者希望它天生就能提供的真相。如果我们期待它提供这样的真相，我们就是在使用一种误人视听的判断标准。我们误解了新闻的局限性，误解了社会的无限复杂性；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忍耐力、公益精神和多方面的能力。我们自以为爱好那些并非根据我们自己的口味，经过诚实分析而揭示出来的不偏不依的真相。

因此，如果要让报纸承担对整个人类生活进行解释的责任，以使每个成年人都对每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产生一种见解，那它们就显得很脆弱，它们必定是脆弱的，在能够想象到的未来，它们将继续是脆弱的。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指望劳动分工和权力分散而运行的世界，会由全体人民的统一舆论来统治。这种想法不自觉地把单个读者设想为理论上的全能读者，让新闻机构承担起无论任何代议制政府、行业组织或外交机构都担不动的重负。新闻机构被要求在24小时内对每个人产生30分钟的影响去造就叫做“公众舆论”的神奇力量，以填补公共机构的懈怠。新闻机构常常错误地认为它可以做到这一点。它为此而付出了极大的道义代价，鼓励了一种仍然固守着原始前提的民主政体去指望报纸为每个政府机构、为每个社会问题，自动提供这些机构自身不去正常提供的信息。制度由于不能给自己提供知识工具而变成了“问题”结，而这些问题据认为要由作为一个整体在读报的全体人民来解决。

换言之，新闻机构被当成了一个直接民主的机构，在更大规模上日复一日地担负着本该由提案、公决或罢免等程序完成的功能。“舆论法庭”夜以继日地为一切规定着法则。这并非切实可行。而且，如果考虑到新闻的性质，这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已经知道，新闻的精确度与事件记录的精确度成正比。除非事件可以命名、测量，且有形而具体，否则就不会具备新闻的特征，如果把它说成新闻，就很可能是观察力出了问题或者是出于偏见。

因此，总的来讲，有关现代社会的新闻的质量是其社会组织的注脚。制度越健全，有关各方的利益就越能得到规范的代表，问题就能解决得更顺利，引入的客观标准就更多，事件就越能够完美地表现为新闻。新闻机构最上乘的表现就是成为制度的仆

人和卫士，最差则会沦为少数人利用社会混乱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当制度运转失灵时，无良知的记者能够混水摸鱼，而良知未泯的就必须跟无常世态赌博了。

新闻机构并不是制度的替代物。它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人们不可能仅凭这样的光束去照亮整个世界，不可能凭着一个一个插曲、一个一个事件、一个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去治理社会。他们只有靠着一道稳定的光束——新闻机构——去探索，让这光束对准他们，使一种局势足够明了，以便大众作出决定。麻烦深藏于新闻机构之外，解决办法亦然。救治之道在于建立在一个分析和记录系统基础上的社会团体，在于靠这一原则产生的一切必然结果，在于摒弃全能公民这一理论，在于分散决策权，在于通过可比记录和分析去协调决策。如果在管理中心有着连续的核查，使从事工作及监督工作的人都对工作清晰明了，那就不会出现纯粹是盲人相撞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将会通过一个信息系统无遮无拦地展示给新闻机构，同时又对新闻机构形成一种制约。

这是一条根本途径。因为新闻机构的麻烦，和代议制政府的麻烦一样，无论是区域性的还是功能性的，也和产业界的麻烦一样，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合作式的还是共产主义的，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自治的人民不可能通过发明、创造和组织一种认识机制去超越自身的偶然经验和偏见。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在没有一幅这个世界的可靠画面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因为民主政体还有比较明显的缺陷，因为人们还抱有强烈的偏见与冷漠，对于稀奇古怪的鸡毛蒜皮兴致勃勃，对于重大问题却兴趣索然，而且热中于枝枝节节和三条腿的牛犊，但是政府、学校、报纸和教会与这一切进行的斗争却并没有取得多少成效。这是世俗政府

的主要缺陷,是它传统中的固有缺陷,我认为,它的所有其他缺陷都可以追溯到这里来。

第八部分

有 机 化 情 报

第二十五章　打 进 楔 子

一

如果救治之道妙趣横生，那么诸如查尔斯·麦卡锡、罗伯特·瓦伦丁、弗里德里克·泰勒这样的美国先驱也就不至于非要为一次听证会而艰苦斗争了。但他们不得不进行斗争的原因，以及政府的研究部门、行业审计部门、预算部门等等成为改革的丑小鸭的原因，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扭转了兴致勃勃的公众舆论得以建立起来的进程。他们并不是为公众提供偶然的事实、提供演示成见的大屏幕以及制造戏剧性的认同，而是打破了戏剧效果、打破了成见，给人们展示了一幅事实的画面，它使人们感到很陌生，而且不是特指某一个人。尽管这一点并不令人痛苦，但是令人感到沉闷，而那些对它感到痛苦的人，那些尽力想把它隐瞒起来的做交易的政治家和党人，为了消除公众感到的痛苦，则常常会利用公众感到的沉闷。

二

然而，每一个复杂的共同体都曾寻求如占卜家、牧师和长老这样特殊人物的帮助。我们自己的民主政体，则以普遍能力的

理论为基础，寻求让律师管理政府并协助管理产业。人们认识到，经过专门训练的人会以某种模糊的方式去适应一种更繁杂的真相体系，它比业余爱好者头脑中自发产生的真相体系更繁杂。但是经验表明，传统律师的资质并没有足够的助益。专业知识的应用使我们的大社会猛烈膨胀，已经达到了异乎寻常的规模。它的创造者是那些通晓精确计量和量化分析的工程师。人们开始发现，大社会不能由那些根据推理判断正误的人来管理。人们只能通过把它创造出来的那些专业去控制它。于是，那些比较开明的领导人逐渐召集一些经过训练或自我修炼成的专家，让这个大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对管理者来说变得清晰明了。这些人有着各种各样众所周知的称号，统计学家、会计师、审计师、工业顾问、各个门类的工程师、科学管理者、人事管理者、研究人员、"科学家"，有时干脆就叫做私人秘书。他们不仅带来了各自的一套行话、公文柜、卡片目录、图表、活页夹，更带来了一个听上去很完美的理想：一位行政长官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眼前是一份打印好的文件，上面罗列着等待他否决或批准的政策问题。

这一切的发展，不是自发的创造性进化，而是一种盲目的自然选择。政治家、行政长官、政党领袖、志愿组织的领袖都发现，如果他在一天里要讨论两打不同的问题，非有人培训他不可。他开始嚷嚷着要备忘录；他发现连自己的邮件都不能读；他需要有人将重要信件中有意思的句子圈点出来。他发现他无法消化那些在他桌上快变成故纸堆的报告中的内容，需要别人为他总结。他发现他无法读懂那些没完没了的数字。他拥抱那些把这一切制成彩色图表的人。他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机器间的区别，于是雇来工程师替他挑选，并告诉他价值几何及功能所在。当他奋力要转动这笨重的系统时，他又会一个接一个地甩掉包

袱,就像一个人先脱了帽子,再脱掉大衣,然后摘掉领子一样。

三

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尽管他知道需要帮助,但在求助于社会科学家时却很迟钝。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很早就受到厚待。他们有实验室,有高薪,战胜自然的成果很快得到赏识。但是以研究人性为本职的科学家却要另当别论。个中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他可展示的成就寥寥无几。之所以寥寥无几,是因为要向大众展示其理论,他就必然涉及既往的历史。自然科学家可以提出假设,进行检验,数以百次地修正假设。如果最终他还是被证明是错的,也无需任何人付出代价。但是社会科学家却得不到实验室试验的保障,一旦他的建议被采纳而他又是错的,其后果便无法估量了。他所负的责任更大,所面对的结果更加变幻莫测。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在实验科学中,学者摆脱了思想与行动的困境。他可以将一个行为的样本带入安静的环境中,随意重复,尽情观赏,可是,社会科学家却常常处在进退维谷之中。如果他呆在书房里潜心思考,就只能依赖官方报告、报纸或访谈所提供的极为偶然而贫乏的书面记录。如果他想实际入"世",他就必须耗费——往往还是白白耗费——漫长的时间去学徒,然后才能获准进入密室。他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探究到什么行动之后再去规避。不存在享有特权的听众。[①] 身负重任的人看到社会科学家只是从外部了解到他至少部分地从内部了解的东

① 参阅 Charles E. Merriam,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Study of Politics*, 载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XV, No. 2, May, 1921。

西，便认为社会科学家的假设本质上得不到实验印证，只有在“现实”世界中才能得到检验，于是对那些与他的公共政策意见相左的社会科学家便很不以为然。

社会科学家在内心深处也是对自己这样估价的。他对自己的工作并无成竹在胸。他只是半信半疑，由于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把握，他便觉得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坚持自己的思想自由。凭良心说，他真的会要求思想自由吗？他既无确凿的数据，亦无检验的手段。他自身最佳的素质恰恰成为挫折的根源。如果他真的具有严谨的头脑和十足的科学精神，他就不能死抱住教条，为他自己都没有把握的理论，而向受托人、学生、公民联盟和保守的新闻机构宣战。如果要进行这样的大决战，就必须是为上帝而战，但政治科学家总是有点怀疑上帝是不是召唤了他。

因此，如果说社会科学做得更多的是辩解而不是建设，个中的原因就在于社会科学的机会，而不是“资本主义”。自然科学家之所以能摆脱教权主义争得自由，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它能够产生无法压制或忽视的结论。社会科学家做到这一点时也会赢得尊严和力量。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为大社会的领导人物提供机会以满足他们对分析手段的需求，从而使极难对付的无形环境变得明白易懂。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社会科学家在一堆互不相关的材料中组合着自己的数据。社会进程只有断断续续的记录，而且常常都是行政当局的偶然记录。给国会的一件报告、一场辩论、一次调查、一份法律诉讼要点摘录、一组统计数字、一张关税表、一张税率表；材料就像皮尔当人[1]的头骨，学者们对于他们所研究的

① Piltdown man，1912 年在英国皮尔当发现的头盖骨，当时被认为是史前人类的化石，1953 年经鉴定为伪造。——译注

事件能够获得某种画面之前不得不进行精巧的推理。尽管这画面显示的是他们的公民同胞的自觉生活，但却常常模糊不清、令人沮丧，因为力图进行总结的人对于他的资料的搜集途径毫无监督可言。想象一下进行医学研究的学生，如果极少有机会进入医院，被剥夺了动物实验的机会，被迫依据病人的口述，或是各个诊断系统的护士报告，或是国内税收局编制的医药暴利统计来得出结论，那又是怎样一番情景。社会科学家一般都是在某个官员不加分辨所想到的范畴里去做些能够做到的事情，该官员可能在实施某项法律，或者一心要进行辩解、说服、提出要求或加以证明。学者了解这一点，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他发展出了一门学问，那就是细致入微地怀疑他得到的信息在哪里被打了折扣。

这是一种美德，但如果仅仅把它用来改善社会科学的尴尬地位，那就太不够用了。因为学者总是被责怪像他那么敏锐的人为什么竟会不能清楚理解这样那样的事情正在发生。但是，作为代表之间的中介、作为行政当局的镜子及量具而被雇用的专家，却对事实有着非常不同的把握。他不是去总结采取行动的人们抛给他的事实，而是为采取行动的人们准备事实。这是他战略地位的一个深远变化。他不再身处局外，不再只是抱着忙碌的大人物留给他的东西苦思冥想，他在决策的台前而不是幕后占据了一席之地。如今的顺序是，大人物发现事实并据此作出决策，一段时间之后，社会科学家推出充分的理由说明大人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英明之处。这种事后的关系是学术性的，而且是从学术这个好词的坏意思上说的。正确的顺序应该是由不偏不倚的专家首先为实干家发现和阐述事实，然后尽其所能，在他所了解的决策和他所组织的事实之间进行比较。

四

对自然科学来说，这种战略地位的变化开始得较慢，但加速很快。发明家和工程师一度曾是些浪漫的半饥半饱的局外人，被视为怪人。商人和手艺人熟知他们那个行当的全部奥秘。随后，奥秘变得越来越神秘，最终，工业开始依赖并非肉眼可见、只有训练有素的头脑才能认识到的物理定律和化学化合。科学家从拉丁区的小阁楼搬进了写字楼和实验室。他单枪匹马便可以构造出作为工业基础的现实图景。在这种新关系中，他既索取也贡献，且常常索取得更多：理论科学比应用科学发展更快，尽管前者不断从实际决策中汲取经济支持、灵感和意义所在。但是自然科学的作用仍然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因为决策者只靠常识指导自己的行动。他们在没有科学帮助的情况下，管理着被科学家搞得异常复杂的世界。他们不得不再次面对难以理解的事实，于是就像过去求助于工程师一样，他们现在找来的是统计学家、会计师和各类专家。

这些实用型学者才是新社会科学的真正先驱。他们“与主动轮密切配合”①，而科学与行动的实际结合给两者都带来了巨大好处：行动得益于信念的澄清，信念得益于行动的不断检验。我们还只是处在起步阶段。但是如果我们同意，所有大规模形式的人类联合体，由于绝对的实际困难，必定会认识到需要让专家来报告他们的特定环境，那么这种想象力就有了一个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在专家们交流技术和结果时，我想我们就可以

① 引自美国哲学协会主席 Ralph Barton Perry 1920 年 12 月 28 日的演讲，载第 20 届年会会刊。

看到社会科学开始运用实验方法了。当每个学区和每一项预算、每个医疗机构、每个工厂或是每一份关税表都成为彼此的知识原料时，可比经验的数量就会开始接近真正实验的水平。在48个州、2400座城市、277000幢校舍、270000座厂房、27000座矿山和采石场中，只要有记录并可得到这些记录，就会得到极为丰富的经验。而且，还能得到机会进行检验，其风险之小，可以允许对每一种合理的假设进行公平检验而不至动摇社会的基础。

楔子已经打入，打楔子的不仅是工业领袖和那些必须寻求帮助的政治家，还有市政研究所①、立法参考文献图书馆、法人、工会和公益事业的专门院外活动集团，还有妇女选民联盟、消费者联盟、制造商协会这样的志愿组织，有数以百计的商会和市民联合会，还有诸如《国会要闻》和《观察》这类的出版物，以及普通教育公会这样的基金会。它们并不是都在那里力求不偏不倚。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它们全都开始证明，在公民个人和他所处的大环境之间必须插入某种形式的专门知识。

① 在美国这类组织数量非常庞大。有些生机勃勃，有些已半死不活。它们层出不穷。底特律政府研究所的 L. D. Vpson 博士、纽约市政资料图书馆的 Rtbecca B. Ramkin 小姐、(威斯康辛州)州教育局长 Zdwad A. Fifzpabick 先生和(纽约市)工业研究所的 Sanvel Zimand 先生给我提供的清单上就有几百个。

第二十六章　情报工作

一

民主的实践超前于它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成年选民是根据从他们当中产生的一种意志而共同作出决定的。但是，正如在理论中见不到的统治等级正在逐渐形成一样，在民主的形象中得不到解释的大量建设性的适应性变化也正在发生。人们找到了各种办法来体现常常不为人所见的诸多利益和功能。

我们在司法理论中对此极为敏感，我们向法院讲解其立法权和否决权，理论根据是某些利益应当得到捍卫，而这些利益可能已被当选官员抛到了脑后。但是当人口普查局对人口、财产以及各种变化进行统计、分类和整理时，也是在谈论那些不可见的环境因素。地质调查探明了矿产资源，农业部在讨论全国生产要素时提了出来，每个农民却只能看见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学校当局、关税委员会、领事馆、国内税收局所代表的人、观念和目的，是决不会在一次选举中自动发现自己被代表成了这个样子的。儿童局(Children’s Bureau)是一整套复杂利益和职责的代言人，这些利益和职责并非选民日常可见，因而也不可能自动成为公众舆论的一部分。有关婴儿死亡率的比较统计报告，常

常跟着婴儿死亡率下降的消息。在消息公布之前,市政官员和选民所看到的环境画面中并没有这些婴儿的一席之地。统计数字让这些婴儿显现了出来,宛如婴儿们选出了一位高级市政官来倾诉他们的不满。

国务院设有远东事务处。它是干什么的?日本和中国政府在华盛顿都驻有大使。他们难道没有资格代表远东?他们是远东的代表啊!但是没有人会说美国政府只要咨询这两位大使,就可以了解到它需要了解的所有关于远东的情况。假设大使们完全懂得他们应该坦诚到什么地步,他们的信息渠道也仍然有限。作为补充,我们在东京和北京也设立了使馆,并在许多地方设立领事机构。当然我想还有一些特工。这些人的责任是将报告通过远东事务处提交给国务院。那么国务卿对这个处的期望是什么呢?我知道有的希望它能花掉拨款,但有些国务卿则否认它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转而求助于手下的部门。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便是干脆利索地为美国的立场进行辩护。

国务卿所需要的是专家们将所有有关远东的因素摆到他桌面上,使他如同亲自与远东接触一般。专家们必须翻译、简化、总结,但是推出的结论必须适用于东方,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报告的前提上。如果国务卿称职的话,他最不能容忍的便是怀疑专家们有了自己的“政策”。他不想从专家那里知道他们是否喜欢日本的对华政策。他想知道的是不同阶层的中国人、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俄国人对这一政策的看法,以及由于这些看法而可能采取的行动。他希望呈交给他的是他进行决策的依据。对于日本或美国大使、对于太平洋岸边的参众两院所传达的信息之外的情况,如果远东处报告得越忠实,国务卿就能够干得越出色。他可能会按照来自太平洋岸边的意见作出决定,但对日本的看法必须来自日本。

二

世界上最出色的外交机构是最完美地将搜集信息和把握政策分隔开来的外交机构,这不是偶然的。大战期间,在许多英国的驻外使馆、在英国的外交部,几乎都有一些人,一些常设官员或特殊雇员,他们卓有成效地对流行的战争心理打了折扣。他们摒弃了孰是孰非的胡言乱语,既不对哪个民族表示特别喜爱、也不对哪个民族表示特别厌恶,即使有什么结论也是闷在胸中。他们把这些都留给了政治领袖。但有一次我却在一个美国大使馆听到一位大使说,他从不向华盛顿提交不能振奋国内人心的报告。他对每个见到他的人都表现出魅力,他帮助了许多饱受战争之苦的工人,在为一座纪念碑揭幕时更是出尽了风头。

他不明白,专家的力量靠的是与决策者保持距离,而不是亲自操心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产生。像这位大使那样自作主张、搀和决策的人很快就会失去信任。他会越来越片面地看问题。因为,一旦他开始掺和得太多,他就会开始注意他希望看到的事实而不再注意他应当看到的事实。他是在那里代表幽灵。他代表的是些并非选民的人,他体现的是些并不明显的选民的功能,他描述的是些看不见的事件、沉默的人、未来的人、事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拥有一批无形的选民,而无形的选民是不能用来构成一个政治多数的,因为选举归根结底是对实力的检验、是一场理想化了的战斗,而专家并不代表任何唾手可得的实力。但是他可以通过打破力量的布局来发挥力量。通过把无形变成为有形,他会利用一种新的环境去面对那些运用物质力量的人,操纵他们的观念和情感,改变他们的立场,以这种最深刻的方式去影响决策。

人不可能明明知道像预计的那样同环境产生了矛盾而又长期采取同环境相抵触的行动。如果决意采取行动，那就必须重新认识环境、审时度势、找到行动的合理性。但是，如果眼前存在着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事实，那么有三条出路可供选择。人们可以只当它不存在，但会因此而失足、失着、失败。他们也可以予以考虑，但拒绝行动。其代价是内心的不安和煎熬。但我相信最常见的情况是他们会调整整个行为，以适应放大了的环境。

专家因为任由别人决策，所以徒劳无功，这种看法完全不合经验。进入决策的因素越微妙，专家就越能产生影响而不必为此负责。今后他肯定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统治者和选民会越来越不了解相关的事实。所有政府部门都倾向于建立研究与信息机构，伸出触角并不断延伸，就像世界上的所有军事情报部门一样。但专家仍然是人。他们也会喜欢权力，他们会把自己视为审查官，从而摄取真正的决策功能。除非对其职责作出正确定义，否则他们就会对他们认为适当的事实进行裁决，把他们所赞成的决定传递出去。简言之，他们会变成一群官僚。

唯一的制度保证，便是尽最大可能将执行者与调查者严格分离。两者应是平行但又完全不同的，应当分别招募，尽可能以不同的资金来源付薪，对不同的上司负责，并对对方的个人成就本能地漠然置之。在产业中，审计师、会计师和稽查员应独立于经理、主任和工头，而且我相信，我们迟早会看到，为将产业置于社会控制之下，记录方法必须独立于董事会和股东。

三

然而在建立产业和政治的情报部门时，我们却不清楚该如

何着手。除了坚持基本的职责分离原则外,强调具体使用何种方式实现这一原则,就显得有点过分了。有些人相信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愿意接受它;有些人对此不理解,但又离不开它,另外还有些人会予以抵制。但只要这一原则在每个社会机构中有了一席立足之地,它就会取得进步。要开始这一进程就必须着手行动。例如在联邦政府中,没有必要先去解决行政上的一团乱麻和一个世纪积累起来的不合逻辑的机构重叠,就能够为华盛顿所急需的情报局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选举之前,你尽可以承诺要大胆破除成规,但是一旦你面对成规所产生的一切,便会发现每一种荒唐行为都和惯例、强大的利益集团以及和蔼可亲的国会议员纠缠在一起。全线出击便会招致所有势力的反应。就像诗人所说,你前去参战,却总是倒下。你可以砍掉这里一个老掉牙的部门,裁掉那里的一群职员,你还可以把两个局并成一个。到你忙于应付关税和铁路问题时,改革的年代也已经结束。再说,要像所有候选人全都保证过的那样有效地重组政府机构,你激起的不满情绪将是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安抚的。如果有什么新计划,即使你已经成竹在胸,也需要有官员去执行。至于官员,即使苏俄也愿意让许多旧人回来任职,如果对前朝旧官过于无情,那将毁了乌托邦本身。

如果得不到出自内心的同意,任何行政计划都不会行得通,而对陌生做法的同意则非培养不能获得。较好的方式是能够找到一个空档给现存的机器插入一些部门,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举一面镜子,这样你就可以指望让操作机器的人、负有责任的头头脑脑和外部的公众都能看到这部机器。当官员们开始了解了自己,或者说局外人、负责人和下属都看到了同样的事实,即同样可恶的事实——如果你愿意这样理解,那么抵制就会减弱。改革者认为一个部门效率低下,并不一定是这个部门也能承认

的看法。但只要对该部门的工作加以分析、记录,并与其他部门或私营公司进行比较,你的论点就提高到了新的层次。

华盛顿的内阁中有 10 个部。假设每个部都常设一个情报机构,那么这效率的条件该是什么呢?在所有条件中最为重要的是情报官员应当独立于负责这个部的众院委员会,也必须独立于部长本身。独立主要取决于三点:资金、任期以及获取事实的途径。理由显而易见,如果某一届国会或者某个部门官员有权切断他们的资金、解除他们的职务或者对他们封锁档案,他们就只有俯首帖耳的份儿了。

四

资金的问题既重要又棘手。如果一个研究机构依赖于可能满怀妒忌或是吝啬小气的国会每年施舍的拨款,它就不可能真正放开手脚。然而,你无法摆脱立法机构对资金的最终控制。财政上的安排应当保证研究人员能够抵制那些笨拙、可笑、节外生枝的攻击和狡猾的破坏,并同时满足发展的需要。研究人员应当守得住阵脚,使得对他们的攻击不得不以公开的形式进行。他们可以躲在一个联邦特许后面建立一个信托基金开展工作,而且情报部门所隶属的部还可以给它提供若干年的浮动资金。所需的资金额度无论如何都不会很大。信托基金可以支付最低数量工作人员的一般费用和基本开支,浮动资金可以用于扩大机构。无论如何,拨款不能是临时性的,而应该是长期的资金安排。与通过宪法修正案或发行政府债券相比,这是一种更不令人担心的"绑住国会手脚"的方式。国会可以撤销特许。但可能是不得不撤销,而不是存心破坏。

任期应该是终身的并提供充裕的退休金,应当安排休假年

以便深造和培训，只有依据专业同行的评判才能予以解职。任何非赢利性脑力劳动的工作条件，在此都是适用的。要想使这项工作成效显著，那么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就必须享有尊严和安全感，并至少处于较高的地位，就是说，只有在不必为眼前的实际利益而劳神的地方你才能找到思想自由。

获取材料应当是有机的行动。情报部门应当有权审阅所有文件，质疑任何官员或局外人。这类持续调查完全不同于耸人听闻的国会质询或者如今在我们政府中常见的漫无目的的官方调查。情报部门应当有权向所属部提出决算方式，如遭拒绝或建议被接受后出现违规，它应有权根据特许向国会申诉。

首先，每个情报机构都可以成为所属部与国会间的纽带，而且我认为，与内阁成员直接面对参、众两院相比，这是一条更好的纽带，尽管一项动议丝毫不会排斥另一项。情报部门既可以充当国会政策执行情况的耳目，也可以回答国会对所属部提出的批评。这样一来，由于各部的运转总是摆在明处，那么国会就可能不再感到那些出于不信任和错误的分权教条而产生的琐碎法规有什么必要，因为它们给有效的行政作为制造了障碍。

五

当然，这 10 个情报局不可能在密封舱中工作。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极有可能产生为人听说却很少看到的“协作”。显然，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尽可能采用可比的衡量标准。他们会交换记录。于是当国防部和邮政局都要购买木材、雇用木匠或建筑砖墙时，他们就不一定需要通过同一机构去做，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权力过于集中。但是他们对于同样的事情会有同样的衡量尺度，他们会进行有意识的比较，而且相互视为竞争对手。这

类竞争越多越好。

竞争的价值取决于衡量标准的价值。与其自问我们是否相信竞争,不如问自己我们是否相信竞争者为之竞争的东西。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希望“废除竞争”,因为一旦竞争消失殆尽,社会努力便只能机械地服从惯例,受少数人朴素灵感的摆布。但是,没有人会指望能够为那种杀气腾腾的相互竞争设计出什么逻辑结果。问题在于要确定竞争的目标、制定游戏的规则。游戏规则通常都是建立在最显而易见的衡量标准之上的,诸如金钱、权力、名望、赞许或如维布伦[①]先生说的“挥霍浪费”等等。我们的文明还能提供什么其他衡量标准吗?如何衡量我们始终渴望得到的效率、生产率和服务呢?

一般说来,没有什么衡量尺度,因此也不存在足够的竞争来实现这些理想。高尚或低俗动机的区别,不在于人们常说的利他或自私之间的区别,[②] 而在于所采取的行动是为了易于理解的目标还是为了模糊不清的目标。督促一个人比他的邻居挣更多的钱,他便有了明确的目标;督促他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那么他如何确定哪种服务为社会服务呢?什么是检验标准?什么是衡量尺度?是主观的感觉,是一个人的想法。和平时期跟一个人说他应当为国效力,你只不过是说了一堆高尚的废话;战争时期跟他讲同样的话,为国效力便有了具体的含义。它意味着一系列具体的行动:从军、购买国债、节省食品、不计报酬地工

---

① Thorstein Veblen(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他的第一部著作是《有闲阶级论》,力图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研究现代经济生活,认为工业的体制要求人们勤劳、讲究效率、合作,然而统治企业界的人们所关心的却是赚钱和炫耀财富。此书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兴趣,大多数人把它视为对社会的讽刺。——译注

② 见本书第十二章。

作。对于每一项工作,他都能明确理解为一个具体目标的一部分,即自己的贡献将使前线的军队比敌人更强大、装备更精良。

因为你对行政管理的分析越透彻,对可比因素了解得越多,就越能够创造出衡量你希望促进的品质的量化标准,使竞争促成理想的目的。如果你能编制出恰当的指数[①],你就可以在每个车间的工人之间、在车间之间、在工厂之间、在学校之间、在政府各部之间、在团与团之间、师与师之间、舰与舰之间、各州之间、各县之间、各城市之间确立竞争关系。指数越恰当,就越有助于竞争。

六

交换材料显然可以提供这样的可能性。每个政府部门时时都在要求得到另一部门已经获得的信息,只是形式可能有所不同。比如说吧,国务院需要了解墨西哥的石油储量,它与世界石油供应的关系,墨西哥油田现在的所有人,在建或拟建的低耗油战舰的重要性,以及各油田的比较成本。今天,国务院如何得到这些消息呢?信息可能分散在内政部、司法部、商业部、劳工部和海军部。要么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在可能准确也可能有误的参考书中查阅墨西哥石油资料,要么某人的私人秘书打电话给另一个人的私人秘书索要备忘录,随后便会有信使送来一堆看不懂的报告。国务院应能够要求自己的情报部门以适合于解决外交问题的方式搜集事实,外交情报机构则可以从情报交流中心

---

① 我这里使用的不是指数这个词的纯技术含义,而是涵盖了对于社会现象的任何比较衡量手段。

获得这些事实。[①]

这种机构很快就会成为极不寻常的信息中心，而机构中的人会意识到政府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他们要处理定义、术语、统计技术、逻辑等问题，他们将实际横跨社会科学的整个领域。除了少数外交和军事秘密之外，如果这些材料不能向国内的学者公开，那就令人难以理解了。正是在这些材料中政治科学家才能找到需要解决的难题，才能为他的学生找到切合实际的研究课题。工作不一定全部在华盛顿完成，但是都与华盛顿有关。因此，这个中心机构便有了一所国立大学的内在要素。机构的工作人员可以在研究生中招募。他们将在这个国立大学的管理者与分散在各地的老师进行磋商后，展开他们的选题研究。如果这一联合体能够达到应有的灵活程度，那么为了弥补专职人员之不足，还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各大学临时选派专家，交换华盛顿所需要的文献。这样，人员的培训和招募便相辅相成。研究部分由学生完成，大学中的政治科学将与美国政治紧密相联。

七

这一原则的主要内容同样适用于州政府、市政府和县政府。比较和交换的工作可以由州、市、县的机构联合会进行。在这些联合会中又可以组成适当的地区组织。只要决算制度是可比的，就可以避免大量重叠。地区协调非常必要，因为法定疆界不一定总是与有效环境相重叠。但两者有着一定的共同基础，打破这一基础代价很大。通过信息共享，若干行政区域之间便可

① 这种服务在商会之间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1921年纽约建筑商会的调查披露了它被不正当利用的可能性。

以在合作中协调自主决策。例如,纽约市已经是得到市政厅良好治理的庞大单位,但考虑到诸如医疗和交通等多方面的目标,这个大都市的区才是真正的行政单位。但在这一区域中还有其他大城市如扬克斯、泽西城、帕特森、伊丽莎白、霍博肯和贝荣。它们不可能由一个中心进行管理,但又必须为完成许多功能而共同行动。或许只有如韦伯夫妇[①]所说的那种地方政府的灵活体制才是最终的适当解决办法。[②] 但是第一步应该是协调,不是协调决策与行动,而是协调信息和研究。应该让各市官员通过同样的事实认识他们面对的共同问题。

八

我们没有理由否认,政治和产业的情报机构网络可能会成为一个沉重负担和甩不掉的烦恼。谁也不难想像这类机构对寻找轻松差事的人、卖弄学问的人或是爱管闲事的人的吸引力。人们将会看到繁文缛节、公文成山和荒唐可笑的调查表,每个文件和背书都有 7 个备份,拖拖拉拉,丢三拉四,本该用 29b 表格纸却用了 136 的,文件因为用铅笔而不是用钢笔或用了黑墨水而不是红墨水书写而被退回。工作可能会做得一团糟。没有什么制度能够严密得让所有傻瓜都混不进来。

但是,假如在政府各部、各工厂、各机关、各大学等的整个系统中存在着人员、资料和批评意见的循环流动,那么内部腐败的危险就不会那么大,人们也就不会真的认为是这些情报机构把

①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1859—1947,1858—1943),英国历史学家,社会与经济改革的先驱者。——译注

② 见 *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n* 一书第四章"The Reorganiz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生活弄得复杂化了，相反，它们会揭示出现在的人力尚无法应付的复杂性而使问题得到简化。目前这种基本上是不可见的统治体系过于错综复杂，以至大部分人放弃了把它弄明白的打算。由于他们放弃了这样的打算，就觉得这个体系还比较简单，但实际上它是难以捉摸、隐隐绰绰、不明不白的。使用情报系统意味着减少每个成果单位所需人员，因为使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人的全部经验，就会减少检验的数量；因为让社会进程清晰可见，可以帮助这些人进行自我批评。这并不需要增加多少官员，因为现在就已经有了许多特别调查委员会、大陪审团、地方检察官、改革组织和手足无措的当政者耗费着大量时间徒劳地在黑暗中探索道路。

如果对现代环境中公众舆论和民主理论的这些分析可以成立，那么我认为必然会得出这类情报工作乃救治良方这一结论。我指的不是本章中提出的几个建议，这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琢磨具体的技巧要靠经过专门训练的人，但即使这些人今天也不一定能够看清大概的框架，更不用说细节了。已经记录下来的社会现象数量很少，分析手段粗糙幼稚，概念仍然模糊不清而且未经批判。但是我想，已有足够的事实表明，不可见的环境是可以有效报道的，而且可以不抱偏见地传达给各种人群，并且能够克服他们的主观性。

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在制定情报原则时，人们就可以找到办法克服自治的最大难题——如何应付不可见的现实。由于这一难题的存在，任何既需要孤立又需要同外界进行广泛接触的自治共同体，都无法把这两种需求协调起来，无法把地方决策的尊严与独立同安全与广泛合作协调起来，无法在不牺牲责任的情况下找到高效率的领导人，无法在放弃尝试就所有问题形成一致舆论的情况下获得有益的公众舆论。只要没有办法对

不可见的事件形成共同的看法,没有共同的尺度衡量不同的行为,那么唯一行得通的民主形象——即使在理论上——也只能以孤立的共同体为基础,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著名箴言,那里的人们政治才能有限,因为他们的视野有限。

但是,现在有了一条出路,一条虽然漫长但确实存在的出路。这基本上是能够让一个芝加哥市民即使没有一个雅典人那么出色的眼光也会看到和听到极遥远地方的事件的同一条路。这在今天是可能的,今后随着更多人力的投入,减少想象的环境和有效环境之间的差异将会变得更加可能。随着这一点的实现,联邦制的运转将越来越多地依赖同意、越来越少地依赖强制。尽管联邦制是唯一使自治团体结合起来的可能途径,[①] 但是,只要这种结合不是建立在对联邦事务正确的共同认识基础之上,联邦制就总是在帝国中央集权和地方观念作祟的无政府状态之间摇摆不定。这些认识不是自发产生的,必须在分析的基础上加以概括来拼合在一起,而分析手段则必须通过研究来发明和检验。

电子仪器、区域控制或是财产制度的变革都不会触及问题的根源。你不可能从人的现有政治智慧中得到更多的政治智慧。任何改革,无论多么激动人心,都不可能是真正彻底的改革,因为它不可能自觉提出一种方式,克服以个人有限经验为基础形成的主观主义见解。有些政府体制、选举和代表体制比其他体制可以带来更多的收获,但归根结底知识未必来自良心,而是来自良心所应对的环境。当人们根据情报原则行事时,就会走出去找寻事实,形成自己的智慧。当人们无视这一原则时,他们便缩进了自我,找到的也只是近在咫尺的东西。他们不是在增长知识,而是在扩大偏见。

---

① 参阅 H. J. Laski, *The Foundations of Sovereignty* 以及其他论文。

第二十七章　诉诸公众

一

在实际生活中，谁也不会按照在每一个公共问题上都会有一个公众舆论这种推测去行事，尽管这一事实常常被掩盖了——人们有时会认为，不存在公共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公众舆论。但在我们的政治理论中，我们继续比布莱斯爵士所希望的还要刻板地相信“舆论的行动是连续性的”，[①]尽管“其行动……只涉及到大原则”。[②] 由于我们总是认为我们有持续的舆论，但又不完全清楚大原则是什么，因此，对于这样的观点——看来应当去阅读更多的政府报告、更多的统计数字、更多的曲线和图表——我们自然会抱以令人苦恼的哈欠。所有这一切从一开始就像党派之争那样令人迷惑，而且更乏味。

不管什么样的体制，如果假设全体公民在全身心投入到所有情报机构的出版物中之后，能够对那些永远无法真正与任何大原则完全相符的大量实际问题更加警觉、更加了解和更加热

① Lord Bryce, *Modern Democracies*, p. 158.

② 同上，158 页脚注。

心,那么你会发现,人们的注意力远远达不到这样的程度。我不是在主观臆断。情报机构首先是实干家的工具,是负有决策责任的代表的工具,是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工具。如果它对这些人无所助益,那么最终也不会对任何人有所助益。但是,它帮助他们了解了自己正在其中发挥影响的环境,就此而论,它能够让他们的所作所为变得显而易见。仅此就足以使他们对普通公众更加负责。

因此,这里的目的不在于用专家在每个问题上的意见加重公民的负担,而是将负担从公民那里转给肩负着责任的行政官员。情报系统作为综合信息的来源和一种对一般新闻机构的牵制,当然有其价值。但这是次要的。它的真正用途是在政治和产业这两个领域充当代议制政府和行政部门的助手。需要求助于会计师、统计人员、秘书等等专家报告的并不是公众,而是那些从事公共事务但已不能再凭粗糙经验行事的人。建立情报机构的初衷和理想都是为了更好地处理公共事务,而不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公共事务被处理到了何等糟糕的地步。

二

作为普通公民、作为纯粹的选民,谁也不会去努力消化这些文件。但是,如果作为一场纠纷的当事方,作为立法机关的一名成员,作为政府、企业或工会的一个官员,作为行业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对于有关悬而未决的具体问题的报告则会喜闻乐见。抱有某种目标的普通公民也许会像现在的情形一样属于一些志愿社团,由社团雇人研究有关文件,提出报告,作为对官样文章的一种核查。有些研究是由报界进行的,更多的是由专家和政治科学家进行的。但局外人——除了在现代生活的少数方面以

外，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总是局外人——却没有时间、精力、兴趣，也没有进行特别判断的手段来从事这种研究。那些在完备条件下工作的局内人，才是对社会进行日常管理所依赖的对象。

外部的一般公众只能根据事后的结果和事前的程序来判断他们的条件是否完备。公众舆论得以持续下去的大原则根本上是程序的原则。局外人可以要求专家告诉自己有关事实是否已得到适当考虑，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他自己并不能判断出何谓有关事实，何谓适当考虑。局外人或许可以判断对决策感兴趣的团体的意见是否得到了采纳；如果是无记名投票，那么投票过程是否公正或者投票结果是否得到公认等等。如果新闻告诉他什么事情值得观察，他便可以观察程序。假如正常出来的结果有悖于他对美好生活的理想，他可以对程序本身是否正确提出质疑。[1] 但如果他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试图只相信自己而怀疑程序，然后巴望着一种像舞台上力挽狂澜的万能大叔那样的“公众舆论”，他就会把自己弄得更加糊涂。他将得不到任何合乎逻辑的思想训练。

在所有错综复杂的问题上都诉诸公众的做法，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借助并无机会知情的多数的介入，来逃避那些知情人的批评。孰胜孰负要看谁的声音更响亮更迷人，谁的吹鼓手更有手腕更无耻，谁能在报纸上占据更大的版面。即使编辑一丝不苟地公正对待“对方”，这公正也并不充分。那些组织良好、资金充沛、雷厉风行的党人，对于可能存在的若干其他对方会不置一词。

被党人吁请来用作原料制造“公众舆论”的普通公民，大概很快就会认识到，这样的吁请并不是对他的智力程度表示敬意，

---

① 参阅本书第二十章。

而是对他善良本性的欺诈和对他求证意识的侮辱。由于公民教育使他懂得了环境的复杂性，因此他将关心的是程序的公平和公正问题。即使仅此一点，大多数情况下，他也会指望其当选代表替他照料。他将拒绝接受这些决策的负担，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会反对那些求胜心切、急着冲出会议室把刚开了头的内幕消息提供给记者的人。

只有坚持经过一定程序，否则就对抛过来的问题不予理睬，现代国家忙碌的公民才有望明智地应对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像一个党人陈述的那些问题，无不包含着一系列他所观察到的错综复杂的事实，无不包裹着厚厚一层油腻，那是饱含着他的情绪的成见。按照当今的时髦做法，他从会议室一出来就会坚称，他要求的是一些崇高的理想，如正义、福利、美国主义、社会主义。在这类问题上，局外的公众有时会被撺掇得忧心忡忡，有时则会赞不绝口，但却从来做不出判断。在他能够做出什么判断之前，首先得把那些油腻溶化掉。

三

这事可以由置身局内的代表们来做。他们在某个人，在一位主席或协调人的主持下进行讨论，而主持人必须保证讨论要尊重专家提出的分析。这是任何处理远距离事务的代议制机构的基本组织。党人的意见应该听取，但是应当让他们发现，他们面对的并不是和他们休戚相关的人，而是掌握了足够的事实，有着老练技能，可以在成见、模式和花言巧语中分辨出真实想法的人。这是苏格拉底的对话，有着苏格拉底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全部活力，但又不止于此，因为这些对现代生活进行论证的人，不仅要探究环境，还要探究人心。

例如，钢铁工业存在一个重大争议。每一方都发表了充满最崇高理想的宣言。在这一阶段，唯一值得尊重的公众舆论是坚持认为应该召开一次协商会议的舆论。如果一方坚称自己的目标极端公正，不容什么协商会议来玷污它，这就根本得不到共鸣，因为世上找不到这样的目标。或许反对协商的人不会这样说。或许他们会说另一方过于邪恶，他们不能与叛徒握手言和。这时公众舆论所能做的只有要求政府官员举行听证会来证明这种邪恶性。对此不可能只听党人的一面之词。但是，我们来假设一下，人们同意举行协商会议，而且找到了一位不偏不倚的主席，他极为尊重企业、工会和劳工部的咨询专家。

加里法官无比真诚地说明了他的人报酬丰厚、工作量适当，然后开始概述俄国历史，从彼得大帝直讲到沙皇遇刺。福斯特先生起立发言，以同样的真诚说这些人受到了剥削，然后开始讲述从拿撒勒的耶稣到亚伯拉罕·林肯的人类解放史。此刻，主席要求情报人员出示工资表，以替代“报酬丰厚”和“遭受剥削”的说法，表中载明了各个等级的实付报酬。加里法官是不是认为所有雇员都是报酬丰厚呢？是的。福斯特先生是否认为他们都受到了剥削呢？不是，他认为 C、M 和 X 组受到了剥削。他说的受剥削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工资不足以养家糊口。而加里法官却说够用了。主席问，这些工资能买些什么呢？福斯特先生说什么都买不到，而加里法官说可以买到他需要的一切。主席查询了政府的预算与价格统计数据。[①] 他的裁定是，X 组可以达到预算水平，但 C 和 M 组不能。加里法官提请注意，

① 见 1921 年 7 月 27 日《新共和》一篇题为“The Cost of Living and Wage Cuts”的文章，作者 Leo Wolman 博士才华横溢地讨论了对这些数据和“拟原则”的幼稚用法。

他不认为官方数据是真实可信的。预算过高，而价格已经下降。福斯特先生也提请注意一些例外。预算过低，而价格却已经上涨。主席裁定这一点不属于本协商会议的议题范围，仍以官方数字为准，加里法官的专家和福斯特先生的专家应向情报机构联合会的常设委员会提起上诉。

加里法官说，无论如何，改变工资比例就会毁了我们。主席说毁了是什么意思，请出示你的帐目。加里法官说，我不能，因为那是私人的。主席说，是不是私人的，我们不感兴趣，请你向公众声明，宣布 C 和 M 组的工人工资低于官方公布的最低生活标准，而加里法官出于他拒绝透露的原因反对提高工资。在经过这类程序后，公众舆论——就这个词的褒义[①] 而言——才有可能存在。

专家调停的价值不在于形成舆论去压制党人，而在于瓦解党派偏见。加里法官和福斯特先生可能仍然像开始时那样毫不服气，尽管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语气。但几乎所有其他没有卷入的人则可以避免卷入。因为他能够为之做出现成反应的有关成见和口号已被这类论证化解了。

四

在许多具有极为普遍的重要意义的问题上，不同的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搀和进个人的理由，这些记忆与情感的头绪则会变成一团乱麻。同一个词可能会意味着各种不同的意思：情感会从形象转移到情感的名称，而这些名称只是类似于这些形象

① Lowell 先生在他的 *Public Opinion and Popular Government* 一书中就是指的这个意义。

的名称。头脑中未经批判的那一部分思想，存在着大量仅仅由宗派、熟人和继承带来的联想。有些情感不知所归，有些词曾是名称而今天则成了面具。在睡梦里，在幻想中，在惊骇时，我们就会暴露出某种紊乱状态，足以使我们了解到天真的思想是如何构成的，以及在没有清醒的努力和外部抵制的情况下它是如何表现的。我们看到，最自然的秩序莫过于积满尘埃的旧阁楼中的秩序了。在事实、观念和情感之间常常存在着同样的不协调，如同歌剧院翻乱了所有的行头，混淆了所有的乐谱，结果蝴蝶夫人会身着瓦尔基里[1]的长裙，唱着咏叹调等待浮士德的归来。有一篇社论说，"在圣诞时节，旧日的记忆会令人柔肠百结。人们重温《圣经》的教义，思绪又回到了儿时。当我们在半悲半喜中回想那些已经与上帝同在的亲人时，这个世界似乎变得没有那么糟糕了。没有谁的心灵不为这种神秘的力量所感动。……整个国家充斥着赤色宣传——但是绞索、打手和路灯杆却供应充足……但这个世界激起的自由精神将在人们胸中燃烧。"

心头浮现出这些词句的人是需要帮助的。他需要一个苏格拉底为他分解词汇，对他进行盘问，直到他为这些词汇作出了定义，使其成为观念的名称为止。应当让它们只意味着一个特定的对象，再无他指。这些急促的音节在他的头脑中通过原始的联想而纠结在一起，由于他对圣诞节的回忆，由于他作为保守派的义愤和革命传统继承者的兴奋而捆成了一团。有时这堆乱麻因为太过庞大和古老而无法迅速拆解。根据现代心理疗法，有时需要一层一层地把记忆追溯到襁褓中去，这必须进行分解和命名。

---

① Valkyrie，北欧神话中奥丁神的侍女之一，被派赴战场选择有资格进入瓦尔哈拉殿堂的阵亡者。——译注

命名的作用，亦即说出 C、M 组而非 X 组工人报酬低廉来取代“劳工”受到“剥削”的说法，这样表述的作用是一针见血的。认知恢复了本来面目，所引起的情感亦是具体的，因为它不再被大量从圣诞节到莫斯科的偶然联系所强化。分解出来的观念有了自己的名称，感情也经过了仔细的审视，会以从未有过的开放姿态接受新证据的校正。它被嵌入了整个人格之中，与整个自我有了某种从属关系：一种能够得到整个灵魂的响应的挑战。经过彻底批判之后，观念就不再是“我”，而是“它”。它被客观化了，它和我保持了距离。它的命运不再与我的命运绑在一起，而是与我行动在其中的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

五

这种再教育可以帮助我们的公众舆论去把握环境。这也是对那些审查报刊、制造成见和喜欢戏剧效果的机构进行清算的一条途径。凡是能够毫无困难地了解相关环境的地方，那么批评家、教师、医生就可以启迪人的头脑。但是，如果分析家和他的学生一样感到环境模糊不清，那就没有任何分析手段能够满足需要。情报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在政治和产业问题上，批评家可以有所作为，但除非他能够指望从专家的报告中得到可信的环境画面，否则他的论证便行之不远。

因此，在这里和在绝大多数其他问题上一样，尽管“教育”是最佳的良药，但教育的价值则取决于知识的进步。而我们对人类各种制度的知识仍然非常有限，非常肤浅。社会知识的采集总体上是零星进行的，而不是正常地伴随着行动进行，这是今后应当实现的目标。然而，我们也许可以断定，信息的收集并不是为了它的基本用途而进行的。收集信息是因为现代决策的需

要。但是一旦把信息收集起来，就可以积累起一套政治科学能够加以总结的资料，逐渐为学校提供一幅世界的观念画面。这种画面形成之后，公民教育就可以为应对不可见的环境未雨绸缪。

如果教师能够得到一个社会系统的运转模型，他就能够利用它让学生敏锐地意识到他的头脑是如何思考陌生的事实的。除非有这样一个模型，教师是不可能指望帮助人们为他们将面临的世界做好充分准备的。他能够做到的，是帮助人们在更加了解自己头脑的情况下面对世界。他可以利用个案方式培养学生形成审查信息来源的习惯。比如，他可以告诉学生看一下电讯登在了报纸的哪个版面，记者是谁，是哪一家通讯社，发表声明的是哪个当局，在什么情形下得到的这篇声明。他可以教学生分析这位记者报道的是否亲眼所见，并回想一下这位记者对其他事件曾有过什么报道。他可以告诉学生新闻检查、保密观念的特点，并让他了解既往的宣传史。他还可以恰当地运用历史，告诉学生成见是如何形成的，使学生养成对印刷文字唤起的形象进行审视的习惯。他可以通过比较历史学和人类学教程，使学生终生不忘那些法典是如何将想象力固定在一种特定模式中的。他可以教给人们不要滥用比喻、戏剧化关系和将抽象事物拟人化。他可以向学生展示一个人怎么会认同这些比喻，怎么会变得兴致勃勃，怎么会根据自己所持的特定见解来选择采取那些壮烈、浪漫或者经济姿态的。

对错误的研究不仅是最高程度的预防措施，同时也会激发对真相的探索。随着我们的头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的主观性，我们便对客观方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我们会生动地认识到我们的偏见能够造成的巨大危害和残酷后果，这在以往一般是认识不到的。消除偏见最初可能会令人痛苦，但由于

和我们的自尊密切相关，一旦成功之后，则会给人带来无比的舒畅和自豪。注意力的有效范围将得到极大扩展。随着各种流行范畴的瓦解，对世界简单而僵硬的看法将被打破。舞台会变得生动而充实。情感自然会得到激励，从而由衷地感激科学方法，否则它就不容易被唤起，即使唤起了也不可能持久；偏见生成得更容易，也更加引人入胜。因为，如果你教授的科学原则听上去始终都是公认的科学原则，那么它们作为一项训练的主要长处——它们的客观性——就会变得很沉闷。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把它们作为战胜精神迷信的辉煌成果来教授，那么追击和征服的兴奋感或许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这样的艰难过渡：从画地为牢的经验走向好奇心趋于成熟、理性得到激发的阶段。

第二十八章　诉诸理性

一

本书的结尾我曾几易其稿。每一次都脱不开最后章节的这一定数——所有观念似乎都找到了各自的位置，作者念念不忘的所有谜团都已解开。在政治学里，主人公今后不会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也不会达到尽善尽美的结局。没有结束的篇章，因为政治学的主人公面临着更久远的未来，远远超过了以往有记录的全部历史。写到这最后一章，作者可以想象得到，彬彬有礼的读者已开始忍不住偷偷看表了。

二

柏拉图到了应该做总结的时候，他的自信也开始怯场，因为他想，让他说出理性在政治中的地位简直太荒唐了。《理想国》第五卷中的那些句子就连柏拉图也难以启齿，因为它太绝对、太僵硬，令人无法忘却，但也难以遵从。于是他让苏格拉底对格劳孔说，如果他说出以“极小的变化就可以让一个国家过渡到更正确的形式”，他就会被讥笑所吞没，因为他有一个想法“很愿意说出来，如果它不算过甚其词的话”，就是说，“除非哲学家成了国

王，或是这个世界的国王和统治者具备了哲学的精神和力量，使政治权力和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我们的城邦、甚至全人类都将永远无法免于祸患……”①

这些惊人之语一出口，他便意识到这是在追求完美，不禁为自己这种想法的可望不可及而感到窘迫。于是他很快补充道，当然，“真正的航海家”会被人叫做“空谈家、幻想家和大饭桶”。② 但是这种不大情愿的表白，虽然使他逃过了那位希腊对话者说他缺乏幽默感的指责，却为他庄严的思想挂上了一条蒙羞的尾巴。他变得愤愤不平，并告诫阿德曼托斯“必须把（哲学家）的无用”归咎于“那些不用他们的人，而不是哲学家自身。船长不应低声下气请求水手服从他的命令——这不是自然的秩序”。他抱着这种倨傲的姿态，匆匆收拾起理性的工具隐入了学院中，把世界留给了马基雅维里。

因此，在理性与政治的第一次大邂逅中，理性的策略是愤而退场。但是一如柏拉图告诉我们的，那时船已航行出海。自从柏拉图的著作问世之后，又有许多船出海航行。我们说一个人是真正的领航人，不再仅仅因为他懂得如何“注意年岁、季节、天空、星辰和风云，以及一切与航海有关的事情”。③ 他不能不考虑任何让航船顺利前进的因素。因为船上有叛乱，他就不能说：尽管我们都不怎么样……按照自然秩序我本不该处理叛乱的……根据哲学的秩序我本不该考虑叛乱的……我知道如何驾船……但却不知道如何操纵一条满载水手的船……如果他们认识不到我是掌舵人，我也没办法。我们都会撞上礁石，他们会因

① 《理想国》第五卷，473。

② 《理想国》第六卷，488—489。

③ 同上。

其罪而受罚，而我，自信会更加成竹在胸……

三

每当我们诉诸政治理性时，这个寓言中的难题就会再现。以理性的方式对付非理性思维的世界，原本就是困难的。即使你和柏拉图一起假设真正的舵手懂得怎样作为才能最有利于航船，也不能忘记要确认他的能力并非易事，而这种不确定性又会使大部分水手难以对他心悦诚服。按照定义，水手们并不知道舵手所知道的东西，而一心关注着星辰和风云的舵手又不知如何让船员懂得他所知道的一切是多么重要。在海上的叛乱中，没有时间使每个水手成为判断专家的专家。舵手没有时间咨询船员并搞清楚他是否真的像他自己以为的那样精明。教育是多少年的事，而紧急事件不过几个小时。因此，如果告诉舵手真正的解决办法是进行教育，使水手们具备更强的事实意识，那就太过书呆子气了。你或许可以跟尚未出航的船长这么说，但在危急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抄起枪来或是发表一番演讲，提出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或是拿出一个妥协办法，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尽快平息叛乱，顾不上证据不证据了。只有在岸上时，人们才会为航程作出计划，他们有可能这样做，为自身的安全也必须这样做。只有在岸上他们才有功夫处理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将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地做下去，而不是只在危机时刻才这么做。对他们智慧的最大考验莫过于分辨真假危机，这是必然的。因为，在危机接踵而至、真正的危险混杂着想象的虚惊时，一旦恐慌情绪蔓延开来，理性就根本派不上建设性的用场，很快，任何一种秩序似乎都比无序更受欢迎。

只有在长期稳定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希望遵循理性的方法。

这不是因为人类无能，或是呼唤理性不过是空想，而是因为政治领域的理性的进化才刚刚开始。我们在政治上的理性观念仍然是一般性的泛泛而谈，过于抽象，过于粗糙，难以指导实践，除非理性观念聚少成多，足以让我们剔除个别特殊现象，得到较大的统一性。政治中的理性在预测个人行为时表现得特别幼稚，因为在人的行为中，最初极为细小的变量也会演化为极大的差异。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处理突发事件时，我们如果坚持仅仅依靠理性，就会贻笑大方。

四

我们所具备的理性，其推进的步伐还跟不上不得不采取的行动的步伐。因此，政治科学的现状是，它还没来得及弄清一种情况，就已经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因而政治批评往往只能是事后诸葛亮，别无作为。无论是发现未知数还是昭示已知数，都存在一个时间差，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引起政治哲学家的重视。我们在格雷厄姆·华莱士先生的启发下，开始研究无形环境对我们舆论的影响。除了从经验中了解到的一点外，我们对政治学中的时间因素还了解甚少，尽管它直接影响着任何建设性建议的可行性。[①]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任何计划的可行性都要取决于实施计划所需要的时间，因为时间的长短决定了制定计划所使用的数据是否能够保持不变。[②] 讲求实际、经验丰富的人们会考虑这一因素，这也使他们不同于机会主义者、空想家、不学

① 参阅 H. G. Wells, *Mankind in the Making*。

② 不管什么机构，当前的情报分析工作做得越好，就越不会以昨天的事实为依据处理明天的问题。

无术之徒和书呆子。[①]但是,如何计算时间因素在政治上的作用,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系统的方法。

在弄清楚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至少可以记住,有一个从理论上说起来极其困难、实践中又会带来极大后果的问题。这会有助于我们继续抱有柏拉图的理想而又不至于像他那样匆匆得出结论,认为那些不听从理性的人都是邪恶之徒。在政治上是难以服从理性的,因为你在力图让步法和速度都不相同的两个过程齐头并进。除非理性变得精致而具体,否则眼前的政治斗争就仍需要一套天然的智能、暴力和无法证明的信念,而这些都是理性既无法给予亦无法控制的,因为生活的严酷现实对于人的理解力是一视同仁的。社会科学的方法仍然极不完善,因此在许多重大或临时决策中,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凭直觉与命运赌博。

但是,我们可以在某种直觉中树立对理性的信念。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为理性开辟一席之地。靠着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画面,我们可以努力展望事件的远景,无论是否可以避开眼前的现实,我们都可以根据更长期的打算去控制决策。然而,即使愿意让未来作出定论,我们还是一次次地意识到我们不知如何按照理性的指导行事。能够让理性有备而来给予指点的人类问题,其数量仍然寥寥。

五

但是,这种施舍有一个高贵的赝品,它来自人类的自知之明

① 我认为,反动派、保守派、自由派和激进派之间的某些——但不是全部——差异,就在于他们对社会事务的变化速度有着不同的直观估计。

和一种无可辩驳的信念，即我们这种群居动物在孤伶伶地期盼一个更为友善的世界。因此，人们焦虑不安地相互做着鬼脸，好像在说我们每个人都不是那么重要。在许多因素不确定、许多行动仅靠猜测来付诸实施的地方，人们便极需要保住体面，而且有必要按照善有善报的假设去生活。我们不可能每一次都证明善意的确能够得到回报，也无法证明为什么仇恨、不宽容、猜疑、偏执、诡秘、恐惧和撒谎是损害公众舆论的七大罪恶。我们只能坚持认为，在对理性的呼唤中还没有它们的地位，从长期来讲，它们是一副毒药；这个世界会在我们的困境甚至我们的生命完结之后继续存在，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能会对它们充满了偏见。

如果我们既没有胆怯，又没有狂热到终于满腔怨气举手告降这种令人刻骨铭心的程度，没有因为对人类未来丧失信心而放弃长期打算，我们就能够干得更好。我们完全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正如詹姆斯所说，我们命运所系的全部**条件**仍然一如既往地充满了希望。我们已经见识了残酷，而且正因为它不可思议，所以它不是最终结局。不就是 1914 到 1919 年的柏林、莫斯科和凡尔赛吗？那不是善恶的最后大决战。越是能够抱着现实主义态度熬过残酷与疯狂，人们就越是有权利说，我们不会愚蠢地认为，因为另一次大战的爆发，情报、勇气和努力就再也不能为所有人设计美好生活了。

恐怖虽然巨大，却不是无所不在。有腐败，也有廉洁。有混乱，也有奇迹。有弥天大谎，也有人在决心揭露谎言。这不是判断，只是一种情绪——如果人们否认有些人一直在这样做，而更多的人，最终会有足够多的人可能会这样做的话。你可以对从未存在过的东西感到绝望。你可以对有人会长出三个脑袋不抱希望，尽管萧伯纳先生即使对此也不愿绝望。但是你不能对人

类已经表现出的品德所带来的前景感到绝望。如果你在以往10年的全部罪恶中看不到男男女女众所周知、你也希望多多益善的那些时刻,那么上帝本人也无力帮你了。